

四川古陶瓷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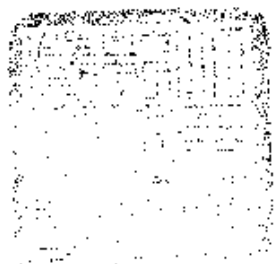
四川古陶瓷研究 (一)

《四川古陶瓷研究》编辑组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05165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四·六·成都

1005165

责任编辑：张 力
封面设计：张复祥

四川古陶瓷研究（一）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新津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60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成都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书号：8316.6 定价：平装1.60元，精装2.60元

四川省文化厅文物组主编

主编：沈仲常

编辑：黄微曦

李立新

四川省文化厅文物组

成都

目 录

- 四川瓷器的化学分析鉴定……高毓灵著 曾中懋译 秦学圣校(1)
- 四川古代的陶瓷器用……傅振伦(16)
- 四川陶瓷概论……杨肃谷(23)
- 邛崃、琉璃厂窑遗址……郑德坤著 成恩元译(27)
- 川西古代瓷器调查记……徐鹏章(41)
- 四川省古窑址……陈万里 冯先铭(52)
- 成都附近古窑址调查记略……林 向(55)
- 从四川唐宋古瓷窑炉看南北科技交流……丁祖春(58)
- 四川省古窑址……冯先铭(63)
- 试谈四川古代瓷器的发展及工艺……陈丽琼(65)
- 四川威州彩陶发现记……林名均(84)
- 四川邛州古窑址……(英)贝德福著 成恩元译(92)
- 唐邛窑奇品……罗希成(96)
- 访邛崃十方堂古窑记……杨枝高(97)
- 邛崃陶器……(美)葛维汉著 成恩元译(101)
- 邛 窑……魏尧西(114)
- 四川邛崃县发现古代窑墩及陶片……罗永祚(119)
- 四川邛崃十方堂古窑……丁祖春(120)
- 邛窑新探……陈丽琼(131)
- 青羊宫古窑址试掘简报……江学礼 陈建中(143)
- 成都青羊宫遗址试掘简报
……四川省博物馆江学礼 陆德良 执笔(150)

琉璃厂窑址·····	(美)葛维汉著 成思元译	(154)
四川华阳县琉璃厂调查记·····	林坤雪	(169)
成都胜利公社琉璃厂古窑·····	丁祖春	(171)
成都琉璃厂古窑·····	陈德富	(181)
四川彭县金城窑白瓷·····	魏达议	(183)
四川彭县磁峰宋代白瓷窑址试掘·····	冯德安 丁祖春	(191)
略谈彭县磁峰窑白瓷的装饰艺术·····	丁祖春	(202)
四川彭县磁峰窑址调查记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彭县文化馆		(205)
四川广元黑釉窑初探·····	王家祐	(209)
广元磁窑铺黑釉窑·····	丁祖春	(213)
四川广元瓷窑的调查收获·····	重庆市博物馆	(221)
记广元宋墓腰坑出土文物·····	魏达议	(235)
四川崇宁县铁钻山的古窑址·····	支沅洪	(237)
四川省新津县邓双乡发现古代窑址二处·····	罗永祚	(239)
成都金堂县金锁桥古窑址·····	陈丽琼	(240)
灌县玉堂公社古瓷窑址试掘·····	四川省博物馆 灌县文管所	(242)
灌县郫县南朝至唐古窑群调查·····	陈丽琼	(257)
乐山县关庙古窑址·····	陈丽琼	(270)
四川西昌高枳唐代瓦窑发掘简报 ·····四川省博物馆 西昌地区博物馆 西昌县文化馆		(272)
重庆近郊的建窑遗址·····	(美)葛维汉著 秦学圣译	(275)
巴县姜家窑址·····	陈丽琼	(277)
四川武胜匡家坝汉代砖窑试掘记·····	陈丽琼	(279)
宋代石炉棚馒头窑·····	陈丽琼	(283)
重庆宋代天目瓷·····	陈丽琼	(288)
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		(302)
巴蜀在中国文化上之重大贡献·····	傅振伦	(312)
编后记·····		(315)

四川瓷器的化学分析鉴定

高毓灵著 曾中懋译 秦学圣校

前 言

中国的瓷器具有悠久和著名的历史。根据可靠的资料，我们可以追溯到周代（公元前 255 年）。那时，虽然青铜器已经普遍地使用，瓷器也开始以粗糙的形式出现，这种粗糙陶瓷器可以认为：是中国瓷器生产的开始。进入汉代之后，瓷器有了相当大的明显改进。据信涂釉的方法最初是从国外传入的。众所周知，在汉代有个人——张骞出使西域，可能是通过他把涂釉技术引入中国。在唐、宋时期，瓷器迅速地发展，不断地得到改进，变得更

很普遍。显而易见，把早期粗糙类型的瓷器改进为后来的精美产品，给我们提供了中国文明发展的某种概念。在唐代后期，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人物出现于瓷器的图案上。较大的耳垂，似乎是因为戴着沉重的耳环所造成的；瓷佛像的制造已很普遍，表明那时佛教的传播广泛。上述的瓷器涂釉工艺可能是从西方国家传入的，从希腊和其它国家得来的一些证据，支持了这个看法。研究中国瓷器可使我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的瓷窑

过去若干世纪中，中国瓷器的制造和其它一些生产，都包含了许多家传秘密。虽然我们的祖先通过艰难的试验过程，经历了若干次试验，终于生产出很精细的瓷器。这些知识和经验仅掌握在他们近亲的家庭成员中，并仅仅适用于某些有限的地区。这种生产体制的主要缺点是：在特殊地区用来生产瓷器的原材料消耗尽了的时候，局部的经验就不能促使进一步发展。如果家庭是严守它的秘密，没有把秘密泄漏给他们的徒弟，当家庭成员全部死亡的时候，秘密也就失传了，即使原材料充足，也仍然无济于事。

由于在家庭和地区之间，在技术上的差异，所用原材料的部分物理和化学特性及在品种上的差异，还由于独特的风格、图案等等也在发展，不同的瓷窑就各具特色。已知最著名的瓷窑如下：汝窑，在河南；官窑，两个在杭州，一个在开封；定窑，在直隶；龙泉窑，在浙江；建窑，在福建；大邑窑，在四川。直隶，河南和浙江的瓷窑看来都有丰富的原材料——粘土。定窑的产品最著名，据说定窑瓷器的胎很薄，能透光乃至透明，釉具有类似象牙的色泽。

鉴定瓷器的方法

从上所述，可见研究中国瓷器不是简单的事情。为了获得对中国瓷器的一个准确的分类法，以鉴别瓷器的不同烧造时期和瓷

窑的名称，一些人终生从历史、宗教著作、各种书籍和其它来源中收集资料。有很多方法可用于瓷器鉴别。但是大多数属于考古学范畴，例如：

1 . 造 形

一般认为，唐代瓷器的造形多受希腊和波斯瓷器的影响。

2 . 装 饰

周代制作的瓷器，仿效比较早期的青铜容器的形状，使用动物和人的原始形象来作装饰。汉代瓷器的装饰中有老虎或狗跟随在骑马人的后面。

3 . 釉 色

在东汉瓷器上普遍地涂绿色釉，但在唐代瓷器上常常是涂黄色或浅绿黄色的釉。

4 . 图 案

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唐代，荷花、舞伎和佛像都被用于图案。

5 . 标记和铭文

一般在瓷器的底部有标记或铭文，它们提供了制作者或瓷窑的名称，并且常常还有制作的时期。

6 . 特 征

建窑的产品是有斑点，其它窑址是在碗的内表面完全涂釉，另外还有一些器物是在外表面完全上釉。

7 . 化学组成

因为釉是一种复杂的硅酸盐，可以进行化学分析。如果用于釉分析的不同朝代的样品是有可靠的和确切的年代，样品的化学组成又可能获得。那么任何与某一样品的化学组成相同的釉的烧制年代就能确定。

对于来源不明的瓷器标本，博物馆专家一般使用上述六个方法来叙述，但是很少研究它们的化学组成，所以全面地科学研究，需要化学分析来旁证，用其它方法鉴定其结果。

1936年，两个大型的古代窑址被找到了，一个在邛州，

距成都西南二百华里附近；另一个在琉璃厂，离成都仅有20华里处。这是在四川考古史上的重要发现。

这两个窑址中的一些瓷器标本收藏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葛维汉(David·C·Graham)博士开始研究这些来自考古发掘的瓷器。并请我担负釉的化学分析。希望这项工作可能有助于说明这些窑的时代。问题是相当的简单，因为窑址是知道的。主要问题是确定这两个窑进行生产的时代。

实 验

化学分析的结果见下表

表 I

琉璃厂窑址的瓷器

编号：101 C/5515 在遗址中发现的定窑白瓷。

1. 物理检查

白色的釉是很坚硬的，外表面类似于大理石。

2. 化学分析

	百分率
SiO ₂ (氧化硅)	64.90
Al ₂ O ₃ (氧化铝)	30.00
CaO (氧化钙)	5.01
合计	99.91

3. 分子式



4. Alumina / Silica (铝/硅) 0.30

编号：102 C/5712 在遗址中发现的白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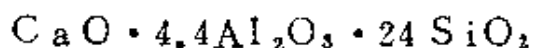
1. 物理检查

白色的釉是硬度很低的，

2. 化学分析

	百分率
SiO ₂ (氧化硅)	67.60
Al ₂ O ₃ (氧化铝)	30.76
CaO (氧化钙)	2.52
MgO (氧化镁)	微量
合计	100.88

3. 分子式



4. Alumina / Silica (铝 / 硅) 0.18

编号: 103 C/16391 褐色或浅黄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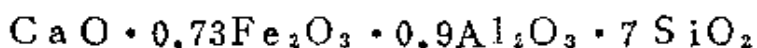
1. 物理检查

胎是浅红褐色，并复盖着一层薄釉

2. 化学分析

	百分率
SiO ₂ (氧化硅)	64.65
Fe ₂ O ₃ (氧化铁)	12.28
Al ₂ O ₃ (氧化铝)	14.28
CaO (氧化钙)	8.78
合计	99.99

3. 分子式



4. Alumina / Silica (铝 / 硅) 0.13

编号: 104 C/5260 在遗址中发现的黑色或红色的建
窑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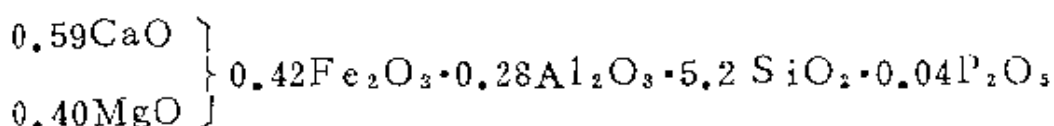
1. 物理检查

非常坚硬的、暗黑色的釉具有一种优美的闪耀的光泽。

2. 化学分析

	百分率
SiO ₂ (氧化硅)	70.10
Fe ₂ O ₃ (氧化铁)	10.40
Al ₂ O ₃ (氧化铝)	6.33
P ₂ O ₅ (五氧化二磷)	1.38
CaO (氧化钙)	7.78
MgO (氧化镁)	3.61
合计	99.60

3. 分子式



4. Alumina / Silica (铝 / 硅) 0.05

编号: 105 在遗址中发现的较粗糙的本地生产的建窑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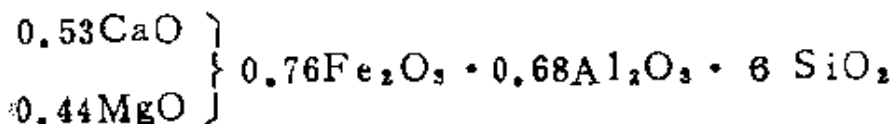
1. 物理检查

釉是深红棕色

2. 化学分析

	百分率
SiO ₂ (氧化硅)	65.30
Fe ₂ O ₃ (氧化铁)	14.20
Al ₂ O ₃ (氧化铝)	12.00
CaO (氧化钙)	5.39
MgO (氧化镁)	3.00
合计	99.89

3. 分子式



4. Alumina/Silica (铝/硅) 0.12

编号: 106 浅黄绿色

1. 物理检查

在浅黄绿色釉和浅红色的胎之间有一很薄的白色泥釉层

2. 化学分析

	百分率
SiO ₂ (氧化硅)	62.50
Fe ₂ O ₃ (氧化铁)	15.96
Al ₂ O ₃ (氧化铝)	12.97
CaO (氧化钙)	9.50
合计	100.93

3. 分子式



4. Alumina/Silica (铝/硅) 0.09

编号: 107 C/13905 深褐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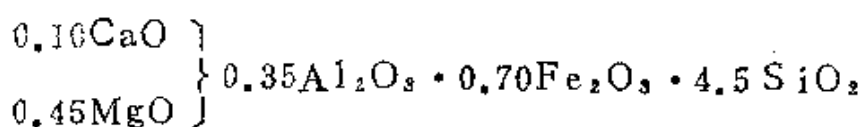
1. 物理检查

这个釉有明亮闪光的表面, 在釉和深褐色的胎之间还有一泥釉层。

2. 化学分析

	百分率
SiO ₂ (氧化硅)	66.10
Fe ₂ O ₃ (氧化铁)	18.90
Al ₂ O ₃ (氧化铝)	8.80
CaO (氧化钙)	1.47
MgO (氧化镁)	4.40
合计	99.67

3. 分子式



4. Alumina/Silica (铝/硅) 0.09

表 II

邳州窑的瓷器

编号: 108 C/13530 博物馆内的模式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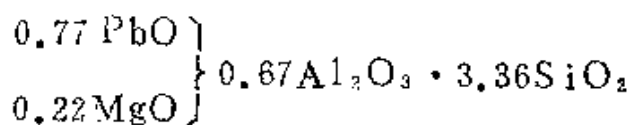
1. 物理检查

釉是芥末黄色, 在釉和胎之间有一泥釉层。

2. 化学分析

	百分率
SiO ₂ (氧化硅)	44.51
Al ₂ O ₃ (氧化铝)	15.22
PbO (氧化铅)	37.68
MgO (氧化镁)	2.01
合计	99.42

3. 分子式



4. Alumina/Silica (铝/硅) 0.20

编号: 109 邳窑类型 博物馆的标本

1. 物理检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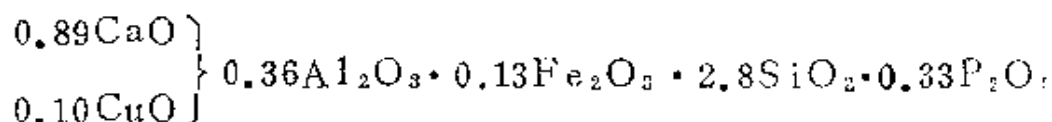
釉是兰色或紫色

2. 化学分析

	百分率
SiO ₂ (氧化硅)	60.87
Fe ₂ O ₃ (氧化铁)	5.15

Al ₂ O ₃ (氧化铝)	10.52
CaO (氧化钙)	18.35
CuO (氧化铜)	3.11
P ₂ O ₅ (五氧化二磷)	1.80
合 计	99.80

3. 分子式



4. Alumina/Silica (铝/硅) 0.13

编号: 110 C/130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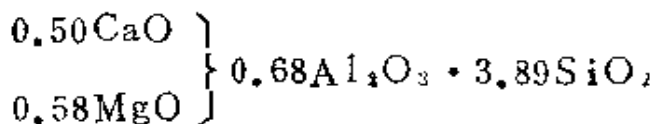
1. 物理检查

釉是灰色

2. 化学分析

	百分率
SiO ₂ (氧化硅)	65.40
Al ₂ O ₃ (氧化铝)	20.10
CaO (氧化钙)	7.81
MgO (氧化镁)	5.46
合计	98.80

3. 分子式



4. Alumina/Silica (铝/硅) 0.17

编号: 111 C/13081和C/13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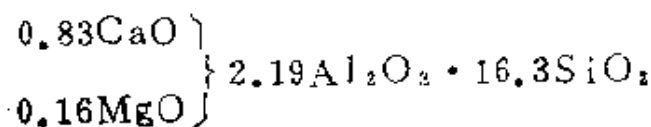
1. 物理检查

釉的硬度很低，是一种很暗的淡黄色，它的外表类似一粘土层。

2. 化学分析

	百分率
SiO ₂ (氧化硅)	75.92
Al ₂ O ₃ (氧化铝)	19.25
CaO (氧化钙)	3.90
MgO (氧化镁)	0.59
合计	99.66

3. 分子式



4. Alumina/Silica (铝/硅) 0.13

编号: 1 1 2 C/134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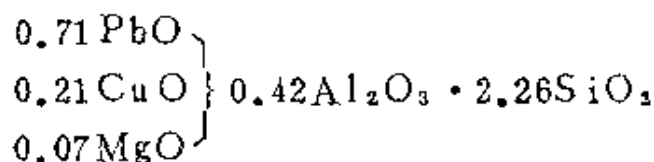
1. 物理检查

釉是深绿色，在釉和胎之间有一泥釉层。

2. 化学分析

	百分率
SiO ₂ (氧化硅)	37.76
Al ₂ O ₃ (氧化铝)	12.50
PbO (氧化铅)	44.64
CuO (氧化铜)	4.45
MgO (氧化镁)	0.90
合计	100.25

3. 分子式



4. Alumina/Silica (铝/硅) 0.18

编号: 1 1 3 C/134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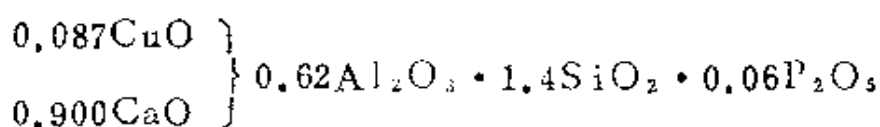
1. 物理检查

釉是绿色

2. 化学分析

	百分率
SiO ₂ (氧化硅)	38.70
Al ₂ O ₃ (氧化铝)	29.78
Fe ₂ O ₃ (氧化铁)	微量
CuO (氧化铜)	3.13
P ₂ O ₅ (五氧化二磷)	3.80
CaO (氧化钙)	23.10
合计	98.51

3. 分子式



4. Alumina/Silica (铝/硅) 0.44

编号: 1 1 4 C/14175

1. 物理检查

釉是褐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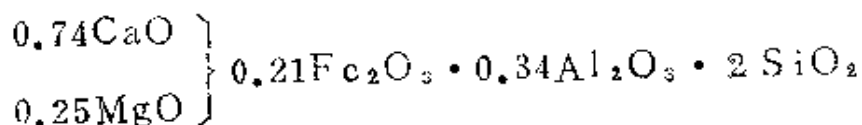
2. 化学分析

	百分率
SiO ₂ (氧化硅)	53.05
Fe ₂ O ₃ (氧化铁)	10.35
Al ₂ O ₃ (氧化铝)	15.55
CaO (氧化钙)	18.25

MgO (氧化镁) 4.55

合计 101.75

3. 分子式



4. Alumina/Silica (铝/硅) 0.17

重庆黄桷埡

编号: 1.15 C/16334 浅红黑色的天目瓷茶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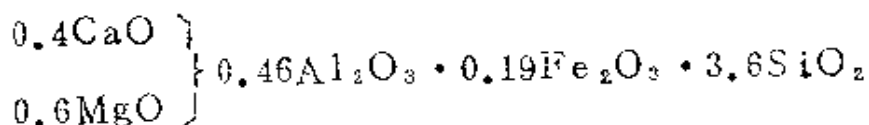
1. 物理检查

釉是黑色

2. 化学分析

	百分率
SiO ₂ (氧化硅)	64.90
Fe ₂ O ₃ (氧化铁)	6.29
Al ₂ O ₃ (氧化铝)	14.68
CaO (氧化钙)	6.72
MgO (氧化镁)	7.30
合计	99.89

3. 分子式



4. Alumina/Silica (铝/硅) 0.13

泥釉的分析

	百分率
SiO ₂ (氧化硅)	70.20
Al ₂ O ₃ (氧化铝)	28.57

CaO (氧化钙)	1.20
合 计	99.97

表 Ⅲ
中国早期陶瓷制品的分析

	高硬度宋 釉百分率	低硬度宋 釉百分率
SiO ₂ (氧化硅)	70.3	68.2
Al ₂ O ₃ (氧化铝)	10.0	9.5
CaO (氧化钙)	5.9	7.1
(K ₂)Na ₂ O [氧化钠(钾)]	5.0	5.0
Fe ₂ O ₃ (氧化铁)	5.3	3.5
P ₂ O ₅ (五氧化二磷)	7.2	8.0
CuO (氧化铜)	微量	微量
合计	101.3	101.2

上面数据取自赫瑟林顿 (Hetherington) 《中国早期的陶瓷器》，为了比较，摘录在这里。

讨 论

从分析的数据中，我们发现两个邛窑瓷器标本含有高百分率的氧化铝，另外两个标本含有磷的氧化物，其余的标本既不含氧化铝，也不含有磷的氧化物。对于来自琉璃厂窑的标本，仅有一个含有磷的氧化物，但都不含铅，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用我们的分析结果与那些已在英国发表的材料相比较，就不难知道这些瓷器的制作时代。

在赫瑟林顿 (Hetherington) 的报告中，氧化铝是从汉朝到唐朝的釉中发现的。但是在宋代两种完全新型的釉已开始使用，并有过报道，在这两种新型的釉中都没有检测到铅的存在。

类含有磷，另一类不含有磷，属于长石类型。在宋代之后，含铅的釉又开始使用。

瓷胎的生产完全使用粘土，这是长石经过长期风化后的一种产物。使用粘土经过人工制成胎，一般都比较疏松，并能吸收水分。这两个缺点多少限制了它的使用。可以采取一种补救的办法，就是把釉涂在表面上，釉不仅能补偿缺点，还产生光泽，为装饰这些器物，使之更加漂亮提供了一个机会。

应用于表面的釉糊是一种很细的碾磨过的长石、燧石、石灰石、沙、粘土和金属的或非金属的氧化物的混合物，混合物在重新干燥后被灼烧，这是非常必需的。灼烧使釉变成一种流体或半流体状态，正好使它填满器物的空隙，并均匀地复盖表面。一般釉的灼烧温度是比胎的灼烧温度低。这是为了防止胎发生畸变。

铅釉具有两个众所周知的特性：灼烧温度低和有毒，之所以铅釉普遍地用于汉代到唐代，可能是由于灼烧温度低。从那时以来，瓷器的生产没有多大的发展。硬度低的釉是容易制造的，而且我们的分析结果也表明，在硬度低的釉中没有氧化铅的痕迹。据现所知，这是必要的，如象玻璃那样，是为了减少可熔性。宋代瓷器工匠不得不停止使用铅釉，而使用一种新类型的釉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铅釉有毒性。因为许多物质或多或少地溶解在水中，微量的铅是能从釉中出来，溶解于盛在瓷器的水中，毒性很大。剥落的釉碎片同食物相混合，可能包含着引起危险结果的铅。因此，瓷器工匠是必然试图用其它烧结更容易的原材料来作釉。磷酸钙取代氧化铅也许是具有与铅釉差不多的可熔性，但是磷酸钙没有任何毒性。虽然我们不能够从文献上来证实这个想法，但我有理由相信，磷釉使用于宋代早期。因为长石釉一般需要比较高的烧熔温度，仅仅比粘土低 200°C 或 300°C 。那个时代的人们缺乏瓷窑结构、气体燃烧、热交换、空气预热或者为了加速燃烧而使用通风设备的科学知识。大量地使用长石釉需要达到很高的温度，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一些改进出现在宋代，可能是南宋

的工匠利用上面提到的原则，以原始的方式，成功地达到了那样高的温度。

一些邛窑产品在胎和釉之间有一硬度低的白色层，在陶瓷工业中称之为泥釉，在使用比较浅色的釉以前，用它来涂抹深色的胎。把泥釉应用到瓷器上，在唐宋时期是很普遍的。我们的化学分析表明：泥釉是一种纯净的粘土。

结 论

显然，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认为邛窑是在唐代末期到宋代中期（公元950——1100年）进行生产。这个结论基于在一些釉中包含有铅，一些釉中包含着磷的氧化物，另一些是似长石类。琉璃厂窑大概的生产时期是南宋（公元1100——1200年），在釉中没有发现铅的存在，并且许多釉都是似长石类。关于这两个瓷窑的烧制时代，使用化学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与葛维汉博士使用其它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译自 Yu-Lin Kao: Identification of Szechwan Porcelains by Chem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XI, P54—65, 1939.

四川古代的陶瓷器用

傅振伦

一、引言

外人称我国曰丝国，曰支那，盖丝与瓷，皆为中国所发明也。中国瓷器，导源于陶器。在新石器时代，已有陶器之埴埴。民国十一年以来，河南、辽宁、甘肃，屡发现其时的粗陶，彩陶，即学者所称之仰韶期陶器者也。山东谭国故城所出新石器时代末期之黑色陶片，尤为精致。《吕氏春秋》载：“黄帝有陶正之官，”又称“昆吾作陶。”太史公谓：“舜陶于河滨。”皆载籍之可考者矣！商代铜器，雕制精美，其陶范必亦精工。由安阳殷墟出土白色雕花陶片，可推而知也。《礼记·曲礼》，述周氏制作，谓天子有六工，典制六材，陶旋之上为土工。《冬官考工记》曰：“凡陶旋之事，鬻垦薛暴，不入市。”其重视陶器也又如此。秦汉以降，铜之产量有限，货币又需以铜为之，陶器骤形发达，此实其主要原因。尊、彝、鼎、鬲之类，后世多有发见，有兽环，璃耳，雁足等装饰；有鸟兽，花草等图案；有青、绿，赤、白等涂彩；且表面之光泽，或如银、或如玉、或如珍珠、或如云母。良以两汉与西域交通日盛，西方所产之琉璃，输入益多，因而发明油（即泐字，或作黏。下同）药，施诸陶器。较诸周末陶器“银釉”，进步多矣。两汉砖瓦陶柱，亦皆讲求，印花者有之，透雕者有之。宋代印花，划花等瓷器，明代珐华，镂空等瓷器，实由此演进以出。瓷器盛，而陶器微矣。

瓷字不见《说文》，汉代无瓷故也。其字之见于字书，始于晋吕忱之《字林》（《文选·笙赋》注引），继见陈顾野王之

《玉篇》。杜毓《筭赋》，且举东瓯窑名。惟其时之所谓瓷器，实涂油坚致之陶器，固非今日之所谓瓷器也。元魏有洛京窑。陈至德初，吕南陶殿础。隋大业作狮象大兽。唐窑十有八，此余所知者，陆羽《茶经》，独称邢、越二窑。大邑白瓷，杜甫咏其坚洁轻薄，定洲白瓷，清光绪丙午发现于越洲都督府长史李基墓。武德中，昌南有陶霍两窑器，且贡于朝。观乎《云仙杂记》所述无宝之自暖杯，苏雷曼所记大中作品，则通莹坚实，已合于布朗格尼亚Brongniart之瓷器界说矣。郭道源能以邢越瓷 瓿十二调音律，马处士，异蟪，步非烟，皆善击瓿。瓷可入乐，其精美何如耶？五代瓷器，柴窑及秘色窑最著。宋有五大名窑，为世所称。明清以来，诸彩大备。康、雍、乾诸朝，继往开来，益臻佳丽。就余调查所及，今古造瓷之窑，二百三十余所，产瓷省区，一十有九（见拙著历代瓷窑表），自古迄今，历世烧造不辍者，惟建于季汉新平之昌南镇窑（即今景德镇），及北宋初叶建于阳翟县神垕山（在今河南禹城县境）之钧窑而已。

窑器种类，普通分土器，石器，陶器，瓷器四种。盖以胎骨及火候而为之区别者也。统而言之，亦不过陶瓷二者而已。今论四川古代陶瓷器用，亦就二者而言，余尝撰巴蜀在中国文化上之重大贡献一文，刊载说文杂志，亦略及川省陶瓷发见梗概，兹又补充而阐述之，以实四川专号，尚希高明有以教之！

二、四川古陶器

四川古代陶器，可于古墓出品中见之，盖全为明器也。四川古代棺槨，多以石为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曰：“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槨，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槨为纵目人冢也。”今古棺发现，亦以石棺居多也。又《老学庵笔记》曰：“临邛夹门镇山险处，得瓦棺，长七尺，厚几二寸，与今木棺略同，但盖底相反，骨犹不

坏，棺外列置瓦器，皆极淳古。时靖康丙午岁也，李知凡及见之。”则棺又有以陶瓦为之者矣。古代川陶，即出此等石瓦棺椁中。法人色伽兰，拉狄格，法占等撰中国西部考古记（冯承钧有译本，商务印书馆刊行之），记河口彭子浩诸石窟曰：“入口之隧道，长二十五公尺，愈入愈宽。……隧道左壁，凿有小坑室二……其一尚存一棺及后述之画砖。内隧又有入口，口内隧道较外宽高。……出内隧，为一大室。……内隧与大室之左，有室三，一在隧左，室横列，二在室左，直列。……别凿有长方之窗，窗上有格，壁上置有零星小物之所……。”又曰：“彭子浩窟中之内容，尤有堪注意者，其中有棺，有人骨，有画砖，土器小像，且有一粘土烧成之瓦棺……。画砖有菱形画，汉墓常见之画砖也。土器为无饰画之碗瓶。小像与洛阳附近邙山出土之像相类，但观其形式之古，其时代应在邙山作品之前，除所集前述诸品之外，附近乡民，又献其所得同样物品。其中有一汉制铜瓶，皆足以辅助鉴定也。吾人竟可于此处，名之曰‘汉代艺术纪元’……。”见（第二章岩墓）其物均佚，不可复考矣。今伦敦大英博物院陶瓷陈列馆，收集四川出土陶器若干件，形象奇朴，色或红或灰，红者尤多，殆火度较低之所致也。二十七年巴县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发现后汉石棺，颇有明器。有土俑（头部仅存）有猪、鸡、鱼等品，皆古拙可喜。二十九年江北汉墓，亦有明器之出土，大致与彼相类，亦与陕西所出汉俑明器，同其风格。

中国古代陶器，有所谓“唐三彩”者，实即“笔拓三彩釉器”。盖合色于釉内，或拓或浇于器坯胎之上，置匣钵入窑烧成之器也，实则三色釉，非三彩也。三色者，铅黄、青、绿也。此等器用，四川亦有发现。余所见者，有出自川北之陶罗汉像，高尺许，下为镂空座。袈裟色浓绿，边缘棕色，制作极拙，釉暗淡无光。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成都东门外，亦发现土俑十一事。其二素烧无釉，其九为“三彩”。有文武官吏，有鸡犬又有人首

蛇身者二具，其一红色而绿尾，其一白面而红尾，岂女娲之像欤？

古代砖瓦，出土亦伙，且全属墓塘之物。中国西部考古记述昭化关索妻鲍三娘墓曰：“见一窟室，穹顶以画砖筑之，破壁而下，见一大室……。壁与顶皆以画砖砌成。其砖之体范，应属汉代。就饰画别，其种类有五：有具菱形者，有具雕线者，有汉武时钱纹者，有模四足兽似鹿者，有模架车者。前二类砖，穹顶有之，马与钱在壁上，四足兽在其两端。”（见第一章中国古代之石刻）汉墓画砖，可见一般矣。往岁余客成都，得东汉以来墓砖拓本二十八方。汉代之砖，皆有花纹，或为几何图案，或作草木鸟兽人物故事之像。其有年代铭文者，录之于下：

汉：永平三年三月（新津宝资山发现）九年 十三年三月
作永平 建初元年 永元八年 延平元年八月二十日 永建
元年 四年

晋：犍为太守零陵刘府君侯作 晋太康九年造 元康五年
七月一日造 太亨三年

刘宋：元嘉元年 泰始五年太岁己酉宜都夷道何孝廉康夫
人桑氏神墓

赵宋：太宗伯苏公墓

余常游江北，南岸，路侧见汉砖不少。江北墓砖，铭文有作“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壑谨……”等字者。盖四川汉代墓砖，散在地面者，实数见不鲜也。倘能汇拓而著录之，亦考古上之趣事也。墓砖多平正，而作长方形，与今制略同，惟长宽每大今砖三分之一耳。其砖之两侧，内面上端突出，而外面下端突出，且其一端作凸起状，一端凹入作臼状，盖诸砖衔接砌塘，且平行数排，故作此行，殊较牢固。延光四年砖之所谓“牢壑”者，或指此也。《鉴诫录·判木夹》：唐末，蜀主竟能“役陶匠二十万烧砖，欲塞剑门。”则五代四川陶工之多，由此可见。盖四川陶业，自昔已大盛矣。

三、四川古瓷器

吾国古用陶器，厥后进而为瓷器。陶之质为土，随地可以取资，故产陶器之地极广。瓷则采石制泥为之，瓷土有产与不产，质又有美有恶，故制瓷器之区有限，而品类亦有精粗之分也。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篇》曰：“凡白土要土……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洲，平凉华亭，太原平定，开封禹洲，南则泉郡德化，徽郡婺源祁门。他处白土，陶范不粘。”实则此外尚多产瓷土之地也。今以川康言之，雅安所出，其品为上，闻今江津窑业工厂所为精瓷，即取给于彼。广元瓷土亦佳，地质学者任熙亭先生，曾为余言之。按之载籍，成都，邛州，大邑等地，均产瓷，则其附近，亦必各有精美之瓷土也。

四川制瓷，始于李唐，至五代赵宋而益盛。《奉天录》曰：“蜀主都门附近，窑门甚多。太史奏曰：‘窑门出天子’。有诏：去城七里内诸窑，尽废之。”亦其征也。今就出土瓷器以考之，则知境内古窑，殆有四处，试分言之：

(一)邛窑 民国二十四年，邛崃城郊，忽发见大批残碎瓷器，军人陈某大事收集。残整瓷器，每斤出洋三角以购之。于是邛瓷，皆归陈手。二十五、六年，军人唐某，更于其地作大规模之发掘，获精品甚多，世称邛窑。远近闻风，争相购求。有好事者，且远之上海市立博物馆，开展览会。龚煦春先生并撰邛窑器考，未付梓而卒。按邛器胎骨坚致，全体敷釉，釉色不一，有青绿，有黑、白，有紫黄。其品类则有人物、戏婴、鸡、犬、龟、鱼（苏埏《垆上记言》：“始皇冢中，以琉璃杂实为龟鱼。”则以龟鱼为明器，或始于斯也）、球铃等物。酒盏有似柳斗者，或仿自北宋定窑制作也。又有所谓省油灯者，发见多器。按《陆放翁全集·斋居纪事》曰：“照书烛必令粗而短，勿过一尺。粗则耐，短则近。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盏最省油。蜀有夹瓷盏，注水

于盞唇窍中，可省油之半。灯繁法，高七寸，盘阔六寸，受盞圈径二寸半，择与圈称者。”《老学庵笔记》曰：“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灯盞诗。今汉嘉有之，盖夹灯盞也。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盞为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邵公济牧汉嘉时，数以遗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尝为玉津令，则汉嘉出此物，几三百年矣。”考文安公即宋白（936年生，1012年卒），蜀平为玉津县令。有司初谥白为文宪，内出密奏言，白素无检操，遂改文安。有集百卷。事详《宋史》卷四39文苑传中。汉嘉在今雅安境，去邛州近，省油灯盞，或亦来自邛州也。今亦可仿制省油灯盞以节泊料也。

（二）大邑窑 杜少陵集于韦处乞大邑碗诗曰：“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则其器之洁白坚薄清韵可知，惜传世者少。四川华西大学博物馆及贵州某军人，藏有数器，闻皆为白碗，未能寓目，为憾事耳！

（三）琉璃厂窑 成都东门外十里，有琉璃厂故址，相传五代蜀时，陶制于此。成都少城公园中，有民众教育馆，其金石馆陈列多器，皆新近出土于此者。会府诸古玩铺，亦多有之。其品类与邛窑器多同，亦有温凉灯盞，又有风字砚。是窑制作，陋劣可厌，胎骨以粗糙之黑泥为之，釉色或黑或白，或青或绿，皆暗无光泽。露胎，釉未能遮器之全体。古玩铺中人，每以冒充邛窑器，实精粗不同，相去固甚远矣。

风字砚，一称畚箕砚，象其形也。日本正仓院所藏盛唐瓦砚，有以形似凤字而嵌以凤字者。古人喜用陶砚，拙作《五代十国之瓷器》曾言之。米芾《砚史》曰：“陈文惠丞相家，收一蜀王衍时皇太子陶砚，连盖，盖上有凤坐一台，馀雕杂花草，涅之以金泥红漆，……有字曰凤凰台。”此蜀制陶砚之见诸载籍者。《砚史》又曰：“杭州龙华寺，收梁傅大夫瓷砚一枚，甚大，瓷褐色。心如釜，环水如辟雍之制。下作浪花擢环近足处，而磨墨处无瓷釉。”今琉璃厂窑所制瓦砚，形制与之相同。底下有二

足，其上傾斜，故一端低下，可以留墨水也。

（四）蜀窑 《唐氏肆考》載：唐末前蜀王建，報朱梁信物，有金梭碗。致語云：“金梭含寶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蓋蜀窑所制，秘色為上也。《景德鎮陶錄》稱蜀窑器：“體薄而堅致，色白而清，為當時所珍重。”而中見由 以 網 盜 為 之 也

四川陶瓷概论

杨 漱 谷

四川在过去交通不便，为了民众需要陶瓷，汉代就有人制陶，唐代就有人制瓷。这就地下发见品来看是可以充分证明的：汉代的有新津出土的仿周古铜尊，上有“元延”的年号；唐代的也有由土中掘出的白泥胎挂缥青釉洞中仙人，上有“天宝二载”的年号。“元延”为汉成帝的年号，“天宝”为唐玄宗的年号，确实证明四川在汉、唐时代已经制有成形的陶器和瓷器留在土中。所以近代考古学者最注重从土中发掘，并最注重带有年号的东西，有了年号，时代上就无疑问了。缥青釉在一般人认为是月白色，此中有铜，有铅，有生石灰配合而成。唐代越州窑也有这种颜色，大概是互相模仿，各求进化。但有为地质所限者，虽用极科学之人工，终归是陶器，绝不能制成瓷器。这个理由到底在那里？因为长石质岩石有风化残留的粘土，是纯白质，无杂质参入其中，才能烧成瓷器。倘若地层变迁及山洪冲积的粘土，是无法烧成瓷器的。四川粘土每多混杂，故从汉而唐、而宋、而元、而明、而清，陶器制得多而瓷器制得少。凡属瓷器须具备四种条件：1. 质地细致坚实；2. 火度要高；3. 胎骨洁白照见半透明；4. 扣之有清越之声。反之，仍属陶器，就不得与江西景德镇所烧的明瓷、清瓷相提并论也。

兹举四川各地窑系论列如下：

一、大邑窑系

大邑县城在汉时原属江原县地。晋以后江原县改名晋原县。

唐时划了临邛、江原、唐安、新津诸地置大邑县。这个县地比任何县地还要广大，故名大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这是“天宝”年间一位大诗人杜甫在成都做的一首诗，分明看出大邑所烧的瓷，颜色是雪白的，胎骨轻坚，必定是火度高的，敲去声音清越如同哀玉，当时确能使杜甫生怜爱心。最近在大邑东关场土中掘出窑王像，上刻有款曰：“大唐‘天宝’三载六月四日唐安郡晋原县德信里永昌窑敬造窑王像”共二十七字。有原来的白釉挂在上面，始知大邑的瓷窑，唐时有名永昌窑者，在今东关场。又于怀远镇（即今崇庆县所属的分州）土中掘出乳白色而带印花的中盘残片。又于灌县蒲村土中掘出粉白色的素陶残片。这些白色还是属于大邑窑系。白釉内加牛骨灰便呈乳白色，白胎骨挂上最白的土，便叫它是化妆土。如果再加上白釉，愈显得白到了不得，但是，照去都不见得半透明，那就是大邑窑系的美中不足了。

二、涪城窑系

涪城县是六朝西魏时开始置的，北周改为安城，隋又复为涪城。元竟废除。故地在今中江县南一百八十里的胖子店。有人于土中掘出一道釉的天青或影青与粉青瓶、罐、盂、碗诸器，并获有印花、划花残片若干。这几种浅、深青色，浅者类似月白色的丽水窑，有虫耳仿古铜尊；深者类似冬青色的龙泉窑，有凤耳，鱼耳，仿古铜尊。间有开片如哥窑者。惟釉厚不如哥窑，而口足又非铁骨泥色。凡类似丽水窑器，底足黄黑色亦与越州窑大有区别。又于今忠县土中掘出青瓷，瓶每带座。鱼缸内的小山架子，四面开窗，均上加铁绣花朵。这是属于涪城窑系的特征。而开窑的年代，涪城窑和忠县窑，当然要比越州窑要早数十年。

三、彭县窑系

彭县在汉、晋的时候，地属繁县。故至清初曾并入新繁县。

不久，又复置县。所辖的西山有磁峰乡，乡内有普照寺，自汉至唐烧砖瓦器。又自五代历宋、元、明、清不断的产陶，多青灰色或灰白色。盘、碗内有印阴文楷书“河滨逸范”及“金玉满堂”两章。字体如唐人写经。胎骨类似灰陶。今在珊瑚口乡（即“关口”），新兴乡（即“海窝子”），添有陶窑，仍属普照寺组。然而西山山脉不甚有长石，所烧还是陶器。近日虽略有改进，淘去白土，但较江津窑的出品，犹觉不及。因江津窑所用长石，是远自湖南醴陵购买来的。

四、邛窑系

邛即邛州。六朝的南梁始置邛州，唐因之，州署在依政县。不久，又移在临邛县，便是今之邛崃县。这个地方产铁，虽不及荣经铁骨泥之丰富，然在汉时已有砖瓦窑。至唐有白地的紫色、黄色、绿色三彩釉，世上简称之曰“唐三彩”间或绿色中加以兰色，极为罕见，比不上洛阳所出的唐三彩兰色来得多，甚有加以黑色的。但是，邛窑器上有刻年款为“开元”与“天宝”者，必为当时人所欣赏。至五代又另辟一途径，如钧州所烧，欲成窑变，宋初有紫、兰、青、绿、黑、黄诸窑变，惟釉质不厚，无腊泪痕及蚯蚓走泥纹。独喜宋工大胆取唐彩涂抹，笔法壮阔，适应大众的要求。又有黄釉小盘内印阴文“元符元年李大兴造”。“元符”是北宋哲宗的年号，邛窑造陶工人李大兴在这个小盘内始发见他，于是四川的陶瓷史上他就应该占一页了。又有黄釉小盘外刻字曰“政和七年”，“政和”是北宋徽宗的年号。这些宋制，底足皆呈紫黑色，凡荣经沙锅及今德昌瓷器仍属邛窑系。

五、琉璃厂窑系

琉璃厂在成都东门外锦江左岸，土脉红色。附近开井，深入

地中文余，犹呈红色。蜀汉烧砖瓦，曾设厂于此。后接受西域烧琉璃的法子，不断地烧出琉璃釉陶器，故世以琉璃厂称。这厂历唐并发达于五代及宋，大约制造盛水、油、米、盐、酒、酱及修盖房屋诸器。间有小儿玩具，亦仿邛窑作风。又有明器和迷信诸品，确属此厂特色。元末因乱停烧。往年有人发掘获得绿琉璃小盘内有“枢府”二字，当为元代所烧的铁证。同时江西景德镇所烧粉青盘内亦有此二字。好些书上认为是奉元朝“枢府”之命而烧的。独是琉璃厂窑所烧各器，胎骨是红色，底足亦然。今荣昌烧酒房的成品，应属琉璃厂系。

（原载《华西文物》创刊号1951年9月）

邛崃、琉璃厂窑遗址 译者注①

(The Kiln Sites of Chiung-Lai and
Liu-Li-Chang)

郑德坤著 成恩元译

在流寓四川的文人中，没有人再比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的杜甫出名了。杜甫于公元756年来到成都，并于城西郊区拥有一所草堂。当他停留四川期间，对离成都六十公里的大邑陶工们所生产的瓷器，印象非常深刻。在他的诗篇（也可以说是个人记录）中，有一首大约作于公元760年给一个“姓韦的朋友”的诗，译者注②曾描写了这种白瓷。译者注③原诗意如下：译者注④

大邑烧瓷轻且坚， 君家白碗胜霜雪，

扣如哀玉锦城传； 急送茅斋也可怜。

多少世纪以来，研究中国美术的学者们都在推想大邑瓷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在那里才能找到这个美丽瓷器的窑址？但一直到现在，这个遗址的确切地点仍没有找到。把诗篇作为数据，按一般科学家们的惯例，这是不能接受的。

邛 窑 遗 址

1936年，一批饶有趣味的陶器开始倾入成都市场，很快地人们就弄清楚它们原是在大邑南十七公里的邛崃出土的。虽然邛崃附近窑地的发现，并不能证实它就是杜甫诗的渊源所自，但对于这一遗址的调查和在窑址“原位”所发现的遗物的收藏，

却在华西陶瓷美术史上确实增加了新的一页。葛维汉博士原注(429)、贝德福先生原注(430)和我于1936年九月曾访问过这一遗址，并为大学博物馆获得一批丰富的收藏品。

遗址位于邛崃城西门外，沿大南河西岸一带。窑址面积长约千英尺，宽约四百至五百呎不等。由于面临大河，这对于一个陶窑来说，确是一个理想的位置，因为它不存在着运输的问题。但它经过了数以百计的年代，遗址上草木丰盛，留有一系列由破碎陶器和其他废物所堆积起来的小丘，丘高四、五十英尺。其中一个倾斜的土堆上，有一个可能建于若干世纪以前的道观。随着时间，村民和士兵们疯狂地从四面八方这个小丘掘进，企图获得一些破坏不太严重的陶器，以便出售。他们这样不断地挖进，以致建筑在废物堆顶上，即将倒塌的那座庙宇，其基础一直呈现在危险之中。

最近成都来的消息说：四川省博物馆所获得的唐式遵将军收藏品，总数不下二万件。当年挖掘进行时，唐将军驻扎在邛崃。据说他曾获得并收藏了一批邛窑陶器的精品。原注(481)

本地的收藏者曾提出一种理论，认为陶瓷的毁灭是由于遭到洪水灾害而放弃的。其实并不如此。遗址高度远在河流水平面之上。如果有这样巨大的洪水冲毁它，那么，位于它东边的整个成都平原将全部会被淹没掉。这样大的灾害，在历史上并没有记载。此外，陶窑的废物积成了土堆，并没有发现像臆想中所说的大南河淹没窑址时，土堆被狂暴的洪水冲刷，使遗物散布在乡间广大地区上的情况。看起来窑址的放弃更像是因为生产原料的罄竭而造成的。我们曾在“原位”上找到本地所不出产的成块的白泥。这可能是在本地材料不足时由外地运来的。

陶窑存在的时间，似乎并不很长。四川的收藏家们似乎倾向于这种说法，即陶窑创建于唐代；到晚唐达于高峰；入宋以后被废弃了。

根据已发表的报告，带文字的陶器碎片，提到的年代有：公

元754、823和874—9等年分。出土的古钱，大多数是五铢、开元等，它们常被混杂在碎片中。

1944年秋，在国立四川大学^①的校园中发现了一座唐墓。它的结构完全与前汉晋时期以及后来的宋、明时期的形制不同。墓室是用大型长方形、素面、灰色砖砌成。墓室呈长方形，两头有方形柱。这是一个女人的墓，中有骨架和陶罐、陶碗各一双。这些陶器都是邛崃窑的产品。陶罐置于骨架右侧近头骨的地方，而陶碗则放在肋骨上，^{译者注②}也许原意是想扣在胸前。当从手腕上取下铜镯时，^{译者注③}腐朽的铜质破了。在墓中发现了一张也许是用古藏文写的咒语印刷品。^{译者注④}还有少量开元钱出土。^{译者注⑤}这说明墓葬属于唐代，很可能在九至十世纪间。这一墓葬极为重要，因为它所显示的不只是在四川所发现的最早的印刷品，和在华西的一种奇特葬俗，而且还为决定邛崃遗址的年代问题提供了佐证。

还有，邛崃的陶器，明显地具有唐代风格。陶工的技术似乎也遵循着唐代的传统。因此，在我们藏品中，有一部分似乎毫无问题地可以确认为唐代产物，尽管其他部分可能属于后续朝代的遗物。虽然，在较后的时期中，陶工们仍然遵循着已建立起来的传统。单靠我们现在对于遗址所具有的知识，要想把早期和晚期的陶器鉴别清楚，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总的说来，邛崃陶器是单色陶衣的或上釉的器皿。唐墓陶器中非常出名的白色陶衣，在邛崃陶器中非常明显。很多的器皿都上了白色、淡黄、或浅灰色陶衣而不上釉。这似乎说明陶工们是有意制造这种陶衣器物的。其中有一些在器面上绘有黄、灰、绿、褐色花卉图案。当然，由于这些材料大多数是从废物堆中找到的，其中很多器皿之所以没有上釉，是因为它们有缺点或是不值得上釉的东西。

釉的颜色有几种，主要的是浅灰、绿、黄和褐色，而暗兰和浅紫则比较罕见。大多数颜色都有几种深浅不同的色调。花卉图

案经常绘于浅灰色背景上。有几个器皿是多色的，它们使人联想到典型的唐三彩。

尽管如此，其中有些釉色更近于中国其他陶瓷中心所产的名瓷。有些非常接近于河南钧窑的瓷，如深兰或紫釉和灰兰绿、浅兰灰，有时上面还有兰或淡兰绿小点。灰色、绿色、黄中泛绿和淡黄釉等，很可能与浙江的龙泉窑有关。深褐色或深桔黄釉则使人联想到福建建窑所具有的特色。

在邛窑陶器中，有三种胎骨；粗糙的器皿，如为烧制所用的匣钵、支丁的胎骨是用一种糙陶夹沙的胎坯制的。大多数的产品为细胎骨，色调不一，从灰色到黄色、暗红都有。白胎骨在几个器皿中也有所发现，但此种类型甚罕见。这说明胎泥可能不是本地的产品。

制造的方法，已发现的有轮制、塑造和模制。大型罐、壶，可能是用圈制法制的。碗、钵、罐、壶和瓶的底部一般呈宽、平形，有或无边缘倾斜面。有边的圈足很少见；如果发现，一般都显得浑厚平扁。有些大的器皿底部，中间呈凹形，但比较少。有少量碗的底部窄小，带有低而薄向外翻的弧度圈边。咀部、柄、脚及其他附件，大多数是模制或塑造的。很有趣的是陶工们对于壶咀，有时会偶尔把它的顶部割去，使之呈现为一个咀形的管子。人和较大的动物造型以及一些更复杂的器皿，则是由分别模制的各个部件装配起来，再加以烧制的。

邛窑的烧制似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器皿是被放在一个圆筒形的容器或匣钵中。一个重叠在一个上面，中间隔以支丁。支丁大小不一。有三足、五足或多至七、八足的，后者很少见。支丁常放置在它下面所置器皿的底上，因而这一器皿上保留下了支丁足部的印痕。匣钵周围具有方向不同的圆孔，它们可能是为流通空气用的。在烧窑过程中，匣钵是一个一个地重叠起来放置的。

有些器皿可能是经过两道火烧成的。第一道火前，涂以陶衣。第二道火是在施釉之后进行的。花卉饰纹可绘在釉上，也可

绘在釉下；器皿也可以再烧，也可以不再烧。大多数陶器烘烧得很好，而且大多数都属于瓷器，其硬度不低于四级。有些陶片的硬度与金刚砂不相上下。

邛崃陶窑以三种胎骨、几种类型的陶衣和釉色，生产了二十二种不同型式的陶器和瓷器，其中包括了很多不同形式的器皿和其他器物，它们可以分成下列各类：

——容器

碗、杯、碟、盆、壶、粉、盒、盘、罐、瓶、鼎、五足碗、六足碗等，大小形式不一。

——玩具

龟、象、狮、禽鸟、鱼、狗、马、龙、兔、牛、鼠、猴、鸭、鸡、人像、陶弹、哨子、桃、柿等。

——陶窑用具

烧陶用的匣钵、支丁、模具等，大小形状不一。

——其它

纺轮、灯、滤盆、擦碟、杵、佛像等。

一些富有趣味而应当指出的事物，如陶模上的莲花双凤图案，这是唐代艺术品中习见的形象。神像陶模，很可能已经用它生产了很多陶甲武士，他们几乎与唐墓出土的许多武士或同期佛寺中的天王像相互媲美。另一方面，典型的宋式碗、小底、外张的碗壁、反置时剖面曲线呈圆锥形，这类碗似乎不见于邛窑。

饰纹方面，样式很多，例如：1. 器身刻纹，在陶器未烘干之前，用尖形工具刻绘。2. 烧前或烧后在器物面上进行彩绘。3. 用范模在器身里壁或外壁压印图案。4. 把泥团放置在器身外面然后塑造成形。大多数的碗、壶都绘以花卉图案。有些碗上附有海扇式饼边装饰带。译者注①器皿的足大多数为戴着面具的头形。其他印纹图案有复合几何纹、龙、鱼、蝶、奔驰的动物、凤凰、飞天、小动物、小人像等等。飞天用来装饰小圆盒的盖子，

形象极为自由生动。这在唐代的铜镜上或佛教寺庙中是最常见的一种图案母题。

尽管如此，邛窑的生产延续到宋代是毫无问题的。据杨教授报导，曾发现一黄釉小盘，内印阳文“元符元年（A.D.1098）李大兴造”。他找到的另一小盘则刻有“政和七年（A.D.1117）”字样。原注（432）

从上述各项论证来看，似乎证明大多数的邛窑陶器属于唐代和北宋时期，保险一点的结论是：陶窑生产的停止，当在北宋首都南迁至长江南岸杭州时。

琉璃厂窑遗址

当另一个古代陶窑几乎就在我们后院中发现时，译者注②四川陶器艺术在技术上的发展看得更清楚了。琉璃厂窑遗址位于成都东南约五公里处，从我们的博物馆很容易到达。因此，其结果就成了学生们很方便的实习场所。在战争岁月中，由于缺乏陶器，因而在古代窑址上建设了一个陶厂，又由于现代技工们用的仍是几百年来制作陶器的老技术，他们仍借助于粗糙的石轮、盘绕技术、铅釉液等，因此，参观这一遗址就成了我们考古专业中的一个必修科。

琉璃厂遗址略呈圆形，直径大约2000英尺。接近遗址的圆边处。有一连串的小丘，译者注③略似圆锥形。它们是由窑中烧过的陶片、废弃的陶器以及其他垃圾等堆积而成的。在各小丘之间的土地中也混杂着碎陶片。在同一时期中，这里可能开设着几个陶窑。原注（438）

事实证明琉璃厂窑初建于唐代末期。陶器的标本曾随葬于公元918年的蜀王王建的皇陵中。

四川曾经发现过很多宋、明时期的石、砖墓，出土物中含有大量的琉璃厂窑陶器。上述这些墓葬的内容非常有趣，但在本文

中，我所谈的将仅限于有关窑址的材料。

关于窑址时代的进一步证据，可以从窑堆中的废弃遗物本身来作证。有些已发现的碎片上有文字记载。博物馆藏的一块碎片上有“隆兴”二字，属于宋代公元1163—1164年。在几个私人藏品中，我曾看到的有下列一些年号：政和七年(1117年)，绍兴十年(1140年)和嘉定十二年(1219年)。四川省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两个得自这一遗址而带有年款的碟子。一个的年代为接近北宋末期的公元1102年；另一个为至元十三年(1276年)。

杨教授曾经报导过一个带着“枢府”二字的小绿釉碟。白色或浅灰兰色釉“枢府”瓷器是中国专家们所熟知的。这是景德镇为元朝内府所生产的。现在我们有了另一个在琉璃厂烧造的“枢府”瓷器了。四川陶瓷的设计与江西的产品类似，但胎骨是红色的，而釉色却是绿色的。

证据似乎表明琉璃厂窑比邛窑存在的时间要长些。据本地文献《华阳县志》载琉璃厂窑到明代，官府所设置的窑厂仍在继续生产着。译者注④

根据上引资料，似乎比较保险的说法是：琉璃厂窑陶瓷工业初建于唐代末期。南宋时期，它的产品几乎独占了四川市场。它可能在明朝仍在生产釉陶。十七世纪张献忠时期的动乱，可能对窑址的破坏负有一定的责任。

当一个人简略地进行考察之后，就会相信琉璃厂窑和邛窑陶器彼此之间有着极密切的类似之处，两处的陶工所遵从的是一个共同的传统。但在技术、风格和型式方面，却有必要把二者区别开来，因为前者属于宋代，而后者则属于唐代。邛窑陶工在表现方面似乎比较保守些，在技术方面较差些，他们的陶器在型式方面更要传统化一些。而琉璃厂窑的产品则在技术上比较进步些，在型式上更具创造性，在风格上更高进取性。这些，我们将会在下面加以说明。

这两个中心，基本上遵循着一个共同的传统。但是由于琉

琉璃厂窑位置离成都近，而成都是唐、宋时期中国西部最大的都会，各式各样城市居民的需求、进口陶瓷的激烈竞争，这些都会迫使陶工们生产新的样式和风格的陶瓷。他们仿制了大多数其他各省的著名瓷器，因此，琉璃厂窑的产品代表着一种极为复杂的发展。

总的说来，琉璃厂窑陶器是一种釉瓷。大多数的器皿是单色釉陶，它们浓淡不一，褐色和绿色最为普遍。褐色釉陶，在褐黄和赭褐之间变化着。茶杯，无论在样式上或色泽上都与建窑器极为相似，可能仿自福建。虽然，大多数杯、碗、瓶、水壶和坛等，在质量上较次，甚至比那些河南窑的仿制品还差些。

绿釉窑器的色调，从黄、淡绿黄、黄绿到绿色间变化着。其中有些发亮，似乎是本地所产的一种浙江龙泉窑式器物。

白釉陶很少。兰色和灰色陶最为稀少。白釉陶器的色调，从极亮到晦暗都有。有些碎片确属定窑，可能是从华北河南运入的。但其余的则是本地对宋代名窑的仿制品。还找到了少量发光的影青白陶，但它们的质料是属于青——白式系统的。

有一种黑陶，它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瓷器。它的色泽晦暗，可能是用煤烟汁或墨汁涂绘的结果。它只在常用的碗上出现。

但是，这种墨绘，当它绘制纹饰于釉下的白陶衣或淡黄陶衣上时，却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类型中，有一件器皿使人联想到华北同一时期磁州所生产的美丽瓷器。有的还保留了这种窑最出名的刻瓷技术。

多色陶器，在琉璃厂也并不是少见的。彩色的组合，可以是褐色和白色、绿色和黄色，也可以是绿色和白色，但最占优势的是三种颜色：红、绿、黄或褐、绿、黄。多色釉最常用于碗、瓶和各种型式的明器上。这使人会想到有名的唐三彩，尽管四川的产物还赶不上唐代图案的那种彩色缤纷和浪漫气氛。

素面和不上釉的陶器似乎只限于玩具、窑具和厨房用品上。

曾经发现一些淡黄——灰色陶衣的器皿，但它们可能是属于有缺点或不值得上釉的一些东西。

在琉璃厂陶器中，人们注意到有三种不同类型的胎骨。粗糙的器皿，如为烧制用的匣钵和支丁、玩具以及厨房用具等，是用浅红褐色掺沙烧制的。遗址中大多数的碎片用的是砂石细粉制的浅黄灰色胎骨。白胎骨器皿也有，它们所用的陶土，肯定可分作不同的两类。灰白的可能是本地材料；另一类则属于纯白色的高岭土。博物馆中有两块碎片可以肯定是华北的定窑和华东的青白陶器，它们应是外省的输入物。

琉璃厂的窑工似乎很喜欢仿造其他各省的名陶。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可以使人联想到建窑、龙泉、定窑以及磁州窑式陶器。这类陶器非常普遍，但在每一类中，其胎骨则完全与各窑原有的不同。这可以归因于四川陶工在工作中无法得到合式的胎坯和釉料。最好的仿制品是那些青——白陶器，制作极为精细。本地收藏家视作蜀窑而加以珍藏。这一陶器和它的原型器间所存在的不同处，似乎仅在于胎骨上。江西瓷的胎骨用的是细而白的土质，而本地的胎骨则略呈淡黄，并在纹理上要粗糙些。如前所述，琉璃厂陶工也制作过“枢府”陶器，但他们在复制精确的胎骨和釉色上却失败了。

施工和烧制的方法与邛窑所应用的极为相似，但琉璃厂的窑工们在技术上要比较进步些。轮制、塑造、模制，是施工中占主导地位的技术，而圈制则是在制大型器皿时才应用的。琉璃厂的碗底有较好的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具有圈足，底部中间有轮制印痕。有些底部有下列纹饰或字：译音同



壶咀的顶部齐平，象锤打过的管子一样。器皿内壁，有时在上釉之前乘胎骨柔软未干时，刻上一个字或整个句子。

还有，琉璃厂陶工对于火候的控制较好。遗址中的碎片保持着一贯的硬度。只有少量的碎片是例外，它们的表面可能受到了腐蚀，其硬度仅至三级或更低。其他大多数的硬度经测验后，都在6—7级中。

琉璃厂窑器的器型，可能较邛窑的丰富些。它们可以分作以下各类：

——容器

碗、杯、碟、钵、水壶、盘、罐、瓶、鼎、女足碗、小瓶、桶、砚台、漏斗、研钵等、形式、大小不一。

——玩具

龟、小兽、人像、棋子、响子、环、珠、陶弹子、急响器等

——陶工用具

烧制用的匣钵和支丁、模子等，形状、大小不一。

——其他

纺轮、小佛像、墓俑等、形状、大小不一。

我们发现琉璃厂窑创造了很多新型的东西。这两个窑（邛窑与琉璃厂窑）确实生产了一些类似的器物，如中空灯（即省油灯或夹层灯——译者）、厚碟、双咀壶、研钵（或研碟）、匣钵、支丁、小人像和动物像，但二者之间的不同处，甚至还更大些。琉璃厂的新式器物是值得注意的，如小底碗、精致的圈足、大型盆、深凹盘、（碟形盘）小碗或茶杯、扁圆形水壶或酒壶、砚台、模子、细高罐。这些都不见于邛窑。

纹饰方法，在某些方面，琉璃厂要比邛窑更完善些。在前者中，印纹碎片最常见，而在后者中则彩绘碎片占优势。彩绘的制作或在烧前或在烧后，二者都有。在陶土未干时进行刻纹的方法也不少见。大多数的图案主题是花卉，少量为几何纹图案。贴花图案在琉璃厂窑比邛窑应用的更广泛些。

为了把两个窑址的陶器群的比较研究工作进行的更深刻些，可以参考一下华西大学化学系高毓灵教授所著关于两个陶器中心用釉的化学分析文章。原注（434）

高教授从邛窑和琉璃厂窑遗物中各选了七件不同形式的釉陶进行分析研究。他的结论是前者有两块标本含有氧化铅的高百分比；另两块含有氧化磷；其他三块属长石性质。那些琉璃厂窑的标本则是一块含有氧化磷，其他六块均为长石型。

应当指出的是高教授的试验中没有包括那些软釉碎片。这标本在遗址和一些宋墓中，曾经大量出现过。琉璃厂的软釉与汉、唐陶器所用颇相似，采用了氧化铅，用低温烧成。邛窑和琉璃厂窑在用釉上都遵循着这一传统以制作此类陶器，这是用不着怀疑的。所有的三种类型的陶釉，在这两个烧造中心都采用了。虽然，很明显的一件事是在釉的应用上，琉璃厂窑要比邛窑更专门化一些。在成都的陶器中，铅釉是装饰明器和建筑材料用的。

制陶用的陶土是由久经曝晒的长石生产的。陶器的胎骨，一般多孔而富吸水性。陶釉一般用来填充孔隙并使表面光滑。釉的采用不单补救了陶泥的缺点，同时还给器皿增加了色泽和美观。但是，从技术上来谈，陶釉温度的使用，应低于胎骨的温度，以避免破坏器形。铅的熔点温度很低，但它有毒。铅釉在汉、唐时期广泛地被利用，也许是由于它的熔点低，当时陶工们控制火力的技术还不高。邛窑陶器的硬度为4—9级，这说明在烧制中运用了多种多样的火候。邛窑对于铅、氧化磷和长石釉的混乱用法，说明它是属于一种传统性的工业，时间上可能在晚唐或宋初；而琉璃厂窑对铅釉则有专门化的应用。这说明一个事实，即成都陶工们已经获得了一种新技术，以生产满意而有效的长石釉。他们很可能已经设计出一种能够诱导快速燃烧的窑。因而较好地掌握了火的控制。他们烧出的陶器硬度比较稳定，经常保持在六至七级间。这些正是宋瓷的特点。

对于这两个陶窑遗址的年代，用化学分析陶釉的方法和上述

其他的证明，我们所获得的结论是相同的。

四川这两个窑所生产的典型陶器收藏品见图版48—95。除了已提到的一些其他来源外，所有标本都保存在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中。琉璃厂窑陶器出现在宋墓明器中的丰富品种，将在下面第八章中加以讨论。译者注④

注 释：

译者注①本篇选自郑德坤先生著《四川考古研究》(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Szechwan, 英国剑桥大学, 大学出版社, 伦敦, 1957年。日译《四川考古论文集》)一书中之第七章。此章包括两个专题, 分别论述邛窑和琉璃厂窑的情况。

译者注②“姓韦的朋友”, 应为韦班。杜甫诗集, 一般都按写作年代顺序排列。在紧接这首诗前的另一首诗标题为《凭高少府班觅松树子栽》。大邑瓷诗的标题, 一般人引用时都简化为《乞大邑瓷碗》诗。按宋人鲁山《杜工部诗》原标题为《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这里所谈的(又于韦处)……是紧对上诗而言。故知杜甫所谈的大邑瓷碗的主人当是韦班。

译者注③按杜甫《乞大邑瓷碗》诗, 各家刻本字句, 略有出入。今据日本东京木村嘉平氏藏宋本《杜工部草堂诗笺》(《丛书集成》影印本第一集), 并以简化字体录出。诗中与其他版本不同的字句, 详见本编葛维汉《邛崃陶器》一文中译者注②。

原注(429)葛维汉(Graham, D. C.)《邛崃陶器》(The Pottery of Chiung-Lai),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WCBS), 第11期, 14—15页, 1939年。

原注(430)贝德福(Bedford, O. H.)《四川邛州古窑址》(An Ancient Kiln Site at Chiung-Chou, Szechwan)《中国杂志》第26卷1期, 14—15页, 1937年。

译者注⑤郑先生此处所述“西门”外等方向, 亦沿贝德福说而误。“西门”应是“南门”。(说见本编贝德福文)译者注⑥。

译者注⑥“道观”之说, 沿自贝德福的误解, 应为佛寺, 更

确切地说，是尼庵。当年女尼，今仍有存者，可证。

原注 431 《华西文物》第1期，38页。1951年。

译者注⑦元按：此墓译者曾亲自参与发掘工作。两腕及臂上藏有佛经印纸的铜镯等，均由译者亲手搜剔泥土后取出。两碗不是向上放在肋骨上，而是向下覆盖在左右乳房部位。

译者注⑧元按：铜镯不是带在手腕上或近手腕处，而是束在上臂近肩处。

译者注⑨元按：印纸主体确为古藏文陀罗尼咒语，此外还印有佛像和一行汉字。

译者注⑩开元钱，仅有两枚，分别握在死者的左右手中。

译者注⑪此种纹饰可名之为“漆文堆饰”或“粗绳纹圈堆饰”似较通俗。

原注 432 杨献谷《四川陶瓷概论》，《华西文物》第一期，页8—10页，1951年。

译者注⑫郑先生此处所说的“后院”，意指琉璃厂。因琉璃厂遗址在原华西大学博物馆东南方，距离甚近，故戏呼之为“后院”。

译者注⑬这种“小丘”或土堆，当地人呼之为“窑包”。

原注（433）葛维汉（Graham.D.C.）《琉璃厂窑址》，《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卷11，36—45页，1939年。

译者注⑭关于琉璃厂在明代仍在烧造的有力证据，见于五十年代四川省文管所发现的明嘉靖二十一年太监丁祥墓志，文中提到“屡命于琉璃厂董督陶冶。”

译者注⑮ 此种陶工记号，内容颇丰富，有文字，有图案。文字中有数字，有姓氏等，或一字或二字，图案中有各式几何纹和花卉。葛维汉报导中收有45种，（见葛氏《琉璃厂窑址》一文）可参考。译者所收，种类更多，此亦为琉璃厂窑特点之一。

原注（434）高毓灵《四川陶釉的化学分析》（A Chemical Analysis of Szechwan Pottery Glaze），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11期，54—57，1939年。

译者注⑩郑先生下章（第八章）的标题为《四川宋墓随葬品》内容广泛，琉璃厂窑陶器为其中的一小部分。此处从略未译。

（原载《四川考古研究》1957年）

1983.11.27于四川大学博物馆

川西古代瓷器调查记

徐鹏章

一九五六年九、十月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川西进行文物普查工作时先后调查了很多古代遗址，搜集到不少关于瓷器方面的实物资料。现在将调查所得，分“川西古城中的印花白瓷器”及“邛崃县的几个古窑址”两部份，略述如下：

一、川西古城中的印花白瓷器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温江专区下八县文物调查小组的同志们，在四川崇庆县江源乡大庙的古江源城中调查时，在地面上发现有一些白色的素瓷片及印有水波纹边并在碗内印有凤鸟等花纹的白瓷片，这种白瓷片，分布在古城中的面积是相当大而数量又相当多的。

后来我们听说，这里有一个姓雷的农民于一九一九年在田中提取土砖时，曾发现地的下层有一大堆白瓷碗，碗的附近还发现有三口井、阴沟及其他器物，现在碗仅留下来两个。我们又在另一农民家中看到了两个，这四个碗的胎、釉、花纹和我们所发现的瓷片是同一个类型的。

我们在川西其他的古城中继续调查时，都发现有这种白胎素白瓷片及白胎印花瓷片，如崇庆西门外的旧城址，大邑的安仁古城，大邑北外及城内的古遗址，邛崃油榨乡的火井故城，邛崃永丰镇的依政故城，蒲江东北乡徐家碾的蒲江城故，新津旧县坝的

新津故城，新津永商乡鱼翅孔的古遗址，新津龙马乡的古遗址，双流外北的古城遗址，华阳永兴乡的灵泉故城，华阳中兴乡古城村的广都故城，华阳正兴乡韩家坝的古遗址等处。在一些古城中，这种白瓷片且是大量存在的。

在其他川西的古城古遗址及古墓葬中，也发现有这种白瓷器，如袁明森同志在郫县安靖乡两路口从当地农民处收集到一个完整的秋花折枝的印花白瓷碗，匡远莹同志在崇宁县君乡花街子，从当地农民处收集到一批白瓷碗，刘志远同志在彭县敖平镇的宋代墓葬群中，也发现有一个完整的白瓷碗。

在成都的四川省博物馆及重庆的重庆市博物馆与成都西门外的杜甫纪念馆里，过去都曾展出过这种印花的白瓷碗，据说，这种碗就是唐代大诗人杜甫诗中所说的大邑白瓷碗。

为了了解崇庆县江源古城及这种白瓷片的时代问题，遵照上级指示，我们在崇庆江源大庙原雷姓田中挖了两条深沟，一东西向，一南北向，皆长5米，宽2米。

在南北向的第一探沟中，共挖了1.2米深，可分四层：第一层为农耕土，厚0.2米。第二层为灰黑壤土，厚0.4米，内有许多瓦砾、碎陶片、碎瓷片、白胎素白瓷片及白胎印花瓷片。第三层为黑沙层，厚0.4米，陶瓷片比上层少了，在这一层内，没有发现白胎印花的白瓷片，在较少的素白瓷片中，有白胎的也有红胎的，还有其他颜色的平底陶碗。第四层为未经人动过的卵石夹沙层。

东西向的第二探沟，情况与第一探沟大致相同。（两条探沟相距约20余米）在这条探沟的第二层内发现了一大片较大的印花白瓷片，花纹与前面所说的相同。在这层的表土内，发现一个“祥符元宝”。第二层内又发现一个“咸平元宝”及一个“正隆元宝”。

查咸平与祥符皆为北宋真宗的年号，咸平为公元998年到1005年，祥符为公元1008年到1016年。正隆为金海

陵王年号，相当于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到三十一年，为公元1156年到1161年。因此，这个地层不会早过两宋时代。在这个地层里才有印花白瓷器，而较早期的地层里，就只有白胎或红胎的素白瓷片了。

至于这批瓷碗的作法，与其它地方的瓷碗的作法是有所不同的，它是在白瓷的胎骨上（早期为红胎）涂上一层灰白色的陶衣（有时这层陶衣在圈足底部也有），在这层灰色的陶衣上再上一层白釉。烧成后，这种白釉微微发灰。现存碗内都有数堆芝麻大的小疤点，在底周围成一个圆形，外底的圈足上大都有磨过的痕迹。推测这种碗烧制时的放置方法，可能是在碗内放上几堆沙粒，再在沙粒上放置支圈，支圈上再放第二个碗，也有可能支圈也没有放。这种放法，在成都琉璃厂的古代窑址中就曾发现过。这样烧成的碗，碗内就不会如邛窑碗似的有几个大疤点，损伤了碗的美观，而这种小疤点从上面看去，似乎是碗内特别印的几朵无釉小花，更给碗增加了趣味。

这种碗的印花，有时印在碗内，有时只印碗外，有时内外皆有。在其他器物上，如瓶等也印有花纹。

碗内的花纹有凤穿牡丹、天鹅莲花、秋花折枝（菊花和海菜）、鸳鸯莲花及莲花等。边上的装饰多为水波纹，也有万字格纹的。碗心有鱼、双鱼、唐草等花纹。

碗外的花纹，目前只见到莲瓣纹。

以上花纹大都为五代到北宋的作风，在五代前蜀的王建墓中一个银盒上就有上面的一种鸳鸯莲花的花纹。

这批白瓷器是这样的精美是这样普遍的存在于川西各地，它究竟是那里烧造的呢？它的窑址在什么地方呢？

据杜甫乞大邑瓷碗诗说，唐代大邑烧造一种很精美的白瓷。杨献谷先生所写“四川陶瓷概论”说“在大邑东关场”，东关场与大邑城郊等处我们皆去调查过，除了大邑北关同样发现了许多印花白瓷片外，都没有窑址的痕迹发现。

川西的印花白瓷器到目前为止，虽然说还没有发现它确切的烧造地点，但经过上面的调查及试掘的结果，可以提出几点意见：

（一）在宋代或以前，川西各地大量使用着一种瓷质坚致、红胎白釉、白胎白釉及白胎白釉印花的瓷器。

（二）这种瓷器中的瓷碗，是以一种特殊的放置法烧造的。

（三）这种瓷器的早期是红胎白釉及白胎白釉没有花纹，到了后来，才在白胎白釉上印花。后者可能是五代到宋的器物，前者或能更早。

（四）由于这种白瓷器的作法、形式、花纹都与其它地区同时代的白瓷器有所区别（如定窑是覆烧的，邢窑瓷特别白而不发灰），又在川西各地大量存在，当时四川与外面交通困难，不大可能由其他地区运来这么多的瓷器，因此，这种白瓷器可能是川西本地烧造的（川东就很少发现这种白瓷片）。

二、邛崃县的几个古窑址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邛崃进行文物普查时，除了复查了南河岸十方堂的一个古窑址外，四川省立邛崃中学张校长向我们提供了两个古窑址的线索。经过了访问和调查，找到了这两个窑址。同时，在西河乡的才冲土耙桥，又发现了第四个窑址。

现在在这些古窑址的所在地上，除了还有窑包或山坡上的烧土外，还残留有许多窑具及残陶片。

（一）十方堂窑址

十方堂窑址在邛崃南河南岸的小平坝上。由县城过河上岸，即可看见遍地皆是各种各样的窑具、残陶片、大大小小的窑包耸立四周。十方堂的后殿即建筑在一个窑包的顶端。

窑址东西长约二里许，南北宽约半里，东南到陈巷子，西北到瓦当沟，北面紧靠南河，南接严坝。站在窑址南缘可以望见严坝那边有一条小山脉，自西而来，蜿蜒东去。

这里除了过去已被南河河水冲走的窑包及河边残存一角的窑包不计外，现在尚有较完整的窑包十三个。最高的约十米，最低的约四米。在窑包的顶端现在还可看见当初的火口。

窑包的形式，除了上部有一个尖顶外，在它的侧面还有一个渐次低小的尾巴。据一个在窑包间居住的农民谈，他曾经挖开过一个窑包，看见这些窑包的尾巴中间是空的，上面与窑包内部相通，在它的侧面有数个渐次升高的火门，尾端也有一个。从其他地方现尚使用这种形式的窑包的烧法看来，它是由最低处开始生火，渐次升高，直到顶上然后封口的。这样一窑可装许多窑货，又可节省许多燃料（这种形式的窑包，现在华阳窑子坝坛罐窑上尚有存在，窑工称为长窑。在浙江绍兴等地称此种形式的窑包为龙窑）。

1. 窑 具 十方堂古窑址中的窑具有匣钵、支丁、土垫数种。

(1) 匣 钵 成圆筒形，一般高21厘米，口径20厘米，底厚4厘米，边厚2厘米，钵侧下部有圆孔二个，钵口缘有半圆缺孔二个。据农民严树成谈，过去挖出有许多个匣钵，匣钵的正中均装碗七个，周边再加上一些小壶及其他小件物品。这些匣钵放入窑中时，钵上置钵，都不加盖，为免火灰飞入，只最顶上一个匣钵有盖。

(2) 支 丁 一般上作圆环，下有五齿足，计有下列数种；

大型的高3厘米，上圈径8.5厘米，齿足径6厘米。

中型的高1厘米，上圈径6厘米，齿足径5.5厘米。

小型一的高0.8厘米，上圈径5.2厘米，齿足径4.8厘米。

小型二的高1厘米，上圈径5厘米，齿足径4.8厘米。

(3) 土 垫 这是当时的窑工们将泥土任意搓成的。有下列三种形式：

圆环形 系将泥条两头相接圈成。

圆板形 将团泥压成。

垫条 形似鸭子，以泥条两头捏扁而成，土垫上清楚的遗留

着当时窑工的指纹。

2. 器物的种类与形制。

十方堂窑址内器物的种类极多，根据此次调查及农民所谈情况有好几十种，其中最多的是碗，其他的还有盞、杯、盘、碟、壶、罐、钵、灯、砚及玩具饰物中的龟、鱼、鸡、犬、羊、猪、鸚鵡、铃、球等。

碗的形式绝大部份为平底，只有个别的才有极浅的圈足，圈足是就原平底挖成的。碗腹微外凸，碗口有撇口、敛口、直口三种，以撇口为最多。

器物中有“省油灯。”这种灯是夹层的，夹层边上有小孔，从小孔注入冷水，上层注油置灯芯，燃时夹层中的冷水可降低了灯的温度，减少油的消耗。据说每夜约可节省油一半，所以叫做省油灯。

器物的制作方法，绝大部份是轮制，只有个别器物如玩具等才用手捏或模压而成。

3. 釉色和胎骨。

釉色大别可以分为六类，计有米黄色、绿色、蓝色、茶褐色、酱色、鹅黄色，以米黄色为最多，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绿色次之，约占百分之十几；酱色、鹅黄色最少。在这六大类的釉色中，每类釉色又有深浅不同。

器物上敷釉较厚，尤其是米黄色、绿色和鹅黄色，这三种釉在十方堂的器物中就显得特别莹润可爱。釉上有冰裂纹，或称“百圾碎”，或称“鱼子纹”，非常美丽。冰裂纹以在碗中出现的最多。

在釉下胎上，有些器物涂有米黄色的护胎釉一层。

一般器物外部都涂半节釉，不到底。

器物的胎骨，一般为灰色及土黄色的泥胎，胎泥淘洗得很纯净，以细沙作的鬲和料在胎骨中分布得很匀净。

鹅黄釉的胎骨与其他釉色器物的胎骨不同，是朱红色，泥质

也以细沙作麝和料。

以上器物的火度均较高。

(二) 尖山子窑址

在尖山子发现尖山子古窑址，东距邛崃西河数百米，西为西河乡的丘陵地带。这个窑包，耸立在这个河边的小平坝的边缘上。

窑包长3.2米，宽2.5米，高约7米。窑包的斜坡上堆满各种窑具及各式陶器残片。在窑包顶端，火口的痕迹及火烧土还可看见。

1. 窑具 有匣钵、支丁、土垫、垫板、托筒数种。

(1) 匣钵 与十方堂窑址中的匣钵相同。

(2) 支丁 与十方堂窑址的大体相同，惟齿丁数大都为六个，也有五个或较多的。其中六齿足的支丁，一般直径8厘米，高2.8厘米。

(3) 土垫 系以泥条任意捏成。

(4) 托板 扁平，有下列数式：

圆环形，似玉璧，外圈径14.5厘米，板宽2.8厘米，厚1.7厘米。

外圈作圆形，内圈成连续的半圆弧形，外圈径24.5厘米，板厚1.3厘米。

波浪型，因已残断，不能窥测全形。

(5) 托筒 作圆筒形，惟上下口缘皆微侈，筒顶平口，筒下有浅齿足，上缘外侧有指窝数处便于挈取。筒高12.2厘米，筒径10.5厘米。

2. 器物的种类与形制。

器物有碗、盘、钵、罐、砚等。

(1) 碗有三式：平底微凹；有浅圈足；

有一般的圈足。碗内都有放置支丁的疤痕。

(2) 罐的耳部大都为横方耳，口部有下列三式：高置颈

卷唇；斂口而唇向外傾；作碗口形。

(3) 钵有下述二式：口部向内微掩，口的边缘向外平直，在唇的顶部微向下凹；侈口。

(4) 盘为平底，直边，唇外卷。

(5) 砚为圆盘形。圆盘中心平坦无釉，盘边内侧有凹沟一圈，下有小足。

以上器物，全部轮制。

3. 胎骨和釉色。

碗、盘等较小型器物的胎骨一般皆作灰黄色，也有作较浅的酱黄色的。

罐、钵等较大型器物的胎骨一般皆作土黄色，也有较少的作青灰色。

器物的火度皆很高，屑和料为细沙粒。陶罐及陶钵的釉色，大都为绿褐色，也有作黄褐色的。在有些陶器上，除了上有一层淡绿色的釉汁外上面还用酱色的釉汁划有极简单的花纹。碗上的釉有浅绿、黄等色。器物釉也有冰裂纹。碗的外部，釉水皆只有半截，不到底。

(三) 瓦窑山窑址

邛崃瓦窑山古窑址，在邛崃固驿乡南河之南约一、二里地的瓦窑山山坡上。窑址长约200米，从下到上高约20米，前面临南河河边的小平坝，穿过小坝即为南河。

窑址所在地的山坡间，还可以看见烧土的痕迹，但没有窑包的痕迹。

器物釉色、种类、火候、与十方堂古窑址及尖山子古窑址的大体相同。现分述于下：

1. 窑具 没有匣钵、制造大型陶器的窑具则较多。窑具有支丁、垫圈、托板数种。

(1) 支丁有四种形式：

短筒形，顶平作圆环状，下有锯齿足，外腰微收，内壁凸

出，圈径11厘米，高5厘米，厚1.5厘米。

短筒形，上下缘作锯齿形，外腰微收，内壁圆凸，高6厘米，一端径8.5厘米，一端径7厘米，厚1厘米。

平顶作覆盘形，下有齿足，高2.5厘米，顶径6.5厘米。

上圆环状，下有锯齿形足，高2.5厘米，上圈径8.5厘米。

(2) 垫圈作较厚的圆环形，内壁微凹，外腰微收，圈外直径15厘米，高2.5—3.5厘米。

(3) 托板形似玉璧，外径24厘米，板宽5.5厘米，厚2厘米。

2. 器物的种类和形制有罐、钵、盘、碗数种。

(1) 陶罐有外斜口沿横方耳陶罐及大碗口横方耳陶罐两种。

(2) 钵为圆腹敛口。

(3) 碗一般是平底微凹，口唇微侈，内底有支丁痕迹。另有一种较少的碗，底为浅圈足，内底无粘，可能为晚期器物。

这些器物一般皆为轮制。

3. 釉色和胎骨。

陶罐的釉色一般为深茶褐色，胎骨为紫灰色，也有为较浅的土黄色的。钵、盘、碗等器物的釉均较厚，釉色一般均为米黄带浅绿色，开细冰裂纹片，也有少数茶褐色的。罐、钵、盘、碗的胎骨有黄灰、青灰、紫红、紫灰数种。器物火候皆较高，胎骨内以细沙作龛和料。器物外部的釉皆只施半截，不到底。胎骨淘洗得较十方堂与尖山子的粗糙，器物上时有石粒露出。

(四) 才冲土耙桥窑址

才冲土耙桥窑址，距邛崃西河乡约三、四里地，四周是浅山丘陵，窑址在丘陵上一个山沟侧的小山边。窑址比上述之窑小得多，器物与窑具也少。窑址上还可以看到许多红烧土。窑具只有托筒，都是圆筒形，腰上有明显的梭数轮，筒外上边缘有指窝数处，便于挈取。形式可分三种：筒上下为平圈顶平圈底，直径

10.8厘米，高9厘米；平圈顶，下为大齿足，顶直径9.7厘米，足直径10.5厘米，高5.8厘米；较大，顶为平顶，足部已断，顶直径17厘米。

器物有陶罐、陶钵等。据当地农民谈，他们曾挖到过碗，但调查时，没有发现。

陶罐有二式：口缘为有棱的外卷唇的，敛口圆边大竖耳的。

陶钵除一般的侈口大钵外，有一个钵从内底部直到钵口刻有紧密相邻的较深竖纹，可能是磨制姜蒜及果皮之用的。

陶器只有茶褐色釉，但有深浅之不同。陶器的胎骨为青灰及土黄色。

（五）关于邛窑器物的年代

从邛窑器物之从粗到精，花纹之从简到繁，种类的繁多，我们可以知道邛窑是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

从窑址本身及现存地面上的遗迹研究是不容易确定它的年代的，我们只能从有关资料推测它可能的年代。

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及“斋居纪事”谈到五代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到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2年）宋白为玉津县令，从四川回去之前，买了很多“省油灯”。这种省油灯虽然不一定是邛窑的，但可供邛窑年代推测的参考。

在重庆市博物馆里有一个有“仁寿年造”四字的双鱼盘，从它的胎、釉与其他邛窑器物相比较，当是一个窑址的出品。如果鉴定没有什么错误的话，邛窑的年代可以上推到隋（公元589到617年）。

据十方堂的农民严树成谈，丙子年（1936年）四川军阀唐式遵曾在这里大量收购出土物，附近农民数百人在这里日夜挖掘，成都邛崃古董商人也在这一带大量经营买卖，前后达数十日之久。挖到一丈多深处还有各种陶片及匣钵。

从邛窑窑址分布之广与窑包之多，十方堂窑址占地面积之大

与陶片匣钵堆积之深，可以想见当初四川邛崃窑业之发达。我们调查川西古城时，在蒲江的临溪故城及双流的广都故城等地方，发现邛窑器物当时是大量散布于这些古城中的，这就给我们研究四川经济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资料。

邛窑器物之精美与十方堂窑包造作法的进步，也给我们研究中国陶瓷史提供了一个重要资料。

执笔者 徐鹏章

（原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二期）

四川省古窑址

陈万里 冯先铭

一、成都市青羊宫

在成都西城通惠门外，青羊宫内后院以及院墙外面有许多碎片的堆积，1955年秋当人民医院在院墙外修建院屋时也发现窑址的遗物，四川省文管会曾派人去试掘过。我们去调查的只是青羊宫后院部分，所见碎片中以四系罐器形为最多，釉呈酱褐色，又有高足豆形盘的残片，此外盘、碗等碎片大都是平底。这个窑的烧造年代，有上溯到南朝甚至到东晋的，当然还需要较多的材料来研究。

二、华阳县琉璃厂

琉璃厂离成都约10里，属于华阳县的胜利乡，此处是一个丘陵地带，以琉璃厂镇为中心，四周都有突出在地平面上的大堆，当地人称它为窑包，散布着不少陶器碎片及工具，这就是一般人所称的琉璃厂窑了。碎片的器形以双耳壶、四耳罐以及盆碗等为最多，以往在成都古董铺中所见到的所谓黄釉省油碗、绿釉平底浅盘、多种多样的陶玩具，都说成为邛窑的出品，其实是琉璃厂所烧造的。碎片中还有画着一枝草样的纹饰，跟王建墓中出土的一件盘口双竖耳壶是同样的。四川文管会还藏有一把短嘴有柄壶，以及文管会派人调查琉璃厂时曾征集到几件黄绿两种色绘双鱼、牡丹的大盆，都可以说明这个琉璃厂窑的年代，就是从晚唐、五代以至陆放翁《老学庵笔记》里所提到的省油灯，那是

了南宋的时期了。四年前四川文管会在成都外西瘟祖庙清理出一座明嘉靖 21 年太监丁祥的墓葬墓志中特说到“……屡命于琉璃厂董督陶冶”的这句话，更就宋墓中出土了不少黄釉的陶俑来看，那末琉璃厂从晚唐以至明代一直没有停烧过，这样历史悠久的一个窑场，是值得予以清理的。

三、新 津 县

这个窑址的调查在时间上比较局促的，从邛崃返回成都途中必须经过新津县，因之顺便调查了这个窑址。

窑址位于山坡上，碎片堆积面积长约 21 米，厚 1 米。碎片标本多为青釉碗，有深深的墩子形碗，有比较浅的，都是小小的平底，碗外釉都不到底，叠烧。从造型上判断，新津窑是属于南朝比较晚期的一个窑址。

四、邛 崃

邛崃西门外过河约 5 里，地名十方堂，就是邛窑的所在，此处于三十年前为四川军阀在邛崃的驻军所破坏。抗战期间在邛崃当地还见到邛窑经过破坏后所遗留下来的残器，而当时成都华西大学的博物馆里收藏着许多邛窑的标准器物。此次调查，地面上已难找到碎片，所以现时如欲研究邛窑的作品，恐怕除了发掘窑址以外，现存在成都许多的物品，是很好的资料。离邛崃 20 里固驿镇瓦窑山，在地面上捡到很多匣钵残片，所烧器形有四系壶、高足豆及浅碗等，时代与青羊宫的相仿，为四川早期的产物。

关于四川省陶瓷方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邑窑的废址到今天还没有被发现出来。其次像成都市青羊宫以及新津那样早期的四川作品，据说绵阳一带也有这种类似的碎片，这都是值得重

视的。至于乳白色釉而有斑点的元瓷，所谓川东窑；质地比较粗松的影青瓷，所谓蜀窑；以至广元瓷窑铺所发现的黑釉器都在这次调查期间见到了各窑的实物。其中广元瓷窑铺窑址的发现已有记载，川东窑、蜀窑等窑址尚未发现。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未曾经过正式发掘谎称为出土的器中，尽多伪造年代的东西，如有太和款的坛、建隆款的琉璃造象以至后加天宝款的陶枕、崇宁款的油盞等等都是，这在鉴定上是不能不审慎的。

（摘自《故宫博物院院刊·故宫博物院十年来对古窑址的调查》
总二期1960年）

成都附近古窑址调查记略

林 向

1964年4月，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门组师生在成都附近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两处古窑址，现简述如下：

一、双流县牧马山窑址

在双流县城南6公里，牧马山西端应天寺附近，现存一大土堆。1957年兴修牧马山水利工程时，灌溉渠道正好从土堆中间穿过，暴露出大量的釉陶片和制陶工具（支钉、支架、匣钵等）。我们采集了一些标本，都是紫泥胎，青釉，有冰裂纹，易于脱落，有些似先上粉再上釉，釉挂在器上部。器形最多的是碗、盘、罐。有一种盂形器（？）大小不等，敛口底有孔，器下部有青釉的“烛泪痕”。不知何用。

从碗、盘等制法、器形、胎骨及釉质看，与四川地区已经发现的邛崃的“邛窑”及华阳琉璃厂的釉陶应属一个系统（林坤雪等《四川华阳县琉璃厂调查记》，《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9期47—48页；邛窑资料见四川大学历史系博物馆藏品），尤其是小碗，与成都青羊宫窑址的出土物十分相似（江学礼、陈建中《青羊宫古窑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6期53—57页）。其时代应在唐宋之间，或可能早到南朝晚期。这个窑址还是第一次发现，过去县志等也从未记载过。为四川唐宋民间窑业提供了

新材料。

二、郫县横山子窑群

横山子在郫县先锋、安德两公社与灌县金马、崇义两公社的交界处。南端过去亦名铁砧山，是南北约长5公里的老黄土埂子，原属崇宁县，今已归入郫县。山上有庙三座，北面的叫上评乐寺；中间的叫中评乐寺或称宝光寺；南端的叫下评乐寺，传说中的严君平墓和君平读书舍就在附近。在这三座庙的附近，尤其是山的西侧，散布着许多窑包。据《崇宁县志》记载：“铁砧山又名横山子，今农人之耕田者犹时获古碗古盘”。其中一有个窑址1956年报道过（支沅洪：《四川崇宁县铁砧山的古窑址》，《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3期49页）。这次我们在横山子共调查发现发现了22个窑包。最大的窑包编号为E4、E5，高约15、底径约50米，两窑相连。窑包上布满碎陶片和窑具：支钉、支梁、垫板等。

从各窑所采标本看，内涵复杂。胎骨有灰白胎、灰黑胎、紫红胎、褐红胎等四种。质地较粗多孔，但火候很高，基本上不吸水，扣之声音响越，尤其灰白胎近乎瓷器。釉色以豆青为主，还有酱褐釉和白釉等共三种。青釉易于脱落，白釉数量很少。另外在E7还找到一块釉里青花的白瓷盘片，其制法、质料都不与一般相同，可以认为不是本地制作的。但有一部分瓷盘的制法好像是仿造它的，故也许是输入外地佳品以作样板的。

釉陶器形有碗、盘、罐、壶、砚等。以碗为最多。可分为三式：Ⅰ式敛口、深腹、小实心圈足。灰白胎或紫红胎，挂半截豆青釉，釉水薄，易落。Ⅱ式直口、浅腹、大实心圈足。灰黑胎，挂青釉，有烛泪痕。Ⅲ式侈口、斜壁、大实心圈足。最为常见。有灰黑胎青釉、紫胎白釉、紫胎青釉等三种。

盘的数量也多，也可分三式：Ⅰ式直口、平底。有灰黑胎青釉和红褐胎青釉两种。Ⅱ式敞口斜壁、大实心圈足。有灰黑胎青釉和紫胎青釉两种。Ⅲ式直口、浅圈足。紫胎青釉，最为常见。

罐大约也有三式：Ⅰ式大口平缘。横组呈方形，紫胎青釉。Ⅱ式直颈小口。横组呈圆形，灰黑胎青釉。Ⅲ式直颈圆形，紫胎青釉。

碗。圆形，碗心微凹，周围有凹水槽，下有四个小泥突足，紫胎青釉。

另外还采集有壶口残片（灰白胎、青釉）、器盖以及窑具如支钉、垫板、支架等。没有发现匣钵。

据现有材料观察，这个窑群延续年代较长。如Ⅰ、Ⅱ式碗与牧马山及青羊宫出土物相同，应为唐代遗物或可早到南朝。Ⅰ式罐也是四川唐、五代墓葬中常见物。而Ⅱ式碗和Ⅲ式罐是四川宋代常见的（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古代墓葬清理简况》，《考古》1959年8期442页，同上《四川东山灌溉渠宋代遗址及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8期430页）Ⅲ式盘与青花瓷片的出现，则说明到了元、明以后，此处窑业仍旧很盛。陶碗也应是唐宋间物，为碗史提供了新资料（可参考《文物》1964年2期图版捌）。

这些器物在四川各地，尤其是川西一带唐宋遗址、墓葬中常有出土，过去认为不是“邛窑”就是“琉璃厂”的出品，现在可见这种民间用品的产地是很多的，是唐宋时川西的一项重要的手工业。但这类窑址，至今尚未经发掘，调查发现也不够，有待今后去工作。

（原载《文物》1966年二期）

从四川唐宋古瓷窑炉看南北科技交流

丁祖春

地处西南边陲的四川，古代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唐代诗人李白曾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当然这是诗人的艺术夸张。其实再难也拦不住科学文化的交流。下面就四川古代制瓷工艺中的窑炉结构来看它与华北、华南地区的技术交流。

在制瓷工艺大发展的唐宋时代，四川也同全国一样，制瓷工艺也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两宋时代更有显著的进步和提高。据解放以来的调查，仅川西地区就发现有十多处唐宋古窑址。近年新发现了彭县磁峰宋代白瓷窑址和灌县玉堂公社唐宋青瓷窑址。这两处的窑炉颇具代表性，分析研究它不仅可以看到当时的工艺水平，而且还可以从中窥探它与南北科技交流关系。

彭县磁峰公社宋代白瓷窑炉，1977年初进行了试掘，取得了一些科学数据。它的窑型是属于双烟道馒头型，也有人称马蹄形窑。整个窑炉由窑门、火膛、窑室、烟囱四部分组成。其特点是火膛即燃烧室呈半月形，特别大，灰坑深达一米六，这是因为以煤作燃料的原故。煤的燃点高，点火速度慢，着火后温度高，这就涉及到煤的灰熔点问题。为了适应通风面积，降低灰层温度，灰坑必须要深而大。窑室长2.8米，宽5.23米，实心窑底，略有倾斜。烟囱在后部，并排两个，呈方形。烟道与窑室之间有一道隔墙，火焰从燃烧室起，沿着弧形窑壁，通过隔墙火孔进入烟囱。窑室容积不大，因窑墙和窑顶破损，无法算出实际容积，但窑底的面积可以算出，仅14.7米²。这种窑无论从热工能上或工艺上

讲，都只能用氧化焰烧成。要烧还原焰都必须分两次，坯用氧化焰，釉用还原焰。

1977年底，我们在距彭县不远的灌县玉堂公社歧山大队，清理了一座唐宋时期的残窑。这座窑是建造在废品堆积层的斜坡上，炉身与地平线构成了 14° — 13° 之间的角度，前缓后陡，全长42.92米，内宽1.76—2.62米，中部略大，前后略小，残高1.04—2.08米。由火膛、前后窑室、隔墙和烟道等部分组成。窑体庞大，底部斜平，不分级，上铺0.15—0.24米的含有石英颗粒的粗河沙。后部有十级阶梯，呈斜坡状，可能是为了提高抽力所置。这显然是属于通行于南方各地的“龙窑”。

“龙窑”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战国时就开始出现，明以前南方各地主要产瓷区都广泛采用。但在四川发现42米多长的唐宋时期的龙窑，这确是空前的重要发现。因为它解决了古代盛产木材地区烧瓷的窑炉问题。过去曾有人提出过邛窑的窑炉可能是龙窑，看来这种推测有了一定的依据，可能性是很大的。

除上述两种窑型外，在川东地区巴县姜家还发现有所谓“鸡窝窑”。这种窑结构简单，利用就地取材的卵石砌成，形体扁圆，似桶形。从火堂至后壁深2米，宽2.4米，高2.1米。后壁有两个圆形出烟孔。窑室有二级台阶，匣钵与烧制器皿堆叠于上。这恐怕也是属于馒头窑之类。

四川在唐宋时代，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当时就有“扬一益二”^①之称。宋初各州县都设有官监，“大者专置，小者令佐兼领”，专门主管商务。宋仁宗时国家征收商税倍增，皇帝下诏增使臣一员监督。熙宁以前四川各州商税岁额达四十万贯以上。商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尺度。灌县42米多长大型龙窑的发现，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物证。据有关方面计算，42米长的龙窑，一窑可烧瓷器一万五千件以上，无疑是规模较大的商品生产。

到了南宋，形成了宋金对峙的政治局面，经济重心南移，北方窑场遭到破坏，瓷业工人大批南下，促进了南方瓷业的快速发

展。浙江的龙泉窑、江西的景德镇窑都发展很快。四川宋窑也是迅速发展。

最近在彭县磁峰公社宋代白瓷窑址中，发现一刻有北宋嘉佑年号的印模，这就证明在四川使用煤作燃料烧造瓷器是比较早的，估计可早到唐末，至少也在宋初。这种新工艺的出现，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

馒头窑是由新石器时代竖穴窑和横穴窑发展而来，历经了几千年的不断改革，它的演变大体如下，由无窑堆烧（现在云南西双版纳少数民族中还可见到此种烧法），到不封顶的半地穴式窑敞烧，再发展到封顶，容积扩大。到了龙山文化时代窑炉就比较完备了。西周到战国又有重大改进，烟囱才从窑的上面移到后面，热工能的利用更加充分。战国到西汉，火膛从窑的下面移到前面。至此以后，窑炉日趋完善和提高，直至馒头型的平焰窑。在北方由于原料特性和工艺要求，燃料种类的不同，最先使用煤作燃料，大量发展这种馒头型的平焰窑。彭县磁峰窑正是从北方传来的，是属于北方烧煤的馒头窑。从结构上看，它与陕西铜川立地坡窑、西安砖瓦窑、河北曲阳定窑，都属于一种类型。从产品的工艺、质地、装饰方法都同定窑有相似之处。我省近年在西昌地区发现的唐代砖瓦窑，其结构也和北方的窑炉相似，说明早在唐代这种窑炉就已经传到了四川。

至于龙窑，我们认为从南方传来的，时代恐怕还要早一些。最近在灌县发现印有乾元年号（公元758——760年）的窑砖就是依据。这种龙窑在四川很可能占主导地位，因为大多数地方都是以木柴作燃料。

我们之所以将上述两种类型的窑炉断定为南北科技交流传到四川来的，其理由有三：

一、我国制瓷技术，唐宋以来，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影响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对邻近国家的影响尤其显著。如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泰国。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宋开宝二年至乾道

七年（公元969——1171年），在远隔重洋的非洲埃及，有一名叫赛尔德的手艺人，仿造中国瓷器，还传授了许多徒弟。奴隶王朝时代，埃及就大量仿造中国瓷器。西亚各国，制陶技术都源出于埃及，都仿造中国瓷器。波斯、伊拉克、叙利亚、西班牙、意大利等都深受中国瓷器的影响。当时在国际中影响如此之大，在国内的影响就可以想见了。在远隔重洋的非洲、欧洲都能传去，难道仅隔秦岭和长江三峡的四川就传不到吗？何况当时川陕之间还有栈道可通，川江航道蜀商往来频繁。我们根据当时技术在国外传播的情况，认为制瓷工艺直接传到四川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二、近几十年来，四川出土大批外省瓷器，主要是浙江龙泉窑的青瓷、江西景德镇的影青瓷和河北定窑白瓷。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在什邡、温江、简阳等地的窑藏和宋墓中出土了成批的瓷器。就拿1974年11月简阳宋墓出土的瓷器来说，在很小一个宋墓中出土各名窑的瓷器达515件，其中龙泉窑的青瓷就有259件，几乎占将近一半。景德镇影青瓷131件，定窑的紫定、黑定和白定共103件，耀州窑2件。这说明当时南方、北方各名窑的产品都通过商品交换这个渠道大量流入四川。既然笨重易碎的瓷器都能通过不便的交通运到四川，难道这种制瓷技术就不能随着产品的交流传到四川吗？这是可以理解的。一种生产上的先进技术，不管经过多少周折，总是要传播的，总是要被人们所接受，只是时间上的迟早而已。在古代尽管为闭关自守的封建自然经济所束缚，但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使技术交流不断冲破这种约束，向各地传播。不仅制瓷手工业如此，其他手工业也是如此。近现代的情况就不同了，科技方面的传播就要快得多，因为它可以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手段来索取资料。

三、再从磁峰窑和玉堂窑的产品风格和装饰技术也可以看出技术交流的关系。首先看彭县磁峰窑，它的造型和装饰除地方风格外，有很明显的定窑作风。定窑的装饰手法有划花、刻花、印花三种。划花和刻花用刀或竹片划刻，印花用范模，都属阳纹。

彭县磁峰窑的装饰手法也是三种，特别是印花，我们先后发现了三个印花范模，花纹雕刻非常繁缛，有分组，有缠枝，有串枝，其中一件刻有北宋嘉佑年号。定窑选用的题材内容以现实生活中的动植物图案，植物多以牡丹、萱草、莲、菊等，动物多以飞凤、双鱼、鸂鶒、仙鹤、鸳鸯等。磁峰窑花纹的题材几乎与定窑完全一样，尤其是牡丹、萱草、双鱼、飞鸟等。造型大部分相同，只是胎骨略厚。磁峰窑的印花技术很高，工艺过程特别精细，艺术效果也很不错。过去我们在崇庆县大庙公社江源故城，发现过磁峰窑的印花白瓷碗，其花纹制作之精细，完全可以同定窑媲美。

玉堂龙窑，产品主要是青瓷，也有少量白瓷，这里的产品无论从造型和装饰方面看，都不如前者精细。它的工艺流程不一样，这里采用无匣钵敞烧。没有匣钵这种装烧工具，就不能解决烟灰的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质量。但在这种条件下，使用那样庞大的龙窑，在技术上也算是高超的。龙窑在江、浙一带很早就使用了，唐宋时候已相当发达，开始出现阶级窑，普遍采用匣钵了。当时的灌县玉堂窑还没有采用匣钵，这正是技术上落后的表现。在装饰方面灌县玉堂窑有一种刻划莲花瓣碗，纹样与龙泉窑相同，只是表现手法不同，前者刻划阴纹，后者为凸阳纹。花瓣式口的造型也与龙泉窑青瓷相似。青瓷中有些色调较好的，也有龙泉窑梅子青的味道，粗看颇有龙泉青瓷之感。

据此，我们初步认为，四川南北两种窑型的发现，证明在唐宋时候南北两种烧瓷窑炉都传到了四川。它的发现，对于研究四川唐宋时候瓷业生产水平、工艺流程、生产规模和生产关系等，都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①编者注：扬州是唐代南北交通之枢纽，街市繁华，商贾辐辏，故有“扬一益二”（扬州繁华第一，成都第二）之称。诗人杜牧有“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诗人王建也有“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等吟咏。

四川省古窑址

冯先铭

四川省古窑址已发现十余处，绝大部分是五十年代发现的。都聚集在成都市附近。已发现的窑址上起南朝，下到宋元时期，以烧青瓷为主，不少瓷窑具有共同风格，带有四川地方特色。

1. 邛崃窑 解放前窑址遭到严重破坏，建国后经过多次调查，对窑址分布、烧瓷历史以及装饰特征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邛崃窑创烧于南朝时期，固驿窑遗留有不少南朝时期标本，如常见的四系壶，壶的四系多为桥形，敛口的小杯，在四川地区南朝墓中经常可以见到。窑址里还有高足盘，又具有隋代典型作风。十方堂是邛崃窑的典型唐代遗址，解放前被盗掘的主要地点就在这里，窑址所出五颜六色的瓷片被军阀做为装饰牆壁与铺路之用。十方堂出土器物与长沙窑具有共同装饰特征，青釉褐绿斑与釉下彩绘品种遗留甚多，既可看出两窑的关系，又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十方堂除烧制大量日常生活用的瓶、壶、碗、洗、盘外，还大量烧制小件雕塑，既可见到活泼可爱的胖娃形象，又有各种飞禽走兽，姿态都很生动可爱。

2. 成都窑 窑址在市区通惠门外的青羊宫。一九五五年四川省博物馆对窑址进行过小规模试掘。从出土的四系壶标本判断，这里创烧于南朝时期，标本之中还有隋唐时期遗物，唐代标本有在黄白釉下施加褐绿彩圆点纹饰的，这种装饰与邛崃窑的青釉釉下褐绿彩点装饰有相似之点，但釉色黄白，釉层薄而不同。又与邛崃窑不同，这种色调更具有四川地区特色；灌县新发现的

玉堂窑址也烧这类器物。

3. 华阳窑 窑址在县南胜利乡一村，窑址一带俗称琉璃厂，因此也叫琉璃厂窑。出土遗物有青黄釉绿彩刻花鱼纹盆，两尾并游的鱼逆水而行，线条自然流畅，具有较高的水平③。

4. 广元窑 窑址在磁窑铺，一九五三年修建宝成线路时发现。烧瓷品种，除黑釉外，还烧绿釉、黄釉和黄地褐花小件雕塑等品种，黑釉有兔毫和玳瑁釉。烧瓷为宋元时期。

5. 彭县窑 一九七六年发现，是四川省发现的唯一一处烧白瓷的窑址。一九七七年又对窑址进行了局部试掘，出土遗物中有很多刻花双鱼纹盘碎片，印花标本也出土不少，证实彭县窑是属于仿定窑白瓷的瓷窑之一。它的烧瓷时间是在宋代，但窑址出土有绍兴及嘉泰铜钱，又以定在南宋时期比较合适。

此外，金堂县、乐山县和奉节县也都有窑址发现。

（摘自《故宫博物院院刊·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1980年第1期）

试谈四川古代瓷器的发展及工艺

陈丽琼

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我国瓷器在世界历史上放射着灿烂的光芒，对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我国被誉为“瓷器的祖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黄河、长江流域商周原始青瓷的不断发现，以及两汉以来的青瓷的大量出土，说明了我国瓷器在东汉时期已普遍生产，南方的青瓷已达到真正瓷器的要求，① 距今约有一千八百多年，它比西方瓷器制作要早十五个世纪。现就四川地区古代瓷器的发展情况试作如下论述。

一、青瓷的发展（汉—南北朝）

关于四川烧制瓷器的开始年代，在历史文献中缺少记载，但在本世纪的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初，有关专家、学者多认为始于唐代，至五代到宋而兴盛。② 或更有甚者，认为始于宋初。现在根据考古发掘出土的可信材料说明，远在东汉晚期就已有相当成熟的青瓷了。它们的造型有罐、碗、钵等，质地坚硬，胎为淡灰白色，釉色有黄绿色、姜黄色、灰青色，还有美丽的淡青色。大件容器多为手制，小件食用器多用快轮拉坯。1954年重庆南岸樊家花园、③ 1955年重庆弹子石东汉砖室墓共出土青瓷碗廿余件，④ 1957年新津堡子山东汉岩墓出土青瓷罐四件，⑤ 大邑县马王坟东汉墓出土青瓷罐数件，⑥ 重庆江北东方红公社

东汉石室墓出土青瓷两件，⑦1975年成都市郊曾家包东汉画像石墓出土青瓷数件，⑧1976年中江岩墓亦有青瓷出土，特别是1979年重庆南岸电讯局出土青瓷器，即有五件较完整的六系、四系罐。⑨ 这些瓷器经过认真比较，分析研究，既具有同时代南方青瓷共具的时代风格，又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工艺特点和装饰艺术的殊异性。如前列举的1957年和1979年重庆出土黄绿釉中有水浪纹的六系罐，与洛阳烧沟汉墓编号147东汉初平元年墓出土的四系罐十分相似。⑩唯一不同是新津、重庆的青瓷罐，在等距离的扁形耳下，多设两竖立耳，且于四横耳上增饰有四川汉代花砖常见的米形纹三组，此纹饰似葵字，“葵”为“贵”的谐音，可能是寓有“富贵”之意。⑪又如成都1975年曾家包汉墓出土的四系青瓷罐，其造型、釉色与浙江上虞县小仙坛东汉龙窑的四系罐相同，⑫它们都胎釉结合牢固，釉面无裂纹，玻化良好，釉是淡青色，胎呈浅灰白色，质地坚硬细腻。再有就是南方青瓷的碗、杯、钵的造型多一样，只是器形的内外壁未见有十余枚不等的瓷石支钉疤子，此疤子是装烧器件时的一种间隔垫具，这类垫具外地瓷窑不曾使用，当为四川特征。但是四川汉代窑址在什么地方呢？根据多年的古窑调查，确实未见有比较清楚的汉代烧瓷窑场，不过据多次在成都青羊宫反复调查和青羊宫窑址的试掘资料，知其多是晋至晚唐的遗物。但笔者于复查时却见大量的汉代陶器，若从南方越窑在汉代既能烧陶亦能烧瓷甚而陶瓷合烧推测，青羊宫窑在汉代亦可能烧瓷。至于未发现汉代瓷窑，则可能是因经历时间长久，古代窑址被淹没了。亦或调查未周，还有古窑址未被发现。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新津、灌县、郫县、温县等地均有可能发现汉代窑址。

此外还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在四川发现的周秦以前墓葬或遗址内，未见有印纹硬陶或原始青瓷出现，而至汉代晚期即有较成熟的青瓷呢？这是因为四川地区在周秦时代与中原和南方的交往甚少，文化比较后进。但自秦始皇统一巴蜀后，即在巴蜀设置郡

具、传播先进文化，到汉代，四川地区已经是汉帝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都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与此同时，长江上下游文化交往更加频繁，特别是东汉晚期，南方青瓷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由原始青瓷逐渐向成熟阶段发展。因此南方青瓷在东汉晚期才传播到四川，四川到东汉时，一开始就能烧制较成熟的青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国至两晋时期，四川青瓷生产的造型的种类逐渐增多，装饰更加丰富。1976年中江县岩墓有浅腹平底青瓷碗与刘备时的直百五铢铁钱同时出土，碗内壁底部有十余枚支钉疤子，^④与汉代器形无甚变异。

西晋初期，不仅有德阳黄许镇出土的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青瓷器，^⑤还有更早的成都羊子山泰始十年（公元274年）砖室墓出土的青瓷印方格纹碗与黄绿釉六系瓷罐。这些瓷器造型端庄，釉色莹润，具有汉代遗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绿釉六系罐，以造型和纹饰而言，大体上与东汉晚期六系青瓷罐相同，其主要区别是肩上的浪纹没有了，最大径由腹中上部降至腹中下部，相应的底足增大了。用以保持器物稳定，说明了器物演变是与人类生活习俗紧密相关的。它的变化和发展，基本上是承袭前代作风的。

东晋时期，造型与花纹装饰较西晋显著不同，造型上和南方相似的鸡首壶、盘口壶、盘口罐、盘口唾壶、龙把柄、桥形系均有较多的出土，颇具地方特色。花纹装饰上，不仅有刻划纹饰及压印的圆珠纹等，此外还创烧了以褐色斑点于器物的口沿上，从而突破了青瓷的单调色彩，同时在釉色上更加稳定于青绿色。

至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东晋纪年墓出土的青瓷器，但根据墓葬结构与青瓷本身造型和纹饰比较，表明常山六朝岩朝出土的盘口壶、盘口桥形系壶、点褐色斑点四织于口沿上的平足碗、^⑥忠县六朝岩墓出土的桥形系盘口壶，与浙江瑞安宋晋太和三年（368年）砖墓的鸡首壶略同，^⑦与江西新干余鸡岭晋墓鸡首壶^⑧

和广州六朝墓鸡首壶、^⑳ 南京甘家巷和童家山六朝墓盘口壶无甚差异，^㉑ 还与南京中华门外郎家山、^㉒ 浙江上董窑东晋鸡首壶^㉓ 极相类似。综上所述相同点较多，但相异处亦很突出，就拿鸡首壶为例，外地多把鸡首流、桥形系、龙把柄设在肩边沿上的一个水平线，而四川的鸡首流嘴不是平向前方，而且向上翘，首身靠颈边，并于双鸡首之中附加印瑞兽面压印圆珠纹排为三角形的须状纹饰，这是外地所没有的，独具浓厚的地方色彩。又如盘口壶外地多双系壶，可四川仅有四系壶。碗的制造工艺均采用快轮拉坯，但装烧垫具多用瓷石作支垫，少用圆形齿垫间隔。这些说明四川青瓷无论是装饰、造型或装烧工艺都与南方瓷器工艺有所不同。

关于制瓷的窑场，1957年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冯先铭先生来川调查古窑时，曾认为成都青羊宫窑址可上溯到南朝至东晋，邛崃十方堂的窑址其时代与之相仿，为四川早期产物。^㉔ 近年来笔者曾多次复查，认为他们的推断是正确的。此外还有灌县的金马窑、^㉕ 邛崃固驿窑均可上溯到东晋至南朝。^㉖

南朝瓷器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更有新的进展。根据现有资料，昭化（现属广元）、广元、绵阳、德阳、彰明、^㉗ 涪陵、重庆、忠县等地墓葬多出土有青瓷器。无论器物的类别和造型与花纹装饰均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如除生活用器的罐、壶、碗、杯、盘（高足盘）、钵在继续生产外，还新增了文房用具的五足乳钉砚、带盘的三足香炉等。^㉘ 在壶罐形制上多以瘦长为主，特别是盘口桥形四系罐、盘口桥形四系壶等均由短颈变长颈、短腹变为深腹、耳系亦流行桥形系，但还新创一种圆环耳，^㉙ 碗亦由浅腹变深腹，平足增高（即假圈足），内底的瓷石支钉没有了，而是五至七枚的无釉支烧足，大大增加了碗的美观与实用价值。为改进釉面的光亮度，釉下已普遍使用化妆土，在花纹装饰上，由于南朝佛教盛行，莲花是佛教的象征之一，以莲花为题材的纹饰广泛流行，如昭化、重庆出土的莲花纹盘口壶、碗等，^㉚ 都较别

致。另外在盘口壶的颈上，饰以明显的竹节纹亦是这一时期的新作。特别新奇的是邛崃十方堂窑出土的盘口四系壶，^⑤其形制为盘口短颈、颈肩之处设四圆环耳，丰肩，平足。花纹装饰在腰的上部施青釉，而后用黑彩绘两株草叶纹和“永元”二字相隔其间织成纹饰，虽釉和胎质均欠佳，但由此可知至少在南齐永元年间（公元499年—500年），就已在黑斑彩的艺术上，开创用笔绘黑彩装饰的新工艺了。

南朝的窑址有成都青羊宫、邛崃固驿、十方堂、新津白云寺、灌县金马、金堂金锁桥、双流牧马山等窑。^⑥根据各地出土了众多手捏环垫的造型，上平下斜，测其斜度多 21° 左右，推测当时可能是采用龙窑烧制瓷器。

二、白瓷的出现及青、白瓷并 驾齐驱（隋—五代）

隋代瓷器是上继南朝下承唐代的重要发展阶段。窑场分布更加普遍，川南、川西皆有之。这时虽仍以单色的青瓷为主，但还出现了灰白釉下饰黑色联珠纹饰，这是它的特殊贡献。

根据川西出土的隋开皇年间墓葬的敛口浅腹小平足碗，与重庆博物馆馆藏黑彩书写的“仁寿四年造”平足盘而言，碗的造型已由深腹变浅，大平足为小平足，高足盘变为平足盘。深腹平足杯为小平足，还新创了一种高足杯。花纹装饰上，无论金马、固驿、双流牧马山、青羊宫等窑场多在敛口钵上饰以釉下黑色联珠纹，这种釉下彩的出现为唐代的釉下彩开创了先路。

唐代五代是四川瓷器生产大发展的重要阶段。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四川的农业、手工业和文学艺术都空前繁荣，反映在陶瓷手工业上更有飞跃的进展。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诗中赞美“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⑦据清人兰浦所释：“首句

美其质，次句美其声，三句美其色，蜀窑之佳可想见”。^{③④} 依据这些文献记载，蜀窑到此时已达到相当完美的阶段了。

根据古窑调查，川西、川南、川东等地都有窑场（详见古窑调查表），遗憾的是大邑窑，近年来笔者和四川陶瓷编写组的同志，曾多次前往调查，至今仍未有发现。但是诗人歌颂的大邑瓷是不是就应否定呢？笔者认为不能。关于它的窑场也可能设在大邑，也可能不在大邑境内，而在附近相毗邻的县境内。在大邑境内的理由是，大邑境内的均平、王泗至今仍盛产瓷土，经过科学的化验分析比较，若去掉0.2%的氧化铁即与景德镇的高岭土一样的优质。^{③⑤} 古人烧制瓷器，因交通不便，制瓷原料多是就地取材，因此从这一点说，唐时大邑烧瓷是有可能的。窑场不见，可能因烧造时间短，遗存不很丰富，被覆盖了。也可能大邑瓷不在大邑而在邻县生产，瓷商们运到大邑出售，杜甫的友人从大邑买来送给他，故称大邑瓷。

四川唐墓出土很少，可喜的是1978年四川省博物馆在川东万县清理一座砖结构的唐墓，出土了一百余件青瓷器，瓷俑占80%，其中有乐伎俑、武士俑、文俑、侍俑、骑骆驼俑、马俑、鸡俑、棋俑、瓷砚、瓷磨、唾壶等，釉面匀净，晶莹润泽，造型优美，神采各异，尤以那各类文武俑、骆驼俑的形象塑造与北方唐三彩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是现阶段我国唐墓出土的青瓷俑中所罕见的珍品。至于烧造窑场究在何处，至今还不能肯定。^{③⑥}

唐时的青、白二瓷不但有其飞跃的发展，还有更负盛名的邛窑三彩器。邛窑三彩是一种釉下彩，其釉彩有黄、绿、兰、褐、白等色。釉面平整，具有彩绘永不脱落的效果，誉满中外，亦为诗人骚客吟咏称美。元代诗人吴莱所作《大食瓶》诗，歌颂波斯瓷器时，即有“定州让巧薄，邛邑斗轻坚”之句，诗人以定窑、邛窑作比，可见非一般了。邛窑的历史悠久，至唐时是它的极盛阶段。解放前，军阀唐式遵曾强迫数百军民进行日夜挖掘达二月之久，许多精品被盗运上海，流传国外。尽管邛窑遭到如此

浩劫，仍是盗不完，挖不绝的。近年笔者曾专程前往调查数次，收集了不少邛窑作品，尤以唐时最精，胎质坚硬，色呈灰白色，值得注意的是釉色种类繁多，深浅、浓淡不同的青、绿、蓝、紫、褐、灰、白等色达二十余种。造型的种类凡生活用具如罐、壶、碗、钵、杯、盘、碟、盏，无所不有，且各样规格品种极多。在陈设器与小玩具上更是花色品种齐全，有砚、水澄、笔洗、狮、龙、虎、猴、狗、牛、羊、龟、豚、象、兔、鸡、鸭、鱼、响铃等。生活用具采用轮制拉环成形，小玩具与陈设器以手捏、或范印、雕琢等均有之。而尤以雕琢器最佳，无论是人物或小动物都很形象逼真。还收集到一件三彩人物水澄，器为一体态丰腴、深目高鼻的少妇，身着折领短袖衣，怀抱一角杯（杯空可盛水），面容肥美，颇有唐代胡人装扮。这可能是因唐和西域来往频繁，或有“胡客”流寓于蜀者，故蜀窑造形艺术也有外来文化的反映。邛窑三彩器中的褐、绿、蓝色彩斑，及圆珠纹构图的纹饰亦精美别致，独具风格。与湖南长沙铜官窑略似，在胎质上亦很相仿。但铜官窑有贴花，而邛窑则无；铜官窑不饰化妆土，而邛窑必饰化妆土，这是两窑的主要区别。③⑦

灌县的金马窑、玉堂窑、郫县的大坟包窑亦出有带彩器，但数质上远远不如邛窑。

初唐时，凡碗、盘、杯等由隋的小平足改为圆圈足。到中晚期因圆圈足工序较难，又改为大平足，而后为玉璧底。壶、罐的耳系由圆环耳或桥形耳，改为复式系。壶的流有八棱短流、管状短流两种，壶身略呈圆柱形，显得稳重大方。盘的形式已有花瓣形了。

灌县玉堂窑青瓷，经化验分析烧成温度为 $1240 \pm 20^{\circ}\text{C}$ ，与越窑相同，胎釉质略次于越窑，而与江苏宜兴唐代瓷器相近。③⑧

在窑具上，邛窑已独树一帜地采用匣钵装烧。调查邛窑时，在堆积如山的碎匣钵中有一匣钵碎片，刻有铭文“贞元六年润”（公元790年），为蜀瓷使用匣钵的历史提供了实物的证据。

唐代晚期，窑具的种类除匣钵而外，创有三角形圆孔垫，在

灌县玉堂窑的三角形圆孔垫具上，刻划有唐“咸通十年（869年）”铭文。^③同时亦沿用大小不等的锯齿形垫。值得注意的是那上平下斜的手捏环垫消亡了，这可能是不用斜坡式龙窑，而改用平底的馒头窑，手捏环垫就失去作用而消逝了。

唐代以后的五代，在前蜀王建割据四川时，四川相对稳定，反映在制瓷上也有所提高。王建对中原的统治者表面上恭顺，常有贡物送去。据记载：唐末前蜀王建，报朱梁信物，有金棱碗。致语云：“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报青瓷之响”。可见王建贡物的瓷器，是秘色青瓷碗，其碗之口沿镶嵌有金、银边。这样的瓷器，五代浙江钱氏亦有贡物，“吴越清泰二年（935年），王贡唐……金棱秘色瓷二百事”。^④秘色瓷至目前四川未有出土，而重庆市博物馆藏有一器，从工艺特点看属成都青羊宫烧造。所谓秘色瓷是一种色优形美的青瓷器，是专为帝王宫殿的御用瓷，被称为“秘色瓷”，徐夔有一首《贡余秘色茶盏》诗，美其茶盏的艳丽是“揆翠融青”、“嫩荷涵露”之色。^⑤这种色泽近于唐的越窑器，而又美于越窑器，成型技巧较之唐代更新颖灵巧。

五代时壶多长流，弯柄，器身似椭圆形。所有器足，多出现方圈足。窑场亦有增设，如川北广元瓷窑铺黑釉瓷已进入极成熟的阶段。1979年，岳池出土一件喇叭口、长流、双沟系把执壶，^⑥无论是造型、釉色均极考究，是广元窑的佳作。据郫县大坟包窑出土两件盘口长颈带把执壶的把柄上，印有楷书“郑家造”三字，可见当时许多瓷窑已有民间经营了。

三、瓷器工艺的繁荣时期（两宋）

两宋时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划时代阶段，瓷窑分布南北，产品各具特色，出现了群芳争艳的繁荣局面。西南的蜀瓷是其中的一支，无论制作规模，制瓷工艺，烧造区域的扩大，胎质、釉色、花纹的精细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适应大量生产的彭县白

瓷以石英砂垫烧，和广元窑直接叠烧、阶级窑的创造、成熟的掌握“窑变”技术制作的结晶釉，都是这时制瓷科技上的重要成就。

器物的造型，无论是碗、杯、盏、钵等均普遍流行方圈足，口以敞口、侈口为主，壶的流已改用长曲流。

烧黑釉瓷的地方，根据已知材料有川东的重庆、巴县、川北的广元等地。

重庆海棠溪白鹤嘴窑址，近年曾调查过两次，根据窑址堆积物的碎片与装烧工具匣钵来看，无论方圈足型的碗、盘、敛口玉璧底茶盏、碗型匣、漏斗匣的造型，以及黑釉色中的鹧鸪斑纹、兔毫纹等等，多与四川广元窑、福建建窑器极相似，与三十年代美国葛维汉先生调查相符。^{④③}

巴县姜家窑，县1976年重庆市物馆新发现的，^{④④}产品有黑釉瓷和灰白釉两种，以黑为主，造型有碗、盘、杯、灯等。所有器物足底均呈方圈足，唯盏为玉璧底，一般胎呈灰白色，釉面多有气泡，仅玉璧底釉色光滑，内壁还有闪闪发光的结晶筋脉纹，与“建窑”和“广元窑”的兔毫盏极为相同。窑炉结构简单，利用就地的自然碎石建砌，深、宽皆二公尺许。烧制方法一为器物直接叠烧；二为一匣一器装烧，匣钵有漏斗形、碗状形两种。从窑炉前堆放的煤渣和未烧用的煤炭观察，系用煤作燃料。此处如今仍在烧制粗瓷。

广元瓷窑铺黑釉窑，是1953年修宝成铁路发现的。分析出土的陶片，可认为此地是唐宋以来的古窑址。^{④⑤}目前出土的虽大多数是宋代风格，唐代风格较少，可是1979年在岳池墓葬中出土一件黑釉喇叭口把柄执壶，不论是釉色、胎质、造型，均已达到极成熟的阶段，从工艺特点看亦属广元窑产品，非外来品，它的烧造时代可上溯到唐。

广元窑的产品特征，与“建窑”极似；^{④⑥}还与同时代南方江西吉州窑、^{④⑦}浙江武义黑釉窑、^{④⑧}河南禹县扒村、^{④⑨}汤阴鹤壁集

民窑都有相互的共同特点和差异。^⑤经现代科学的测验,它与建窑更为接近,而最大的区别是广元窑饰有化妆土。其烧制的器物胎体厚重,断面有灰黑色、黄白色、灰白色,并以灰白色为主,烧成温度 $1290 \pm 20^{\circ}\text{C}$ ^⑥釉色以黑色、黑褐色为主,但也有青灰色、米黄色、黄色、绿色等。器物的种类有碗、盏、盘、碟、杯、钵、盏托、瓶等,其次是盆、洗、香炉、水匝、鸟槽、动物瓷塑及小玩具等,一般多使用轮制拉坯成形。从造型设计上看,是比较考究而多有一定比例法则的,如大型的碗通高与底径多为1:1左右,盏的口径与底径多为3:1左右,瓶的口径除梅瓶而外,口径与底径多为1:1左右,从整个造型上看是比较厚重稳妥,给人一种庄重之感。造型的变化是根据扩大使用范畴与审美观相结合而产生的,同时也使纹样得到充分的发展。特别值得称美的是手捏瓷塑与小玩具,虽寥寥几手,都意态生动,看后使人印象深刻。花纹装饰,有窑变兔毫纹、鹧鸪斑纹、玳瑁釉花纹、压印纹、绘花纹等,绘花纹饰有素胎绘花和釉下彩绘花两种。素胎绘花多施技于瓶上,有白地绘酱色牡丹花、酱色地绘白色牡丹花,及其他卷叶纹饰。釉下彩绘花有米黄地绘黑花、青灰地绘黑花、绿地绘黑花,这些黑花并非单一的黑色,而还有深浅浓淡不同的浸染色调,颇具国画风味。其纹样多取材于现实,如以写生为基础的枝叶并茂的折枝花、草叶纹、游鸭等。这些纹饰,根据器形的特定位置,用中国绘画的大写意手法写绘而成,虽仅几笔,织成纹饰,有似花非花,似叶非叶之趣,却简朴自然,具有浓厚的国画中的花卉“不似之似”的“遗貌取神”之艺术效果。只有把绘画的方法应用到瓷器上,才可以从笔触中充分发挥艺人们的智慧。这种新创的艺术瓷的烧成,为以后的彩绘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8年重庆博物馆进行古窑复查时,发现了广元窑的窑炉是阶级窑,遗迹中有窑墙、窑壁、排烟孔、窑汗、窑门、煤渣等,窑炉中出土的碎片,多为宋代常见之器。宋代使用阶级窑,

是目前田野考古中的新发现。过去曾有文献记载：“建窑”的天目盏（即黑釉茶盏）是在阶级窑中烧制的，但未见实物证据。即有人怀疑，甚而给以否定。现在看来应重新给予肯定。阶级窑是比较先进的窑炉，在火焰控制上，能烧还原焰，它升降温较慢，易控制升降温速度和保温时间，又能利用产品冷却的热来预热空气，使燃烧温度高，成品率高，节约燃料。^⑤ 装烧工具，有各式匣体和支垫，特为突出的三叉形支垫，是四川其他窑所无的。装烧方法最主要有两种，一是一匣一器，用石英砂支垫；二是无匣无垫直接叠烧。前一种装烧是精细品，后一种是一般大市货。

青釉瓷系，据已知材料，多集中在川西地区，名窑有邛崃十方堂、灌县玉堂窑、成都琉璃厂等窑，此外尚有金堂金锁桥窑。

灌县玉堂窑是1977年四川省陶瓷史编写组发现的，四川省博物馆曾进行了试掘，1978年春重庆市博物馆又进行了复查。玉堂窑为唐宋瓷窑，在宋时仍以烧青瓷为主，其次也兼烧白釉瓷。此窑不见文献记载，据试掘者推测上限至唐，下限当为北宋中期，^⑥ 根据笔者调查，何家龙窑出土的菊瓣纹碟，与白釉碗的装烧工艺用石英砂堆作垫烧，同彭县瓷峰窑白瓷南宋时期的装烧法无区别，更为重要的还有从窑区的农民手中采集到一件破残的白釉带沿洗，洗的沿底有“淳熙肆年平阳使用季冬题记”铭文十二字，此件器物的胎、釉、造型均与何家龙窑出土的器物无异，其下限当是南宋淳熙肆年（1177年）以后去了。故认为下限定为南宋中晚期比较符合实际些。

此处所发现的器物胎质有灰白色与黄白二种，体薄而坚，釉色多呈橄榄绿色，碗的内外壁上满釉，且以素面为主，但亦有极个别的三彩草叶纹，和刻印的折枝牡丹纹，及釉下绘六条等距离的直线纹。器物种类以生活用器为主，不见瓷塑和小玩器，尚有明器，如青灰白釉的船形镂空圆座枕亦有烧造。

邛崃十方堂窑，在唐时以烧三彩著称，到宋时，仍有不断创新。其中声誉远扬的是邛窑省油灯，据《陆放翁全集·斋居纪

事》：“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盏最省油，蜀中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半”。又据《老学庵笔记》：“《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灯盏诗，今汉嘉有之，盖夹灯盏也。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故速干，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根据以上记载可知：第一，陆游时四川人读书，不用铜灯，而用夹瓷的省油灯。灯的使用法，是把水从盏嘴灌入夹层，而后在灯面蓄油，降低油温，减少蒸发，节省油耗。第二，五代到北宋初的宋白，即文安公，记述了蜀中的省油灯产于汉嘉（今之雅安）。据已知材料，雅安未发现古窑，而雅安距邛窑最近，可能当属邛窑产品。若推论无误，而我们又在邛窑发现有较多的省油灯和陶瓷出土，则可证实邛窑于五代至南宋初还在继续烧制瓷器和省油灯。省油灯的出现，大大提高了陶瓷产品的使用功能，为以后陶瓷产品用于工农业生产开辟了新的途径。

琉璃厂窑，烧造的历史悠久，延续的时间较长，约始于晚唐，盛于宋，衰于明。产制的品种既有陶又有瓷，多数火候和胎质略次于邛崃十方堂窑，但品种繁多，釉色有单色釉和多色釉两种，单色釉基本上是青、黄、赭色三种，青色有青白、粉青、虾青，黄色有米黄、桔黄，赭色有深棕色、酱色，多色釉为绿、黄、褐三色配制，具有唐三彩的效果。花纹圆装饰，常在青釉地、或赭色、桔黄地绘上绿、白色花枝、鱼纹、水藻等。特别值

旺、吴等，关于商标的记号有：王造、窰造、范造、易造等等。⁽⁵⁵⁾ 这些标记可能是晚期商品经济更加繁荣而反映在陶瓷上的特征。

白瓷，从文献上看似乎宋代白瓷情况不明，根据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在川西彭县思文、瓷峰两地发现有白瓷窑址，其次灌县玉堂窑也烧有白瓷器，这三处白瓷窑址，以彭县瓷峰窑遗留丰富，最具有研究价值，是四川白瓷艺术的一颗明珠。在未发现瓷峰窑以前，不论是古董商或是研究古陶瓷者，常有把瓷峰窑的产品误认为“大邑瓷”，视如珍宝收藏，这实为一种错误，现应正名为彭县瓷峰窑瓷。

彭县瓷峰窑，是1976年重庆市博物馆与四川省博物馆陶瓷调查组发现的，位于彭县西北角的瓷峰公社所在地。窑场范围约四华里，据探测和已暴露的窑灶残迹即有十七处。其周围盛产瓷土、釉药、石英、长石、耐火土和原煤，为瓷器生产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1977年初曾进行了试掘，共采集标本一千余件。关于它的时代，根据试掘的地层关系，结合文献资料分析，上限为北宋，下限为南宋晚期到元初。但也有人认为它很似北方定窑风格，疑是靖康之乱以后北方艺人带迁，将定窑制瓷艺术带到四川而有瓷峰白瓷。后来重庆市博物馆1978年再次调查时，在窑区出土有泥质八方圆形刻花鸟的轴座，刻有“嘉祐×××月二十二日，谢家使用，赵抃土造，右土西登用”。1978年，在阆中北宋崇宁年间陈安祖墓出土有瓷峰窑白瓷素器二件，即证实瓷峰窑在靖康之乱以前就已烧制白瓷了。

经过试掘，在一百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南北长8.32米、东西宽5.76米的马蹄形窑炉（又称馒头窑），⁽⁵⁶⁾ 这样大的窑炉，是考古发掘中所罕见的，比定窑五代马蹄形窑灶要大约二分之一。⁽⁵⁷⁾ 还发现了直径70厘米的拉坯石质辘轳、研磨釉药石磨、石臼、铁杵、以及各种大小不等的匣钵和试测窑温的“火表”（又称照子）瓷片、压印花纹的印模等等，这些生产设备烧造出来的产品，均胎质薄膩，釉色莹润，造型端巧，纹饰生动，与同时代

的定窑、景德镇田窑、龙泉窑、耀州窑等先进窑场是用一样的操作方法生产瓷器，甚而在某些方面还超过它们。据已知材料，使用测温“火表”，仅耀州窑于南宋时方使用，其他均晚于耀州窑。而瓷峰窑于北宋时就已开始了。使用瓷片测温的方法直到解放初还在继续使用。其方法是待入窑烧制的器件，切削成几块，插放在窑内不同代表的火位，而又通过火眼便于观察，当火候烧到一定时间，即取出观看，再确定升降火温。这是一种有实效而相当科学的方法，充分证明瓷峰窑的烧制水平和控制火焰能力是很高的，同时又证实了我国开始使用“火表”测温，并非始于公元十三世纪的南宋或元代，而是早在公元十世纪的北宋初期的彭县瓷峰窑。这对于后世陶瓷工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瓷峰窑器形的种类有碗、杯、碟、盘、盒、香炉、瓶、尊、瓶等。一般胎薄，上满釉，釉下饰白色化妆土，釉白带牙黄，净洁光滑，无片纹。造型制作规正端秀，棱角足，线条挺拔，可用美观。花纹有绘花、刻划花、印花三种。绘花比较简洁，用洁白的瓷浆，以笔钩六条平分线于碗的内壁，表示六出花瓣，或以六根曲线表示花纹，颇素雅大方。刻印花纹内容广泛，纹饰内容都是在自然界中寻找艺术题材，植物中的莲花、牡丹、海棠、梅花、荷花、萱草，动物中的鱼、鸭、鹅、鸳鸯、孔雀、鸳鸯、凤凰、火烈鸟等，组成带主题性的纹饰，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刻划的飞鸟、游鱼、折枝莲花等，运用豪放的刀法，熟练的笔写，勾勒轮廓，用篦纹填充，使这些疏密一致的线条，产生谐和的意趣，而形态率真，典雅大方，恰到好处。特别是刻划的折枝莲花，缠枝牡丹更是奇趣独具。印花多工细秀丽，图案布局谨严，对称美观，疏密变化有致，达到密不嫌满，疏不嫌稀的艺术效果。最引人入胜的是，花中之冠（牡丹）、鸟中之王（凤凰）组成的纹饰满布碗的内壁，宾主分明，神彩飘逸，虚实相衬，可谓达到诗情画意的美妙境界，充分显示出瓷峰窑的民间艺术匠师们，对自然界的一切美的形象和事物有着极为敏锐的审美感和独特的表现能

方。

瓷峰窑的装烧工艺是具有独创性的，主要方法是口沿悬空叠烧或覆烧，器件与器件之间，采用支托或瓷石珠及石英砂粒等作介质，以避粘连。因此瓷峰窑器物的口沿皆有釉，仅底足与内底有几粒瓷石珠或芝麻状的石英砂疤痕的缺点。定窑是覆烧，以口沿着匣，底足悬空，故定窑内外底皆平整，而口沿为芒口，这是两窑的最大区别。若从瓷峰窑口沿有釉这一点，又比定窑先进而适用，而从胎的瓷化程度上看定窑又略高一点。既然定窑是我国古瓷中一颗明珠，则瓷峰白瓷艺术，亦应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颗明珠。瓷峰白瓷与定瓷一样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具有中华民族的独特风格，浓郁的地方色彩，是我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它对于我国古代陶瓷造型装饰的研究和我国陶瓷工艺发展史的研究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四 结 语

解放后，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逐渐开始对四川古陶瓷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但由于调查范围不广，掌握资料不全，对元、明、清三个时期的发展情况还不甚清楚，故本文暂不提及，留待今后补充。从已有两宋以前的资料分析研究中，使我们了解到四川制瓷的开始，并非起于唐宋，它大体上和全国一样，成熟的青瓷器始于东汉晚期，蜀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是青瓷的发展时期，隋代继前代的基础，新创了白瓷，唐五代是青、白二瓷并驾齐驱、天下无贵贱通用之阶段，两宋时则出现了群芳争艳，相互辉映的繁荣局面。由这种分析而引起的对四川古瓷与中原和南方瓷器的关系探讨，可以知通四川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和南方地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四川瓷器的发展，只不过是这种客观存在的一个实例而已；同时也表明四川瓷器的发展，也是祖国瓷器发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过正文所述，充分说明陶瓷是科学和艺术的综合产物。它既是物质的产品，具有经济的价值，又是精神的产物，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服务的。我们研究整理古代瓷器的发展和演变，目的是去粗取精，发扬优良传统，继承我国古代文化优秀遗产，促进我国陶瓷事业繁荣兴旺，使其更好的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外文化的交往，继续作出新的贡献。

注 释：

- ①⑫ 叶宏明、曹鹤鸣《关于我国瓷器起源的看法》，《文物》1978年10期。
- ② 傅振伦《四川古代的陶瓷器用》，《文史杂志·四川专号》1944年；杨肃谷《四川陶瓷概论》《华西文物》1951年1期。
- ③④ 资料在重庆市博物馆。
- ⑤ 陆德良《四川新津县堡子山岩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8期。
- ⑥ 《大邑县“马王坟”出土东汉青瓷罐说明》，《四川陶瓷史资料》第一辑。
- ⑦ 资料藏重庆市博物馆。
- ⑧ 资料藏成都市文管处。
- ⑨ 重庆市博物馆《本市南岸上新街发现完整东汉岩墓》，载1979年7月20日《重庆日报》。
- ⑩ 《洛阳烧沟汉墓》第100页。
- ⑪ 徐文彬《四川汉代雕塑艺术》第66页。
- ⑬ 曹鹤鸣、叶宏明、程朱海等《关于我国从陶器向青瓷发展的工艺探讨》，浙江省硅酸盐学会印，1978年。
- ⑭ 资料藏四川省博物馆。
- ⑮ 张产煌等《四川昭化宝轮院屋基坡岩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8年7期。
- ⑯ 沈仲常《成都扬子山的晋代墓砖》，《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7期。

- ⑭ 石光明、张产煌等《四川彰明县常山村岩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5期。
- ⑮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瑞安桐溪与芦满古墓清理》，《考古》1960年10期。
- ⑯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新干金鸡岭晋墓南朝墓》，《考古》1966年2期。
- ⑰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六朝砖室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3期。
- ⑱ 金诗《南京甘家巷和童家山六朝墓》，《考古》1963年6期。
- ⑲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京出土六朝青瓷》图50。
- ⑳ 党华《浙江肖山县上董窑窑址发现记》，《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3期。
- ㉑㉒ 陈万里、冯先铭《故宫博物院十年来对古窑址的调查》，《故宫博物院院刊》总2期。
- ㉓㉔ 四川陶瓷史编写小组《灌县郫县南朝到唐古窑群调查》，《四川省陶瓷史资料》第1辑。
- ㉕ 资料藏重庆市博物馆。
- ㉖ 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院南北朝时期的岩墓》，《考古学报》1959年2期。
- ㉗ 蔣万锡《南岸玄康庙发现六朝墓》，载1979年9月18日

- ③⑥ 四川陶瓷史编写组《四川陶瓷史上存在的问题》第3页。
- ③⑦ 长沙市文化局文物小组《唐代长江铜官窑址调查》，《考古学报》1980年1期。
- ③⑧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1978年。
- ③⑨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第355页。
- ④⑩ 《十国春秋·吴越三》。
- ④⑪ 《全唐诗》卷6。
- ④⑫ 重庆市博物馆、南充地区文化局《嘉陵江南充地区河段考古调查记实》1979年5月。
- ④⑬ 大卫·格来汉姆《重庆附近之建窑窑址》，《华西学报》1938年卷10。
- ④⑭ 四川陶瓷史编写组《巴县姜家窑址》第85页。
- ④⑮ 王家祐《四川广元黑釉窑新探》，《文化参考资料》1955年3期。
- ④⑯ 厦门大学人文学博物馆《福建建阳水吉宋建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4期；宋伯胤《建窑调查记》，《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3期。
- ④⑰ 蒋玄怡《吉州窑》图41。
- ④⑱ 1978年6月笔者曾同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李辉炳、李智晏等专家于武义调查，采集标本进行比较。
- ④⑲ 叶喆民《河南省禹县古窑调查记略》，《文物》1964年8期。
- ⑤⑰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河南省鹤壁集古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8期。
- ⑤⑱ 国家建材总局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所《我国古代黑釉瓷初步研究》第22页。
- ⑤⑳ 刘振群《窑炉的改进和古陶瓷发展的关系》第21页。

- ⑤ 四川省博物馆、灌县文管所《灌县玉堂公社古瓷窑址试掘》第60页。
- ⑥ 资料存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
- ⑦ 刘可栋《漫谈我国古代的馒头窑》1978年5月。
- ⑧ 《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试掘》，《考古》1965年8期。
- ⑨ 陕西省考古研究《陕西铜川耀州窑》第49页。

附：四川古代瓷窑调查表

名称	瓷系	时代	地点
青羊宫窑	青瓷	晋至唐宋	成都市青羊宫及省医院附近
十方堂窑	青、三彩瓷	南朝至唐宋	邛崃县南河小平坝上
固驿窑	青瓷	南朝至隋	邛崃固驿镇瓦窑山
白云寺窑	青瓷	南朝至隋	新津白云寺小学
玉皇观窑	青瓷	隋至唐	新津玉皇观
金锁桥窑	青瓷	南朝至唐	金堂县玉红公社金锁桥
金马窑	青瓷	南朝至唐	灌县金马公社穴马槽
牧马山窑	青瓷	隋至唐	双流县牧马山应天寺
关庙窑	青瓷	隋至唐	乐山县关庙公社盘陀寺堤堰
玉堂窑	青、白瓷	唐至宋	灌县玉堂公社歧山、凤鸣
大坟包窑	青瓷	唐至五代	郫县永胜公社大坟包
礼安窑	青、黑瓷	唐	武胜礼安公社九大队三小队
琉璃厂窑	青、三彩瓷	唐至宋	成都市永胜公社琉璃场
瓷窑铺窑	黑、青瓷	五代至宋	广元瓷窑铺公社溶剂厂
姜家窑	黑瓷	宋	重庆巴县姜家场口
黄桷窑	黑瓷	宋	重庆南岸黄桷丫
瓷峰窑	白瓷	宋	彭县瓷峰公社所在地

(原载《史学论文集》1982年。)

四川威州彩陶发现记

林名均

一、发现之经过

我国彩陶，自安特生博士(J·G·Andersson)在河南、甘肃、辽宁等地发现后，继之有新疆、山西、陕西、湖北诸地之发现，吾国彩陶之分布情况得以大明，而吾国古代文化传播之途径，及其与亚洲西部及欧洲东部诸文化之关系，亦得一新见解。四川邻近陕甘，是否与中原古文化有所接触，因缺乏此种地下实物之证据，颇难断言。然四川实早已有彩陶之发现也。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二期(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Society Vol(1914—1925)四十五页附有插图一幅，第七十五页并有戴谦和博士之说明(Symbolism of the Designs—by D.S.Dye)，该图所示为红地黑花之陶片一块，然戴文仅谓得自灌县松潘道之威州一城堡内，而不著发现人姓名及其时间与确定之地点，故此陶片虽曾华西大学博物馆内陈列若干时间，而未为学人所重视也。

民国二十七年，华大博物馆前任馆长葛维汉博士(D·C·Graham)曾偕英人甘君(S·V·R·Cammann)游历理番等地，携回同类陶片数块，保存馆中，因所获材料不多，未曾经著文发表，地点亦未宣布。

作者因供职华大博物馆有年，早已注意于此类材料，惜不知其确实地点，无从前往考查。三十年四月，奉校命随华大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闻在宥教授赴川西北汶川理番一带考察，曾一往理番所属之威州，寄宿于威州师范学校。某日，偕邓维汉君步访校

后山坡上之姜维城遗址，其城传为蜀汉姜维征讨叛羌时所筑，建于山腰较为平坦之一台地上，城以土筑，高厚约七公尺，其周已不可计，今所存者，仅长约二百公尺之城墙一段而已，且半已倾塌，夷为平地。余以此城或即戴文所称之城堡，故即留心有无同类之陶片发现。甫抵该处，即于城足地而寻得一带彩陶片，红地黑花，与河南仰韶彩陶颇为近似，不禁大喜。继又发现同类之陶片二块，花纹甚为清晰。又于城墙土内寻得磨光红色陶片及绳纹灰色陶片多块，一一携取以归。其后余又数往该处，因当地气候较冷，烧后之山草尤未长起，且雨后泥土冲刷干净，故先后在土墙周围寻得陶片甚多，计带彩之红陶片十九块，不带彩之红陶片四十六块，绳纹红色陶片二十五块，灰色有纹与无纹陶片一百零六块。因考察时间甚暂，未能多有所获，然仅此亦足以证明四川之确有彩陶无疑矣。

返成都后，曾以所得出示葛维汉博士，告以采集地点及各种情形。承葛氏告以渠所采集及戴文所说之一陶片与余所得者均系同一地点，且谓最初一片之发现者为叶长青牧师(J·H·Edgav)其时间乃民国十年七月也。①

余所采集诸陶片，彩陶十九块，现归华大中国文化研究所保存，其它则保存于华大博物馆中。承闻在宥主任及郑德坤馆长惠予假借研究，盛意可感，谨此致谢。

二、发现地之史地考察

威州又名新保关，属理番县管辖。其地在四川西北边境，汶川县北四十里，位于岷江上游东岸，当岷江支流沱江入口处。沱江一名杂谷河，源出梭磨土司直固雪山，经杂谷理脑番县城东流而入岷江，威州城则建于此河口处对面江岸，负山带水，北通茂县松潘，经草地而至甘肃，西至理番杂谷而入西康，为川西北交通之枢纽。城内有山曰玉垒山，左思《蜀都赋》所谓“包玉垒而

为字”，或以为即指此山。又有溪名玉轮江，《理番厅志》②谓“玉轮江，原出玉垒山，又名湍水，下达于江，即茨玉水也。”《汶志纪略》；③“玉轮江出玉垒山后，经茨玉村，流入保关城内。经玉垒脚下，出北门，入大江。”此水今名南沟，将威州划分为二段，玉垒山在南沟之东，其西城桓以外山脚平坦处，今所谓之姜维城遗址存焉。

按《理番厅志》：“姜维山在厅治西北。《元初志》：在保县西十里，汉姜维马忠讨叛羌屯兵处。”又云：“高礪山在厅东三十里，三面悬岩，状若番俗礪房，上有姜维故城。”理番昔名保县，在威州之西，距威州约七十里。则今威州城后所谓之姜维城，实非昔日之姜维城也。考《理番厅志》称：理番古名维州，唐武德七年置，宋景德三年改曰威州，明洪武二十四年，徙威州治于坝州，宣德七年，因羌患逾江徙治汶川县，更徙汶川县治于寒水驿。《汶志纪略》亦云：“明宣德中，古维州为生番所克，移治霸州，复罹番害，遂迁威治于汶川县，而迁汶川治于寒水驿北。”又云：“汶川故城在今新保关城上古城坪，正德七年，生番攻破坝州，徙玉垒，更名威州，迁汶川于寒水驿。”又云：“汶川故城在今威州废城东山腰之坦平处，基址尚存。明宏治中，迁威州于汶川。知州赵符节，千户赵方筑威城，包玉垒在城内，石壁刻玉垒山三大字。汉之绵虒，晋唐以下之汶山、汶川，俱系故城。”是今之威州，乃古之汶川县治也。其城后山腰平坦处名古城坪，今相传所谓之姜维城，乃古汶川县故城城墙遗迹也。远在汉时，即于此置县，即绵虒县，其城为蜀时所建。今无可考。在汉以前为冉豸夷，情形更不得而详。惟以地势察之，岷江上游两岸都系高山而少平地，此地既较平坦，且地当两江之会，旁有溪流，既有水草之饶，复得交通之便，甚合古代游牧民族住居条件，是则此地必为古代民族聚居之所无疑。年代久远，生聚日繁，后人因地建城，就地取土，遂将古遗址堆中之陶器碎片，杂入土城墙内，今城废墙圯，雨水将泥土冲去，此等陶片遂得显

现于今日。

或以为此地下距江面达数十丈，山势甚陡，未必适宜于古代人类住居。此一问题，甚易解答，即此坪之西端，坡度较斜，入江取水，甚为便利。汉以后之人，既能在此居住，则古代之人，聚居于此，当亦无有困难。且岷江水流湍激，两岸石土易于冲卷，经若干年以后，河谷变深，河岸亦将加高，今之威州城即建于此新台地之上，故此坪在古代必较今日距江面为近，而山势或亦不如今日之陡也。

此地陶片既如此其丰富，以地势观之，又适宜于古代人类居住，若能以较长时间细心考察，附近尚可能发现未经毁坏之遗址。

三、各 类 陶 片

威州所发现之陶片，以彩陶为主，然尚有与彩陶时代相差不远之其它陶片，依其颜色及表面装饰，可分为彩陶，红色素陶、灰色素陶、红色绳纹细陶，灰色绳纹细陶，灰色绳纹粗陶六种。兹分之如次：

1. 彩陶 此种陶片，除一片稍带灰色外，其余均为砖红色，上绘黑色纹，与河南、山西之先着色衣，后绘花纹者不同，而与陕西宝鸡、汉中之红地黑花者相似。质料坚韧，不含砂粒。厚薄由4公厘至十一公厘，其平均厚度约六公厘。由陶片之厚薄不匀及陶片里面所显明之指痕，知其为手工制作。其中一片反面有盘圈痕迹，如其所使用者为盘圈法（Coiled）表面除一片为器之口沿未经打磨而外，其他皆打磨光滑。通常仅器之外部，即陶片之凸起面施以打磨，他面则高低不平，有指刮痕迹。然彩绘施于凹面者，则两面皆甚光滑。至其花纹，多为简单之黑色条纹，或横或竖，宽窄不等，有具同心圈纹者，有具圆点者。惟因所获全系碎片，不能知其全部情形如何，然大体与河南、山

西、陕西诸处彩陶上之花纹相似，故可视为同一系统之物。其中较为特殊者，为一小陶片，具有植物花纹，则为他处之所未见者也。至于施彩部位，所获之口沿二片，均有花纹，其它多绘于器之外部。仅葛氏所拾得之一片及余所拾之一小块，花纹在陶片之凹部，为器之内部，当为盘、碗等较为平坦之物。

2. 红色素陶 此类陶片之颜色、质料、厚度、作法与表面打磨情形，均与彩陶相同。有两面磨光者，有一面磨光者，亦有少数未经打磨过者。其与彩陶唯一不同之点，仅面上未施绘画而已，然则前者为同一时期之物无疑。其中一片，里面亦有盂圈痕迹，能显示其作法。又一片为口部边沿，其断面露出白石一粒，此种石质，为岷江上游之岷山所特有，呼为岷石，附近山间所在皆是。在粗陶片中，亦有包含此种细石及砂粒者，足以证明此种陶器系当地制造而非由他处带来。

3. 灰色素陶 此种陶片，或为深灰色，或为浅灰，亦有稍带红色者。其质料、厚度及表面磨光情形，均与上述二项相同，故可视为同种陶片，因火候及氧化程度不同而颜色有差异耳。其作法除手制之外，有二陶片（其一为口沿），外部光滑，厚薄均等，内部有平行手指线纹，似曾辅以轮盘（turn-table）制造。此类陶器，因系灰色，故不能绘以黑色花纹。仅有一片，一角涂有白粉一层，然不能断定其为当时涂上或后来偶着白色。此类陶片，虽无特别花纹，然亦间加装饰。一陶片表面虽平而不发光，然有四平行磨光条纹，每条宽约五公厘，其间距离约四公厘，似用指甲所磨成。又有一陶片，表面打磨光滑，而有二平行凸线，二线间之距离为二十七公厘。另二陶片则各带一浅槽。

此种陶器之形式虽不可知，然在此吾人可附带提及一事，即理番近年来出土之双耳陶罐，其颜色、质料、厚度、作法及表面磨光情形，均甚相似，两者之间，不无关系。又理番陶罐，双耳由口及腹，颇类甘肃常见之双耳陶罐，与齐家坪之双耳素罐，①尤为相近，是威州陶器与甘肃陶器又颇有相关之处也。

4. 红色绳纹细陶 此类陶片，亦为砖红色，或略带灰色。其质料除二片略含细砂粒外，余均坚细，不含杂质，手工所作，厚薄中等，与红色素陶片相似。惟表面未经研磨，满布绳印纹，细者多而粗者少，可分单纯线纹与交叉斜线纹两种。其中四片，在绳印纹之上各有一带凸起，系绳纹印就以后加上者。一凸起之带打磨甚为光滑，与红色素陶之曾经磨光者无异，故可视为同期之物。

5. 灰色绳纹细陶 此类陶片，亦分深灰与浅灰。有两小片内含白色细砂粒。其质料、作法、厚度与所施绳纹样式，均同红色绳纹细陶。其中一片，亦有凸起之带。另有三片，则在绳纹之上刮有平行浅槽数条。又有一片，仅一小部分有绳纹，大部分无纹者与灰色素陶之未加研磨者无异。

6. 灰色绳纹粗陶 此类陶片，大部分为灰色，少数略带砖红色。质体粗松，泥土之内，杂有白色粗砂或深灰色小石块，故断面甚不整齐，纯为手工制造。厚度由五公厘至十五公厘，厚者多而薄者少，平均厚度约十公厘。除一片为器之口部表面平滑无纹外，其它均满布粗大绳纹。其中四片有凸起之带，带上另印绳纹或以物稍加刻划。一片为器之口沿，作锯齿形。一为器底，平面带有绳纹。就陶片中之带边沿者观之，皆为粗大之器，因用于烧煮，故多夹石子，俾经火而不致破裂。

综上各类陶片观之，虽其颜色及表面装饰与质料有所不同，然颜色由于火候，质料决于用途，由其制作技术及其它相同之点，可视为同一时代或时代相距不远之物。又由彩陶上之花纹与仰韶期各陶器花纹相较，其时代亦大概相近，即属于新石器时代之末期也。或有疑此地并未发现石器者，吾人可以提出一旁证，即基督教边疆服务处及三十年暑期边疆服务团人员，曾先后于岷江支流沱江流域之佳山寨附近，发现有新石器时代之石斧若干件，威州距佳山寨仅数十里，交通较佳山寨为便，更适宜于人类居住，彼时佳山寨既有人类，则威州之必为先民所繁殖住居，可

无论矣。

兹将各类陶器大概情形列表于后：

种类	颜色	质料	厚度	作法	表面情形	装饰
形陶	砖红色	坚细	中等	手制	磨光	绘黑色花纹
红色素陶	砖红色	坚细	中等	手制	磨光	素
灰色素陶	灰色	坚细	中等	手制 以轮盘	磨光	素间带凸沿或浅槽
红色绳纹细陶	砖红色	坚细间含细砂	中等	手制	不施打磨	绳纹间加带形凸纹
灰色绳纹细陶	灰色	坚细间含细砂	中等	手制	不施打磨	绳纹间加带形凸纹或浅槽
灰色绳纹粗陶	灰色或带红色	粗松复有粗砂或石块	厚	手制	不施打磨	细纹间加带形凸纹

四、四川与中原文化之关系

由上所述，可知威州所出陶片，与山西、河南、陕西出土诸器，颇有相似之点，为同一系统之物，故四川与中原文化必早已接触。其文化系由河南而陕西，沿渭水与汉水而进入甘肃南部，然后进入四川，循岷江流域而南下。又理番双耳陶罐显受甘肃陶器之影响，故四川似亦曾接收西北文化，其路线为溯沱河上行而达于岷江。今沿岷江上行，由威州至茂县松潘而过草地，尚可北通陕西、甘肃，近人以山道崎岖难行，故多废为不用。而古人因造路艰难，^⑤同时游牧民族不能离水草而居，故交通以沿河流为便，他日考古工作若能深入边地，能于松、茂等地发现与此同类陶器，当可证明此说为不误。

此说如可成立，则中原文化之进入四川，最初当在西北边地而非中部平原，其时代远在三四千年以上。惟此文化到达威州以后，是否沿岷江流域而南下，是则有待于将来考古界之努力者也。

注释：①关于叶长青牧师在威州发现之彩陶，可参阅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一期布理士君 (A·J·Brace) Notes on Wei Chow一文，其文曰：“While on a brief visit on the purpose of Photographing the ruins Mr. Edgfn, With his cane, turned up a valuable piece of glazed pottery of ancient symmetrical design.”惟布君误以彩陶为带釉陶片，故为人所忽略。

②同治五年周祥峰修。

③嘉庆十年李锡书纂修。

④安特生甘肃考古记第五版第三图。

⑤自四川至陕西经过广元一线，在周显王以前，尚不可通。故秦惠王欲伐蜀，不得不使用石牛便金之计，使五丁开凿金牛道，俾便行军，其事具载于《华阳国志》。可知古人造路之艰难，亦可证古代川陕交通，必西经甘肃。

民国三十三年二月于成都

按：林先生此文，原附有画的彩陶图若干，但彩陶用原彩色印出，方可看出其彩色。原色彩图，今印不起。而用黑线条代表黑色，空白代表红色，则此图就无附的必要。况这些画图在目下印起来，数目是很可观的，故决定把它省去了。因此半页尚有空白，故附说明于此！

卫大法师校后记

(原载《说文月刊·巴蜀专号》四卷合订本 1944年)

四川邛州古窑址

(An Ancient Kiln Site at Chiung—Chou,
Szechwan)

(英) O·H·贝德福 (Bedford) 著

成恩元 译

出四川邛州城西门，译者注①顺着向西的公路前进，经过几个美丽的“牌楼”译者注②(一种石拱形建筑)，即抵达大南河东岸。然后沿河南行，不久就会到达一座半破坏的石桥，据说这一石桥，如果不是全中国最长的桥，至少也是四川最长的石桥。

通过大桥，登上河的对岸，顺着离开邛州城时所经的那条西行公路前行，译者注③很快，人们就会突然发现自身已经踏上一个古老的陶窑遗址了。

在它的左面，有几个直径大约十英尺，深约四英尺的圆形土坑。这些土坑是村民和农民们最近挖掘而成的。

再远一点，人们可以看到一堵残留的墙，它原是围绕着一座建筑在陡峭土堆上的道观译者注④和殿堂的围墙。这个小丘，经考察后，证明原是由古窑所遗弃的陶瓷碎片堆积而成的。现在村民们正在从各个方向，狂热地挖掘着这座小丘。他们希望能够发现一些损伤不太严重的陶瓷珍品，好给他们带来几元或几千小钱原注⑤的收入。这样坚持不断地挖掘的结果，使得那个建筑在废弃物小丘顶上即将崩溃的庙宇，其安全性更成了问题。在近一点的地方，其他的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身躯，在深坑中用最原始的方式挖掘泥土，而他们头顶上的地层则随时有吞没他们的危险。据说已经发生过一次事故，夺去了两个人的生命。

被掘出的大多数陶制器物，有的有釉；有的无釉。器物品种，包括下列各物：碗、碟、瓶；有时还发现陶俑头、兽头、器模的碎片、油灯盏；不时还出现一些陶球或陶铃，后者是仿自一些傲岸而庄严的骏马所具的装饰品而制成的佩饰。

釉陶碎片的种类很多，如果把它们杂乱地置于灼热的太阳光下，就会显示出系列可爱的色调。浓厚的青绿色是最常见的色调，而白色及浅亮黄色则比较罕见。偶然也会发现深紫色的碎片，一般都把它们列入钧窑式器物类中。那些在淡黄底色上点洒成黄、绿斑点图形的碎片，则使人联想到唐代的陶器。尽管如此，总的说来，窑址废弃物中的绝大部分都具有宋代的风格。

据说有一种器物，上面题有唐代乾符(874—879年)的年号。译者注⑤这件器物，一直到最近仍归邛州唐将军所有。如果这一报导属实，并确认此项遗物出自邛州遗址，那么邛州陶窑的活动时间，大约在公元九世纪的后半期到十二世纪末期，这一说法是可以接受的。

无论如何，要想得到更确切的年代，还有待于科学的调查。

遗址废弃的原因是另一个长期争论的题目。有的人主张陶窑活动的停止是由于洪水淹没而遭到了破坏。

经过对遗址的访问后，有两件事情弄清楚了。第一、窑址的位置，大大地高于河流的水位。能淹没这么一个遗址的洪水，其水量首先会把整个成都平原都淹没。这样的灾难性洪水，在四川省的历史上是没有记载的。第二，今天所看到的窑址废弃物，被堆积成几个土堆，译者注⑥每个土堆高约三十至四十英尺。它们在这一带乡间分布的并不很广，不足以构成大南河支流延伸浸泄而把全部窑址淹没掉的说法。

目前唯一比较保险的结论是：窑址是由于原料消耗殆尽而不得不放弃的。

译者按：

贝德福原文除附有《四川邛州附近宋代窑址示意图》外，还附有图版十二幅。其中八幅是关于遗址远景、沿途古建筑及遗址本身的建筑和当时乱挖乱掘的实况记录，颇富参考价值。现分别将其标题说明译出附后：

图版 1. 精雕的牌楼或拱形纪念碑，由邛州到大南河途中。

图版 2. 邛州附近大南河上的石桥。

图版 3. 大南河及窑址分布远景图（O. H. 贝德福摄）。

图版 4. 邛州宋代窑址上的古老道观，在这里本地农夫们为了寻找完整的陶器以售与收藏家们，已经挖掘了很多土坑。

图版 5. 图示被寻找古陶器的人们所挖掘的一个较大的土坑。右侧还有由于挖掘而显露出来的很多混杂着陶片和瓦砾的小坑。

图版 6. 邛州窑址景色一瞥。译者注①

图版 7. 图示本地居民们正在从邛州窑址中挖出陶器时的情况（一）。

图版 8. 同上（二）（O·H·贝德福摄）。

发掘自邛州古窑址的完整陶器，现藏四川成都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

图版 9. 无釉浅红色陶酒壶一件。表面涂有一层淡黄色陶衣。高：18.5Cm。

图版 10. 一件深棕色陶瓶〔应为“四耳陶罐”——译者〕。涂有白色陶衣和棕色粗犷图案。局部有釉。宋代。高：19Cm。

图版 11. 无釉彩绘罐，上绘棕色、灰绿图案。高：18.5Cm。

图版 12. 无釉陶壶，上涂白色陶衣。高：10.25Cm。

译者注①贝德福这里把方向搞错了，实际上他所描写的是南门而非西门。这一错误，影响到以后的一些作者，也都沿袭了他的这一错误描绘。

译者注②原文附有译音“牌楼”二字。这一称呼，比较普

通，但在四川，“呼作牌坊”，当更恰当些。

译者注③ 贝德福在这一段中所说的方向，也同样搞错了。

“西行公路”应是“南行公路”。原文在这一页，附有《四川邛州附近宋代窑址示意图》一幅，图上没有方位标志。如果按一般通行的凡例——上北下南——来看，也与文中所说的方向不同。

（《示意图》的位置，大体上是正确的。）

译者注④ 按：“道观”当是佛寺之误。解放前，主持庙宇的人，既不是道士，也不是和尚，而是尼姑。其中一些较年幼的尼姑，至今仍健在。

原注① 一分钱可换小钱二百文。

译者注⑤ 贝德福所说的“乾符”年号陶器，系一件小钱。杨枝高《访邛崃十方堂古窑记》中曾提及。其他各家著录，如葛维汉、郑德坤，魏范西等文中，也都有所叙述。杨枝高文并提及唐天宝、长庆等题款陶器。当时关于邛窑的时代，把它上推到唐代，大体上已具备了一些适当的条件，但贝氏态度比较谨慎，文中只作了有条件的承认，其下限也较接近事实。实则邛窑遗址的年代，其上下限，特别是上限，今日所知，远较贝氏所推测的要源远而流长。

译者注⑥ 贝氏所说几个土堆，大约是在主堆近处而言。就目前所知，十方堂附近全部土堆，大小共十三处。

译者注⑦ 图中心远立者为葛维汉。葛氏当时与贝德福同往调查邛窑遗址。窑址年代属于宋代，也可能早至唐代，虽然出土陶器的质量远不及中国同一时代陶窑的产品。

11·5·1983年于四川大学博物馆。

（原文载《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1931年第1期）

唐邛窑奇品

吾蜀邛窑瓷品之见于记载者，仅杜甫于韦少府处乞大邑碗诗中：“大邑烧瓷轻且坚，叩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盛称其美，后之论瓷者，亦以未见其器为惜，而只据杜甫所言，遂定邛窑瓷品，皆为白色。不意去岁邛崃县掘出唐代废窑数处，获品近万件，而完整者，仅百分之一而已，其中形色颇多且间有字文，其釉色有如钧窑者，有如汝窑者，有如龙泉大观绿等者，亦有三彩者，色白固无论矣。由此观之，亦可谓宋代之钧、汝诸窑之釉色，均胎袭邛窑而来，此种发现，不独于蜀文献上有极大之价值，而于吾国瓷学之沿革上，亦有其重要意义也。

（罗希成藏并记）

（原载上海《美术生活》1936年33期至35期）

访邛崃十方堂古窑记

杨枝高

邛崃，秦汉为临邛。唐宋元明皆称邛州。出南门二里渡南河（即仆干水，东至武阳入江），达十方堂。庙为前清所建，计分两重，后一重较小而高，即架于古窑上，左右二三里，皆属废窑地，土人呼其旧名曰义丰乡，曰高窑坝，曰汉窑，曰蛮窑。相传窑有十三，一窑独精，邛崃志亦未详其年代，称曰古窑，谓所出陶器质不坚，色亦不佳。本年夏季，天稍旱，军民等约三四百，争先恐后，昼夜挖掘，冀得珍奇，省中古董商，往来不绝于道，所售出之银，约计万余元。余于假期中八月十日，由蓉驱车抵邛，十二日午前十钟出南门过渡，十一钟抵十方堂，住寺尼僧，无一在内，步至后庙，见四面掘空，后壁柱足，皆已虚悬，佛像四处倾散，不胜凄凉之感，左右回顾，遍地瓦砾，有如楚炬秦宫。细检视残片，为器实繁，色不一种，花不一类，日光映照，灿耀夺目。斯时从事采掘者只二三处，问其由来，大多树倒猿散，取之至尽也。午后四钟返邛，留住十日，除搜集外，遍访邑中绅耆商贾，得其出土之梗概，特分述于后，以告海内之留心古代艺术者。

一、种类 分十品

甲 文具 文中所列物品之高低，有系用旧尺计者，则曰高若干，有系估计者，则曰约高若干。

红泥胎敞口盂。黄釉，白釉，口径四五寸，中立一小鹅以注水，颇精致。青色笔洗，六瓣、八瓣，口径五六寸者，古朴有致。水滴、小盂，大小形式极多，难以笔记。有鸳鸯水滴，白地涂彩釉，高约二寸者。有莲花水盂，高约二寸者，白釉绿彩莲心。又有一种水滴，高二寸余，釉青，式如一碗，上面凹，侧有一小咀，对咀之上侧面有一小蒂，可执，能节制水出，颇费匠心。笔格只二出，黄泥极细，无釉。笔筒罕见，瓦砚为磨盘式，白釉。

乙 陈列品

有荷叶碗三足红泥胎，口径五寸，黄地紫绿虎斑花，为最精美玲珑，藏于某绅家。瓶有红泥胎，通身绿色，高七寸者，有白地黄泥胎，涂绿、涂紫，大小各种形式。花瓶有贯耳者，有多耳者，两双耳两单耳相对者，高由二寸以至一二尺者。釉色青与白，亦有涂彩者，有深黄色龙耳酱釉发花寿字瓶，高九寸，极古朴者。有通身绿釉三道印花，高五寸小口坛者，底有“河滨遗范”四字款，内为黑釉，极精美。香盒大小皆有，大者横径约二寸，胎骨有白泥、红泥两种，盖上印花有双龙、双凤、双狮、单龙、牡丹、芍药等。釉色有白、绿、黄，秋葵等，有白地狮子，涂绿釉，高三寸者，有白地象斗蛇，高四寸，涂绿釉者，有鱼缸，豆青色，口径一尺者等等。

丙 酒器

酒器有蓝地，涂粉、紫两彩草花扁酒瓶。旁有两耳可贯，胎薄而坚。有白地涂紫彩角杯。以上二种，发现极少。有无足藤编式酒杯，能容二两许。色白，底涂朱大酒壶，高约一尺，敞口，长细颈，一柄上端连于颈，下端连于身，咀颇长。亦有双咀相并者，多青白两釉，乌泥厚胎，有小至一二寸者，红胎黄或绿釉极精美，想系盛香油之用。

丁 茶器

所得茶器，似近代之卤壶，上小下大，口收而小，有盖，有柄以执，有咀，高约四五寸，青釉较多，亦有白釉涂绿彩者。茶

盞红泥胎，三足、五足、六足印花，黄地涂绿紫二色，光可镜人，全者绝少。茶托黄釉口径五寸，五瓣。中有一托杯，红泥胎，色黄而放金光，美丽之至。

戊 碗

碗有极大极厚者，有极小极薄者，有四瓣、六瓣、八瓣者，有海棠式者，有荷叶式者，有倒钟式者，有内印花极精者，形式不可胜计。胎骨厚者多黄泥，薄者多红泥，釉色有白、青、黄、绿、涂紫种种。极美观者惟金黄色碗，薄而坚，内外一色，底涂紫色，金光射目，如在灯下视之，有似金珠一块，蜀王建礼朱梁之金棱宝碗，盖即此之谓欤，然全者绝少，可压倒他省唐宋时各大名窑也。其黄色之传，现犹未失（彭县桂花场所制黄色陶品胎骨虽较劣，面色之差则无几也）。有小厚胎三四寸碗极多，釉色亦各殊，多窑变，较他品为完善，俗人呼为墨盘，误也。

己 砖 瓦

掘出极少，有全绿釉、全黄釉及三彩釉。

庚 坛 罐

极厚，极大，极重，有能盛水一挑者，有耳者多。釉则白、黄、黑三色。白黄较多，黑者较少。

辛 造 像

有孔子像（高六寸），观音像（高三四寸），释迦像，天王像种种。胎骨红白不一，间有彩釉，亦有全无釉者。

壬 玩 具

龙、虎、狮、象、猫、犬、马、牛、羊、猪、鱼、鸭、鹅、鸡、龟、蛇、兔等，应有尽有。有骑马者，有骑牛羊者，有卧者，有仰者，有抱小儿者。有高二三寸者，有长五六寸者。有单独人头种种，面貌不可数计。有一女头，像极美丽，头后有一印款，极细，不易识，制作较精。胎骨多黄白细泥，釉色亦具各种。

癸 乐 器

有白、绿、黄三彩独角兽三孔乐器，高二寸五。有人头三

孔乐器。有一孔吹哨如卵形者。

二、分 论

子 胎 骨

可分红泥、乌泥、白泥三种。精细品多用红泥，极坚，至今未变。乌泥次之。白泥又次之。因白泥少粘性，出品少见全者。

丑 釉 水

可分青、黄、白、黑、绿五种。黄者如金，黑者如漆，绿者如玉，皆属一道釉。黄白地涂彩色者，皆系涂于釉上，一火而成也。

寅 图 案

图案皆古朴玲珑，精者系用模制成。模质为黄泥，花刻于模上，有印于器内者，有印于器外者，四瓣、五瓣、六瓣、八瓣。三足、四足、五足、六足。双耳、四耳、多耳种种形状。此次掘有造像天王模，观音模，碗模，香盒模，鱼模等可凭。

三、年代之推测

以图案、花纹、釉色三者而论，皆系唐宋间制作。有多数开元钱同时掘出。有天宝九年三月十日造像座。有长庆三年造像。有乾符小盂为证。宋以后则无证可考。疑当时该地因人事天灾，突遭浩劫，致令中辍，绝非泥土取尽之故。希有发掘家，史地家为之考证。查此次出土之品，完善者不过百分之一，余则多属残缺。虽一鳞一爪，如能聚数件同类之器而观之，则全豹可窥。上列十类，总计不下千种，釉色花纹，见所未见，诚大观也。深感此行不虚，惟念省门在望，路不终日。负有博物之职责者，不肯效举足之劳，分些小之费，类集陈列，以为吾蜀艺术之光荣与指导，乃任贩夫渔利，收藏者私心独赏，流落散漫，永无见集大成之日，而后之人亦不能复观唐宋邛窑之盛，实为惋惜耳。

（原载民国二十五年6月《华西学报》第四期）

（华西学报之四 考证部）

邛 崃 陶 器

(The Pottery of Chiung Lai 邛崃)

[美]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著

成恩元译

邛崃古陶窑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邛崃(邛州)西门外大南河对岸,占地长约一千英尺,宽约五百英尺。这里有很多由破碎陶片以及其他废物组成的瓦砾堆,有的高达四、五十英尺。

这个陶窑的出土器物,至少在最近几十年来,不断出现于成都市场,并被一些对古陶感兴趣的人们收购和珍藏。1936年的夏季,一些穷人和士兵们,为了获得能卖钱的陶片,差不多把整个窑址表面,狂热地翻掘了10到15英尺的深度,即使是最珍贵的陶器,也被人们收集来放在篮子里称斤论两地出售。在近两、三个月中,相信卖掉的陶器,其价值可能达到三万美金之上。

1936年6月10日,作者曾偕贝德福(Bedford, O.H.)与郑德坤先生同赴邛州进行过一次邛窑遗址的调查。此后不久,笔者曾给“中央研究院”写过一封要求正式发掘的信,但没有获准。鉴于遗址的破坏活动继续不已,很可能不久就会全部遭到毁灭,因此,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决定收集这批邛陶资料,以便将来研究时应用。

邛崃遗址存在着不少迷惑不解的问题。窑址不独大而且很重要,但在四川所有的历史文献上却没有记载。在形制和图案设计方面,它和唐代的陶器很相似,但在陶釉上却与宋代的真正瓷器极接近。在一些肯定出自这一窑址的少数陶片上带有年号和日

期，它们都接近唐代的末期。住在成都的唐代诗人杜甫曾提到一种大邑瓷。但这一瓷器的确实来源却无所闻。

杜甫于公元756年来到成都。他在草堂写大邑瓷一诗时，可能是公元760年。译者注①诗的全文如下：原注①

《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大邑烧瓷轻且坚，
扣如哀玉锦城传；
君家白碗胜霜雪，
急送茅斋也可怜。”译者注②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杜甫在描写大邑瓷时，也许用的是一种诗词中的破格语，同时唐代诗人在用“瓷”这一字时，按今天人们对这一字的确切含义要广泛些。

如前所说，邛州窑址不见于任何中文历史载籍中，但大邑离邛崃只有五十华里，而且在唐代，它是属于邛州管辖的。因此，杜甫诗中所提到的大邑瓷，也许其来源就是邛崃窑。另一方面，在《邛崃县志》卷一中，有下列一段记载：

“城西偏南二十里孔明庙，山市小场也。相传为诸葛武乡侯过辙。后人立庙，附近多坛罐。”原注③、译者注④

另一段历史参考资料如下：

“大邑距崇庆州只一舍。少陵至州治东阁观梅原注⑤时，过大邑，晤邑令，访磁窑，有大邑出磁轻且坚”之句。详见《艺文》，原注⑥

有些中国学者相信第二段记述是由于杜甫大邑瓷一诗附会而成的传说。第一段的资料，没有清楚地说明所提到的地名是否是瓷窑的名称；甚至也没有说明所产的陶器是否上了釉。然而，这些记载，毕竟引起了人们对于邛窑的希望。如果它们不是杜甫咏大邑瓷的根据，那么，它的真正产地也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

贝德福先生曾写过一篇关于邛窑遗址的短文，发表在《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 1936年1月号。原

注⑤、译者注④ 贝氏文中曾谈到1936年驻扎在邛崃的唐将军，译者注⑤ 曾从邛窑遗址中收集到一块带有‘乾符’（公元874—879年）年号的陶片。成都加拿大教会医院的杨枝高医生曾在《华西学报》原注⑥ 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到邛崃出土陶片带有年号、日期者三块。第四件虽有文字，但不可识。译者注⑥ 最后这一件，作者认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它是晚近的仿制品。杨医生所说的三个年号、日期是公元754年、译者注⑦ 823年和874—879年。我没有看到杨先生所提及的任何具有日期的陶片，但我曾看到大量的这类器物，上面所写或所刻的年代都是近期的伪款，有时还很精致。其中有些可能是真的，但截至现在为止，我们还不能明确作出论证。

上节已经谈到邛窑陶器与唐代的陶器具有极为相似的风格。一般说来，邛窑的碗、罐、盂、瓶的底部宽而扁，有或没有外倾的斜边，底部有足者极为稀见；偶有发现，通常都显得很浑厚。有些容器的底部靠近圈定部分偶尔会发现有一圈底凹压痕迹。少量的芥黄色陶碗，具有薄边小底，但底边是由碗底外向的。有些浅色的壶，在淡黄、浅绿、灰绿或其他类似的浅色上，装饰着深褐色斑点的花纹。这种类型的时代，有时被人们归在唐代；有时则归在宋代。一种中空的人像头部，可以用作口哨，它和一般列为唐代的同类像，极为相似。有几个小圆盒的盖上所绘的飞天具有一种独特的唐代风格。原注⑦ 陶碗不独具有高平的底，而且比宋代陶碗要厚得多。另一方面，较大多数陶器似乎已属真瓷范围，而且大多数是单一色调。

釉色方面有深蓝、紫以及淡蓝、青蓝、灰蓝等，还有小花点或绿兰点釉色，其风格极似宋代的钧窑产品。有些灰、绿、淡绿、黄、淡黄的釉色，可能与‘龙泉窑’有一定关系。有些容器的深褐色和深橘黄色与建窑中的一些风格相似。定窑式的风格似乎在全部出土器物没有发现。在薄釉容器上所出现的褐色斑点，很像那些深褐色和橘黄色容器上的色调。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难

道唐代末年和宋代早期的这种深褐色装饰斑点图象可能是宋代‘天目’(Temmoku)的开始吗?译者注⑧

有些容器似乎具有真正瓷质多采装饰的开始性质。这些容器经过上釉、烘烤,然后再绘以绿、褐色的花卉装饰图案。它们有时要经过第二次烘烤;有时也可不再烘烤。图版25所示的四耳罐,其绘画装饰即在釉下。这种情况显示了烧制过程是在一次烘烤中完成的。

邛崃窑器上有时也出现冰纹。唐、宋陶器上有名的陶衣(White Slip),在邛陶上是很明显的。在已发现的很多陶器上都带有一层白色,淡黄或淡灰色陶衣而没有上釉。这说明邛崃的陶工是有意识地这样制作并出售的。同这种制作方式密切有关的是那些无釉的、画有红或褐色花卉的装饰图案,而上面具有白色、浅灰或淡黄陶衣的容器。当然,这类陶器之所以没有上釉,多半是由于它们有缺陷或不值得上釉。

装饰所用的方法如下:

第一,在烘干前用一尖形器在陶器身上浅刻图案。第二,在烘烤前或烘烤后彩绘图案。第三,用模印器在器内或器外打印。第四,加泥块于器物外部,然后模制成形。应当记住的是我们在窑址外所发现的器物都是在生产过程中弃掷的一些有缺陷或不值得保留的次品。但其中仍有很多在图案上、形制上或釉色上称得上精致优美的器物。

为了在叙述釉色上能尽量地做到精确无误,我采用了《勃雷德莱标准色度表》(Bradley's Standard Color Chart)和梅尔茨(Maerz)保罗(Paul)的《色采字典》(Dictionary of Color),其结果如下:

C/1270 蓝绿 (blue green) — 勃雷德莱; 色度一号。

在某些器物上较暗。梅尔茨—保罗: 图版29, 9, K。

C/13087 蓝绿 — 梅尔茨—保罗, 29, 4, D。

C/13484 勃雷德莱; 在绿色度1号到蓝绿色度1号间。

梅尔茨—保罗：图版30，8，C。

C/12763 稀见的，而且极为珍贵的红紫色。勃雷德莱：
色度1号。梅尔茨—保罗：图版42，8，J。

C/—— 译者注⑨深绿，软釉。勃雷德莱：色度2号。梅
尔茨—保罗：图版24，10，C。

C/12675 淡绿黄，极浅，几乎近于天然灰色。勃雷德莱
（以下简称‘勃氏表’：色度2号。梅尔茨—保罗（以
下简称‘梅—保色典’：图版20，1，B。

蓝绿点纹 勃氏表：色度1号。梅—保色典：图版29，
9，K。

C/14398 梅—保色典：图版21，1，A。

C/14175 淡黄—绿色，中有褐色小点。前者，梅—保色
典中为图版20，2，D。后者，深色小点，属图版16，
12，A。

C/13530 芥黄色，所附冰纹也许是事故性的而不是有意
造成的。勃氏表：黄色度1号。梅—保色典：图版10，
1，K。

C/14198 深橘黄色，较梅—保色典图版16，12，A还
要深。

C/12494 较下列两标准色均浅：勃氏色度2号。梅—保
色典：图版10，8，C。

C/14379 灰陶衣，上绘红色花纹装饰图案。灰衣，勃氏
表：淡中灰。梅—保色典：图版35，2，B。橘红，
属勃氏表色度2号。梅—保色典：图版7，10，J。

戴谦和教授（D. S. Dye）对邛窑陶器曾进行了详尽的硬
度测验，其结果如下表。为了相互比较，表内包括了一块由四川
汉族墓葬中出土的唐三彩釉陶片和一件唐代的釉陶男俑。

标本编号	遗物和色彩	硬度
	唐三彩釉陶	4.5

	唐釉陶男俑	4.0
C/12727, C/12658	黄色陶衣, 白衣	4.—
C/14374	灰衣	4.5
C/13530	亮芥黄	5.0
C/13525	亮芥黄	5.5
C/15233	深绿釉壶(软)	4.5
C/12751	黄碗(绿色碗口边)	6.—
C/12700	蓝釉碗(钧窑?)	6.5
C/12653	蓝釉碗(钧窑?)	7.—
C/14175	浅绿黄带褐色点	6.5
C/12725	深褐色或橘黄色壶	7.0
C/12735	大黄酒	7.0
C/12667	亮灰褐色壶	7.0
C/13486	淡绿黄壶	7.0
C/15286	黄釉附以绿褐色装饰物	9.—
C/12665	黄釉附以绿褐色装饰物	9.—原注④

当一件陶器的型态、装饰图案、色彩、硬度以及真实的题辞都对器物制造的时代有所说明后, 另一件重要的测验就是陶釉的化学分析了。这一化学实验工作, 目前正由华西大学的高毓灵教授进行中。译者注④其重要性可由下列事实看出。根据海塞灵顿(Hetherington, A.L.)的测验, 在汉、唐、元、明的釉药中用了铅, 但宋代的釉药中却不用; 而宋釉中用了磷酸盐, 在唐和明代的陶器中, 除了明代的磁州窑和定窑产品外, 都缺少磷酸矿物质。原注④如果化学试验的结果显示出在较软的芥黄釉和深绿软釉中含有铅质而无磷酸盐物质, 那就意味着这两种釉药与唐釉的关系远胜于与宋釉的关系。另一方面, 如果硬釉不含铅而只有磷酸盐物质, 则可以说明它们与宋瓷有关系。

下面是邛窑遗址出土器物的插图和照片, 它们可以弥补文字说明的不足, 读者可以从中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彩色插图是由

柯琴夫人 (Mrs John Kitchen) 和成都加拿大小学校长 黄思礼先生 (Walmsley, L. C.) 译者注①绘制的。我在此愿对下列诸先生表示深刻的谢意：戴谦和教授 (测验了釉陶的硬度)，华西大学古物博物副主任林名均先生，(为我辛勤细心地收集了四川方志和历史参考资料，并协助进行了翻译工作。)

我们的研究工作还遗留了一些未解答和无法解决的问题：邛窑遗址是否就是杜甫所写的大邑址的产地？如果不是，大邑窑址在什么地方？一方面，邛窑遗物有很多与唐代陶器相类似的地方，似乎有必要把这种陶器的开始鉴定在晚唐，有些瓷器似乎是宋代早期的单色釉陶；在另一方面，宋代陶器最具特点的圈足小底碗似乎在邛窑中很少见。因此，比较谨慎的说法是邛窑的生产在宋代早期停止了。我们的希望是，在将来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时，首先要进行一次科学的化学分析。这一点，如前所说，高毓灵教授正在研究中。第二，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料，诸如在原址发现具有年代的陶器等，从而可能把邛窑遗址的时代修订得更正确些。

参考资料：

鲍塞特 (Bossert, Dr. H. Th.) 《工艺美术史》(Geschichte Des Kunstgewerbes)，卷Ⅱ，Verlag Ernest Wasmuth, A. G. Berlin, Wien, Zurich.

大英博物馆《远东陶瓷指南》(Guide to the Pottery and Porcelain of the Far East) 1924年，

蒲沙尔 (Bushell, S. W. C. M. G.) 《中国美术》(Chinese Art)，卷2，维多利亚阿倍尔特博物馆手册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Handbooks)

《中国杂志》(China Journal)，卷26，1937年1月号。

梅尔茨—保罗 (Maerz and Paul)，《色彩字典》

CDictionary of Color)第一版,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Inc. 纽约, 370m Seventh Avenue. 伦敦, 618 Bouverie Street, E.C. 4, 1930年。

海塞灵顿(Hetherington, A.L.《中国早期陶器》Early Ceramic Wares of China), 伦敦, Bern Brothers Limited, 8 Bouverie Street, E.C. 4, 1922年。

哈卜生(Hobson, R.L.)《中国美术》(Chinesische Kunstwerke), Verlag Ernst Wasmuth, A.G. 柏林, W.S.

施密特(Schmide, Robert),《中国陶器》(Chinesische Keramik), 法兰克福(Frankfort) am Main, 1924年, Frankfurter Verlag-Anstalt A.-G.

《勃雷德莱标准色度表》(Standard Color Chart for Elementary Color Instruction Based on the Bradley Color Standards), Milton Bradley Company, Springfield, Mass, 8110.

《邛州志》,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9年)刊本。

《邛崃县志》, 民国十一年(1922年)刊本。

《大邑县志》, (清)同治六年(1862年)刊本。

《大邑县志》, 民国十八年(1929年)刊本。

附注:

为了写《邛崃陶器》这篇文章, 我获得权利去访问了欧、美一系列的博物馆。

在大英博物馆中, 藏有底格里斯河(Tigris)附近沙马拉(Samarra)和勃罗明纳巴德(Braminabad)遗址‘原位’出土的中国陶器。这些属于公元800—900年的瓷片与邛窑出土遗物极为相似。

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The Royal On-

ta-rio Museum) 藏有带着年款的公元二至三世纪和一些属于汉至唐代的瓷器标本。有一个陈列柜，全部是唐代(公元618—917年)的白瓷。在孟塞斯先生(Mr. Menzies, A.)的私人藏品中，有两个类似唐代的白瓷碗。其中一个用手指敲起来‘其声如铃’。如果允许用诗人的破格辞句来描写的話，则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和孟塞斯的两个唐代白碗，就是“其白如霜雪”了。

综观上面所列举的事实，以及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一些同类实物，邛窑釉陶的生产时期，很可能，如果不是最早的话，是在公元800至900年间，译者注②而杜甫所描写的瓷器也确实是制作在这一段时期的。译者注③至于杜甫所说的白瓷碗究竟是制作于邛崃，还是制作于大邑附近的什么地方，则还有待于未来的发现。

附图版48(略)。

译者注①元按：葛氏所说的“公元760年”可能是根据《杜诗镜诠》而定的。杜诗目录标题，一般都按写作时代前后顺序排列，但据较早的刻本，日本东京木村嘉平以宋人曹誉所编《杜工部诗》而刻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在卷25中所收的杜诗共30首，这一卷的目录前注明“上元元年(760年)庚子在成都所作”；自第十三首起，另题“大历元年(766年)丙午春后迁夔州所作”。从上元元年至大历元年，中间还经历了宝应、广德、永泰等年号，前后共计六年光景。杜甫的这首诗，在顺序上排在第七首。尽管一些人倾向于把它定在上元元年，但还不能十分肯定，如果把它说成写于公元760~766年间，似比较合理些。

原注①：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林名均先生曾仔细地查阅过现存的、比较早的中文地方志、历史文献，但没有找到任何有关的参考资料。林先生曾协助翻译此诗，并试作过其他的译法。(译者注：林氏已于1969年逝世。)

译者注②元按：杜甫咏大邑瓷一诗，各家刻本字句略有出

入。葛据方志通行本，讹误颇多。今据《丛书集成》影印日本东京木村嘉平刻本附译以资参考。诗题全文应为“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第一行“烧瓷”之“烧”，他本或作“出”、“之”。第二行“哀玉”之“哀”，或作“寒”。第三句“胜霜雪”之“霜”，他本或作“于”。第四句“急送”之“急”，他本或作“分”。又，瓷碗主人韦姓，当指“韦班”。在这一首诗前的另一首诗题是《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故下一首诗开头即书“‘又’于韦处……”。杜诗中题韦姓者凡17处，其他15处韦姓，似与韦班无关。

原注②：《邛崃县志》卷1。（元按：见《场镇记》页12上～下。）

译者注③元按：史籍中有关邛窑遗址的记载极少。《邛崃县志》涉略及者有二条，但葛氏所引此条，从广义的邛窑系来说，固然也值得注意，若用它来证明十方堂的窑址，显然扯得太远。此段所谈为城西南二十里的“孔明庙”，而通常所说的邛窑遗址则指大南河岸边的“十方堂”。《邛崃县志》卷一（页15上“山水志”栏）有“十方堂”一条，正是记述此窑的主要资料。葛氏舍此不引而引二十里外的孔明庙，其误或由于代葛氏收集中文资料的林名均氏偶不见也。

原注③学名：Pruns Mume Set Z.

原注④《邛州志》，嘉庆二十三年刻本，卷37。〔译者：见“流寓”栏，页3上。〕

原注⑤《中国杂志》卷26，第1期。1937年1月。页15。

译者注④元按：葛氏此处称贝文发表于“1936年”，而原注⑤中则写作“1937”。二者必有一误。兹查《中国杂志》原书，知葛氏文中所称“1936年”实误，原注中所称为是（即1937年）。贝德福原文题为《四川邛州古窑址》

An Ancient Kiln Site at Chiung Chou, Sze--

chwan)。

原注⑥《华西学报》1937年7月号。

译者注⑤此处所说的“唐将军”，系指唐式遵。

译者注⑥ 杨枝高所发表的文章题为《访邛崃十方堂古窑址》。文中所提到的有年号的器物是(1)天宝九年(750年)三月十日造像座。(2)长庆三年(823年)造像。(3)乾符(874—879年)小琰。另一件(即葛文所说的第4件)是一件属于玩具的女头像。“头后有一印款，极细，不易识。”

译者注⑦原按：葛氏此处所说的“754年”当为“750年”之误。查公元754年为唐天宝十三年。杨枝高原文所举为天宝九年，当西历公元750年。(见前引杨枝高原文。)

原注⑦见阿伯拉罕(Abraham, Aziza)《杭州塔的艺术宝藏》(Art Treasures of a Hanchow Pagoda),《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卷26,页12—13,1937年。

译者注⑧原按：“Temmoku” (或“Temmoky”)一词为日文“天目”的音译，是日人称呼中国宋代古瓷中的一种专门术语。它原指福建建窑所产的黑、蓝、褐等深色釉瓷，特别是具有“窑变”性质的瓷器，统称为“天目”，如“曜(窑)变天目”茶碗，“星天目”、“油滴天目”等。日人称“天目”的原义，一说由于这称瓷器产自天目山而得名；但福建无“天目山”。(天目山在浙江临安县。)另一说：宋时日僧来华，学佛于天目山。后携建窑瓷器返国。日人因误称建窑瓷为“天目”。这一术语传至欧、美后，为欧、美陶器学家普遍所采用。“Temmoku”一辞含义，后渐广泛。日人不独用来称建窑产品，并及江西的吉州窑(如吉州的“斑天目”、“梅花天目”等)；河南钧窑(称作“河南Temmoku”)；甚至定州的“黑定”也称作天目。〔参见(英)何乃(Honey William Bowyer)，著《中国陶瓷艺术》(The Ceramic Art of China)伦敦，Fader and Faber Limited 24, Russe Squallre 1944年。〕

(日)小山富士夫著《宋磁》，昭和18年本。葛氏谈及天目窑，着眼点在论证宋代“窑变”的起源。

译者注⑨ 原文此处漏印器物号码。

原注⑧ 注意：戴谦和教授的测验中没有第八级硬度。

译者注⑩ 原按高毓灵文题为《四川瓷器的化学分析鉴定》(Identification of Szechwan Porcelains by Chemical Analysis)，已发表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WC BRS)卷11，1939年。

原注⑨ 见海塞林顿(Hetherington, A.L.)《中国早期陶器》(Early Ceramic Wares in China)。

译者注⑪ 黄思礼先生(Luis.C. Walmsley)加拿大人。1948~1949年曾在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任代理馆长。1949年归国后任加拿大多伦多(Toronto)博物馆东方部主任。业余精绘画。著述甚丰。

译者注⑫ 元按：关于邛窑的时代问题。出土陶器带有年号者，除葛氏所提到的杨枝高列举的三个年号：天宝、长庆、乾符外，还有下列诸年号：贞元年号—四川省博物馆藏。开元—杨献谷著《四川陶瓷概论》中提到邛窑器上有刻开元款者、(《华西文物》创刊号，页10)、“元符元年”—(同上)、“政和七年”—(同上)。隋“仁寿年造”—重庆市博物馆藏品。近年更发现有南宋年号，向上溯则还有早至六朝、东晋的器物。这些具有年号的器物是否可靠，具体情况如何，笔者没有看到实物，未敢轻易妄作结论，但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则是肯定的。

译者注⑬ 元按：邛窑遗址，从1936年以来，中间又经历了四十七年，仍没有进行过一次科学的、系统性的发掘。不过，解放以来陆续进行过一些公、私的初步调查。1936年四川文管会在邛崃普查时，除十方堂遗址外，还发现了尖山子窑址、固驿乡的瓦窑山窑址和西河乡才冲土把桥窑址。出土陶器与十方堂者风格类似。(见徐鹤章《川西古代瓷器调查记》)《文参》

1958年，第二期。)

关于大邑窑址，杨肃谷曾提到大邑东关场出土天宝间“唐安郡晋原县永昌窑窑王像”（同译者注引文）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不明。1956年四川文管会普查时，在大邑北关也发现有白瓷片。但无论在东关场或北关都没发现窑址。另一方面，出产白瓷的窑址在大邑附近的荣康县江原古城却有所发现。1977年在

邛 窑

魏尧西

大邑烧瓷轻且坚，叩如哀玉锦城传；
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蜀窑在唐时，已甚著名，杜甫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叩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此诗作于上元（760年）初，可见当时大邑瓷名，已盛传成都。《景德镇陶录》亦称：“蜀窑器，体轻而坚致，色白声清，为当时所珍重。”此亦指大邑瓷而言。世传成都海棠甚佳，杜老诗中不曾提及，而寻常一器，既咏之乞之，复又望其急送之茅斋，大邑瓷碗，杜公珍爱如是，则瓷之精美可知矣！清朱琰《陶说》，引杜老此诗，以大邑属邛州，色白而声且清，叩之有韵味。工部诗，瓷之上品矣，《茶经》并不训之下瓷中，独有取于越州者，何也？此以大邑瓷为邛窑，实误。大邑瓷色白声清，杜诗《陶说》，均已言之。邛窑以青绿紫黄等色为多，大邑瓷今存者极少。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今供藏数器，闻皆为白色。余前居大邑时，友人云：大邑瓷县中某姓尚有存者，亦系白色，当时惜未请一观。朱琰以大邑属邛州，谓大邑瓷即邛窑所产。《蜀故别录》亦附和其说，惜未细察耳！邛窑见载于史籍地志者极少。宋陆放翁《老学庵笔记》卷五云：“临邛夹门镇（按即今夹关镇一名夹门关，在邛崃西南，距城约九十华里）山险处，得瓦棺，长七尺，厚几二寸，与今木棺略同，但盖底相反，骨犹不坏，棺外列置瓦器，皆极淳古，时靖康丙午岁也，李知几及见之。”此

言瓦棺、器，皆极淳古，疑二者皆为唐以前之物。由此断定，邛窑则不始建于唐矣，盖至唐而制器益精耳！邛窑窑地，在今邛崃庵南十方堂，距城约二华里。十方堂系一古尼庵，门临文井江，凡近庵里许之丘陵，皆属古窑地，遍地堆积破碎瓷片，疑为古窑之废弃地。邛窑过去极少出土，偶尔于冷摊上或古董商店中见之，皆系普通陶器，俗呼曰蛮碗，既无彩色，又不精致，素不被人重视，《邛州志》与《邛崃县志》亦未详载其年代，只称曰古窑，为所谓陶器，品质皆不佳。民国二十四年有军人陈某于十方堂发现此残碎瓷片，乃大事发掘，有出土者，皆归陈手。二十五年，唐式遵驻防邛崃，更作大规模之发掘，军民齐集三四百人，争先恐后，日夜挖掘，收获甚多，且运到上海市博物馆公开展览，并设专肆售卖，至残碎瓷片有购归嵌饰庐宇，每斤售洋三角；有彩色及图案者，倍其值。省垣古董商人，竟图渔利，往来不绝，亦有好古人士，专车赴邛崃参观，旧归荒烟蔓草之废墟，竟繁华若市矣。《美术生活》杂志，将最珍美之邛窑，摄成影片，专刊介绍，邛窑之名，由是风传海内焉。余生长是邦，耳目所经，不知凡几。往岁余长县中图书馆时，曾保管此物，去岁在成都，又于友人处获睹邛窑之奇品甚多，因夷考诸家记载，参证诸器，勒为器具、造像、砖瓦、玩具、乐器、胎骨、釉水、图案、款识、年代十端，分详言之，统署说曰：“邛窑考略”。以供赏鉴家之参考，若曰有裨益于蜀中文献，则吾岂敢，要之邛窑在吾国瓷学之沿革上，极有研究之价值，尚祈博雅君子，不吝指正！

1. 器 具

器具可分为饮食、文具、陈列三类。

饮食：碗有薄有厚，有大有小，有四瓣、六瓣、八瓣及海棠荷叶吊钟等式。胎骨厚者多黄泥，薄者多红泥。余曾见成都罗姓所藏荷叶碗为三足红泥胎，口径约五寸，黄地紫绿虎斑花，又有三彩色盏，上有“隆兴四方”四字。其他釉色有白、青、黄、绿及涂紫色种种，惟金黄色一种，最为美观，盏薄而质坚，表里一

色，底涂紫釉，金光射目，于灯下视之，似金珠一颗。杨枝高谓蜀王衍礼朱梁之金棱宝碗，疑即此类也。此类色彩，实足以压倒唐宋他省各大名窑。盘多为厚胎，口径三寸、四寸不一，釉色各殊，多窑变，质极坚，出土者较它品完整，世多误呼之为墨盘。酒器，酒壶大者高约尺许，长细颈有柄，咀极长。间亦有双咀者，釉多青白色，乌泥厚胎，另有蓝地涂粉及作花草之扁瓶，两旁有耳，薄胎，质坚。杯有白地涂紫彩角杯，有无足扁藤式，容量可盛二两许。有五瓣翠色酒杯，可容四两，俗传为桃花樽者，误也。友人余纪功今藏有一盞。茶器，半身为上小下大，亦有下小上大者，白釉涂绿彩。茶盏细红泥胎，三足、五足，并印有花纹，或黄地涂绿紫二彩者。茶托有五瓣黄彩，径五寸，中有一托杯，红泥胎，色黄放彩者，洵奇珍也。

文具：笔格只二山，黄泥胎无釉。墨砚与盘相似，白泥釉为多。口残多红泥胎，口径四寸、五寸不等，中立一小鹅用以注水，制造极精致。清色笔洗，六瓣或八瓣，皆极古雅。水滴小盂，大小形式不一，有鸳鸯水滴，高约二寸，白地涂彩釉，有莲花水盂，白釉绿彩莲心。又有小盂一种似碗，上面凹，侧有小咀，对咀之上侧面，有小蒂，可执，能止水出，思裁极费匠心。

陈列品：花瓶有贯耳者，有多耳者，或两单耳相对者，高由二寸至二尺以上。釉色有青有白或涂彩者，另有深黄色龙耳。酱釉发花寿字瓶，高约九寸，有三道印花小口坛，里为黑釉，底有“河滨遗范”四字，通身绿釉，苍翠逼人，靓丽无匹，诚斋中之清供品也。香盒大小皆有，大者横径约二寸，釉有白、绿、黄及秋葵等色，盖上印花、有双龙、双凤、双狮或单龙芍药、牡丹等花，又有白地狮子，绿釉白地斗蛇，高约三四寸，或涂绿釉者，又有鱼缸豆青色一种，精美无比。

2. 造 像

有孔子像，高约六寸。白胎素烧观音像，释迦天王像等。胎骨红白不一，亦有彩釉或全无形釉者。

3. 砖瓦

砖瓦有全绿全黄等釉，又有三彩釉者。款识有“开元三年”等字。亡友顾隽曾获见之，惟砖瓦有款识者，则凤毛麟角耳。

4. 玩具

玩具种类极多，狮、虎、牛、羊、马、犬、豚、鸡、鹅、鸭、兔、鱼、鸟、龟、鳖等无一不备。有小犬长约寸许，釉颇似均窑。又有戏婴骑牛骑马者，或俯或仰，高约二三寸五六寸不等。又有如龙泉窑之小鸟，釉水极美，玲珑可爱。

5. 乐器

有独角兽三孔乐器，或人头三孔乐器。又有一孔吹哨如卵形者，釉水多为白、绿、黄三色。

6. 胎骨

胎骨有红、乌、白等泥，精致者多为红泥。质坚最硬，乌红白泥则远不及红泥。

7. 釉水

古无釉字，若寻本字即说文髹字，髹者黍也。《汉书·孝成赵皇后传》：“殿上髹漆。”以漆漆物谓之髹，以漆施物上曰髹。马叙伦曰：“瓷之着釉，即仿漆之髹木而来。”邛窑釉水，多青、黄、绿、白、紫、黑等色，黄者如金，黑者如漆，绿者如玉，皆为一道釉，至黄色釉涂彩色者，皆系涂釉于上，一火而成也。青、黄、白、绿一色等釉较多，惟黑釉极少见。青绿釉苍翠可爱，为最贵重。棕釉而有花纹，或彩釉如窑变者，为最难得，其釉色无美不备，宋均、汝、龙泉诸窑之釉水，亦多仿效邛窑而来，《蜀故别录》说：“邛窑影响宋窑甚巨。”非虚论也。

8. 图案

邛窑出土时，同时掘出造像之天王模、观音模、碗模、鱼模等。模质系黄泥制成，刻花模上，亦有印花于器内或器外者，四瓣至五、六、七、八瓣，或三足、四足、五足、六足不等，又有双耳、四耳及多耳，种类甚多，不一而足。

9. 款 识

造像款识有曰“天宝九年十月造像”，有曰“长庆三年造像”。碗之款识有曰“隆兴四方”，“河滨遗风”。

10. 年代

邛窑年代，疑始建于唐前。陆放翁《老学庵笔记》所载临邛夹门关得瓦棺，外列瓦器，皆极淳古，由此判断，邛窑必创始于唐以前，至唐而益精（已见前说）。据造像款识所书年代，多为天宝九年（750年）、长庆三年（823年）所造，且同时掘出有“开元”（713—741年）钱；“乾符”（874—879年）小钱等，邛窑于唐之中叶，制造已极精美，殆无疑义。罗希成《唐邛窑奇品》云：“其釉色有如均窑者，有如汝窑者，有如龙泉大观绿等者，亦有三彩者，色白固无论矣。亦可谓代之均汝诸窑之釉色，均胎息邛窑而来。”《蜀故别录》：“邛窑影响宋瓷甚巨，均汝诸器，可为例证，论瓷者不可不知。”二说均以邛窑之釉水，实开宋代均汝诸窑之先河，惟罗君以邛窑年代列为唐蜀则又误也。闻龚煦春先生常撰邛窑器考，未及付梓而卒，余亦无由寓目，此谨就平日耳闻目击，略加注释，臆举十端，补苴罅漏，其俟诸异日可也。

（见于《风土什志》1948年二卷二期）

四川邛崃县发现古代窑墩及陶片

罗 永 祚

四川邛崃县南河坎孔明乡大路两侧有唐代邛窑遗址。窑墩上有后代修建的十方堂庙宇一座。解放以前，反动军阀，地方恶霸等曾在这里挖掘过大批的陶器，碗、碟、缸、绿釉缸、花盆、陶响铃等，甚至十方堂的庙基因此被挖成深坑。在该地河岸上及农田中遍布着碎陶片，颜色有黄、白、绿及深赭色的，路侧两旁的碎陶片深达一尺。附近的乡民家用匣钵或破陶坛内装泥土砌为墙垣的很有几处。希望有关部门对该窑加以调查研究。

（原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0期）

四川邛崃十方堂古窑

丁祖春

邛窑是四川古窑中负有盛名的古窑，它包括十方堂、尖山子、瓦窑山、西河乡才冲土耙桥、固驿镇等处，其中以十方堂最集中，规模最大，具有代表性，择其要点介绍于下。

十方堂古窑址在邛崃县南岸的小平坝上，由县城出南门过河上岸，各种窑具和各种器物残片俯首可拾，大小窑包耸立四周。十方堂这座古庙的后段就建造在一个窑包上。窑场广阔，东西长约两华里，南北宽半华里，东南到陈巷子，西北抵瓦当沟，北紧靠南河、南接严坝。南边可以望见由西向东的蛮子山，除已破坏的窑包外，现存窑包十三个。最高的约十米，低的约四米。在窑包的顶部还可见到红烧土。

窑址破坏严重，解放前国民党军阀唐式遵曾动用数百军民，日夜挖掘一个多月，许多精品被军阀或古董商人贩运上海等地，以至流传国外。因此，地层关系已被扰乱。

解放后曾多次调查，1976年初省博、重博又进行了调查，我们编写组也曾三次调查、采集各类标本120余件。除证实过去的研究成果以外，也获得了一些新的资料，对于推断邛窑烧造年代，研究邛窑陶瓷工艺、烧造技术的发展情况都有了新的实物资料。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要素之一，也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窑具和窑灶是瓷器生产的必要条件。我们依次简述如下。

生产工具

1. 匣钵 呈圆筒形,钵口有半圆孔两个,腹壁有圆孔二至四个。功用是排气和通火。一般通高21,口径20,底厚4厘米,腹壁厚2厘米。钵体厚重,内呈灰黑色,外呈酱红色,微有光亮,显然是多次使用,在高温下焙烧所致。这次新发现一匣钵残片,刻有铭文数字,为“贞元六年润”(791年)这对于匣钵使用和窑址的年代都是很好的证据。

2. 支钉 一般是圆圈锯齿形,作支烧间隔器物用。根据所烧器物的种类大小作出各种型号,大体分大、中、小三种,无论大小均有五至六个齿足。

3. 环垫 有两种,一种呈壁状,一种呈环状。

4. 土垫 有三种,均系当时窑工们用泥土随手捏成。一圆环形,将泥条接成圆形而成;二圆板形,将泥丸压制而成;三垫条、形似鸭子,以泥条两端捏扁而成。

窑室结构 因未发掘,不可确知。但根据现场观察,从窑包外观看都有一个从顶端依次低小的尾巴。据当地社员谈,他们曾挖开过一个窑包,窑包的尾巴是空的,上下相通,侧面有数个渐次升高的火门,尾端也有一个。据此,有可能为长窑(浙江等地称这种型号的窑为龙窑),也可能为阶级窑。

成型方法

邛窑的产器很复杂,我国制瓷传统工艺中主要的三种成型方法都有。

1. 圆器成型——这是生产大量碗、盘、杯、碟、罐、壶、盆、等圆器广泛采用的方法,所用工具是辘轳,古代称为“陶钧”。

2. 琢器成型——主要用于瓶罐之类的复杂器形的生产。

3. 雕镶成型——四方器、六角器、象生瓷、瓷塑、以及壶

咀、壶把等，都采用此法。

除此而外，还有范印成型的，如小玩具之类。

焙烧方法

从窑具看，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先将坯胎依次重叠放入匣钵内，胎体之间为防止沾结以支钉相间，匣钵相叠至最后一个加盖，入窑焙烧；一种是用圆筒式支柱垫底。然后往上重叠坯胎，还是用支钉相隔。两种方法都叫“重合迭烧”法。邛窑的匣钵，一般可重叠六、七件产品。采用那一种方法，主要以产品的精、粗来决定。

邛窑的产品极为复杂，但主要是生产民间生活用品，根据不同用途，大体分以下几类：

（一）餐 具 有碗、盘、盏、碟等。

碗分四式：

1. 平底、敛口、深腹碗。
2. 小平足、敛口碗。
3. 大平足、敛口、深腹碗。
4. 玉壁底、宽沿、撇口碗。

以上四种特多，均有大小精粗之分。

盘 一般是大平底、浅腹、敞口。

盏碟之类很多，多数是平底、敞口、厚唇。

（二）酒 器 有壶、杯等。

壶分二式：

1. 平口、短流、有圆有扁，也有长流者。
2. 盘口、桥形系、平底。

杯分四式：

1. 敞口、深腹、直壁、圈足，有圆把或无把杯。
2. 敞口、宽沿、高倒叭足杯。

3. 敞口、口身呈花瓣形，有鸳鸯杯和鸭杯，艺术性很高。

4. 角杯、敞口、器身呈角状，饰似彩釉，有妇女抱杯，老人抱杯等，造型和装饰艺术都很高，是邛窑的佳品之一。

(三) 用 具 有钵、罐、炉、瓶、灯等。

钵分二式：

1. 撇口、深腹大平底钵；
2. 撇口、折腰、大平足钵。

罐分三式：

1. 敛口、宽沿、桥型系、平底。
2. 撇口、短头、丰眉、复式系、平底。
3. 小盘口、圆形耳、丰眉、圆腹，有素面的，有花纹的。

特别是其中有一件似草书“永元”年号。

炉 有梭口、五足炉，

瓶 胆式、小口、长颈、圈足、下腹丰满。

特别突出的是省油灯，圆形似盘，内有一柄，夹层中空，外层有一小圆孔，为加水用。平底，釉色光滑，此系邛窑特产。

(四) 玩 具

种类很多，有鱼、龟、响铃等。据《风土什志》载还有狮、虎、牛、羊、犬、豚、鸡、鹅、鸭、兔、鳖、长龙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均系手捏、范印、雕塑制成。

此外，还有文具、乐器、砖瓦、造象等。

这次新采集了一件三彩瓷妇女象，身着短袖服，胸前抱一角杯，面部丰满，颇有唐代妇女之风度。

邛窑的胎骨，属于瓦缸胎，不透明，质较粗，结构比较疏松，气孔较多，产生的釉泡也多。早期一般呈红色、褐色、黄白色，灰白色，晚期质地细腻坚硬，声音铿锵，火候较高。

邛窑的釉色也很复杂，据现在邛窑陶厂康北明同志所采集的资料，就有深浅、浓淡不同的色彩二十余种。我们所采标本不多，但也有青色、青白色、黄色、米黄色、茶黄色、褐色、青灰

色、绿色等八种，也有深浅之分。其中以青色、青白色、米黄色、茶黄色为主。这些种类繁多的釉色，有可能是采用不同釉料配方所成，也有可能是温度不同和火位相异所致。我们根据器物造型的时代特征看出早期比较单纯，一般是以青白釉为主。晚期比较复杂，釉色极佳，光泽莹润。特别是有一件青釉瓷碗，青色很佳，粗看真有龙泉青瓷之感。

花纹装饰

邛窑的花纹装饰总的说来简练古雅，生动活泼，具有民间风味。所选用的题材来自于自然界动植物，尤以草叶纹为著。根据所采集的标本看，这种草叶纹一般施于罐、杯之上，虽然寥寥几笔，却很形象生动。特别要提出的是出现了一种新颖的装饰方法，那就是在瓷器上使用几种不同的矿物质颜料画成各种花卉，呈现出青、褐、绿三种色调，这是最早使用的多色彩釉，也是绘画题材反映在瓷器上最早的窑址之一。

画圆斑点纹（或称连珠纹）的装饰方法，在省内青羊宫窑有，郫县大坟包窑特多，省外湖南长沙窑也有所见，这可能是反映了共同的时代特征。

关于邛窑的时代

对于邛窑的烧造时代，解放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唐代窑址；一种认为是宋初。^①解放后，又经反复调查，才对它的时代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冯先铭同志认为，邛窑的上限可能早到南北朝，这种推测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根据现有的资料看，它的时代可能早到南北朝，最盛的时期当在唐代，衰落可能在宋初。其理由如下：

1. 出土物中有一种比较大的盘口壶，这种壶是平底，钵形

系，造型和装饰与省内东晋至南朝墓中的遗物相同，与浙江一带的六朝青瓷也很相似。

2. 出土物中有一种小盘口、短颈、鼓腹圆形四条罐，这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造型。并在此种类型的罐上发现有似草书“永元”二字和草叶纹饰。^② 此件遗物正与灌县金马六马槽窑址下层出土的大量小平足碗、盘口壶、桥形系罐，盘口、短颈、鼓腹、圆形、四系罐相似。查“永元”年号历史上只有三个，一为在汉中期汉和帝刘肇年号；一为东晋前凉张茂年号；一为南齐东昏侯肖宝卷年号。这一“永元”年号显然是南齐的年号。因此，推断邛窑烧造年代的上限在南朝是有所据的。

3. 从现在堆积层中大量遗物多为唐代作品，如：短流八棱壶、敞口、宽沿、玉壁底碗，瓷塑面部丰满的三彩妇女象，“贞元六年润”匣钵残片，以及《风土什志》64页记：邛窑年号有“天宝”、“长庆”瓦当，同时出土有“开元”、“乾符”等年号钱，都证明邛窑在唐代是极盛时期。

4. 关于邛窑的下限，推断为宋初，是根据在此窑中未发现有明显的圈足器，但宋代的长流又有所发现。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和《斋居记事》中谈到五代后晋天福元年（936年）到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2年）宋白（文安）为玉津县令从四川买了大批“省油灯”，而四川除邛窑出“省油灯”外，其他古窑尚未发现，无疑宋白所买之灯为邛窑所作，这就证明五代到宋初邛窑仍在继续生产瓷器。

邛窑历史悠久，产品尤精，遗憾的是我们掌握的材料还不够，而且许多精品被国民党反动派盗运至国外，现在本地收集的资料不能反映邛窑的全貌。要了解邛窑的真正概况，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工作。特别需要选择适当的地方进行科学发掘，以便在地层关系上弄清邛窑发展的来龙去脉，以及工艺的发展和窑灶结构。

关于邛窑各种釉色的化学成分，及质量的硬度，解放前有人

作过测定，虽不完全可靠，可资参考。资料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1939年11卷。现转抄如下：

1. 芥子黄釉色

SiO ₂	44.51
Al ₂ O ₃	15.22
PbO	73.68
MgO	2.01
总计	99.42

化学分子式 $\left. \begin{array}{l} 0.77 \text{ PbO} \\ 0.22 \text{ MgO} \end{array} \right\} 0.67\text{Al}_2\text{O}_3 \cdot 3.36\text{SiO}_2$

硅酸铝 0.20

2. 钩窑型蓝色带紫色釉

SiO ₂	60.87
Fe ₂ O ₃	5.15
Al ₂ O ₃	10.52
CaO	18.35
CuO	3.11
P ₂ O ₅	1.80
总计	99.80

分子式 $\left. \begin{array}{l} 0.89 \text{ CaO} \\ 0.10 \text{ CuO} \end{array} \right\} 0.36\text{Al}_2\text{O}_3 \cdot 0.13\text{Fe}_2\text{O}_3 \cdot 2.8\text{SiO}_2 \cdot 0.33\text{P}_2\text{O}_5$

酸硅铝 0.13

3. 灰色釉

SiO ₂	65.40
Al ₂ O ₃	20.11
CaO	7.84
MgO	5.46
总计	98.80

分子式	0.50	CaO	}	0.68Al ₂ O ₃ · 3.89SiO ₂
	0.58	MgO		

硅酸铝 0.17

4. 深绿色釉

SiO ₂	75.92
Al ₂ O ₃	19.25
CaO	3.90
MgO	0.59
总计	99.67

分子式	0.83	CaO	}	2.19Al ₂ O ₃ · 16.3SiO ₂
	0.16	MgO		

硅酸铝 0.13

5. 绿色釉

SiO ₂	37.76
Al ₂ O ₃	12.50
PbO	44.64
CuO	4.45
MgO	0.90
总计	100.25

分子式	0.71	PbO	}	0.42Al ₂ O ₃ · 2.26SiO ₂
	0.21	CuO		
	0.07	MgO		

硅酸铝 0.18

6. 棕色釉 (褐色)

SiO ₂	38.70
Al ₂ O ₃	29.78

Fe ₂ O ₃	Trace
CuO	3.13
P ₂ O ₅	3.80
CaO	23.10
总计	98.51

分子式 0.087 CuO
 0.900 CaO } $0.62\text{Al}_2\text{O}_3 \cdot 1.4\text{SiO}_2 \cdot 0.06\text{P}_2\text{O}_5$

硅酸铝 0.44

7. 红黑色釉

SiO ₂	53.05
Fe ₂ O ₃	10.35
CaO	18.25
MgO	4.55
Al ₂ O ₃	15.55
总计	101.75

分子式 0.74 CuO
 0.25 MgO } $0.21\text{Fe}_2\text{O}_3 \cdot 0.34\text{Al}_2\text{O}_3 \cdot 2\text{SiO}_2$

硅酸铝 0.17

邢窑器的硬度

唐三彩陶	4.5度
唐 甬	4 度
黄色陶器	4—度
灰色陶器	4.5度
发亮的芥子黄	5 度
发亮的芥子黄	5.5度
深绿色壶	4.5度
边有绿色黄碗	6 度

绿色釉碗	6.5度
蓝色釉碗	7—度
绿黄色上有褐色斑点的罐	6.5度
暗黄色或橘黄色壶	7度
大黄色罐	7度
发亮的褐色灰褐色壶	7度
黄釉有绿的褐色装饰	9—度
绿黄色壶	7度

关于邛窑的特点

一、化妆土的普遍使用。在采集的标本中除大型的桥形系罐、壶不用化妆土外，多数产品都在坯胎上涂有一层白色护胎釉。这种护胎釉既有护胎作用，又能增加釉的光洁度。对于提高产品质量是很重要的工艺过程。

二、圆筒式匣钵的普遍使用。在堆积层中存在着大量的匣钵残片，而且都是经过多次使用，质地如紫褐色的炼锅。特别是发现有一匣钵残片有“贞元六年润”等字样，这就证明至少在唐代已普遍采用匣钵了。

三、多色釉的开始。据解放前化验邛窑的彩釉中含有铅质，说明它是属于含铅的彩釉系统。特别是青釉和琉璃混合施于瓷器，可以说是邛窑手工业者的一个创举，是我国制瓷工艺中早期的釉下彩，它对于多色釉下彩的普遍使用起了重要作用。

四、“省油灯”的制造，“省油灯”是邛窑的独特创造，它利用水来降低油温减少蒸发，达到省油的目的。据《乐山县志》记载：“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灯为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在当时技术条件下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创造，它充分反映了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卑贱者最聪明”的伟大真理。

注 释：

- ①《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11期1939年。
- ②此件器耳罐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是“永元”年号无疑；一种认为陶瓷器上的款无此种题法，是花纹不是文字。待进一步研究。

（原载《四川陶瓷文资料》第一辑1979年）

邛窑新探

陈丽琼

邛窑是我国著名的民间瓷窑之一。由于它烧造时间长，品种多，流传广，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邛窑三彩器更是一种颇负盛名特殊工艺品。邛窑三彩是一种釉下彩，其釉彩有黄、绿、褐、蓝、白等色。釉面平整，具有彩绘永不脱落的效果。远在宋元时代为诗人骚客吟咏所称美，元代诗人吴莱作的《大食瓶》诗，歌颂波斯瓷器时，即有“定州让巧薄，邛邑斗轻坚”之句，^①诗人以定窑、邛窑并称，可知当时邛窑与定窑同样齐名。而定窑是我国五大名窑之一。其艺术风格和烧窑工艺，至今仍可借鉴。邛窑的工艺在元代以后衰微，不为研究瓷艺的人重视，但从留传器物，以及窑具，即是当时瓷业发达的历史见证。充分说明了邛窑的制瓷匠师们的勤劳和创造才能，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也作出过卓越的贡献。

邛窑的文献记载不多，不能作为考察古代瓷器工艺的根据，加以解放前四川军阀唐式遵等人的盗掘，竟用数百兵工进行日夜挖掘，时间达一二月之久，地层关系受到严重破坏，许多精品又被盗运至上海，流传国内外，而当时爱好古瓷的研究者，又以这层位不清的出土物及类似的传世品，进行著录或考证，因而得出过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解放后，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开始对邛窑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近年来笔者也曾参与其事，先后调查过几次。第一次是1976年4月重庆市博物馆与四川省博物馆一起进行调查，第二次是同年7月由四川省古陶瓷史

编写组又调查一次；第三次仍是同年7月由编写组再进行调查；第四次是1978年4月由重庆博物馆进行调查；第五次是1981年6月于川大教学后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会同邛崃县文化馆共同调查。在此多次调查中除采集一些典型标本外，在有些窑址的局部还进行了小小的试掘，对窑址时代叠压关系，烧造的历史，及装饰特征，工艺的发展逐渐有所了解，但仍然由于掌握资料不足，和试掘面积有限，因此在研究结论上，不免有它的片面性。但是为了提供一些实物资料，故来一抛砖引玉，供大家讨论参考。

一、邛窑的创烧时期

六朝时候，我国出现了南北对峙的两个政权，南朝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社会经济得到发展。长江两岸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商业繁荣，文化交往的频繁，长江下游制瓷技术的传播，促进了四川陶瓷工艺的进一步发展，如成都青羊宫、灌县金马窑、邛崃窑都先后建立起来了。

关于邛窑的创烧时代，其说有五。（一）“邛窑年代，始建于唐代，^②（二）“邛窑始于唐末，或宋代初期”，^③（三）“邛窑存在的时间是唐，至唐末为高潮”，^④（四）“邛窑的年代可上推到隋”，^⑤（五）“邛崃窑创烧于南朝时期”。以上这五种说法，笔者根据多次调查资料对比研究，认为第五种推论是符合实际的。

邛崃窑创始于南朝，根据目前调查所见有两处，一是邛崃固驿瓦窑山窑址；二是邛崃十方堂窑址。瓦窑山窑址是解放后发现的，十方堂窑，在解放前已传名中外，但对它的烧造时代，多认为属于唐代时期的典型。根据以往多次采集的标本，都有南朝时期的瓷器，但窑址内绝大多数是唐代的匣钵和器物，未见有南朝的窑具，今年复查时（1981年6月）终于得到了科学回答，即在现今十方堂的渡口处，由于泛大水冲垮一岸边，暴露一窑渣堆积断层，高约三米多宽约五米左右，其中遗物没有匣钵，与固驿瓦

窑山南朝至隋的窑址所出的遗物相似。如南朝时期习见的四系壶，四系罐；四系多为桥形系；敛口平足碗，以及隋代高足盘，小平足敛口碗均有。这足以证明十方堂窑址在南朝至隋朝已开始烧造瓷器。

邛窑这时的产品，在生活用器上有罐、壶、碗、杯、盘、钵等，文房用具只有五——六足珠形画砚。

窑炉的结构，根据窑炉的残断痕迹，和出土的大量手捏环垫，可以推断其窑室为一斜坡状。这种高低不等的手捏环垫，平窑面再在上面叠器坯用的，因此窑灶可能是一种平焰式的龙窑，具有抽力作用，能烧高温。根据手捏环垫的高低差度，推测其窑炉的坡度为14—18度。这种窑炉在当时说来比较进步的：装烧器物较多，能充分利用火力烧制瓷器。

装烧方法：由于没有使用匣钵，还是明火叠烧，叠烧间隔物，已不是以瓷石为支垫，而是用五至七枚的圆圈形齿状支垫，碗内再不是两晋时碗内留下的高低不平的瓷石支钉，而是较平整的疤痕。

成型方法：是轮盘拉坯成型。胎质由于是就地取材，质地较差，常夹杂细砂。胎色呈灰白、灰黑、黄白、灰黄、红色等，由于窑炉先进，烧结较好，有铿锵之声。因克服胎质粗糙，提高釉面的平整，和釉色的光亮，在未上釉之前，多上一层化妆土，用以美化瓷器。

釉色：釉色的种类，有青灰色、米黄色多有细片纹，上釉方法有刷釉和浸釉两种，以刷釉为主，一般器物的釉，仅及腹的上端或略偏下而不到底。由于釉层较薄，常有脱落剥蚀现象。

纹饰：根据目前所掌握资料，比较简单，甚而没有，仅有的只是在碗的口沿或碗内底刻划一凹弦纹。但值得使人注意的是，笔者曾在十方堂窑址采集有一件特别新颖的黑彩盘口四系壶，其形制为盘口短颈，颈肩之处设四圆环耳，丰肩、鼓腹平足，青灰釉（釉极薄），腹部上用黑彩绘两株草叶纹和“水”“元”二字

间隔其间织成纹饰。此“永”“元”合起来引为“永元”年号。历史上有三个，第一是东汉和帝刘肇（89—105年）；第二是东晋时期前凉张茂（320—323年）；第三是南齐东昏侯肖宝卷（499—500年）。都以永元为年号，但根据此处遗址的情况断定，无论怎样不会是东汉和帝永元，绝没有那么早，至于第二个永元，更无根据，因前凉张氏政权未及四川，只在甘肃北部地区。这显然只能为第三个南齐“永元”。由此为证，至少在南朝“永元”时，邛窑已在两晋时的青瓷釉上点褐彩装饰的普遍使用上，新创了用笔绘黑彩花草纹新的装饰工艺。虽然这里根据的仅仅是一件器物似有孤证之嫌，但姑且提出来，供大家研究，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待今后的继续调查和大面积的发掘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邛窑到了隋代，还有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在邛窑境内，还新增了尖山子窑场。

这时的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成型方法工艺过程无大的改进，但在造型的种类，釉色的光亮，纹饰的多样却有了大大的提高。

新增的器形有高足盘、高足杯、敛口钵。造型的演变为敛口小平足浅腹碗变为敛口小平足浅腹碗，小平足杯等，桥形系变得草率。胎体更加坚硬，在上釉之前仍必上化妆土，但是釉色青润光亮，还是釉不到底。

在调查中，于邛窑瓦窑山遗址采集有少数釉下彩瓷片，釉下彩纹饰均绘制在一种敛口钵上，有的青灰釉作地，有的米黄釉作地，彩绘绿色、或黑色，与褐色等色，其纹饰仅日前采集的，为圈状联珠纹，一圈圈的绘在器腹上，十分雅朴。这样的纹饰，在成都青羊宫、新津白云寺、灌县金马、双流牧马山窑均有出现，尤以金马窑地层清楚，定不会晚于隋代。釉下彩绘的出现，是这时最突出的卓越成就，为后世唐三彩艺术开拓了新的道路。说明了釉下彩的出现既不是宋代，也不在唐代，而是早在隋代。

在隋代时期，邛窑烧造已进入它的烧成发展阶段。

二、邛窑的繁荣时期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人文之盛，物产之实，为前代所未见。出现了继汉而兴起的波澜壮阔的古代文化高潮，这时我国的制瓷手工业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北方的邢窑白瓷和耀州窑青瓷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南方越窑青瓷，长沙铜官窑的三彩器，使陶瓷工艺达到高度的水平，出现了崭新的面貌。邛窑瓷器生产在这时亦有了飞跃发展，是它繁荣时期。无论是胎质的规模，工艺的改进，胎质、釉色花纹装饰都有了空前的提高。

从调查所得资料看，尖山子窑场仍在继续烧造，初唐时候，手捏高低环垫，圆环垫窑具继续使用，亦无匣钵。窑炉还是平焰式龙窑结构。其胎质更加坚硬。器物的造型，变化较大，出现了圆壁形的圆足碗、杯、盘、高足盘消逝，而高足杯更为普遍使用。此时还出现了一种大口宽唇短颈四系大罐，耳系为长方型，但不规正。釉色方面在隋代初创的釉下彩基础上，出现了一器上同时出现褐、绿、黄三彩釉下纹饰，或单色黄褐彩绘，但纹饰极简单，似花非花，似叶非叶的草叶纹绘于碗的内壁或钵的外壁，这种纹饰基本上和灌县玉堂窑、郫县大坟包窑唐代作品是一致的。到中唐时候，碗的造型又有改变，由圆足壁浅圈足碗，又为平足，或璧玉底。但是使用了匣钵装烧器。

十方堂窑址，到了唐代，是它的大发展阶段，从现存窑包的堆积形看，属唐代作品的即达十三个，分布范围东西长二华里，南北宽半华里，是四川瓷窑最大的窑场了。故有“十方堂是邛窑的典型唐代遗址”之称。

根据四川唐墓出土物，和我国各大博物馆所珍藏的邛窑器，特别是近年收集的不少作品看，无论是胎质、造型、釉色等，均极娴熟优美。其胎色品种又多而细腻，多灰白，灰中带黄，或微

带灰红色细红色等，其中必以红色胎体最薄，质地坚硬，从窑具上看，手捏高低环垫已消亡，和未见有任何高低垫，绝大多数是匣钵，圆圈锯齿支垫，推测这时可能已烧半倒焰窑之“马蹄形”式窑炉。也有说仍为龙窑烧制。在邛窑中未发现煤渣，可能当时系烧柴。

造型的种类：凡生活用具的罐、壶、碗、钵、杯、碟、盏、灯、香炉无所不有，且各种规格品种齐全。形式多有创新，这时一般壶、罐不再用桥形系或长方形系耳，多用复式系。壶的咀已为管状短流，八棱形短流代替，碗口多出现侈口鼓腹，口沿也有花瓣形、荷叶形，底多为平足或玉璧底；盘为坦底平足或花瓣口沿，这些器形均是这时的时代特征。值得注意的这时陈设器与小玩具，更是花色品种，样样完备；有砚、水丞、笔洗、小瓶、茶托、粉盒等。小玩具有猴、犬、鸡、鸭、鹅、狮、虎、牛、瓷塑羊、马、象、龟、鱼、响铃及各种飞禽走兽。还有最引人注目的小人，活泼可爱，尤以那翩翩起舞细腰姑娘维妙维肖，姿态生动，意趣横溢，形态变化无一雷同。

制作方法：生活用具采用轮制拉坯成型，小玩具与小件陈设器，以手捏塑或范印、雕琢等，而尤以雕琢器最佳，无论是人物或小动物都形象逼真，如出土一件雕琢的鸭子酒杯，利用莲叶伸张形态，加以艺术的夸张塑为杯体，配以游鸭的曲颈后向莲叶啄食为杯把，鸭体与鸭足紧连杯体构成足底，玲珑饱满，和器形一体浑成，精美简洁，没有多余的堆砌，便能发挥装饰美的作用，这些塑瓷，至今仍为荣昌陶工仿制，深受国内外人士欢迎。此外还收集有一种三彩人物水丞，器为一体态丰腴，深目高鼻的少妇，身着折领短袖衣，怀抱一角杯（杯空可盛水），面容肥美，颇有唐代胡人装扮。这可能是唐和西域胡人来往更加频繁的情况，在陶瓷工艺上的反映。据历史记载唐玄宗天宝以来李泌知胡客留得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⑨安史之乱后，玄宗曾避难于蜀，或在此前后，胡客有流寓于蜀者，

故邛崃窑的造型艺术也有外来文化反映，可见邛崃窑塑瓷的题材，许多是来自生活的现实。

釉色：多青、黄、绿、白、紫、黑、蓝等色，“黄者如金，黑者如漆，绿者如玉……青绿釉苍翠可爱，最为贵重，棕釉而有花纹，或釉彩如窑变者，最难得，其釉水无美不备，《蜀故别录》云：邛窑影响宋瓷甚巨，均汝诸器，可为例证，论瓷者不可不知”^⑩的记载经多次调查，确系如此，今邛窑厂已收到三十余种深浅不同的釉色。

花纹装饰：以釉下三彩著称。纹饰类有图案画、没骨画、散点画、斑块纹饰。素色瓷有印花、划花等。素色瓷纹饰较少。现分别叙述：

图案画：釉下彩饰，表示手法，以黑褐、黄等色，用圆珠点串连成方、圆、棱形等构成图案，绘于壶上钵上罐上多有之。

没骨画：釉下彩饰，不用勾勒，常用绿色，褐色随笔绘于壶、罐之上，有似花草纹，或似云气纹，其笔划好些国画中的没染笔触，耐人寻味。

散点画：釉下彩饰，用绿色或深褐色，以大圆点饰于壶、盃、盖上，尤以绿色圆点最美。

斑块纹：以褐、绿、黄或以绿、蓝、黄三色并用饰于器上，以三彩著称者即以此纹饰为代表。其斑块有长形、圆形、桃尖形最美。今年曾在邛崃十方堂收集一器，器形为圆形短流小罐，肩上有四系，以四系为坐标，饰以深绿、深蓝（又似绿色）、深黄、浅黄四色彩绘四桃形斑彩壶身，色彩鲜艳，赋有浓厚的艺术色彩，优美别致独具风格，是很难得的珍品。

这些纹饰的先后秩序，根据地层关系，及器形的演变，图案画散点画在前，而此类纹饰在隋代亦有萌芽，到唐代只为更加发展。没骨画晚于图案画，或者与斑块纹饰三彩器同时。从斑块饰釉色的光亮，器形的工整可能是在创造了匣钵以后的产品。

邛窑什么时候开始创造匣钵，根据收集十方堂出土匣钵残片

上刻有“贞元六年润”铭文看，可以得到回答，查“贞元”年号，历史上有两个，一为唐德宗李适时的“贞元”（公元785—804年）共20年；二为金海陵王完颜亮“贞元”金贞元共2年，未有六年，因此当为唐代“贞元”，唐贞元六年，即公元791年，正是唐代中叶初期，即说明十方堂至少在唐中期以前已使用匣体了。使用匣体，能把火焰和制品隔离起来，避免落渣，粘釉，火刺，变形等缺陷，使制品器型端正，器壁减薄，釉面晶莹光滑，大大提高了瓷器的质量。同时，使用匣钵，解决了生坯的叠装时的负重问题，可以码得更高些，提高了窑炉的利用率，这一创造成功，是邛窑的又一重大贡献。

邛窑虽以釉下彩饰为主体，但是据记载还有贴花，近些多次调查均未曾见有，也许是调查不周。此外在紫色瓷上，还有印花鸚鵡小盒、双凤粉盒，但产品极少。

邛窑款识，据《风土什志》记：有开元三年（公元713年）的三彩釉砖瓦。天宝九年（公元753年）的造像，长安三年（公元823年）造像等。均证明在唐代是邛窑的极盛时期。

我馆还有一件“开皇四年”的邛窑砖，也是难得的器物。

邛窑十方堂，在唐时以烧三彩著称，到五代至宋，仍有不断创新，在窑外和墓葬中，发现有敞口宽沿圆足碗，带把长流壶，三足炉，和声誉远扬的邛窑省油灯，这都是五代至宋常见之物。据《陆放翁全集·斋居纪事》：“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盏最省油。蜀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半”。又据《老学庵笔记》云：“《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灯盏诗，今汉嘉有之，盖夹灯盏也。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根据第一段记载，说明在陆游于四川时，四川人读书不用铜灯，而用夹瓷的省油灯，灯的使用法，是把灯蕊和油从盏咀灌入夹层，而后在灯面蓄水，降低油温，减少蒸发节省油耗；第二是五代到北宋初的宋白，即文安公，记述了省油灯的使用法，及蜀中省油灯产于汉

嘉（今雅安）。据已知材料，雅安未发现古瓷窑。而雅安距邛窑最近，很可能属邛窑产品。同时我们又在邛窑中发现较多的省油灯残件。则可证实邛窑于五代至南宋初还在继续烧制瓷器和省油灯，省油灯的出现，为以后陶瓷产品用于工农业，开辟了新的途径。

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更划时代的阶段，出现群芳争艳的局面。这时邛窑十方堂已达到了它自身历史的最高水平，至南宋虽仍在继续烧造，但却已趋于衰退的境地，而由彭州的瓷峰白瓷器，广元的黑釉瓷，重庆南岸涂山黑釉瓷，灌县玉堂窑取而代之。盛极一时的邛窑工艺，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从此，在四川陶瓷上，邛窑就不居于重要地位了。

三、邛窑与川西各窑和湖南长

沙铜官窑的比较

四川的古陶瓷窑址，在唐以前多分布在西部，并以成都平原为中心。比较大的窑场，除邛窑以外，尚有成都青羊官窑（以下称成都窑），新津白云寺窑，灌县金马六马槽窑，玉堂窑，郫县大坟包窑，双流牧马山窑。这些窑场均以烧青瓷为主，与邛窑具有其共同的风格。无论是造型、胎质、釉色、纹饰以及工艺过程均极相仿，如不作文字标记，是难以区分产地，很似同为一窑之物。

然而，除以上共同点外，亦有不同的差异：

1. 邛窑与成都窑，成都窑的烧造时间仅自南朝至初唐，不及邛窑悠久。但在青釉单色瓷上成都窑特别光润精细，是邛窑不及的。在纹饰上成都窑虽仍在隋唐时期创烧了釉下彩绘联珠纹装饰，但邛窑的唐三彩的散点画、没骨画、斑块画、流云纹等，在成都窑就未曾见过，且在其他诸窑中亦为少见。

2. 邛窑与灌县金马六马槽窑的烧造时间与成都窑同，在产

品方面，南朝至隋初与邛窑无显著差异，而在纹饰上，六马槽在近似白釉作地上，绘制釉下绿、褐线圈纹套以褐色或黑褐色联珠纹，进行各式排列、交叉、连续构成复杂多样的图案纹饰，但这种纹饰又与成都窑纹饰好似姊妹纹一样。而邛窑仅有单圈联珠纹，其他复杂多样纹饰即未曾见有。六马槽窑到中唐以后，可能一蹶不振，相反邛窑则进入了它的繁荣时期。

3. 邛窑与新津白云寺、双流牧马山窑，虽均有化妆土美化瓷器，与具有釉下联珠纹的特点，但新津与双流到初唐以后即已消亡退出历史舞台。

4. 邛窑与灌县玉堂窑、郫县大坟包窑。玉堂与大坟包窑、烧造时间均起于唐，终于宋。在纹饰上相似之处比较多，斑块画、花草纹等，但远远不及邛窑丰富精细；这时邛窑的瓷塑特别突出，其它诸窑亦未有发现。在工艺上，邛窑独树一帜的创制使用了匣钵装烧，而其他仍采用传统的老法明火叠烧；装烧支垫邛窑由六至七齿锯齿形圈垫改为五齿，玉堂与大坟包的垫具虽不使用匣钵，但已不再使用环形圆孔垫具，而改为三角形圆孔垫具了。

尽管有以上区别，但归结起来，只是时间早晚长短不同，纹饰精细多少不同，而共同的因素是主要的。笔者认为，以上各窑与邛窑应是一个窑系，均可统称为邛窑或蜀窑。称蜀窑之由，也正如古代越窑一样，在越国故地浙江的绍兴、肖山、上虞和余姚等地不同窑场。

5. 邛窑与湖南长沙铜官窑，铜官窑烧造时代在唐五代时候，晚于邛窑两个世纪，但根据出土物，多公认邛窑“十方堂的遗物与铜官窑具有共同装饰特征，青釉绿斑与釉下彩绘品种遗留甚多，既可看出两窑的关系，又反映了时代特征”^①，以及“两窑产品在风格上区别很小”^②的真实记载。然而仍有不同的特点，如邛窑全部上化妆土美化瓷，铜官窑只部分使用化妆土；在纹饰装饰上铜官窑不仅有题材众多，用笔流畅的釉下彩人物、花鸟、流云纹等，还有更具有特色的印模贴花，书写动人心弦的梵

句，这在邛窑中反映较少；在窑具上虽均使用匣钵装烧，而在支垫上邛窑中反映较少；在窑具上虽均使用匣钵装烧，而在支垫上邛窑为五齿锯状圈垫，铜官窑则是三足环垫。^⑬但是，无论怎样，他们相同之点较多，而这些相同之点，应是当时的时代特征，不同之处，当是地域的风格不同。从釉下彩装饰一致看，两窑是互相仿效，互相影响，同时，这个装饰工艺应是后来彩绘瓷的先驱。

结 语

邛窑历史悠久，在陶瓷史上占着很重要的地位。自南朝至两宋时代，共经历了约八个多世纪，是目前已知四川古陶瓷窑址中，烧造时间最长，产品最富，造型纹饰最美的一个名窑。在南朝即已广泛使用化妆土美化瓷器，在隋代就独树一帜的创造了釉下彩绘；唐至五代时就以釉下彩著称于世，无论是瓷质、造型、纹饰都已达到了它的历史高峰；发展到五代至两宋，还创烧了有名的“省油灯”，大大扩大瓷业生产的范围，为后世陶瓷直接为工农业服务开辟了广阔的新途径。

特别值得称颂的是邛窑釉下三彩装饰工艺，应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创造，是在青瓷釉器，单色和素白瓷刚开始盛行时，就大胆的突破传统局限，向新的方向发展，使陶瓷装饰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为彩色瓷装饰艺术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开辟了绚丽多彩的途径，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现今十方堂古窑之侧，仍建有陶瓷厂，他们在古代邛窑工艺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和改进，又创造了许多新品种，为国内国际文化交往作出了新的贡献，深信这株古树开放新花，必将继续为我国陶瓷史谱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

注 释:

- ①《渊颖集》卷2“大食瓶”诗。
- ②⑩魏芑西《邛窑》《风土杂志》卷2·2。
- ③《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1937年6月,葛维汉《邛崃的陶器》。
- ④郑德坤著《四川考古论文集》《邛窑和琉璃厂窑址》。
- ⑤《文物》1958年2期,徐鹗章著《川西古代瓷器调查记》。
- ⑥⑦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1期,冯先铭著《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
- ⑧此器原件存邛崃县陶瓷厂。
- ⑨《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条。
- ⑫《文物》1963年3月,冯先铭著《从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到的几点收获》。
- ⑬《考古学报》1980年1期《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

(原载《古陶窑研究》1982年第一辑)

青羊宫古窑址试掘简报

江学礼 陈建中

成都西城通惠门外一里许，有个古庵青羊宫，古窑址的堆积，主要分布就在青羊宫后院西北角的院墙内外。据初步调查，在宫的后院有三座孤堆，各突出地面约10米，径约50米，上有清初建造的殿宇。因为土堆四周底脚经多次翻动，从被破坏的断面可看出满是废窑具、陶片、烧土、烧砖、黑色釉焦的堆积，唯窑址的所在还不确切看出。在西北角的院墙外，有一突出地表约一两米高的土丘，其上已成后代的乱冢了。在这个土丘上和丘南的菜田里，发现埋藏着大量的而且相同的废窑具和陶片、烧土、釉焦等。总的范围，东到青羊宫后院内，西南至青羊场，紧与成（都）温（江）公路毗邻，隔南河与草堂寺相望，西接省医院，东北伸展到新村、关棚，占地面积约16万平方公尺以上。

这个窑址是成都市文化局刘福章同志最初发现，经四川省文管会派人勘查证实。1955年秋，四川省人民医院在丘南进行兴建工程，勘探地层时又掏出很多窑址的遗物。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古窑址，配合建设工程，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进行试掘，十二月二日全部结束，现将清理情况报导于次

一、开掘探方的经过

根据工程队发现陶片的线索，我们择定在建筑设计的房基内开掘了一个探方，其位置与发现陶片的小探方相距不远，北侧距土丘上的窑址约100米。依据地形及地层内所出遗

物看，这里可能为当时窑场堆积废品的遗址。探方见方5米，地表为灰黑色农耕土，下挖平均约20厘米即现出红烧土、陶片、窑具等。就其文化层来看，东北角较薄，只40厘米；西北角最厚达1米多，包含陶片也比较丰富大型；而东南边包含陶片稀薄浅碎。第三层为砂土夹卵石，可能是早期的冲积层。根据第三层的表面地形看，东北边较高，愈往西南方向逐渐低洼，从地势上来说，是很符合由窑址的高处向西南方洼地倾倒废窑器这个情况的。

二、遗物

探方内出土的陶片，可分窑具和器具两大类，其中窑具约占十分之七，窑具中以“垫圈”形式的最多。胎质坚硬细腻，胎体厚重，火候极高，击之声响如钢，胎色赭红，但也有少数灰、白色的。釉色有青白、酱褐两种，器外施釉均不到底。除此外尚有红色烧土、烧砖、黑色釉焦，还有烧坏了的碗重叠连结在一起，完整器物极少。现就所得残片按器形分别说明：

甲、窑具 窑具分圈状式和齿足式两类，属圈状式的有：

1. “垫圈”，作半截圆筒状，外腰微微内收，内周壁作凹形，形式大小不同。最大的高6.5厘米，上口径1.2厘米，底口径8.5厘米。最小的一般高1.5厘米，上口径5.5厘米，底口径5厘米。

2. “支圈”，类似器物口沿的折边，断面成等腰三角形。一般高2厘米左右，直径1.5—6厘米，占圈状式中的少数。其大小是按器物的大小而定。

3. “托环”，作扁平圆圈状，中央有圆孔，形似玉璧，径30—20厘米，边宽8.5—5.5厘米，器厚1—0.6厘米。个别的发现有在边的四周又开小圆孔。这类窑具占圈状式中少数。此物在成都市郊包家桥的宋代墓葬里曾发现用它作随葬品。

但根据环上留有架叠器物烧造后的痕迹看，应该是窑具的一种。

属齿足式的，即通常所谓“支丁”一类。

(1)筒状齿足支丁，有直筒和束腰的形状，一端普遍有六个突起的三角齿形。通高6.5厘米左右，径11—19厘米。

(2)圈状齿足丁，比筒状齿足式要低得多，一般不超过8厘米，径17—9厘米，在齿足式中占多数。

(3)平底齿足支丁，所见都是小形的，即圈状的一端为不穿孔的平面，径5厘米左右。

这些窑具的功用，从烧坏了的“重叠”碗的标本看，可知支丁的用途，是陶器涂釉后入窑烧造时用以间隔两器，免正烧时由于釉的流下而粘固。圈状式的“垫圈”，是陶器烧造入窑时单用于衬托较大形的器物，而不适用于隔离两器之间，亦不适用于杯、碗等小形器物的衬托。至于圈状式中的“托环”，它的使用，从上面保留的印痕看，是置在“垫圈”或“土垫”之上，再将器物安放在环的四周，这样一次能置放许多件小形器物。此外，窑具中常见有一种以手捏成的泥圈，形状不规则，暂名之为“土垫”，专用于托垫在窑具的最低层，以支持烧造器物的位置平稳。

乙、器物 从获得的残片、半残器物陶片中，经我们整理、复原、绘图后，尚可看出器形的，有碗、杯、盘、砚、罐、管以及残器底和带纹饰陶片等。

(一)碗

1.平底小敛口碗，这是陶片内较多的一种，有青白、酱褐两种釉色，以酱褐色居多。口缘稍向内敛，平底，底心微微内凹，器壁稍向外张，器形有大小不同。最大的高7.6—6.6厘米，口径19—15厘米，胎壁最厚处约1.2厘米。小的高5厘米，口径10.5厘米。其中大形碗较多，小形碗仅见青白釉的。

2.大平底小口碗，仅见酱褐釉色的一种。腹浅，高4.8厘

米，口径1.3厘米，底径1.2厘米。为数不多，形制古朴。

3.平底侈口碗，只发现青白釉一种，口缘外侈，高8.5厘米，口径1.5厘米。这类器形亦不多见。

（二）杯

1.平底侈口杯，口缘稍向外侈，高6厘米，口径7.6厘米，胎壁厚0.5厘米。

2.平底杯略大于侈口杯，似半截椭圆形。

杯的形式主要就是这两种，前者在陶片中发现较多，釉色均为青白。另见一种残器，类似杯的器底，所异者是底与腹间成90°角度，不似一般杯的底与腹间成弧线形，因残器的口腹无存，且残片数量极少，看不出它的规格。

（三）盂

仅见高圈足的一种，足底外侈似喇叭形，盘底与圈足施酱褐色釉，盘中央及边沿施青白釉，边缘外折，正中印有一道或两道凹圆弦。高7.4厘米，口径8.7厘米，深2.4厘米，足高4厘米，圈足直径4.2厘米，胎壁最厚处1.3厘米。

（四）砚

仅发现两块圆形残砚盘，只在边沿的内外施酱褐色釉，砚中央及低部全露素胎，腹心微微上凸，四周显出一道凹槽，砚底边沿约有五个等距离的乳头状足，口沿有内收的凸榫，显然原物是有盖的。

（五）罐

所得陶片残碎，无完整器，仅从残片的器口，可看出有高颈四耳罐和折口四耳罐两种。高颈口径一般1.7—1.0厘米，折口径一般1.5—4.5厘米，壁厚0.6—1.2厘米。这两种四耳罐，从其口径的大小可分大、中、小三种不同器形，均着酱褐色釉，肩部的四耳均为横耳竖穿，孔与耳板略呈长方形。高颈四耳罐颈细长，一般高4—7厘米，颈项印有4、5道弧弦纹，口缘外张呈盘状。

(六) 管

作圓筒形，兩端口緣平折，一端較粗，徑1.6厘米，另一端較細，徑1.2.5厘米，器壁厚1.5厘米。其用途可能為過水或作煙囪，目前四川民間的陶窰仍然燒造這類用具。

(七) 其它遺物

除上述器形的陶片外，尚發現很多燒磚、紅色燒土及釉子經燃燒後的凝結物，有的還夾有碎陶片，顏色烏黑，斷面呈海棉狀的細孔。很多燒壞了的碗重疊相連，碗間以支丁衬隔，可看出當時燒造的情況；有些往往與釉焦混合粘固一起。另有一些殘器底，器形胎壁各有大小，厚薄不同，素胎不施釉，大多數為罐的底腹。有施青白、醬褐色的大碗及盆的底腹。

丙、紋飾 探方內拾得二十餘塊帶花紋的陶片及扳、扭的殘件，因而推知這座古窰不僅限於燒造素面的器物，並且也有花紋裝飾的產品。花紋的種類有：釉下彩繪、印紋、附加堆紋三種。釉下彩僅見於青白釉的陶片上，分赭、綠、白三色。印紋只發現於醬褐色的陶片，而附加堆紋僅發現於一塊素地器物陶片上。其中釉下彩及印紋的花紋風格簡朴。

丁、釉色 從發現的器物陶片看，只有醬褐、青白色兩種釉。施青白釉的，據發現只限於碗、盆、盤、杯等較小型的器物，而醬褐色釉都施於罐、大碗等大型的器物。一切器物外壁施釉都不到底。青白色釉略帶青綠，質薄勻淨，開細小的冰裂紋。醬褐色釉由於火候關係，有時略有深淺的差異。深的呈醬褐，以此色居多，而淺的稍現茶黃。都屬草灰釉的一種，含二氧化鐵的成分較濃。這種釉水較厚，光滑潤澤，略帶透明，也開細小的冰裂紋。由於燒造時釉子的流走，往往在器物的陰凹處或碗的中夾，看起來釉水要厚些，釉色顯得深些。從陶片的斷面看，一般釉的厚度在二十分之一厘米左右，在厚的部分有達十分之一厘米左右的。

戊、質料 此窰所用的原料都為一種，即岩石未經淘洗沉澱

后的石浆。此种岩石为四川各地普遍有的红色水层岩，质疏松，含有铁质成分。这种石浆原料能耐火，故其胎质坚硬细密，中无气泡，色呈赭红。

己、制法 主要为轮制。施釉的手续是在干胎坯上先施一层薄的粉末陶衣，以后或绘上彩饰再施釉。器物都是重叠的烧造，如碗的重叠间以支丁相隔，支丁的圈口套着碗底，保护碗的平稳及碗间的距离，不使烧造时器物互相粘拢。在最底层用“土垫”衬底，以支持烧造时位置的平稳。四耳罐等大形器物烧造时都置在“垫圈”式的窑具上，两器间或衬以“支圈”的窑具，但最底层都是用“土垫”托底。此窑中未发现其他窑所用的匣钵窑具；而一种圈状式的窑具发现最多，为他窑所罕见，这是此窑烧造工具的特点。

三、结 语

我们这次的试掘由于只开了一个探方，所得迹象、遗物，不能作为了解和研究窑址的全貌；但从试掘中初步知道了窑址的座落及堆积的主要范围。同时，对于这窑陶器的制法、器形、质料、釉色、花纹等，也了解了一个概括的轮廓，为以后进行全面发掘提供了一些基本情况。

关于这座窑址的时代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

1. 以往在四川境内的唐、五代、北宋时期的墓葬里，常出有类似这个窑器的杯、碗、四耳罐等形式、釉色相同的器物。特别是高颈四耳罐，最近在川西地区唐代、北宋墓葬里仍有出现，形式质料都很相同。

2. 器物施釉不到底，特别是碗、杯的平底半截挂釉，是唐宋时通行的作风。

3. 用简朴的点线组合的花纹形式，显然是较早的作风。

4. 从器物的胎质、火候，特别是器物的厚重、坚硬、朴实的

作风看，与传为邛窑产品的风格颇有相似之处。

初步约可推定为唐宋之间。若从其花纹的风格看，其上限年代可能还更早一点。

（《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六期）

成都青羊宫古窑遗址试掘简报

四川省博物馆

一、遗址位置及试掘经过

遗址的位置在成都西郊南河（锦江）支流磨底河的东岸，青羊宫的左侧。遗址所处的地形全属平坝，高出磨底河的河床仅4—5米。1954年10月省文管会发现并进行了清理（参见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青羊宫古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2期）。1958年4月，四川省博物馆在这里作了一次试掘。先后共开掘了5个探坑，发掘面积计50余平方米。

二、地层概况

第一层，厚0.75米，最上为现代物，中部含唐宋窑址的各式陶瓷片及窑具。下部内含有火候较高的汉代陶片，花纹砖及瓦等。

第二层，平均厚度约0.40米左右，为灰褐色细泥砂土，较上层泥土疏松，包含有烧土和汉代的三足釜，深腹钵、褐色的短足豆，细绳纹的罐，釜，兽骨等。

第三层，厚0.80米，为黄褐色砂层，愈往下砂愈纯、愈松，包含大量的夹砂粗陶片多作褐色，印绳纹，还出了一些兽骨。

第四层，平均厚度约1.30米左右，黄砂土中掺有直径5—6厘米大的卵石，下部灰色，包含有木炭屑，灰末，褐色陶片，卜龟，兽骨，兽牙，鹿角等。

从第四层往下，尚有一层灰黄色的淤泥层，平均厚约0.20米，成由南往北倾斜的缓坡面。此层向下又为一层较大的卵石夹砂层，厚约0.30—0.40米。其下又是一层厚约0.30米的淤泥层，再下又为卵石夹砂层。因出水甚急终止下掘。

三、文化遗物

因各层所包含的文化遗物不同，现把主要的文化层出土的遗物分述于下：

(一) 第二层，为汉代文化层，分布的面积较广，在附近的青羊宫及罗家碾一带的断壁上，均大量的存在着。出土的遗物仅为各式陶片及残器。经复原和能看出器形的有如下几种。

1. 豆。有两种，一种为矮圈足，盘作碗形，夹砂褐色。口径一般在11.5—15.5，高4.5—6.2厘米。此种陶豆的形制与重庆冬笋坝，昭化宝轮院及成都羊子山等地的战国及西汉早期的土坑墓中所出相同。另一种高圈足，浅盘。盘高6，口径11厘米。

2. 钵。经复2件，口稍外侈，圆唇，小平底，高5.8，口径20厘米。

3. 三足釜1件，外折唇、圆腹、圆底、实心足、夹砂灰陶。此种三足釜在成都西汉土坑墓中时有出现。

4. 釜。扁腹，平底，腹上满布斜绳纹。

5. 罐。都是残片。为折唇，短束颈，大腹，圆底，肩上满布绳纹。

6. 铜半两钱。1件，径2.1厘米。为文帝“四铢”半两。

(二) 第三、四层，为遗址的主要文化层，两层所出遗物相同，看不出有时代的早晚，故列为一层综合在一起分述：

1. 陶器：

这两层所出的大都是陶器残片，夹砂粗褐色陶占90%以

上，夹砂灰陶只10余片，细泥灰陶只几片。胎壁较厚，器形以缸、盆等较多。随着器物的不同类型而加入分量不等的粗砂粒或细砂。陶色主要为褐色，火候一般较高，有些陶胎因火候关系而具有夹心的颜色。轮制为主，模制限于绳纹圆底的罐，但口沿部分仍用轮制，手制的主要器足、器钮等。纹饰以绳纹为主，再有乳丁纹、印纹、划纹和弦纹，还有器表涂朱的。

(1) 罐。一般为小口，唇外折或稍斜卷，短颈，肩腹无显著的分界，圆底。与重庆冬笋坝、昭化宝轮院及成都郊区的战国墓出土的相似。

(2) 釜。通体绳纹，圆底，大口内敛，折唇器表留有烟熏痕迹。

(3) 豆。有两种，一种为高足，底部成喇叭形，高13，口径12厘米。另一种足稍矮而粗，浅盘，圆唇。

(4) 尖底盂。残片较多，形似矮足豆而无圈足。

(5) 纺轮。4件，分3式。Ⅰ式：尖锥形，腰有两道凸弦纹；Ⅱ式，2件，顶小底阔如盖；Ⅲ式，截顶锥形。

除以上器形以外，其余很多陶片，从口部、底部上观察，尚有鼎、碗、盆、壶、尊等，都不能斗合。

2. 骨器：

(1) 卜骨。2片，是在动物的头盖骨的内面凿孔，孔不甚圆，在凿孔处施以火灼，而正面的裂纹除个别外多数不显著。另1片的内面只有一大的灼痕，无凿，在其边沿有2钻孔。

(2) 卜龟。1片，龟腹甲，有钻有灼。另有未经卜用的甲片3件，但均残小。

(3) 骨锥。2件，1件成圆柱形，未精磨，尖端已残，顶端略粗而平。另一件系将兽骨尖端稍加磨制而成，顶端粗钝，留有骨白。

(4) 骨簪。1件，已残，磨制较精细，断面成椭圆。前后发现6件人骨残块，1片是额骨，2片顶骨与颞骨相衔接的部分，

一为右肱骨，一为左肱骨，一为股骨，经鉴定全为成年人的骨骼。兽骨，出土较多，可辨认的有鹿头骨，鹿角，野猪牙，獐狗牙……等。其中的一段鹿角有人工锯断的痕迹。

3. 铜器。有铜小刀 1 件，尖残，模铸。

4. 石器。仅有石环的残片 2 件，系用青石琢成，环的背面光滑，正面的边沿磨成斜边。

四、结 语

关于青羊宫遗址地层的形成，我们认为第二层的文化遗物，是当时古代人们在该处生活活动时的遗物。其下三、四层的文化遗物，则是因河流泛滥冲积而成的一个古代文化遗物的堆积层。

他们的时代，根据地层的变化和遗物的形制观察，遗址第二层所出的矮足豆和绳纹的圆底罐与四川战国墓及西汉早期的土坑墓所出的相同，而钵和三足釜，则为西汉坑墓常出之物；特别是遗址第二层出土一枚“四铢”半两，则为我们推断遗址第二层的时代，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因此我们认为遗址的第二层，其时代不会早于战国，而属汉代是比较恰当的。至于遗址第三、四层的时代，根据遗物来观察，其所出的陶器如罐、钵、豆等白形制来看与战国墓所出的相似，同时与新凡水观音遗址的器形也很接近。尤其是遗址第四层所出的泥质灰陶的尖底盂，与水观音遗址所出的完全相同。另外特别重要的是遗址第四层所出的尖底盂，有乳钉纹的罐，与我们 1957 年在成都武侯祠和 1958 年罗家碾清理的二座战国墓所出的完全相同。因此我们认为遗址第三、四层的时代，接近战国是比较可靠的。至于三、四层文化遗物的积成时间，根据遗址第二层的时代来推断，大致与遗址三、四层文化遗物所代表的时代同时或相距不远，与新凡水观音遗址可能有着联系或某种继承关系。

执笔者江学礼 陆德良²

（原载《考古》1959年8月）

琉璃厂窑址

(The Liu Li Chang Kiln Site)

〔美〕葛维汉 (Graham, D.C.) 著原注①

成恩元译

琉璃厂位于成都南郊，通过老兵工厂的公路，大约二十华里的地方。在这里，沿着公路或附近田野中居住着大约二十多家店铺和居民。尽管这个地方很难说得上可以叫做一个村镇，但它在成都却颇有名气，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它是一个古老陶瓷窑址的所在地。在过去几十年，也可能是几百年间，它那陶瓷废物堆中，经常出现一些引起古物爱好者的的好奇心和赞叹的瓷器。

琉璃厂遗址占地略呈圆形，直径大约二千英尺左右。在圆形边缘的地方有近似圆锥形的小丘。它们是由于古陶瓷窑中烧过的陶质碎片、废弃的器皿以及其他垃圾等物堆积而成的。小丘与小丘之间的土壤中，也混杂着大量的陶瓷碎片。这一带可能同时有好几座陶窑在工作着。

在古老的方志一类文献记载中，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副主任林名均先生曾经辛勤地查阅过，但没有找到任何有关这一窑址的参考资料。原注②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刻印的《华阳县志》中有一条记载：“琉璃厂位于祝王山北。明朝官府曾在此地制作釉（陶）。”译者注③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古老的史书或方志提及曾有这个遗址，而所有的证据似乎都与窑址在明代仍生产的说法相互矛盾。它很可能是晚期历史写作者所增补的记载，代表着他们的一种看法。

笔者曾于1933年3月在琉璃厂进行过一次发掘。几乎每

天早晨，当笔者再返遗址时，发现当地的人在前一天晚间把遗址中的遗物都盗走了。因此，工作进行得十分困难。尽管如此，仍然得到了一些好的收获，而且这也是在琉璃厂所进行过的唯一的一次发掘。

1936年的夏天，有一些军官曾命令大批士兵在这一遗址挖掘古物。他们的挖掘方法是完全不科学的。他们到处乱挖，也还挖得深；但当他们相信已经挖完了或觉得所余遗物不值得再挖时，他们便不再继续挖下去了。损失是无可比拟的。

自从1932年秋季以来，笔者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一直在尽力收集发现于琉璃厂的遗物，其数量已相当可观。除了1933年的那次发掘以外，由于中国政府法令的严格规定，不可能再进行这类工作。将来的发掘是否能获得满意的成果，看来是很成问题的。虽然如此，但在1936年，当士兵们挖掘时，笔者和其他一些人认识到如果不去收购这些从遗址中所挖出的材料，就意味着要想获得一个好的遗址藏品集，以后是永远办不到了。林名均先生和笔者曾几度往访遗址，并收购了很多人亲眼看到出自遗址本身的器物。结果，藏品大大地丰富了，本文可依据的基础，就是这些材料。我们曾向一些朋友保证过，笔者和其他一些人将尽最大的努力向政府请求得到允许进行科学的发掘，并说服政府官员们阻止盗掘事件的发生，结果是徒劳无功，全无用处。

很多人曾经而且还在继续对遗址的时代和瓷器的品种问题进行争辩。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试图介绍遗址所出的器物品种，并企图对遗址的年代获得一个比较合理的结论。

在1933年的发掘中，笔者曾在遗址“原位”中发现一个黑色、发光而精致的天目茶碗和其他几件天目型器物，两片瓷州窑型碎片，还有几件定窑型碎片。此后，他还获得几件定窑型和一些影青、钧窑型碎片。笔者从来没有找到，也没有看到任何其他入找到明代的陶片，只有少量可能属于唐代的碎片。

1934年10月间，笔者曾在华西大学校园中进行过一次

发掘。在这次发掘中，发现一座砖墓。出土物有火烧过的人骨、基石、有年款的砖、一些陶器和釉陶人俑等。其中有两件是典型的琉璃厂式陶器。砖上的文字是：“嘉定十二年（A.D.1219）烧造。”^{译者注②}基石上的文字是：“大宋嘉定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死者生平，^{译者注③}降生后居住斯城；死后卜葬此宅大吉。于华阳……乡福地。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中央勾陈。原注④、译者注⑤一切如律令。”^{译者注⑥}这可以明确地证实琉璃厂陶器，在北宋1221（年）时，民间仍普遍应用。墓用薄砖筑成。砖与砖间的裂缝，填以泥土。在这些砖缝间的泥土中，发现了一些风化很甚的陶瓷碎片，它们很像邛窑的产品，比墓中的琉璃厂陶器要早得多。

对于琉璃厂窑年代的进一步证据是这些出土器物的本身。大多数碗、碟的底和底的圈足都很小，这是宋代的风格。还有，大多数陶器所上的釉是单色瓷釉，这也是宋瓷的一个特点。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多数的地区，偶然也产生一些不同的产品，其中有些花卉图案是先刻在器身上，然后上釉，或先印在器身上，然后涂以釉料，或先在器身上以淡色作画，然后上釉。

笔者在琉璃厂曾获得一块砖片，上面写着年号“隆兴”（公元1103年）字样。鉴于这一年号的官方应用，远在中国的遥远地区，当时在政治上并未控制了四川。因此，这一名称，似乎不称指年号的。^{译者注⑦}另一厚碎片上也书有年号，但缺第一个字。这个字只剩了最后一笔。年款全文的其他字则都保存着。年号的另一字为“和”，字迹很清楚。明代没有以“和”字结尾的年号，这类年号，在唐代是有的，但这一碎片上的精美瓷釉，显然是晚于唐代的。在宋代的年号中，至和（A.D.1054）、政和（A.D.1110）、^{译者注⑧}重和（A.D.1118）及宣和（A.D.1119）、^{译者注⑨}都以“和”字结尾。公元1021年的年号也以“和”字结尾，^{译者注⑩}但统治者的政权并没有到达四川，因此，这一年号是否四川行使，很成问题。国立四川大学的收藏品中有两片带年

号的琉璃厂陶片，一片的年代是崇宁元年（A.D.1102），接近北宋末期；另一片为元至元十三年（A.D.1276）。

一、材料和釉色

大多数的容器器身是由红色或橘红色陶土制成的。它的变异范围，由深色到黑色都有。有少量标本则呈浅桔黄色。几乎所有的容器都是轮制的。

有些粗糙的器物没有上釉，也无彩绘，它们是受窑中的高温而变成红色的。有以则绘以深棕色或桔黄色图案。有些陶器只上了黄色陶衣，但大多数是上釉的，而且釉质显然属于真瓷范围。釉陶碟的制造是：先上一层白色或浅黄色陶衣，然后上以较淡而发光的色彩。碗的底或是一般较窄小，但不常具圈边。碗、盘和碟的内部上釉，外面近底处则一般不上釉。有时候，釉水尽处呈一圈厚边痕；有时候则以不规则线条痕流近底部。

在釉色中有一种纯白色的釉，从发光到晦暗不等。有少量定窑型陶器的胎骨是白色的，可能产自华东一带。译者注①本地白瓷胎骨呈红色、黑红色和极少量的黑色胎。琉璃厂的白釉很可能是仿自华东的“定窑”，琉璃厂的陶瓷制作者可能没有得到或没有制造白瓷的技术。

主要的色调是棕色，在桔黄和黄色之间反复变化着。所有最好的天目釉标本，在发掘前已残破；窑址中也少见，可能不是本地产品。另一方面，茶碗的形式和颜色却和“天目”陶极为相似，而且数量很大。这可以证明他们是仿自那些最好的“天目”茶碗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大量的瓶、壶、罐、碗，应当是本地的“天目”产品，其质量较次于重庆、河南和福建的样品。此外，有些桔黄和黄色间的标本，显然不属于“天目”范围。

第三类的釉色是从黄色、浅绿黄到绿色的色调。其中有些是发亮，似乎是本地的“龙泉窑”系。这种瓷器非常普遍，包括一些美丽的茶碗、饭碗、壶、坛、罐等。

较稀少的是灰瓷，它们可能是黄、绿瓷间的一种变异品。这类标本只找到了几件。

最后，发现了一种黑色陶器，它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瓷器。器物本身色调晦暗，可能是用烟灰或中国墨汁涂绘的结果。这类器物唯一的标本是一些饭碗。

戴谦和 (D. S. Dye) 教授曾对琉璃厂陶器的硬度作了仔细的测验，其结果如下：

本地白瓷，红胎骨		6.5
“定窑”，白胎骨	C/15516	7.—
棕色“建窑”茶碗	C/5260	6.5
棕色碗	C/14057	6.0
棕色碗	C/14455	7.— (天目?)
软调棕色碗	C/16550	7.—
棕地黄条纹陶片 (天目?)	C/5240	7.—
“磁州窑”陶片	C/5616	7.—
黄色碟	C/13949	6.5
黄陶衣	C/13982	3.
灰色碗	C/13840	7.—或6.5强
淡绿色釉	C/13941	6.5

从这一测验的结果中，我们发现瓷器的硬度在六至九级间变化着，包括可能来自其他陶窑或华东地区的“定窑”和“钧窑”，这可以说明琉璃厂的陶釉当属于真瓷范围。

下面是根据《勃雷德莱标准色度表》(Standard Color Chart for Elementary Instruction Based on Bradley Color Standards,) 米尔顿勃雷德莱公司, 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 [以下简称《勃表》

一译者]和《梅尔茨—保罗 (Maerz and Paul) 色彩字典》(Dictionary of Color), [以下简称《梅—保典》一译者。]所作的更详细的分类表:

C/5340译者注③深黑棕黄色, 较深于《勃表》型2; 《梅—保典》图版16, L. 12。

C/14139 深黑灰(《勃表》)

C/14969 深红《勃表》型2。附饰—淡桔黄, 《勃表》型2。

C/13776 碗—红陶胎, 桔黄釉, 深于《勃表》型2。

C/13776译者注④碗—红陶胎, 桔黄釉, 深于《勃表》型1。

C/14503 中空灯, 译者注⑤亮红桔红色, 《勃表》型2。《梅—保典》图版14, A. 12。红陶胎, 釉下为黄陶衣。

C/13778 淡黄灰绿色。《梅—保典》图版21, C. 1。

C/13987 淡绿黄或桂叶绿。《梅—保典》图版11, L. 3。

C/14730 深绿。《勃表》型2。

C/13967 浅蓝(极罕)。《梅—保典》图版34, J. 4。

C/14134 翠绿(罕)。《梅—保典》图版34, J. 4。

C/14134 翠绿(罕)。同上, 图版26, J. 8。译者注⑥

C/13759 天目茶碗, 纯亮黑色。有的地方为(红)桔黄色。《勃表》型2。陶双烧为红色。

C/13755 黄釉绿花纹壶。黄色为《勃表》T. 2号。《梅—保典》图版10, L. 2。绿色为《勃表》型1。《梅—保典》图版30, A. 12。

C/5313 (发掘中出于“原位”)极淡的黄色陶衣。

二、陶窑出土遗物描述

照片和插图会“讲述它们自己”, 但文字叙述也会有一定的

价值。

为了使热量流通，以避免器皿彼此粘结在一起，在窖中烧器皿时，要用支丁相互把它们隔离开。这些支丁，一般有齿但不是所有的支丁都有齿。齿数在五个以上。有时支丁的底部绘成红色，齿尖则绘成黄色。

“碟”在窖中是放置在匣钵里的，这样可以避免强烈的热度。匣钵呈圆形，上部有口；周围厚壁上有圆形或椭圆形孔。

“勺”体形大小不等。勺流自勺边的凹部组成，呈直角形。勺流的对面名勺柄。柄为空心，也许是为了安装把手用的。

“壶”大多数的壶有长嘴，仅少量的壶为短嘴。用流代嘴的壶较为罕见。有些壶的柄很大，安置在壶嘴的对面，同时两侧有小柄各一。有些壶则在嘴的对面仅有一个大柄。更为罕见的是仅有两个小柄分安两侧的壶。收藏品中最大的一个壶是C/14072，高272毫米，宽162毫米，嘴长162毫米。

在博物馆的收藏品中，有两件从壶上打裂下来的双嘴残件。其中一件C/5277号，是1933年发掘时“原位”出土品。双嘴代表着人的双腿。另一件，C/14144号，也可能含有同样的意义。前者釉色为桔黄，《勃表》型2，《梅—保典》图版17，H. 11，褐褐色。为了加固和装饰，捆以单条带，近带尾处有一结。后者捆以两条带，三结，还有一双弓，尾部也绕以两束条带。

“碟”有一些很厚的碟，其直径从96到142厘米；边的厚度则由5到16毫米。碟底一般呈扁圆形，直径由30到59毫米不等。少量具有底边。碟边都呈圆形，但上下有弧度。碟的口部边缘呈圆形，或平式，或顶部平面侧边直。口部是碟子最厚的部分。

有很多薄的碟子可以看作浅碗。有些很小，直径只有82毫米。有一种独特的碟，碟的内部是垂直的，但底部呈弧形。碟的外侧边更显得圆，但总的说来，大体上是以内侧线为依据的。第二类碟子的形式，口部系用一种象筷子类的小工具把碟口由外向

内，根据所要求的数目，压成若干小弧形，结果碟边遂呈五瓣、六瓣等不同的形状。这些碟瓣的数目，据已检验的结果，从十二至二十二瓣，多种变化不等。译者注⑭

在我们已看到的琉璃广碟或其碎片中，从宽、平的角度来看，没有足以称为盘子的东西，这一说法也适用于杯类。

“碗” 碗的大小和形式，变化相当大。已发现的几件天目茶碗残件，用釉厚而发亮。已获得的大量彼此相类似的茶碗，形式上呈圆锥体，底小而圈足，属标准的宋瓷碗。有一些在色彩上极像天目碗，但釉质差。他们可能是为一般人所用的本地仿天目的贱价产品。另外一些器形相似的碗则釉色呈浅绿黄或黄绿，发光而且美观。几乎所有的这类碗底都是圈足，已测定的直径从26到37毫米不等。

第二类型的碗可称作饭碗，也可能供其他的用途。它们的底足较宽大，一般都为圈足。较小的碗可能是供吃饭时手拿的，而较大的碗则是放在桌上盛食物用的。这种碗，有的内部饰以黄色或绿色的花卉纹饰。

另一类型碗的内部，表面上紧密地粘有一层粗砂。这种碗可能是用来研磨药品或其他物品用的。译者注⑮

发现了很多擦碗或擦碟。它们的制法是：当坯底仍在柔软状态时，用一种尖形器在坯底上刺戳，让它留下若干行交错的锯齿形尖。人们可以向右或向左在这上面研磨东西（当器皿焙干后）。译者注⑯

“坛、罐” 在窑址中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坛和罐。有些是双柄，一边一个。其他则有四柄（或耳），或多柄（耳）罐。这些柄或耳，被按在近顶部的同一线位上，并平行于器身。还有一些柄或耳不是平行的，而是上下直立在器身上。它们大多数的釉色是黄或棕色。有些棕色坛上饰以黄条纹，而很多黄色坛上则饰以绿色花卉饰纹。

“盆” 收藏品中有几个大盆和不少的碎片。器身厚，内外

都上了黄釉。盆内饰以绿、棕色花卉图纹，有时绘以鱼纹，还有大型彩色牡丹和荷花。盆的厚度为6至14毫米。直径为245至332毫米。C/14977号盆的口部直径达462毫米。底部外直径为332毫米。高110毫米。

“瓶” 收藏品中的瓶很少。有一个顶部已残，釉色为纯白色。C/5283号瓶是1933年发掘时在“原位”发现的。很明显，它是一个本地产的深棕色天目瓶。器身有花卉饰纹。在上釉和烘烧之前，涂了一层黄色陶衣。

“砚台” 译者注⑩ 收藏品中有几个瓷砚台。通常前面有两个短足，使砚台向后面的基座作倾斜状。其中有一个残破而经修补过的砚，附有四足，看起来像一只蛙。

“酒壶” 收藏品中有两种酒壶，形如士兵所配带的水壶，有两个可通过带子或绳索的小耳。壶呈圆形，中腹边缘略厚。

“小像” 译者注⑪ 另一类不同的品种是一些小像，包括骑人的马、有人骑或无人骑的水牛、骑着儿童的狗、兔、猴，以及其他不明种属的狗或狐之类的动物等。

“纺锤球” 收集到相当多的纺锤球。4/5186号是发掘时在“原位”发现的。其他各件则收集自农民或军人，他们是从地下挖到的。

这类器物中有一型又粗又厚，无釉、中空、嘴部微开。有一种说法，这可能是一种炸弹类型的东西。译者注⑫

此外，还发现一些小陶管，有装饰而上釉的瓦以及一些用途不明的器物。

三、琉璃厂窑出土器物照片

下面是琉璃厂出土器物的照片，包括遗址本身出土器物和在华西大学校园中所发掘出的遗物。所有的标本现都保存在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中。

四、琉璃厂窑出土器物的插图和彩色绘图

下面是琉璃厂窑陶器的插图和绘图。有些图案没有绘出，因为它们可以在照片上清楚地看到。彩色绘图是由丁·柯琴夫人（Mrs. John Kitchen）和成都加拿大小学校长黄思礼先生（L. C. Walmsley）绘制的。原注① 插图1—45是圈足底饭碗的底部。插图中图案的大小，相当于碟子或支丁圈足内径的大小。插图46—47是上文提到的年号器。插图48—49是在发掘中“原位”所得到的“磁州窑”型碎片。插图50—56是碗及其碎片和碟的图案。插图57—59是唐宋时代常见的花卉卷云纹图案，一在无釉的碎片上；另两件出现于砖上。

五、结 论

琉璃厂窑较邛州窑为晚，其结果是他与唐代陶器的密切关系略少，而与宋代的关系较多。没有发现明代的釉。这一窑址显然是一个出产瓷器的地方，它的时代在北宋末，历经南宋，至少下延到元初，即大约从公元1100年至1300年间。琉璃厂窑陶器与邛州窑陶器之间，有着很重要的相似处。虽然邛州窑的陶器在某些方面比琉璃厂窑的精致些和艺术性强些，但琉璃厂窑陶器在宋代所生产的圈足等方面却有所改进。二者都有类似的中空灯（即省油灯。——译者）、厚碟子、双嘴壶、研磨钵、荷叶边装饰、匝钵、有齿圆形支钉、人及其他动物小像、单色瓷器、花卉纹饰和釉下的白色或淡黄色陶衣。好像这些相似性是由于生产年代大致接近的关系。但它们间的相异处还要更大些。琉璃厂窑所独有的是小底和精致的圈足碗、盆、碟、盘的大小和形状、带有饰纹底的小碗、圆而扁的水壶或酒壶、砚台以及白色、黄绿、浅绿黄釉。邛州窑所独有的是：有或无倾斜角的宽平底器皿，（有些在

邛州窑中也有，邛窑的小底碗有更多的特点。①厚或呈弧形的圈足、芥黄色或软调深绿釉、淡色瓷器上的深棕色点、淡蓝瓷上加深蓝或翠绿点、无釉器皿和覆以白色或淡黄色陶衣（琉璃厂窑也有，但很少见）、白或淡黄陶衣上加红或棕色花卉饰纹、狮纹图案、五足碗、平底碟、有或无柄的杯、小高脚碗、有或无釉带装饰边的小圆盒、飞天、以及釉上彩绘花卉图案的瓷器。我们大胆地猜测邛州窑的生产时期开始于晚唐，停止于北宋初，大约在公元850年到1000年间。至于更多的情况，我们必须等待考古的发掘和化学分析的结果。

证据似乎表明琉璃厂窑生产瓷器当在北宋初，经历南宋，下至元朝前半期，而它的停止生产陶器，则在典型的明代瓷器出现以前，或这些瓷器在四川使用之前。原注② 我们暂时把它的年代定在公元1100年至1300年间，并假定它也可能在更早一些时候开始和更晚一些时候还继续使用。

参 考 书 目

鲍塞尔博士 (Bosser, H. Th.) 《工艺美术史》

(Geschichte des Kunstgewerbe), 第三卷。

Verlag Ernst Wasmuch A.G. 柏林, Wien, Zurich。

大英博物馆《远东陶器和瓷器指南》(Guide to the Pottery and Porcelain of the Far East), 1924年。

蒲沙尔 (Eusbell, S. W. C. M.), 《中国美术史》(Chinese Arts), 卷2, 维多利亚—阿倍尔特博物馆手册。

《中国杂志》(China Journal), 卷34, 1937年1月
梅尔茨—保罗 (Maerz and Paul), 《色彩字典》(Dictionary of Color), 比尔图书公司,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Inc.)纽约。370 Seventh Avenue.
伦敦, 688 Bouverie Street E.C.4, 1930年。

哈卜生(Hobson, R.E.), 《中国美术品》(Chinesische Keramike), Verlag Ernst Wasmuth, A.G., 柏林, W.S.

施密特(Schmidt, Robert), 《中国陶器》(Chinesische Keramike), 法兰克福, am Main. Frankfurter Verlags-Anstalt A-G.

《勃雷德莱标准色度表》(Standard Color Chart for Elementary Color), Instruction Based on the Bradley Color Standards, 米尔顿勃雷德莱公司(Milton Bradley Company), Springfield, Mass., 1810.

《华阳县志》, 20册, 嘉庆丙子二十一年(公元1817年)刊。

《华阳县志》, 16册,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刊。

注 释:

原注①成都华西文学博物馆。

译者注① 按:《华阳县志》有关此段记载的原文如下:
“马家坡之南约二里曰祝王山。……屋宇参差, 仿佛城郭。向北之北, 即琉璃厂。明世官烧琉璃地也。”(《华阳县志·山水》卷2, 页4上。)

原注② 林名均先生在研究窑址方面曾提供了相当大的协助, 特别是在搜寻中国历史和翻译方面。

译者注② 葛氏此处所引是砖文的节要, 原文应为“嘉定十二年灵泉县烧造”, 十字分两行刻写。

原注③ 上述这些辞汇所指的是五星。译者注④ 或群星。

译者注③ “死者生平”或“死者事迹”(The deed of the deceased), 葛氏此处译述有误。The deed of the deceased, 葛氏意在以之翻译原文中的“故”字。按:“故”字在墓志或买地券中原为“已故”一辞之略语,通常直接冠于人名上,由“已故”动名词而变作形容词(定语),即“死去的”某某人之意。墓石中“故”下的人名,因年久脱落(原为墨书),所以看起来只剩了一个独立的“故”字。译作“死者生平”,非是。

译者注④ 按“五星”一词,容易使人误解为金、木、水、火、土星的“五星”(亦称“五曜”)。这里所指的应为方位神名。(五方,指东、西、南、北、中。)我国古代认为四方由“四灵”之神掌管,如《三辅黄图》所载:“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再加上中央勾陈,合为五方。

译者注⑤ 勾陈,同“钩陈”,星名。包括六星,在紫微垣内,最近北极星。据《星经》载:“勾陈六星,在五帝下,为后宫大帝正妃。又主天子六军将军。又主三公。”一般买地券中多以之指中央方位神名。

译者注⑥ 按:墓石现存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红砂石质,体积甚小。文极简略,自称“地券”。葛氏所译文字,颇有出入,其全文应为:

“大宋嘉定十四年太岁辛巳朔初五日□□□,故□□□□□□地券。生居城邑,死安宅兆,卜筮叶从,相地大吉。宜北华阳县□□乡,福地之原。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中勾陈。一如律令。”


刻文除人名、时间、地点外,其他均系预先刻就,字体风格一律。年月日期为后刻,较浅,与前者字体不同。文中“□”形符号所示为空白处。当时可能用墨笔书写,历年既久,脱落无余,遂至不可辨认。最后一句,因已无余地故改写为双行。

译者注⑦ 按:“隆兴”是宋孝宗的年号,前后共二年

(1163—1164年),当时四川归南宋中央政府管辖。葛氏以赵昀所用或以孝宗偏安,政治权力未及四川,因而否认隆兴为宋年号,均误。

译者注⑧ A.D.1110, 误。斯年为宋徽宗大观四年, 应为A.D.1111, 政和元年。

译者注⑨ 原文误为A.D.1189(宋孝宗淳熙十六年), 兹改正为A.D.1119(宣和元年)。

译者注⑩ 查A.D.1201年是宋宁宗嘉泰元年, 与“和”字样不合。

译者注⑪ 葛氏此处所说的“华东”, 意指福建的建窑。

译者注⑫ 戴谦和, 美国籍, 原成都华西大学数理系主任兼古物博物馆馆长。已逝世。

译者注⑬ C/5340 及以下这类号码, 为原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馆藏器物编号。

译者注⑭ 此条与上条同为C/13776, 可能为重号。

译者注⑮ 即省油灯, 或称省油盏、夹层盏。

译者注⑯ 上列两条, 亦可能为博物馆所编重号。

译者注⑰ 葛氏此处所说的碟形, 一般用“荷叶形”一词形容, 如“荷叶碗”、“荷叶盘”等。

译者注⑱ 这种碗, 通常称为“研钵”。

译者注⑲ 通常称为“蒜泥碟”。人们认为是磨蒜泥用的, 当然也可磨其他东西如药类等。

译者注⑳ 原文“*Ink stand*”直译为墨水瓶架。据文中所描写的情况, 这种前宽后窄, 前高后低的砚台, 俗呼“风字砚”。

译者注㉑ 这类产品, 体积很小, 原供儿童游戏或作摆设之用。标题改称“玩具”, 当更恰当些。

译者注㉒ 琉璃厂窑出土这类圆形小陶件有三类: 一是陶铃, 一般顶部都有把(或耳), 葛氏对此, 在插图已有描写, 显然非葛氏此处所述。二是纺锤, 一般有供绳系凹痕或小孔。三

是玩具。球面有虚或实线纹饰或另印着若干小圆圈。球多为实心。葛氏此段所说，可能是一种玩具。炸弹之说，似不足信。

原注④ 下列诸先生：J·柯琴夫人，黄思礼校长(L. C. Walmsley)，戴谦和教授(D. S. Dye)，林名均先生，对本文的准备工作，曾给以协助，笔者在此，谨致谢意。

〈原载《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Society)卷11, 1939年〉

11·13 1983译于四川大学博物馆

四川华阳县琉璃厂调查记

林坤雪执笔

距离成都约十里的华阳县胜利乡一村，从前一般人叫这地方为琉璃厂，是一个丘陵地带。西面是周家堰、杨家堰、石牛堰汇合成的一条小河，北面是通成都的公路。胜利乡的镇上就是琉璃厂窑的中心。以前，这里常有陶器出土，一般称为“琉璃厂窑”。解放前曾有帝国主义分子来此，向当地群众收买出土的陶器，因此老乡们经常在此挖掘，使古窑址遗存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1955年3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员在胜利乡清理明墓，发现有数十人在琉璃厂周围挖了十余个深坑，在坑内找釉，在胜利乡的茶坊酒店都有人谈论挖釉的事，因此引起清理小组的注意，便派了两位同志去了解调查。原来最初是农民邓复兴挖柏树时发现柏树下埋有大块绿釉，这些釉附近窑厂出售收买，每斤壹仟元（旧币），于是邓、朱、陈姓的农民都先后挖掘，在六、七天内就挖出绿釉七、八百斤，还挖出陶盆四个。四川文管会驻琉璃厂工作小组根据这个情况，与当地乡人民政府取得联系，劝止继续挖釉，同时对琉璃厂作了初步调查。

琉璃厂分布在地面上的碎陶片，面积约340亩，堆积层厚约1—3米。陶片和泥土混合形成二十一个大堆，突出在地平面，老乡们称为窑包。在地平面和陶片堆的上层分布着重重叠叠不同的窑具和各种陶器碎片。器物的标本，就胎色来看，可分两种：

1. 红色胎：以双耳瓶、小口罐、环耳瓶、盂、盆、碟等为

最多，上面涂姜黄釉或赭色釉。

2. 紫色胎：器形有荷叶盏、磨姜盏、高脚杯、鸭嘴壶、长嘴壶、四耳罐、盏等为最多。另有不成器形的陶片，上刻有鳞纹、涡纹、枝叶纹等。这些器物涂半节乳白釉或黄釉。

其它还有窑具支钉、支柱很多，还有骑狗小人、作爬行状的小人、马铃、小罐等玩具及圆瓦当、尖瓦当、残俑头等器物。

向当地群众进行访问时，征集到从琉璃厂窑包中出土的陶器九件：

1. 盆五件，大的高14厘米，口径47厘米，小的高12厘米，口径47厘米，红色胎，涂半节姜黄釉及黄釉，有的盆内画有绿色的双鱼花纹或牡丹。

2. 壶一件，高16厘米，口径6厘米，红色胎，涂半节黄釉。

3. 罐一个，似橄榄形，高33厘米，口径7厘米，红色胎。

4. 碗二个，高5厘米，口径16厘米，红色胎，胎厚约2.5厘米。

有关琉璃厂窑址和陶器的文献记载较少，又没有正式的开掘过，其创始和衰落年代不明。但1955年1月，在成都外西廛祖庙清理了一座明嘉靖二十一年太监丁祥的墓，据墓志铭说：

“……为至正德初，侍于今上，尤重其能，屡命于琉璃厂董督陶冶，建诸瓴甃。自是工不告劳，事多就绪，上下咸得其欢心……”。可见在明代，这个地方还是统治者烧窑的地方。

据群众传说：琉璃厂在极盛时期，有窑九十九座。从这次出土大量的釉、盆，及附近居民经常从地下挖掘出壶、盆、碗等日常生活用具来看，可以推想，琉璃厂原来的规模一定是很庞大，今天地面下也一定蕴藏着不少文化遗产的。要系统的了解琉璃厂窑址的结构情况、制陶的技术和生产发展过程，有待今后的细致勘查与发掘研究。

（傅汉良、袁明森、林坤雪）

（原载《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9期）

成都胜利公社琉璃厂古窑

丁祖春

琉璃场古窑在成都市东门外十华里的胜利公社，从前一般称这个地方为琉璃厂，是浅丘地带，西面紧靠周家堰、杨家堰、石牛堰汇合成一条小河，北面与铁路相距不远，南面可望祝王山，东西是连绵不断的浅丘。成都至仁寿的公路从北到南正穿窑区。民国初年这里是一片坟地。随着修路和坟地的开垦，窑址露头，当地农民经常在地里挖出陶瓷器。帝国主义分子来此地高价收买，致使古窑遗存遭到严重破坏。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地下文物，曾先后多次进行调查，对琉璃厂古窑才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五十年代，散布在地面的陶瓷碎片和各种破窑具，面积达三百四十多亩，堆积层厚约1~3米，突出地表的窑包二十一堆。据当地农民反映，传说琉璃厂极盛时有窑九十九座。我们曾四次去该地调查。近年来由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发展，地貌变化很大，窑区基本上开辟成耕地，突出地表的窑包已难再见。但地面遗物处处皆是，仍能采集各式标本。现将我们收集的实物资料整理如次：

琉璃厂窑是古代成都附近一个很大的陶瓷手工场。特点是规模大、窑灶多、时间长、产品复杂。

一、窑具

琉璃厂窑所烧造的产品比较复杂，因而采用的辅助工具也根

据不同产品使用不同窑具。从遗物看大体上分以下几种：

1. 匣钵 一般用于烧造精细器物，这种产品未发现支钉痕，很可能是单件装烧。窑具可分三式，一为圆筒平底式，腰有小孔，口沿有半圆孔。二为尖底斜腹敞口式。三为漏斗式，底有小孔。目前我们尚未得到比较完整的实物，但此类匣钵残片到处可见。可以肯定那些精美产品是用匣钵烧制而成。

2. 支钉 分圆筒状齿足形和筒状齿足形两类，大小不等，大的直径可达二尺以上，小的仅一寸左右，一般是五至六个齿足，也有十二个齿足的。筒状形分三种，一直筒形，上下一样呈直筒状，有齿足；二椎体状，上小下大，上边有齿足；三是束腰形，上下大中间小，无齿足。

3. 垫圈 分圆状和筒状两种，均无齿足。

4. 垫柱 也分圆筒形和束腰形两种，圆筒形上面略小于下面，体厚重，密度大，一般比垫圈高得多。束腰形这种垫柱比较矮小，下大上小束腰，中有小孔，也有无孔的，呈纺锤形。有同志认为这种工具是修坯用的撞捶，我们分析为垫柱的可能性大，其理由是：（1）底部不平，有经多次焙烧粘结在上面的炭凝子和粘在垫板上的痕迹。（2）在堆积层中量多并与其他窑具碎片共存。如果是修坯用的工具，第一必须要平整光滑，数量也不会那样多，第二修坯是厂房内进行的，遗物当在作坊区，不应在窑区，更不可能与垫板粘连。因此，我们认为是一种垫柱。这种窑具为其他窑址所不见。

5. 垫板 分三式，一为玉璧形，二为圆板形，三为车轮形。

另外也有根据临时需要随手搓捏而成的泥条、泥饼之类。

二、器物分类

琉璃厂窑的器物品种相当多，有大有小，有粗有精，现根据

器物的用途分以下几类介绍：

1. 生活用具

碗分五式

甲、敞口、浅腹、圈足碗。这种碗为大宗，遗物特别多。在碗的外底内分别饰有花卉、图案、文字。花卉都很简单，一般画一朵花。符号图案也很简单，只在外底内画各种极为简单的符号或图案如十字井字之类、菱形、五角星之类。文字有“王”“九”“吉”“利”“五”“旺”“吴”等，这可能是商标记号。还有记有工匠姓氏的如“王造”“窦造”“范造”“苟造”之类，这也有可能是作坊老板标记。一般为凸形，系范印在胚胎上的。这些产品制作比较粗糙，红胎，施半釉，差不多都集中在窑区的西南角，这很可能是当时一般民间所用的商品生产。

乙、直口、深腹、圈足碗，这种碗口沿较厚，制作精细，胎骨细腻，釉色光滑，一般施釉到底，也有不到底的。数量较少，内底无支烧痕，是琉璃厂窑的精器之一。

丙、敞口、玉璧底或浅足圈、斜直腹碗。这类碗一般都有花纹装饰，大都是简单的花纹或弦纹，有内外都画，也有只画一面的。还有在内面由底到口画四条或六条直线，用与釉色不同的釉料画出，一般为白色，作为装饰。这种装饰在盘碟中也有。

丁、敞口、小平足，弧线壁小碗。这类小碗胎薄而细，内底和口沿均有弦纹一周。胎有红色、紫红色、赭色、褐色、黄色等。釉有褐色、棕色、深绿、绿色、黄色、姜黄、米黄等，多施半釉，少数满釉，平底无釉。这是该地最好的产品。

戊、喇叭口、斜直壁、小平足碗。这种类型的碗较少，解放前发现过，这次调查中我们没有找到。

盘类很多，解放前发现过一种花瓣口式盘。

杯分二式，直口、深腹四耳杯和翻口深腹杯。

盏类特多，分二式，平足，厚沿盏和磨姜蒜的带刺盏。

罐分四式：

- (1) 直口、圆腹、平底罐、施半釉。
- (2) 带流和无流单耳罐。
- (3) 小口、鼓腹、直口、长腹、双耳罐。
- (4) 直口、鼓腹、四系或六系罐。

壶的种类特多，可分八式：

- (1) 直口、圆肩、鼓腹、三耳、短流壶。
- (2) 盘口、长颈、长流、扁系壶。
- (3) 直口、长颈、长流、扁系壶。
- (4) 敛口、圆肩、长流、平底、扁系壶。
- (5) 大直口、长腹、长颈、长流、扁系壶。
- (6) 盘口、短颈、双系壶。
- (7) 盘口、长颈、四系壶。
- (8) 小盘口、双系扁壶。

壶的种类实际还不止此，这里要说明的是有两种比较特殊的类型，一种是碗式口长颈四系壶，这类器物的颈特别长，占整个器物的三分之一，器身瘦长、底平小、肩部有对称四横系；另一种是小盘口，短颈、圆肩、鼓腹，小底、四系、肩部两系腹部两系相对称，均横圆系，施半釉，肩部饰花纹。这两种器物为琉璃厂窑的特殊类型，也是它的特点之一。

盆 琉璃厂窑所产大盆装饰比较繁缛，装饰纹样有两种，一种是盆中心画花，周围装饰图案，另一种是盆心画双鱼，周围装饰水草。器物一般都较大，直径有二尺以上者。

瓶 可分二式，一为敞口、长颈、鼓腹；二为直口、长颈、鼓腹、高圈足。

钵 乳钵。敛口，底部以下内收，小平底。

水匣 直口，平底，口沿有流，把中空。

炉 可分三式：一种是直口、折唇外翻宽口沿，直腹平底，五足炉，有长足、短足之分。另一种是圆盘足。再一种是五齿支钉式接于炉足上，以圆圈着地，足呈圈形。

另外在解放前还发现过一种敞口、宽沿、斜直腹、双方耳、三足炉。

缸 琉璃厂烧造的大缸也不少，从残片来看，这种大缸高达一公尺以上，是民间盛水用的。

2. 玩具类

琉璃厂窑所烧造的小玩具较多，有骑狗小人，骑马小人，作爬形状小人以及其他各种动物形象。均系瓷工们用手捏制而成，小巧玲珑，生动形象，颇具匠心。

3. 明器类

琉璃厂窑还是烧制明器的地方，以宋三彩和明绿釉瓷俑为著。曾在开宝二年（北宋初年）和嘉定十四年（南宋中期）墓志铭的墓中发现有琉璃厂制作的三彩陶俑，在其他宋墓中也有发现。至于明代差不多在太监墓中所出的兰釉和绿釉瓷俑都是琉璃厂的产品。

4. 建筑构件类

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主要是明代琉璃瓦、板瓦、筒瓦和兽头之类的装饰构件。发现有以龙纹为饰的琉璃瓦当。这就印证了我们于1955年在瘟祖庙发掘的明嘉靖二十一年太监丁祥墓，墓志所记“正德初……屡命于琉璃厂董督陶冶”的事实。可见在明正德时，琉璃厂是为蜀王府烧制瓴甃的官办窑场。当时蜀王府、蜀王陵所需建材，均由琉璃厂烧制。

三、制作和烧造技术

琉璃厂的成型方法，大体上不外乎我国传统技术的三种方法。但琉璃厂的小件碗制作相当精细，挖足技术也相当高，圈足显得特别规整，在足底部印有工人姓氏或花纹符号图案等。大件器物的轮制加工也很突出。特别是各种明器的制作，显然要用模范和雕塑相结合才能造出比较复杂的俑类。烧造技术方面，多采用大套小的办法。一般粗器不用匣钵，用垫板或垫柱搁在窑室内，

然后依次由大到小，用支钉间隔，也有用沙粒或沙粒与支钉相间使用，向上重叠。所以，釉面窑烟污染很重，而且每个碗底部都有五至六个疤点或沙痕。比较精小的碗，釉面光洁，内无疤痕。我们考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采用较先进的技术一匣一器烧成；另一种是套装在较大的器物内。所以才有比较良好的效果，其燃料是用木柴。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在窑区地面拾到一片白瓷火标瓷片，是用碗坯残片做成，瓷片光洁，孔内施满釉，瓷化程度很高。质地釉色同本地瓷片都不相同，却与我们在彭县磁峰窑所得火标瓷片全完一样，显然系磁峰窑的东西。火标瓷片是古代窑工们烧窑时用来观察火焰、掌握火候的工具。在古代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如何掌握窑内的温度，主要凭经验和肉眼观察，为了集中视线，聪明智慧的窑工们自制了火标瓷片，用于生产实践。

这片白瓷火标反映了古代的技术交流。古代虽然是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但生产技术的交流还是比较普遍的，川西地区古代几个窑场生产工具和产品的大同小异可证。琉璃厂窑出现非本地制作的火标瓷片，很可能是其他地方来的，而且还可能是彭县磁峰窑的。另外使用沙粒代替支钉，减少碗底内釉面的损伤，这种方法也可能是磁峰窑传来的。可见古代技术方面的交流确实是存在的。

四、彩釉和装饰方法

琉璃厂窑的釉色品种较多，分单色釉和多色釉两类。单色釉基本上是青、黄、赭三色的变化。青色有青白色、粉青、虾青等，黄色有米黄、橘皮黄，赭色有棕色、酱色等。多色釉为绿、黄、褐三色相配，显出似三彩的效果。这些色彩都有浓淡的区别。

装饰方法主要是画花，也有划花填彩的，如先用竹竿一类工

具在坯胎上划莲瓣或缠枝花卉，然后再填以色釉。画花多施于盘、盂、盆的里面，划花多施于碗的外部。大盆的装饰较复杂，盆心有画双鱼水藻纹的，有画花卉周围配图案的。有的自然显出红褐色的斑团，增加了艺术效果。

有的在瓶、罐、壶的颈部或腰部，在胎体上交叉成平行划上四、五条等距离平行直线，再填以白色釉料，烧成后出现非常显目的白色线条。这种装饰为琉璃厂窑所独具。

绿、黄色的琉璃釉，继宋以后在明代琉璃厂窑特别盛行。当时蜀王府、蜀王陵、宗庙、寺观所需建材和各种明器，大多数在琉璃厂烧造。琉璃厂这个名称至少在明正德以前就以烧制琉璃釉器而得名了。目前在遗物堆积层中，还可见到黄、绿琉璃釉的筒瓦、板瓦、尖圆瓦当和兽头残片。琉璃釉是琉璃厂窑区别于其他窑址的标志之一，也是它的特点。

五、琉璃厂窑的烧造时代

据遗址中所出各种器物残片和成都地区墓葬出土实物料比较，它的上限在唐、五代，下限在明末，这种判断可能不致大误。从整个窑址的遗物看，唐、五代的遗物不多，最多的是两宋时代，而且发现过有嘉定、隆兴等年号记载的残片。成都市郊的不少宋墓中，常出土直口平底四系罐，口沿至腹部涂有白色化装土，通高为20~40厘米。大口平底双耳罐，腹部有直线花纹，高20、口径6厘米。四足炉，兽头蹄足，口沿外翻，上刻有“辛未绍兴岁造”一句立格文，通高14、直径19、边宽8.5厘米。龙系提梁罐、小口双耳鼓腹平底罐等，都是琉璃厂窑的产品。因此，我们认为琉璃厂窑应始于唐，盛于宋，衰于明末。

附录：解放前华西大学教授高毓灵对琉璃厂窑瓷片和硬度的化学分析以参鉴。（抄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193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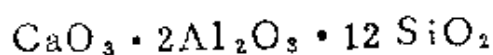
1 1 期)

关于玻璃厂窑釉色化学分析

1. 硬的白釉瓷片

SiO ₂	64.90
CaO	5.01
Al ₂ O ₃	30.00
合 计	99.91

分子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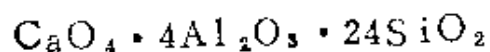


硅酸铝 0.30

2. 很软的白色釉

SiO ₂	67.60
CaO	2.52
Al ₂ O ₃	30.76
MgO	trace
合 计	100.86

分子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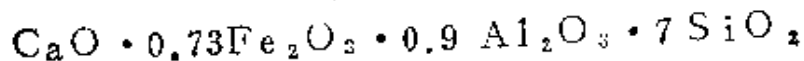


硅酸铝 0.18

3. 棕褐色釉

SiO ₂	64.65
Fe ₂ O ₃	12.28
Al ₂ O ₃	14.28
CaO	8.78
合计	99.97

分子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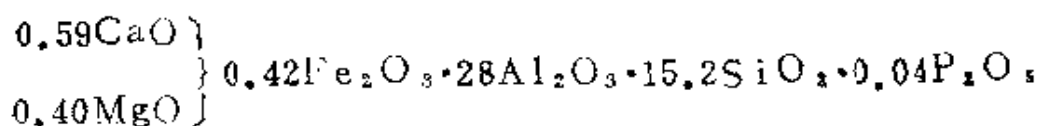


硅酸铝 0.13

4. 黑色或红色“建窑”

SiO ₂	70.10
Fe ₂ O ₃	10.40
CaO	7.78
Al ₂ O ₃	6.33
P ₂ O ₅	1.38
MgO	3.16
合 计	99.60

分子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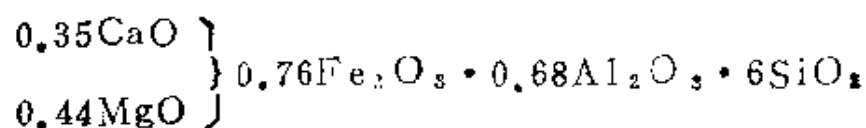


硅酸铝 0.05

5. 本地粗糙的“建窑”暗红棕色釉

SiO ₂	65.20
Fe ₂ O ₃	14.20
MgO	3.00
Al ₂ O ₃	12.00
CaO	5.39
合 计	99.89

分子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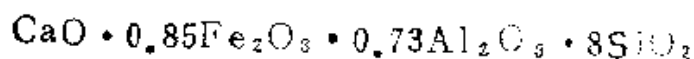
硅酸铝 0.12

6. 黄绿釉

SiO ₂	65.50
Al ₂ O ₃	12.79
Fe ₂ O ₃	15.96
CaO	9.50

合 计 100.93

分子式



硅酸铝 0.09

7、暗褐色釉

SiO_2 66.10

Al_2O_3 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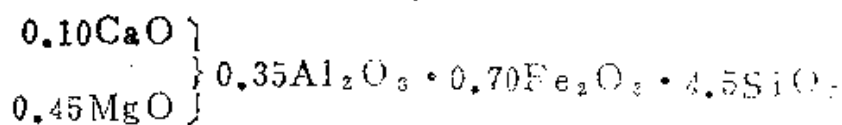
MgO 1.40

Fe_2O_3 18.90

CaO 1.47

合 计 99.67

分子式



硅酸铝 0.09

硬 度

红胎白色装饰土 6.5度

石胎定窑器 7—度

棕色、褐色“建窑”茶碗 6.5度

褐色碗 6 度

浅褐色碗 7—度

褐色瓷有黄条纹 7 度

“磁州窑陶片” 7 度

黄色盘 6.5度

黄色Slip 3 度

灰色碗 7—度或6.5度

绿色釉 6.5度

(原载《四川陶瓷史资料》第1辑1979年)

成都琉璃厂古窑

陈德富

今成都市胜利公社所在地琉璃场（古属华阳县）附近，曾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古代窑场。这里从五代至明朝的七百多年间，大量烧造青瓷器、陶器，特别是那五彩缤纷、光亮耀眼的琉璃釉陶器，更是独具特色，名扬四方。久而久之。这里也就因此而被称为“琉璃厂（场）”了。

有关琉璃厂窑的文献记载较少。半世纪以来，在琉璃场附近和成都四周，与古琉璃厂窑有关的地下出土物不少，使我们能根据丰富的出土文物，窥见古老的琉璃厂窑的历史概貌。这里，三国时期就能造制砖瓦。^① 大约从五代前后蜀时（十世纪）开始烧造青瓷器，^② 历经宋、元直至明代。其间，以南宋时期最为兴盛，能烧制釉色精美、纹饰华丽、造型特别的陶瓷器，诸如碗、盘、壶、缸、杯、盆、盏、碟，各类陶俑，各式砖瓦、以及形象生动逼真陶瓷玩具。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琉璃厂窑也烧制各式省油灯。唐代邛窑首创的这种著名产品，大约很受欢迎，生命力很强，南宋时期的琉璃厂窑仍在继续仿造。明代，这一带仍然烟火很盛。据民国二十二年版《华阳县志》卷二记载：“琉璃厂，明世官烧琉璃地也。”这一时期，这里有官办窑厂，明朝政府专门派有官员驻在这里，监督为皇室官府烧制琉璃器。^③ 直到解放初，琉璃厂窑遗址范围还留存约三百四十亩地，历代陶瓷残件、窑具堆积而成的大小“窑包”二十一个。^④ 这丰富的遗迹遗物，是琉璃厂窑悠久历史的见证，是人们认识和研究这座窑场的宝贵资料。

一九三六年，一批外国人在琉璃厂窑址挖出了大批青瓷器、陶器、窑具、琉璃釉陶俑。根据这批出土文物，当时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馆长，美国人葛维汉（D·C·Graham）写成论文《琉璃厂窑》，在英文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1939年号上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很大重视，琉璃厂窑也就从此名扬海外。后来，这些外国人还打算在这一带地方进一步挖掘，遭到广大爱国群众的强烈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有关方面也就不敢贸然同意，此计才未得逞。

1955年，文物工作者在这里进行过一次调查，收集到一些文物，希望有机会进一步进行科学发掘，以便能系统地了解琉璃厂窑的历史及窑炉构造，以及生产工艺的发展过程。但由于一些单位在这古窑址上大兴土木，这个曾盛极一时、规模庞大的古代窑场，逐渐湮灭。近年来，在成都地区，还不断有琉璃厂窑的精美产品出土。1981年12月，在成都市太平横街42号，发现一座南宋绍定元年（1228年）蒋文华墓，墓中随葬的施漂亮琉璃釉的陶武士俑、文官俑、陶狗，以及施黄褐釉的陶壶、陶坛、陶碗等，经古陶瓷科学工作者考定，就是琉璃厂窑的产品。今年三月，市建十三公司在太平横街施工中，又发现几批琉璃厂窑烧制的琉璃釉陶器。这众多的地下出土文物，向我们展现了古琉璃厂窑的兴盛面貌，为我们研究几百年间成都的历史，尤其是手工业经济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而古老的琉璃厂窑，犹如一颗璀灿的明珠，给成都这座历史名城，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注 释：

①杨肃谷：《四川陶瓷概论》，《华西文物》创刊号

②冯光铭等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③④均见林坤雪等：《四川华阳县琉璃厂调查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九期

四川彭县金城窑白瓷

魏 达 议

解放前后成都地区市面上出现一种被称为“唐大邑窑”的白瓷碗。解放后四川省博物馆也曾在彭县、崇庆、郫县、成都等县、市的工地上收集有这类白瓷的碗、盘、碟；在时代上，当时我们定它为宋代白瓷，其窑口不明。

唐代诗人杜甫居住在成都时，曾歌咏过当时四川大邑所烧制的白瓷碗，《杜少陵详注》卷九《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说：“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诗人所咏的大邑白瓷是否与这些不知窑口而又在成都地区内出土的白瓷有关？带着这一问题，笔者于一九七六年随同重庆市博物馆的两同志在成都附近的几个县作了一次实地调查，获得了一些资料。

遗憾地是我们在大邑县境内仍未发现古窑址，可是在远离大邑一百多里的彭县磁峰场确发现了白瓷古窑址。这个窑址在文献资料上从没有记载，而所出的白瓷又与传为“唐大邑窑”和我馆在成都地区所收集的该类白瓷器在形制、胎釉、花纹上都完全相同。因此，这个窑址的发现，就有值得研究的必要了。

一

一九五三年修官渠堰（即今人民渠）时，在彭县城北十里金山寺（现为小学）附近挖出白瓷碗一件，此碗现保存在彭县文化

馆。碗灰胎灰白釉，胎薄质坚，菱瓣敞口，敛腹圈足，扣之有声，内底有沙点痕，高9、口径22、圈足径8公分，碗外壁烧刻有铭文一圈，字迹粗劣，系用竹笔在上釉后随手刻写的，其铭文是“彭州金城乡窑户牟士良施埽堞壹料永充进盏供献佳用祈愿神明卫护合家安泰”三十三字，其中“进”为敬之误，“售”为寿之误。

从铭文我们知道这件碗是当时彭州金城乡的窑户施于某寺庙的敬盏，碗是在金山寺附近出土的，可能就是金山寺的敬盏供物，金山寺至今尚存。

碗称“彭州金城乡窑户”，金城乡之名不直接见于史册，《全唐文》卷183王勃《益州夫子庙碑》有“冰壶精鉴，遥清玉余之郊；霜镜悬明，下映金城之域。”的骈对句。句中的金城就是指彭州九陇县金城乡这片地域而言，故王勃又在《彭州九陇县龙怀寺碑》（《全唐文》卷185）中说“由是金城逆顺，山河假成器之因；玉烛浮沉，风火兆流形之藁。”这就直接说明彭州九陇县金城的具体所在州、县。以后《元一统志》卷五也说“金城山在彭州”，又说“金城即阳平化也。”金城山就在今彭县磁峰场南，《彭县志·山川志》说“阳平山亦名金城山，长七里，有阳平观，即古阳平化，西南支阜有金城寺”，又说“阳平观、……金城寺并在鹿坪里”，而磁峰场也是“在西乡鹿坪里”，此场南距县城六十里。由此“彭州金城乡窑户”就是彭县磁峰场窑户，而磁峰场一带从唐至元都称金城乡。

二

磁峰场据《彭县志》说“旧名冯街，镇在西乡鹿坪里，距县西北六十里，东南至隆丰场四十里，乾隆十六年设。”显然在清以前这里是没有场镇的，而乡亲传说“这里古代就有四十八座窑包”。所以此地瓷片和窑具堆积成山，设镇时取名叫磁峰，正是

如实地反映这种堆积成山的情况。

磁峰场四面环山，仅土溪河与小河相会的锐角狭长小台地，场就设在两河相会处，即建在古窑址上，现为磁峰公社，场口的南面狭长台地上遍地是瓷片、窑具的堆积层，有的形成小山，其长约二华里，宽约一百至三百公尺，这就是窑址所在地。现在社员的房屋有的就建在窑包上，堆积层也有为近年平整土地时所翻动，因此窑址露头的断面就不多见，但瓷片随地皆是。我们调查时在这里找到一处断面的堆积层，从断面看，其堆积是成层的，在堆积层中有各式各样的碎白瓷片和少量的白瓷器，以及零星的青花瓷片，也杂有大小不同的窑具，我们就在这个断面上和田地中采集了一些标本，同时也访问了当地的社员同志。现将在这个窑址上采集的器物分述如下：

一、陶器：

白衣陶执壶一件，直口束颈，圆腹平底，前有嘴后有把，嘴在腹中开口，惜上部已残，从断面看，嘴口与直口成一平面，红胎，底部以上着白衣，高17.5，口径6.5，底径6.6公分。

白衣小陶罐两件，一件为双横耳，耳残缺，小反口，鼓腹平调，灰胎，腹以上着白衣，高5.3，口径3，底径4公分。一件为小反口，鼓腹平底，灰褐胎，腹以上着白衣，高6.5，口径4.2，底径4公分。

二、白瓷器：

器形多不完整，或仅存残片，其中有碗、盘、杯、碟和瓶等。

碗的大小不一，都是敞口，敛腹，圈足，有的菱瓣形，有的内底有釉下“双鱼水草”暗纹，一般高6.8，口径17.5，圈足径7公分。但圈足的深浅不一，最深2.5，最浅0.3公分，甚至有的仅具圈足形，显然这是由平底和玉璧底发展而来的。

盘的大小和深浅不一，平底或圈足底，有的腰内折，一般高3，口径1.5，底径6.3公分。

杯一件，已残，菊瓣边敞口，腹微收，圈足，高5.5，口

径10.5，底径4公分。

碟的大小和深浅基本相同，一般高1.5，口径9，平底径4.5公分。

胆式瓶一件，圆口，胆腹，圈足，腰中有弦纹一道，高13，口径5.5，圈足径6.5公分。

这些白瓷器的胎骨有红胎、褐胎、灰胎和白胎不等，釉色为灰白色或乳白色，也有器内为灰白釉，器外为赭色釉，这是极少数。这些器物都是质坚而又轻薄，扣之有声，圈足厚重，一般均厚0.5公分。



三、陶 范：

陶碗范一件，灰细泥陶，底已残，残高7.5，外径19.5，内径14，厚5.5公分，为一范兼有内外模，此范内模无花纹，外模为“牡丹”浅阴纹纹饰。使用时是将碗的胎坯的内壁置于范的外模，轻轻拍打碗坯，陶范外模上的花纹就印在碗的内壁上；再把另一范的内模套在此拍打后的碗坯外壁上，轻轻旋转此范，碗坯外壁的拍打痕即被抹去，如此重复若干个后取出碗坯上釉，这样烧制出来的碗，碗内就有釉下“牡丹”花卉纹饰。四川省博物馆收集的这类白瓷碗中，碗内还有“双凤花卉”、“双鱼”、“莲瓣”、“菊瓣”、“凤葵荷”、“双凤荷花”等等纹饰。

四、铜、铁钱：

社员们说：两年前一小队社员王新治在修房屋平屋基时发现窖藏铁钱和铜钱串在一起，惜已分散，我们仅收到铜钱两个，铁钱三个。

铜钱两个，均为旋读“崇宁通宝”，崇宁即北宋徽宗年号。

铁钱三个，一个为对读“政和通宝”，政和亦为北宋徽宗年号。一个为旋读“绍熙元宝”，背文“七四”，绍熙为南宋光宗年号，其背文为纪值，即折三钱，是三的变体字，七四为纪钱范次第，即此钱为第四十七范所铸。一个为旋读“嘉泰元宝”

嘉泰即南宋宁宗年号。

五、窑具：

匣钵，窑址上遍地皆是碎匣钵，大小不一，形式相同，随着所要装烧的瓷坯大小而变化，我们带回三个，大的高18，口径21.5，平底径8公分。陶质灰黑，质坚且厚重，系耐火陶土烧成，圆口直腹，腹外满布弦纹，釜形平底，圆口上有半圆缺口一个，腹下有小孔四至六个，这是便于在窑内温度增高以排除空气避免器物破裂，也可使火路更加畅通。这是一种装烧多件器物的匣钵。另外还有一种装烧单件器物的匣钵，估计可能是用来装烧较精致的器物。此种匣钵比前种小得多，但也有大小之分，数量上也较前种为少，敞口斜腹平底，腹外亦有弦纹，陶质灰或红，比前种轻而且薄。

垫饼，圆形，大小不一，陶质灰黑，多残存其中的一段，是用来在窑内垫于较大的碗、瓶、罐等器物的底部，或隔离匣钵，或使匣钵之间互相靠紧，以防倒窑的情况发生，所以有的垫饼被打成了几段。

垫丸，是随手将瓷土捏成像碗豆大小的丸子，瓷质灰白色，多用来垫于小型器物的器底。

垫圈，是随手将耐火泥随着瓷坯底部的大小而捏成圆圈形的，陶质灰或红色，多用来垫于小型器底。

在堆积层中，我们发现有的垫圈粘接在碗的内底上和匣钵外底粘接在碗的内壁上；也有碗、盆的内底或圈足、平底上粘接有垫丸等情况，这都使我们知道匣钵、垫圈、垫丸在金城窑烧造白瓷器中的使用方法，即垫圈、垫丸置于器底，重叠地放在匣钵内，匣钵上再叠装有器物的匣钵的叠烧法。

又从烧成的器物内底上都留有一圈若明若暗的沙点痕或垫丸痕，可知在装叠时先将垫圈或垫丸沾上耐火沙然后置于器物的底部，其上再叠器物的，从而使烧成器物的内底多留有成圆圈形的沙点痕或垫丸痕。这是金城窑的特点也是缺陷。

六、窑 砖：

窑址上的窑砖并不多见，露头的可能早已被人们取走作为其他之用了，我们仅找到一块完整的窑砖，系陶土烧成，暗红色，长方形，长26，宽19.5，厚6.2公分。

三

彭县磁峰场这一带地方，在唐、宋、元时称为金城乡，已如前论，所以磁峰场窑址所出的白瓷，我们定它为金城窑白瓷，这不只可以与彭窑、彭城窑相区别，^①更重要的是可以确指其地点，以免和其他在唐、宋时的彭州属地原崇宁县铁砧山窑址相混，^②又可避免与今设在彭县关口的东方瓷厂所产的称为彭县瓷的白瓷相题并论。因而磁峰场窑址定名为金城窑，既是唐、宋时的名称，又可确指其地点，亦可显示其出产白瓷的特征。

白衣陶执壶在成都地区内的五代、宋墓中都有出土，洪剑民在《略谈成都近郊五代至南宋的墓葬形制》^③一文中说：“执壶多出于五代至北宋墓中，南宋墓中则少见，可能是以小酒瓶来代替了。”而金城窑址所出的白衣陶执壶则与新凡崇义乡夏家桥宋代遗址所出土的白衣陶执壶完全相似。该遗址出土的“陶酒壶2件，高18，口径6.3厘米，口腰涂淡黄色釉。”^④那件陶酒壶现存四川省博物馆，卡片上注明此“壶嘴配补复原”，文中说是“口腰涂淡黄色釉”，而实物确是灰白色釉的白衣。此件执壶与金城窑白衣陶执壶完全相似。

白衣陶双横耳罐，解放后仅在宋墓中才有出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清理官渠堰宋墓中的双耳陶罐Ⅱ式1件，其“胎红色，口缘至腹涂白色陶衣”，^⑤就与金城窑的白衣横双耳陶罐相同。虽然在唐和五代墓中也有白衣双耳陶罐出土，^⑥但其耳为竖耳不是横耳，且器形厚重，不能以此为据。

解放前在成都流传的“唐大邑窑”白瓷碗和解放后四川省

博物馆所收集的这类白瓷器，遗憾地在四川境内至今还没有在确有时代可考的墓葬或遗址中发现，因此我们只能从以下几点来判断金城窑的时代。

白衣陶执壶和白衣双横耳陶罐确是在成都地区的宋墓中已有出土；铜钱铁钱是为宋代所铸；附近的原崇宁县铁砧山窑址出土一种“中为瓷胎，外为白釉”的瓷器被“认为是五代至宋时物”。⑦ 崇庆县江源乡大庙的古江源城遗址试掘的两条探沟中第二层发现“白胎素白瓷片及白胎印花瓷片”。第三层里“没有发现白胎印花的白瓷片，在较少的素白瓷片中，有白胎的，也有红胎的”，因有两宋钱币在此地层中出现，故断定“这个地层不会早过两宋时代”。⑧ 江源古城遗址出土的白瓷与金城窑白瓷在胎骨、釉色、花纹、造型上完全相同。因此我们认为彭县磁峰金城窑所产的瓷，其时代应属于宋代。那种喇叭口斜直壁小平底碗可能早到北宋，其他均为南宋。至于少量青花瓷的出现，可能晚延至元代。

金城窑白瓷有一些特点：一、胎骨有红、褐、灰、白四种，红胎较早，白胎较晚。二、釉色以灰釉较早，灰白次之，赭色再次，乳白釉较晚。三、圈足依次由浅变深，由厚变薄，且都厚重平整而略向内径倾斜。四、胎薄且轻，扣之有铿锵之声。五、胎上多全着有一层护胎的白衣，然后再上白釉，釉有的及底，有的不及底。六、器物内底多遗留有沙点痕。

金城窑白瓷产品与唐代诗人杜甫所咏的大邑白瓷碗的特点，即“轻且坚”，“扣如哀玉”其白“胜积雪”，等都完全相同。因此我们认为金城窑白瓷技术可能是继承大邑窑白瓷技术而有所发展的。

最后提出一个设想，杜甫所咏的大邑窑白瓷产地，是否有如定窑白瓷不产在定县而是产在曲阳县一样的情况。⑨ 如果这个设想能够成立，我们今后就应在大邑和大邑县附近的几个县作更广泛更深入细致地调查工作，问题总是会得到解决的。

一九七六年六月八日于四川省博物馆

注 释：

- ① 江西省轻工业厅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中国的瓷器》121页，“据说元代有个叫彭君宝的，在霍州仿造定器，仿古定折腰制者甚工，名为‘新定’，也称霍窑或彭窑。又该所《景德镇陶瓷史稿》72页也有同样的记载。吕伯攸《祖国的陶瓷器》22页，“清代瓷器……河南的彭城、汝宁、宜阳、登封等窑。”
- ②⑦ 支沅洪《四川崇宁县铁砧山的古窑址》，《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3期。
- ③ 《考古》1959年1期。
- ④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东山灌溉渠宋代遗址及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8期。
- ⑤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官渠塘唐、宋、明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5期。
- ⑥ 唐墓见注⑤。
五代墓见四川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四川彭山后蜀宋琳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5期。
- ⑧ 徐鹏章《川西古代瓷器调查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2期。
- ⑨ 江西省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景德镇陶瓷史稿》71页，“定窑是以白著称，它是继邢窑而起的。定窑地点在河北曲阳县（距定县四十里，唐名恒阳，原属定州）”。

（原载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资料》1978年第1期）

四川彭县磁峰宋代白瓷窑址试掘

冯德安 丁祖春

彭县磁峰宋瓷窑址是1976年3月，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共同组成联合调查小组，对省内古窑址进行普查时发现的。1977年元月，四川省陶瓷史编写小组派陈丽琼、张俊、魏达谔等同志进行试掘。在当地党委的重视和领导下，在县文化馆和当地贫下中农的大力支持下，顺利完成这次试掘工作。在工作中县文化馆派出了照像和绘图人员，给我们配合。他们不畏严寒，顶风踏雪，一至战斗到最后。省博物馆的有关领导也亲临现场指导，使试掘工作取得较满意的收获。试掘工作从元月十一日开始，二月四日结束，历时二十三天。下面是这次试掘的主要收获。

窑址的位置及范围

磁峰古瓷窑位于彭县西北角山地的磁峰公社附近，距县城有30公里。西与灌县接壤，有公路通灌县。窑址面积较大，从现在的磁峰小学到高龙门一带，东西长约两公里，南北宽三百至四百米。背面环山，前面是土溪河与小河相汇的三角地带，窑址就密布在公路两旁和公社附近。破坏比较严重，文化堆积层多被扰乱，基本上开成了耕地。但从小河边和靠山边公路旁的断面来看，窑具、煤渣和破瓷片的堆积层是相当厚的。河边上堆积有两米左右，公路边的堆积层可达4米以上。据当地社员反映，这一片地全是破瓷片，根本无法耕种，现在的这一片梯田都是他们从

别的地方挑土来填的，不能深挖，下面没有泥土。这些田都是漏水的，每年都是用机器抽水保苗。他们在耕地或在屋前后挖沟都经常挖到完整的瓷器。还传说早年这里的瓷窑很多，最盛时有九十多座，现在公社房子下面都是窑址，可见当时这里的瓷业盛况。

这次试掘开了五个探方，共挖一百六十平方米。编号为T₁至T₅。T₁、T₃、T₅是废品堆积层，T₂是窑灶，T₄是作坊。

窑址结构和作坊

试掘的T₂探方，是残存的窑灶遗迹。窑的顶部全塌毁，形态不明。窑的底部基本保存完好，其平面呈马蹄形，与陕西铜川立地坡窑相似。① 窑的周壁和烟囱均用长28、宽18、厚0.7厘米长方形砖砌成。窑壁整齐，附有一层烧结的深褐色黏土。方向是座北向南。其结构分窑门、火膛、窑床、烟囱四部分。

窑门——上顶倒塌，原貌不明，残高182厘米，门前宽52、后宽72厘米。内部顺着门的方向，有三排两个重叠的匣钵，上面压着三层整齐有序的砖块，高80厘米。门外两侧堆放着长短不等的石条。

火膛——呈半月形，略小于窑床，东西长520、南北宽216厘米。火膛底部低于窑床160厘米。膛底有四至五行东西排列8—18个倒扣匣钵。未发现炉桥，倒扣匣钵，可能是起炉桥的作用。膛坑内填满了炭渣和炭凝子，粘结坚硬，用钢钎才能取出。在离膛底40厘米左右，则是不粘结的黑炭渣，这说明是用煤炭作燃料的。

窑床——南接火膛，北与烟道相连，东西长528、南北宽230厘米。顶部和墙均破坏无存，仅存底部一层耐火泥，厚20厘米，褐红色，坚如砂石。再下为红烧土，厚40厘米。

烟囱——位于窑床的东壁，呈并排的两方形，东西长160、南北宽170厘米，残高36厘米。两烟道之间的隔墙厚100厘米。烟道与窑床之间的隔墙厚20厘米，由于破坏严重，未见有烟孔痕迹。

窑内堆积分两层，第一层农耕地，灰褐色，厚20厘米，含有少量瓷片。第二层为窑址废弃后的残砖块、炭渣，厚20—200厘米。窑址烟道右侧3公尺处，清理出残存断壁一小段，形态不明。出土有少量瓷片，釉色洁白，有刻牡丹花纹的直壁罐形器一片，范印纹碗瓷片。在窑的东南侧15公尺处，曾出土圆形拉坯用的石辘轳一个，很可能是作坊。在窑门东边30米处，曾出土有粘结成饼的宋代铁钱和少量铜钱，其中有北宋的崇宁通宝、政和通宝，南宋的绍兴元宝、嘉泰元宝等。

作坊的位置在窑东北边约100米左右。东边是机械提灌站挖的一条水沟，将作坊东西挖断，仅存西面一部分。堆积可分四层：

第一层是灰黄色板土，上面长满了杂草，厚20—30厘米，

第二层是灰土，厚6—12厘米；

第三层是瓦渣、瓷片、废匣钵堆积，厚18—20厘米；

第四层为黄色生土，无瓷片。南北残长7.30米，东西残宽4米以上。木构建筑，残存西壁与北壁一隅。西边有上圆下方石柱础四个、间以石条相砌，可能是墙基。在北壁东边有直径34.5厘米的石磨上扇一个，可能是釉料加工用。磨齿的局部有磨刀痕，可能是作坊倒闭后，有人利用过。另在西北角上有外方内圆长47、宽45厘米的石臼一个，可能是捣石英砂粒用。在此附近还有大型灰缸残片。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坊遗址中出土有唐代陶残片。

出 土 器 物

出土遗物中有瓷器、窑具、生产工具和铜、铁钱币，其中以瓷片为主。能复原成型的器物有碗、碟、盘、瓶、钵、杯、盒、罐等，碗、盘最多，瓶、盒、钵次之，其他更少。

所挖出的几个探坑，除窑灶和作坊瓷片较少外，其余瓷片堆积的密度都相当大。我们择其有代表性者和能复原者，采集了科学标本669件，其中能辨别器形的514件，不能辨认器形的155件。窑具24件，其中匣钵10件，匣钵盖11件，垫柄3件。

一、器 物

碗——分三类：大碗、小碗、喇叭形碗。

(1) 大碗共二百八十七件。(完整的六件)可分八式：

1式一件。直口、直腹、圈足，内施白釉，外边未施釉，开粗纹片。口径23.5、底径10、高9厘米。

2式八十件。直口、斜直腹，口沿略厚微外敞，圈足内凹，施满釉，底足内不施釉。口径22、底径8、高7.7厘米。

3式二件。敞口厚唇、斜直腹，口沿外一厘米处有一道凸旋纹，内印或刻有团花图案，圈足，施满釉。口径19.2、底径7、高5.2厘米。

4式一百零六件。敞口、浅腹，浅圈足，施满釉。有的内刻、印、划花卉，有的釉下划白线条，口沿作五出花瓣式。口径16~17、底径6—7、高4.5~5厘米。

5式七十二件(完整的两件)。敞口，斜直腹，内底中心有刻或印的双鱼，有张口合口，有头向一致，也有头尾相对，并刻划有水波纹。内底有5~7堆沙痕。口径18.2、底径7.6、高6.3厘米。

6式十三件。敞口，斜直腹，圈足，施满釉，内底至腰部刻有菊瓣一周作装饰，腰与口沿之间有1.4厘米宽的一周缠枝花卉。有的为花瓣式口，外壁亦显花瓣。口径17~17.5、底径6.5~7、高6.4~6.7厘米。

7式八件。敞口，斜直腹，高圈足，施满釉，内底中心一般都刻有飞鸟含草花纹：口径16、底径5.8、足高2、通高9厘米。

8式五件。敞口外侈，折腰，浅圈足，施满釉，内壁刻印有各种花卉图案。口径18~18.5、底径6.5~7、高4.5~5厘米。

(2)小碗共五十三件。可分三式：

1式四十七件。直口外折唇，斜直腹，圈足微外敞，施满釉。口径11、底径4、高4.6厘米。

2式四件，敞口作花瓣式，器壁亦显花瓣式，圈足，施满釉。口径13.4、底径5.5、高5厘米。

3式二件，直口，弧线壁，圈足，施满釉。内壁釉下有白色对称六条曲线或直线，口沿作相应的六出花瓣式。口径11.2、底径4.5、高5.8厘米。

(3)碟共七十七件，分三式：

1式十八件。侈口，浅腹，平底，底部不施釉。口径9、底径4.4、高1.6厘米。

2式十一件。侈口，折腰，平底，腹部至口沿的外部 and 底部不挂釉。有的器壁内釉下画六条白线作装饰，口沿呈六出花瓣式。口径9.2，底径4，高2.4厘米。

3式四十八件。。敞口，外折沿，平底，底部不挂釉。口径10.2、底径4、高2厘米。

(4)盘共三十四件。分二式：

1式六件。敞口，浅腹，外折沿，平底，底部和口沿外边一圈不施釉，系施釉后再刮掉的。内底刻划花瓣式或花卉作装饰。其中有一残盘片，上面刻书有“马大王遂案”五字还有一字仅存部分不识。口径13.2、沿宽1、底径5、高1.7厘米。

2式二十八件。敞口，外折唇，平底，底部不挂釉，内底有一圈凹弦纹。口径12.3、底径5、沿宽0.7、高2.1厘米。

(5)杯共四件，形式相同，直口，深腹，圈足，施满釉。口径8.3、底径3.5、高5.7厘米。

(6)瓶共四件。分三式：

1式一件。敞口，长颈，圆腹，圈足，(残)器身刻划螺

旋形纹饰，似含苞欲放的花蕾。口径2.7、底径3.2、高3.6厘米。

2式一件。口沿残，长颈，圆腹，圈足，施满釉。底径3.3、残高8厘米。

3式二件。直口外卷唇，颈部有凸弦纹一周，鼓腹，圈足外敞，施满釉。口径6.8、底径6、底高1.7、残高2.2厘米。

(7)钵二件，形式相同。直口外折唇，直腹，圈足，施满釉。外表有刻划花卉的，有刻划福祿寿喜等吉祥语的。口径18、底径10、高18.1厘米。

(8)罐二件，形式相同。直口、鼓腹，圈足，腹部呈十出瓜楞状，施满釉。口径7.3、底径5.5、高7.5厘米。

(9)盒一件。(残)敛口，鼓腹，平底，口沿有扣榫，缺盖。底部不施釉。口径8、底径4、高4.2厘米。

二、窑 具

(1)匣钵十件。分三式

1式四件。直口，直腹、底部内收，呈锅底状，腹部下有5~8个通气孔，大小都有。口径12~24、底径4~7.5、高6~9厘米。

2式一件。(残)直口微敞，斜直壁平地内凹，中心有孔，口径25、底径16、高8厘米。

(2)匣钵盖十一件。分二式：

1式六件。敞口，浅腹、底内凹，中有孔。口径14.5~16.5、底径6.8~7.2、高2.7~4.4厘米。

2式五件。敞口，外折唇，浅腹，平底。口径9.5、底径4.5、高3.5厘米。

(3)垫柄三件。分二式。

1式二件。圆形，采用泥团压制而成。直径12~21、厚

0.5~2厘米。上面粘满了砂粒。

2式一件。不规则，采用手捏制而成。

此外还有垫圈两件，垫柱两件，火标三片。

三、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是生产发展的标志。研究生产工具可以窥见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和生产关系。

我们在磁峰窑发现了宋代陶瓷生产中的主要生产工具，就是在窑址东南侧15米的地方出土一个拉坯用的石质辘轳。这件东西本来是社员发现的，但是非常重要。从形制来看它与今天省内部分手工业生产的陶瓷厂用来拉坯的车盘一样，甚至比某些个别小厂脚踏车盘还要先进。车盘的边缘有两个小孔，是用木棒绞动的。比足蹬的要快得多，说明当时生产力已经相当发达了。

辘轳的直径70厘米，中间的圆孔直径7厘米，圆孔两边各有长7.5、宽3厘米的长方形孔一个。

磨子上扇一件。出土于作坊内。直径34.5、厚11.8厘米。

石臼一个。外方内圆。长47、宽45厘米，内直径39、高58厘米。

四、钱 币

出土有宋代铁钱十几斤。

结 语

1.窑址的年代

磁峰古窑址的烧造历史，地方志中没有记载，出土的瓷片中虽

有少许简单文字，但不能据此断定它的时代。我们只能根据出土的钱币、瓷器的造型特征和装饰风格，以及其他有关的资料进行分析推断。在窑址附近曾出土过宋代铁钱几十斤，均已锈坏，粘结成饼。其中有北宋崇宁、政和通宝；有南宋绍兴、嘉泰元宝。从钱币的时间来看，多为北宋晚期和南宋中期的，这就给我们断定窑址年代提供了根据。遗址中出土有双耳陶罐，这种器物在四川宋墓中比较常见。^② 1953年，彭县礪口乡修官渠时出土一件白色供碗，碗的外部有用竹签刻在胎骨上的一周铭纹：“彭州金城乡窑户牟土良施碗碟一料永充进盏供献售用祈愿神明卫护合家安泰”。碗的造型，胎骨、釉色与磁峰窑瓷器完全相同，无疑是该窑产的。

考彭州设于唐初，直至明洪武十年降州为县，始称彭县。彭州金城乡就是在磁峰公社。^③ 这个碗是当时窑户做来作供盏用，以求“神明卫护合家安泰”。金城乡这个名称只有在唐以后明以前才有，窑址的时代也就在这一段时间。

再从窑址的结构上看，是属于唐宋时代北方常见的窑，即所谓馒头窑，又称马蹄形窑。其实这种窑型北方南方都有，如陕西铜川耀州窑，^④ 河北曲阳县间磁村的定窑，^⑤ 广东的潮州窑、新会官冲窑，^⑥ 四川西昌的唐代砖瓦窑^⑦ 等，都属于这种窑型。从普遍采用刻划花装饰来看，不仅工艺上与耀州窑相同，而且在装饰部位和图案内容上也有相似之处。^⑧ 范印纹，特别是不透明的黄白釉色印花碗，其花纹的细致、工正、富丽、布局谨严，都与北方定窑的风格相似；^⑨ 这不仅说明他们有时代的共性，也反映了南北技术的交流。这种印花白瓷碗，过去在崇庆县大庙公社江源古城遗址中，发现有这种印花碗与祥符元宝、咸平元宝、正隆元宝的地层中共存，^⑩ 说明它的时代同钱币有一致关系。出土物中有一种喇叭型碗，这是北宋最典型的器物。根据以上这些分析，我们认为磁峰古窑的时代应为两宋，也可能早到唐末五代，晚到元初。但最发达的是两宋，尤其是南宋。

2. 焙烧方法和装饰艺术

从出土的辅烧工具看，这里的焙烧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四种：

(1) 正烧法。一个匣钵装烧一件产品，这种产品质量较高，除圈足底部留有少量砂痕外，其他部位保持釉面光洁莹润。

(2) 砂垫式重叠仰烧，用较大的直筒锅底式匣钵重叠装上若干产品，入匣的坯胎之间为了防止粘连，放上五至七颗瓷土制作的小丸或石英砂粒，一般重叠十二个左右，然后入窑焙烧。此种方法，器底内釉面被破坏，留有芝麻点痕迹，既有损美观，又不利于洗涤。但产量高，窑的火位利用率高，这种方法在此窑中是主要的。

(3) 支垫式仰烧法，这种方法基本上与砂垫式烧法同，所不同的是支垫物为垫圈或垫柄之类。

(4) 挂烧法，这种烧法在产品的外边有一圈与窑具接触处无釉，其窑具呈漏斗状，一般用于烧盘和小碟之类。

装饰方法有印花、刻花、划花、绘花四种，印花最多，刻、划花次之，绘花最少。早期以刻划花为主，绘花次之。题材有鱼纹、水波、葵瓣、牡丹、莲瓣纹等。中晚期装饰方法四种皆有，但以印花为主。题材上鱼纹逐步减少，缠枝莲、菊花、葵瓣纹、花叶纹、水波纹、萱草纹、飞鸟含草、鱼鹅戏莲菊、天鹅双莲、风穿牡丹、孔雀、鸱鹰各种折枝花卉等动植物图案。图案结构富于变化。碗盘的花卉，多采用团花结构。花纹的布局，在器物的内壁或底部中心部位。

划花：多早期作品，但单独采用划花者少，一般与刻花相配制。

刻花：自由放纵，刀法犀利，繁简皆有。题材以双鱼为主，牡丹、莲花、飞鸟次之。

绘花：多装饰在碗、盘、碟上，表现方法极为简单，用白色画料先在坯胎上绘起直线或曲线，一般从口沿到底部绘六条。然

后再上白釉，焙烧以后釉面显出白色线条。虽然简单，但很朴素大方。

印花：即范印纹，图案设计严整雅洁，编排配置对称美观。植物图案花叶密茂，动物图案生动自然，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间风味。

总之，彭县磁峰窑的焙烧和装饰工艺水平都是相当高的，它反映了当时制瓷工艺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

3. 彭县磁峰窑发展的原因

彭县磁峰附近有丰富的制瓷原料，据东方瓷厂技术科提供的资料，殷家场、三郎镇、丹景山、斗子山产铅矿、磁矿，梅林子产耐火石，思文场产硅石。白水河、小鱼洞产方解石，湔江产长石，各种原料极为丰富。^①同时这个地方又产煤，现在温江地区都还在这里办有煤厂。既有原料又有燃料，这就为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古代这里的交通条件也比较好，水陆交通方便，水路可以通过土溪河到桂花运往各地。陆路东到海窝子，通过湔江输散到别的地方，西面可达灌县。所以当时能发展那样大的手工业瓷场，就地取材和交通方便也是促进瓷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过对彭县磁峰白瓷窑址的试掘，虽与唐大邑白瓷的渊源关系暂时不能直接证实，但我们认为它是在唐代白瓷烧造技术上发展而来的。到宋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磁峰窑的发现，不仅为四川陶瓷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更重要的是为我国陶瓷工艺和艺术史，增加了四川的新材料。

注 释：

①《陕西铜川耀州窑》，陕西省考古研究所1965年。

②《成都市郊的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6期。

- ③《新唐书·地理志》：九陇县有阳平山。《五代史补》蜀王衍与其大妃游青城山，遂至彭州阳平化。《元一统志》：“金城即阳平化”。《彭县志·户口志·附寺观》记：“阳平化……金城寺在鹿平里”。又里市志记：“磁峰场旧名冯街，镇在西乡鹿坪里……乾隆六十年设。故磁峰在唐至元名金城乡。
- ④《陕西铜川耀州窑》：第二章铜川立地坡古瓷窑遗址。
- ⑤《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3期。
- ⑥《广东新会官冲古代窑址》，《考古》1963年4期。
《广东潮安北部唐代窑址》，《考古》1964年4期194页。
- ⑦《四川西昌高枳唐代砖瓦窑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6期。
- ⑧同①和《耀州瓷、窑分析研究》，《考古》1962年6期。
- ⑨同⑤和《定窑的装饰艺术》，《文物》1959年6期。
- ⑩《四川古代瓷器调查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2期。
- ⑪彭县东方瓷厂技术科提供资料。

(原载《四川陶瓷史资料》第1辑1979年)

略谈彭县磁峰窑白瓷的装饰艺术

丁祖春

在制瓷工艺高度发展的宋代，素称五大名窑的官、哥、定、汝、钧窑，烧造了很多精美的瓷器，是我国瓷器烧造技术飞速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陶瓷艺术可谓百花争艳，丰富多彩。但杰出的民窑为统治者掠为己有，如河北的定窑。还有些民间窑址，长期湮没无闻，很多艺术珍品未被人发现，四川彭县磁峰窑就是其中一个。

磁峰窑烧造民间日用瓷器。工匠们仿照北方定窑的风格制造了一种薄胎，乳黄色釉，用印花或刻划花装饰。磁峰窑与定窑相仿，具有恬静的、不透明的乳白色釉，巧妙地衬托出印花，刻划花纹的装饰效果。给人们以制造精细、工巧，纹饰富丽、严整，造型纯朴、挺秀的感觉。

从我们收集到的印花范模，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的制瓷工匠特别善于在自然界中寻找人们熟知的动植物作为艺术创造的题材。植物有莲花、牡丹、菊花、萱草和各种花卉的变形图案。动物有鱼、鹤、鸭、凤凰、鸟等，以及花鸟组成的团花图案。民间制瓷工匠对自然界美的形象和事物，有着极为锐敏的审美感和独特的表现才能。磁峰窑的瓷器继承了前代优秀传统，也显示了他们的独创精神。

印花装饰图案，对自然形态，加以巧妙的夸张、变形组成结构严整的画面。如凤穿牡丹是经过夸张、变形的牡丹花，它是从

不同的角度美的综合，是装饰艺术形象化的创造，任何写实牡丹也为之逊色。经过取舍处理的茎叶，形象简练，生趣盎然，它并没有失去毛茛科植物茎叶的基本特征。构图上注意了排比、对称，花叶适度，互相烘托。在衬托大面积的花朵上，主次分明，宾主相揖。以鱼鹅戏莲花作为装饰的作品中，作者的安排大胆而有趣，本来在荷花盛开的夏季是难以见到莲蓬莲子的，但是为了表现红艳艳的莲花和蜂窝状的蓬斗，突出花果并茂，在画面上出现了花艳果硕富丽清新的形象。成双成对的天鹅和鱼，在整体上对称谐调，浑然一体，颇具匠心。这些无名工匠们的艺术硕果，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出色的装饰艺术技巧。

磁峰窑的印花瓷器装饰结构严整。植物的茎往往处理成为主要的装饰构架。花朵和枝叶之间疏密相间，主次分明。在盘碗装饰结构中，图案富于变化。口有莲瓣、菊瓣，边饰图案有回纹、水波纹、曲线纹等。图案新颖，配置合理，与中心的双鱼和树叶相协调，同整个画面有机组合，具有节奏感。乳白色的釉，衬托出饱满的具有浮雕感的印花纹饰或是刻花纹饰的器皿，具有种富丽堂皇的美。

刻划装饰的磁峰窑瓷器，刀法犀利，豪放不羁，较印花更为活泼生动。无论是双鱼或是其他花卉的变形图案，都极隽秀。盛开的莲花，侧面配置翻转的莲叶，是用圆体斜面的竹质或骨质的工具和梳篦状的工具进行刻划，获得了有斜度的凹线组成的画面。以鱼作主题的装饰中，用梳篦状的工具划出了旋转流利的水纹。水纹呈中间色调，露出栩栩如生的小鱼。由于刻花工具对坯胎的处理，花朵、叶脉、枝干、游鱼、水纹，均呈现了有斜度的“刀痕”，这种痕迹并不损害形象的完整。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工具对于处理材料手法的不同，更有助于表现装饰特点。这种优美的极富有表现力的线条刻划法，是雕刻艺术在瓷器装饰上的运用，体现了劳动人民多少年来的审美感。

磁峰窑瓷器的造型也比较讲究，注意了美观同实用相结合，

显得美观、大方、实用。一些盘、碗器皿上，多采用显著的直线，转折处菱角清晰，交待利落，一丝不苟，说明磁峰窑造型技术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制造工艺的精巧工整，印花纹饰平面的虚实处理和凹凸关系，刻划花表现出纯熟卓越的技巧等。可以看到当时制瓷工匠对于工艺材料的工艺处理，对体现工艺品在实用上的需要，经济价值和美术效果上，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磁峰窑烧造的瓷器，吸取了传统装饰的精华，很值得我们分析、研究、吸取。工艺处理中的印花纹饰和刻划花饰，对于现代玻璃工艺和塑料美术工艺，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原载《历史知识》，1980年3期）

四川彭县磁峰窑址调查记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彭县文化馆

1978年12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县文化馆同志配合下，对磁峰公社的古代窑址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简介如下：

磁峰古窑址位于彭县以西三十公里的磁峰镇东面，窑址座落在群山环抱的河谷地带。东西长约1000至1500米，南北宽约200至300米。据当地社员回忆，此地原有四十八座窑包，可惜现在很难看出其分布情况，但地面上的瓷片、窑具碎片却遍地皆是。我们在一个断面上，清楚地看见当时烧制瓷器的堆积层：即窑渣和瓷片及匣钵残片依次相叠。

从所采集的标本看，磁峰窑所烧制的器物绝大部分是白釉，但也有少量的黑釉和褐黄釉。其器形绝大部分是碗、碟、罐、盘、盏等，其中又以碗为主。窑具有匣钵、支钉等。尤为可贵的是，收集到五个陶质印花碗模，这对研究古代印花碗的生产工艺过程有很大的价值。磁峰窑所烧制的器物釉色以灰白为主，有一些精品釉色洁白。胎骨大部是灰色高岭土，质地细腻坚硬，也有少量的瓷器为白色胎骨。现将采集的标本分述如下：

一、陶器

碗 3件。敞口，斜腹，圈足。口径18.5、高5.7、圈足外

径7厘米。细泥红胎，表内均施有白色粉衣。

黄釉盏 1件。敞口，斜腹，平底。口径11.5、高3.5、底径3.8厘米，与过去发现邛窑所烧制的陶盏相类。

黑釉盏 1件。仅存底部，为平底。径3.4厘米。胎骨褐色，质粗坚硬，黑色釉，由于烧成火候较高，釉色晶莹发亮，颇似琉璃。此类陶盏过去在广元瓷窑铺古窑址发现较多，同时在郫县红星公社瓷器窖藏也有出土，而这件残黑陶盏又仅此一例，因此它是否为磁峰窑所烧制，尚有待于进一步调查了解。

二、瓷 器

碗 分五式：

1式三件，第一件为敞口，弧腹，浅圈足。口径17、高4厘米。胎质灰白坚硬，釉色灰白，施满釉。内有水波、秋花折枝和双鱼等印花纹饰。第二件，口径16.5、高3.5厘米。白胎，器身全施灰白色釉，有烛泪痕，内有水波、莲菊、唐草印花纹饰。第三件，与第二件同，但素面无纹。

2式，残，白色胎釉，素面无纹。敞口，弧腹，圈足。口径17.2、通高6.5厘米。

3式，残，平底，余同2式。口径14、高4厘米。

4式，残，敞口，弧腹，圈足。口径15、高5、足径6厘米。灰色胎釉，内有点沙痕。

5式，残，敞口，斜腹，小平底。口径约为13.8、高4、底径2.8厘米。白色胎釉，釉色莹润，内底略尖。

碟 分为四式：

1式，敞口，浅弧腹，平底，内底呈弧形，底壁间有凹纹一道。灰白胎釉，外底无釉。口径8.7、高2厘米；2式，与1式器形基本相同，但内为平底，外壁有三道弦纹。口径9.2、高1.5、底径4.5厘米；3式，敞口，折壁，平底。白胎灰白

釉。口径10.7、高2.4、底径4.7厘米；4式二件，一件敞口平沿，边以下弧线内收，小平底，内底凹纹一道。口径9、高1.8、底径4.5厘米。另一件内底略呈弧形，边为莲瓣形。口径11.2、高2.4厘米。

罐 1件。直口，鼓腹作瓜瓣形。口径8、残高5.8厘米。白色胎釉，釉色晶莹。

杯 1件，直口直腹，腹内收成弧形。口唇锐薄，圈足，灰胎，内外均施灰釉。口径8、高6、足径4厘米。

花纹瓷片 32件。其中20件为印花，9件为划花，刻花只占3件。纹饰有花卉、飞禽、游鱼、水波纹等十几种。器形以碗为主。

印花纹饰有折枝牡丹、莲花唐草，这两种图案的边上，均饰有水波纹，另有一种折枝或缠枝秋花，天鹅穿莲花纹各一件。内外均有纹饰的瓷片，内壁为印花纹、外壁为桔瓣、莲瓣等的刻花纹。

划花和刻花纹饰，只饰在内壁或外壁。题材中外壁的有莲瓣、线条等，内壁的有游鱼戏水等图案。

三、 窑 具

匣钵 6件。可分为两式，均由耐火粘土烧成。

1式三件，分大、中、小三种，圆口，直壁釜底，壁底部有小孔四至六个，外壁有轮制粗弦纹。大的口径26、高24厘米；小的口径12、高11.5厘米；2式三件，形如碗，底上有小孔，造型各异，一件敞口，弧腹，平底，外壁有轮制粗弦纹。口径22、高6.5厘米，另两件形如碗，底上有小孔。

支钉 2件。耐火粘土烧成，罐形，敞口，鼓腹，底微向内凹，口边上有三个支丁，腹一侧微向内凹，外连一横把。口径8.5、腹径9、高7厘米。

印花碗模 5件。器形大小相同，上部呈覆碗状，下部为圈形内空。均用红色粘土烧制，火候较低，纹饰为阴线刻花。一件腹径17.5、底径13、高8厘米。表面刻有双天鹅穿缠枝莲花纹，顶部有一圆圈纹，边上饰水波纹一周。另两件形制、纹饰基本相同，模顶刻凹纹一周，中饰以双鱼。模身分为六等份，每份均刻以对称的牡丹、莲花、秋菊等。第四件顶部饰飞龙、云纹，四周饰鸳鸯、折枝秋花等纹饰。第五件模身饰28瓣菊花纹，边上有唐草纹一周。

四、小 结

从我们采集到的标本看，磁峰窑的制坯工艺为轮制，待坯胎到适当干度时，再模印上纹饰或刻上所需的花纹，待坯胎全干时上釉，最后装到匣钵进窑烧成。

磁峰窑产品中最多的印花白瓷器，这种白瓷器解放后在成都平原宋墓中偶有出土，被认为是大邑窑产品，磁峰窑的发现便可纠正这一错误。磁峰窑的生产量比较大，这从现在地表遗存的窑包之多和遗物之丰富可以得知。

关于窑址的年代问题，就现已发现的资料看，是两宋时期比较兴盛的蜀地窑址，因这里出土了数十斤北宋的“崇宁通宝”、“政和通宝”和南宋的“绍熙元宝”、“嘉泰元宝”等钱币，它生产的碗、碟、盏等器物的造型纹饰也是宋代的风格。

执笔者：刘 钊

（原载《考古》1983第1期）

四川广元黑釉窑初探

王家祐

四川出土的古瓷器中，经常见有一种黑釉的器物，而以兔毫盏与酱滴斑黑釉盏等最常见。这类器物一般都认为是宋代瓷，多称之为“黑建”、“虎州窑”或“陕窑”。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是忽略了它们在四川大量出土的事实。

我参加宝成铁路文物保护委员会工作时，在广元文化馆又看到好几件此类黑釉瓷器，据广元文化馆的同志说：“都是在广元附近挖出来的”，由此更使我联想到它们的窑址问题。广元的陶德渊同志送给我一件黑釉葵花碗，又正是此类黑釉器，他是在瓷窑铺窑址拾来的，并承他热心的告诉我他曾在瓷窑铺及城北的古窑窑址中收集到很多古陶瓷碎片，由于他的帮助，才能有瓷窑铺古窑址的发现。

瓷窑铺又名磁瑶铺或磁陶堡，在广元县北门外约十二里。当地是嘉陵江左岸公路边的坡地，现有住户二三十家。在这一段公路上，约有半里长的江边均堆积着残陶瓷片及匣钵，尤以旧酒厂侧小坡上堆积最厚，陶片堆中以黑釉的占绝大多数，但也有其他种的。我们在这一带收集了二百多片碎片及少数残器，一部分是在堆积片中选出，一部分是在河边堆埂中挖出，这些陶片都是研究蜀瓷的新资料。

根据出土的陶片，似乎确可认为此地是唐宋以来的古窑址，它包含几类近似的陶瓷器，似可说明他们之间的发展过程。其中以上层的宋代黑釉器为最普遍。我们在六朝岩墓上层及宋代石板墓中

已发现过此类陶片，又在一遗址中的残陶片上贴着一个钱，都可说明它的时代是不很晚的。在陶片本身釉彩、器形、制作上更明显的表现了时代，这是见到实物的人们都所公认的。由此，我们可以大胆的说蜀瓷中的黑釉器决不是建窑或处州窑，而是蜀窑中的瓷窑铺窑。至于陕窑名称的来源是有些道理的，首先瓷窑铺是在接近陕西的川陕道上，此外甘肃的王同志告诉我，在甘肃平凉及西安一带也有此类窑器，如泾川东南的窑店镇就可能是一个古瓷窑，有此类出品。传说是否确实，尚待证实，但川陕边境上工艺的交流是可能的，谁先谁后的问题也尚待调查研究。

有关这方面的县志记载的资料，新修县志第三编一〇二页陶瓷业云：

“广元陶业似早，考县北磁陶堡当在明时，其成陶之器不悉何时没于水，每当水落常于河干掘获小缶，质同今之母家山陶，因陶没而业歇。”

“清之著名陶器，以羊模坝之瓮罐火碗为佳，瓮可一石，罐耐火炼，火碗味佳，世守其业，未之或停。”

“大石（堡）之母家山，陶磁並出，磁属粗料，陶则细质，磁业现犹经营，陶则停矣。”

“五郎之磁业亦粗质，水磨有细磁料，无识而营之者。”

“沙陶业，县之北门外炉罐为主，质劣而不耐火，未若甘省品质之佳。”

新修县志第三编九十三页物产云：

“长石，分布县属南北二山，其晶形劈开面互成直角者为正长石，不成直角者为斜长石，表面有真珠光泽，但易受风雨剥蚀分解为陶土，磁土，粘土。”

“陶土，县北东山堡羊模坝，取制陶器最良，大石堡之母家山及磁窑堡均佳。”

“磁土，县东流坪与大石，取制土碗，水磨虽有，无制器者。”

在我访问当地故老的谈话中，也有些可供参考的，如：

“……老一辈的人说这里从前有四十八家窑，二十七家水冲。釉子就是用羊肝石舂细做的。现在公路及其东边是窑地，河边是水冲旧址。已经好多年没有烧过了。我们常常在地里捡到陶人人，陶马马，都是古来窑土变成的。”

“……汉皇帝手头（时候），红花年间还烧过窑。”（红花或系指吴世藩洪化，或系指明成化。）

“……我们祖辈才来的时候，兴〔插田占地〕，那个时候还没有地名，因为有几个古窑子，就叫个瓷窑铺。”

“……后来清地修河岸，才把烂瓦片（指残陶瓷片）丢到河边，年年水冲，现在只土里头还留着有点”。

这些点滴的片断的情况，都值得我们在研究时的注意。

现在把在该地收集和清理得的标本分述如次：

一、黑釉系：这系器物的表面为黑色釉，器形以碗盏发现最多，胎骨以黑黄色者为主，一般器壁厚约五公厘，半圈底，轮制。又可分为正黑色发光釉，酱边黑釉，兔毫纹黑釉，酱斑花黑釉，紫色霞光花黑釉，黄色霞光花黑釉等色釉。凡兔毫纹，滴酱斑、流霞云等小盏，皆用匣钵烧成，色彩精美，制作工细。另有黑釉灰釉碗等，无匣钵叠烧而成，多作葵花式。这系器物在已发现的瓷片中占绝大多数，可能是本地的主要系，已收集到的有带匣钵小盏及各色小盏残件、骑马小人等三十件。

二、素衣系：这系器物无釉，只在表面上涂一层白色陶衣或用素白色绿色绘花于陶胎上。胎骨很薄，有的薄到一公厘，多作红胎或绿色胎。已知有小罐、三脚炉、茶缶、花瓶等器。又可分为素白衣类，绿底白花类，红底白花类，红底绿花类等。这系陶片埋藏较上系深，形制亦似较早。

三、尚发现有少量复杂色的各种陶片：（1）银灰色开银片陶片；（2）绿色釉陶片；（3）蛋壳色黄釉绘绿花似琉璃厂窑残盏；（4）似越窑暗花残片；（5）似宋瓷白瓷小片；（6）似大邑窑小印盒；（7）一残底上有似烛泪痕的钧窑釉；（8）青灰釉绘

绿黑花花瓶半个；(9)白衣陶器口又加黑釉。这些残片说明了这个古窑是可能烧过或交流过四川邛窑、大邑窑、川东窑，甚至远远的钩窑、越窑的釉彩与技术。尤其是钩釉片与越窑片提供了谁先谁后的资料，颇值重视。在蜀瓷邛窑中已见似钩窑色的釉彩，涪城暗花与射洪暗花亦不让于越器，均可参考。此类瓷片杂于下层，出土很少。

此外还收集了一些附属品：带匣钵的小盏，烧成叠的黑釉碗，三角形支钉，圆形小土块，大小泥圈，烧过的羊肝石，流出于土上的黑酱釉土块，带开银片绿釉支钉。

我们另外又访问过羊模坝熊家山窑及母家山窑。熊家山窑在县北七十里羊模坝，是依山坡建成的长条形窑。轮制大缸及茶罐，远销甘肃的阶县、文县及陕西，现有窑户三家。陶为黄绿色，无黑色釉，有打印方格纹陶片发现，现在仍用打印图案花。母家山窑在县东五十里，现名小柏林沟，有柴烧窑八座，水冲四五十座，正以“工合电瓷厂”为中心走向合作化中。在窑工唐元孝处收得黑釉小杯一个及黑釉药（红色土）二块，他说这里早年曾烧过黑色釉。此处瓷土为山上的白灰色石岩磨成。现烧白窑青花器及电用材料，产品甚佳。

由于地下的不断发现与调查，我们对“蜀窑”的过去的概括观念应补充与修正了。蜀窑实际上包括着四川广大地区中各个不同的窑系。对于已知资料的集中研究及科学清理工作希望能逐渐加强。

本文只是粗略的介绍一下情况，在说明问题上是不够的，但愿由于这个消息的报导，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与研究。

（原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三期）

广元磁窑铺黑釉窑

丁祖春

磁窑铺黑釉窑，位于广元县城西北，距城约十五华里，嘉陵江流向的左岸磁窑铺公社所在地，即千佛岩至广元溶积厂一带。川陕公路穿过窑区，交通方便。整个窑址范围，长约二华里，宽约半华里。现在有部分被溶积厂叠压。

此窑是1953年修宝成铁路时发现的。76年8月陶瓷编写组又前往调查，正值溶积厂扩建厂房之际，已将窑场挖了一个2米深，10米长的一条断面，出土了大量的黑釉和少量的青釉及黄釉带彩器，各式窑具。采集标本425件。根据这些材料和过去所得资料，有如下几点认识：

一、磁窑铺窑的成型和焙烧方法

从采集的窑具和器物来看，主要是生产民间实用器，也生产小件玩具。成型方法主要是轮制，也有手制，如小人骑猴子，小人骑马之类的瓷玩具。碗、盘、瓶、罐的制作，先轮制成型，待稍干后，用旋刀削底，挖为圈足。盏，水丞、粉盒等小件器物，为浅圈足。挂釉方法，多采用浸釉和蘸釉两种。除一部分瓶、香炉挂满釉外，大部分器物挂半釉。

烧制方法，据出土物看，未见支烧痕，窑具多为匣钵。烧制方法应是一匣一器的正烧法。为避免匣钵与器物之间粘连，其间用手捏环垫相间，或用沙粒放入匣钵内底作介质，故在器物底足或匣钵内底还多少粘有沙粒。另外碗的烧法是底内一圈无釉，底

足无釉，上一个碗的底足正好重叠在下一个碗内底无釉处，这种重叠入匣的烧制方法称为叠烧法。在地层中未发现煤渣，可能是用柴火焙烧。至于窑灶是什么类型，没有正式发掘，缺乏资料，不能臆测。

二、窑具与器物分类

窑具有匣钵、环垫、柱形小支具、三岔形支钉。其中以匣钵的种类为多。

匣钵分四式：

1式：直口、尖底、上腹直壁、下腹内收，呈漏斗状。腹壁有四个对称小孔。高11、口径16、底径5厘米。

2式：直口、上大下小，凹圈足，呈钵状。高8、口径10、底径6厘米。

3式：敞口，斜直壁，凹圈足，呈碗状。高4.5、口径8.5、底径5厘米。

4式：直口，直壁，平底，呈桶状，壁上有四个小孔。高5.5、口径8.3、底径6.5厘米。

实心小支具：高4、直径2.5厘米。

圆环形垫圈，用泥条随手作成，外径5、内径2.5厘米。

三岔形支钉：岔距4.3厘米。支钉上还粘有绿釉痕迹。

器物的种类很多，有碗、盘、盏、茶托、瓶、罐、壶、盒、水丞、香炉及其他小件人物、动物、瓷塑小玩具等。

碗分大碗、小碗。

大碗分三式：

1式：敞口、厚沿、深弧壁、圈足。

2式：撇口，斜直壁、圈足、足内壁外撇。

3式：侈口，弧线壁、圈足、足内壁外撇。

这三种不同造型，施釉不到底，内底一圈无釉，釉色有黑、

赭、青、酱等色。口径17.5至18、高6.8至7.3、足径6.5厘米。

盘分二式：

1式：敞口、浅弧壁、圈足。口径14.5、高1.8、底径5.5厘米。

2式：撇口，口下有短颈，内底平坦有谷状凹纹，成人字形排列，系器成后在坯胎上用竹制工具戳制而成的。俗称磨蒜盘。口径10.5、高2厘米。

茶盏分4式：

1式：大掩口、斜直壁、小底浅圈足，口沿呈赭色，外挂半釉，内施满釉。高0.5、口径11.6、底径3.4厘米。

2式：小掩口，口沿微外撇、赭色沿。小底浅圈足。高5.2、口径11.6、底径3.5厘米。

3式：大敞口，斜直腹、小底浅圈足。高5.4、口径11.5、底径3.5厘米。

4式：小敞口，胎呈红色，圈足较深。高4.4、口径5.5、底径3.5厘米。

茶托分二式：

1式：托上部为一小杯，下部似盘，底为圈足，或平底，底心内凹。有黑黄两种釉色，黄者饰以点花。高3.5、口径6.7、底径2.5厘米。

2式：敞口、上托微敛，下托为六出花瓣式口，系器成后在胎上用竹制工具在托盘口上按制而成。圈足中空，上下相通。高2.9、口径4.8、底径4厘米。

瓶子8式：

1式：胆式瓶，长颈、鼓腹、圈足、青褐色釉，施釉不到底，口沿残。残高9、底径3.3、腹径6厘米。

2式：双耳含环瓶，长颈、鼓腹，喇叭型高圈足，肩部有双兽耳含圆环，施满黑色釉。口沿残。残高25、腹径14、底径

9.5厘米。

3式：贯耳瓶，直口、短颈、长圆腹，圈足，肩部有对称双贯耳，施满黑釉。高23.5、口径5.6、底径6.7厘米。

4式：葫芦瓶，短颈，束腰，上小下大两鼓腹，圈足，器身呈葫芦状，施满黑釉。口沿残。残高7.5、底径3.5厘米。

5式：玉壶春瓶，敞口、长颈、圆腹、圈足、颈肩之间有弦纹四道，两道在上，两道在下，其间相距2.3厘米，饰以花卉。腹部绘酱色芍药花二组。底色为白色。高24.5、口径6.6、腹径11.3、底径7.3厘米。

6式：纺锤瓶，直口微敛，腹颈无显著区别，由上到下渐大，底为圈足，器身呈纺垂状。高14、口径5.3、底径5厘米。

7式：小梅瓶，短颈小口微外敞，肩部有弦纹一道，由肩向下渐内收，小平底，底心内凹，施满黄色釉，绘酱色花卉。高8.4、口径2.2、底径3厘米。

8式：小花瓶，敞口、短颈、鼓腹，浅圈足，施满黄色釉、开细纹片。高8、口径3.4、底径3.8厘米。

壶：撇口外翻、短颈、鼓腹、带流、有柄，圈足。黄色釉，均饰褐色点花。高7.4、口径3.6、底径4厘米。

水丞：大小不等，均小口，圆腹、浅圈足。口径4、高4.5厘米。

粉盒：圆形，盒下部口沿有榫，底部系圈足。盖面绘有褐色点花。一般为黄釉，有大小之分。高4.5、直径7、底径4.3厘米。

香炉分二式：

1式：直口、宽沿、直腹、三扁足。有大有小。口沿下有凹弦纹一道、腹下部有凹弦纹两道，施白色陶衣。口径15.3、通高7、足高3厘米。

2式：直口、短颈、外折沿、鼓腹、三乳足。有大小之分，有黑釉和白色陶衣两种。通高12、口径20、足高3厘米。

罐分二式：

1式：单耳带流罐，有大小两种，有直口无颈，有小口短

颈，有直腹、圆腹，有圈足、平底，均未施釉。个别的在内边施有不规则黑釉，有的外边下半部施褐色釉。扁耳。流口有的与耳相对称，有的在耳之一侧。大的高11.5、口径13、底径4.8厘米。小的高7、口径7、底径4厘米。

2式：双耳罐，这种罐一般较少，内施满釉、外施半釉，对称双扁耳，无流、底部有圈足、有平底，底心内凹。高5.8、口径5、底径3厘米。

碟：大小碟很多，一般内部施有不规则的褐色釉，外边为素胎。多数在口沿上都有一把柄物，系器成后，随意捏上去的。不知是何用途。敞口、厚沿、斜直腹，有圈足，有平底。大的口径11、高3.5、底径4.8厘米。小的口径8、高2、底径3.5厘米。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小玩具。

三、质地与釉色

磁窑辅窑的胎骨属于砂胎，比较坚硬，火候约为1100℃左右。断面呈黄白色、红色、乌黑色、褐色，而以黄白色为主。胎体厚重，含铁量较多，未上釉部分，在焙烧过程中，由于氧化作用而呈红褐色乃至黑褐色。比较精细的黑釉器，在上釉之前先在胎体上饰一层白色化妆土而后挂釉。此种白色化妆土含铁量较少，即可克服器表粗糙或凹凸不平的缺点，又可掩盖胎料中因杂质未除净而泛出的杂色或黑点。还可提高器表釉色的光洁度。从标本中可以看出，凡釉施有白色化妆土上者，则光亮莹润。反之，则光泽减半。

釉色有黑色、酱色、黄色、绿色，以黑色、酱色为主，黄色、白色次之。

黑色又分四种程度不同的呈色：

1. 正黑色，黑如漆，光可鉴人。
2. 黑色，光亮次于正黑色，表面布有密集的黑褐色小斑点。

3. 兔毫纹黑色釉，闪兰色光亮，呈现许多褐色毫毛状筋脉。

4. 黑花色釉，这种釉与玳瑁釉略同。

酱色釉分二色：

1. 酱色釉，挂釉较薄，光泽不如黑色釉。

2. 鹧鸪斑釉，底着酱色，洒以油滴般纹饰，呈酱黄色花釉。

黄色釉：此种色釉，不是纯黄，而是黄中略带青白色。这种黄色釉器物，一般都加绘有黑褐色花纹。

白色釉：无光泽，呈黄白色，多为化妆土，许多瓶、罐、炉上，多采用此色。并同时绘成褐色花纹。

绿釉：含铅量重，故绿中闪银灰色。

绘花器有五种：

1. 黄地绘黑花或褐色花，常饰于盒、壶、瓶等，唯碗不见此类装饰。凡黄地黑花者，胎骨黄白坚硬，吸水性弱，釉层较薄，色调莹润光亮，表面略有开片。花绘题材有水藻纹、草叶纹、花朵纹。色彩有浓淡深浅之分。

2. 白地绘酱色花，此种花纹施于瓶上，装饰方法是在白色化妆土上，直接绘上酱色花纹。

3. 酱色釉绘白色花纹，方法是在白色化妆土上的花纹部位施酱色釉，再绘以白色花纹。题材以牡丹、芍药为主。此种技法，其他地方未见，可能是广元磁窑铺的特点。

4. 黄釉点彩花，似釉下彩，在器体上由瓷工的喜好，随意点上几笔，或几组纹饰，似花非花，似叶非叶，简朴自然，毫放不羁，表现了民间技艺的特点。

5. 鹧鸪斑花纹，多施于茶盏上，酱色或褐黄色作地，洒上浅黄色的花釉，佳者内壁发光，别具风味。

从以上这些花纹装饰方法来看，有釉上彩，也有釉下彩，但是色调比较单纯，技艺不算很高。彩釉不是此窑的生产重点，精

品主要是黑釉茶盞。

四、瓷窑铺窑的烧造历史

关于磁窑铺的烧造历史，由于它是一般的民窑，未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无早期史籍可考。对它的时代，只能根据采集的实物，与其他相类似的器物比较分析，推测它的时代。

广元磁窑铺窑碗的特点多具敞口，茶盞仍是大小敛口，口沿微敛、底小为浅圈足，胎骨厚重，施釉不到底，未上釉部分露胎呈“铁足”，这与建窑的风格大体一致。特别是黑釉茶盞的造型和色泽的种类与建窑茶盞相似之处颇多。茶盞的釉色分五种：

- 1 . 釉色漆黑发亮，没有黄色的兔毛纹和银色斑点。
- 2 . 黑色釉发光亮，密布着极不规则的银褐色小斑点。
- 3 . 黑色釉地，有土黄色毫毛纤纹。
- 4 . 兰黑色釉，上有黄褐色毫毛状筋脉。
- 5 . 黑色发光釉，釉下有裂。

这些特点都与福建建窑有共同之处，他们的时代应当相同。

有关建窑的记载，在十世纪中晚期陶穀著《清异录》提到：“闽中造茶盞，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清异录》书成于北宋初年，可见北宋初这种茶盞也就很盛行了。但在建窑遗址未发现有鹧鸪斑这类标本。鹧鸪斑是吉安永和窑的独特风格。《清异录》中记载：“花纹鹧鸪斑点”应为永和之误。古代往往有人把鹧鸪斑同兔毫纹搞混，《陶雅》的作者陈浏就是一例。这里不管鹧鸪斑也好，兔毫盞也好，这类茶盞在宋初就很普遍是可信的。

《广元县志》三篇十二卷记：“广元陶业似早，考县北磁陶堡（即磁窑铺）当在明时，其陶之器不悉何时没于水，每当水落，常于河乾掘获小缶，质同今之母家山陶，因陶没而业歇。”

这段材料说明在明代还在烧造，至于何时停业尚不可知。

根据出土的绿釉长颈瓶，在元墓中也有出土。黑釉和素白釉的三足炉与明代铜炉造型类似。可见县志记载明代仍在烧造，是和出土的器物相符合的。

因此，我们认为广元磁窑铺的时代为宋，下限可能到元明时代。

广元磁窑铺窑的兴起和发展，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和统治阶级的提倡有密切关系。宋代饮茶之风很盛，在饮茶的方法上也有所不同。宋代饮的是一种“斗茶”，把一种发酵的茶饼碾成细末，然后用煮沸的水点注入，茶面即浮起一层白沫，这种茶自然是以黑色茶盏为宜。宋徽宗在《大观茶论》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各地瓷窑便纷纷制造，而广元黑釉窑就是适应这种风尚而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原载《四川陶瓷史资料》第1辑， 1979年）

四川广元瓷窑的调查收获

重庆市博物馆

广元瓷窑是1953年修筑宝成铁路发现的。1976年和1978年月，四川省陶瓷史编写组和重庆市博物馆进行了两次调查清理工作，初步摸清广元瓷窑的基本面貌与烧造历史，为探讨它与“建窑”和其他黑釉瓷的关系提供了资料。

窑址南距广元县城约十二华里，在嘉陵江左岸瓷窑铺公社，遗址范围长约四华里，现已有部分被房屋叠压。调查时选择了溶积厂扩建厂房时还残露的10米长、2米深的一个断面进行重点调查和探索。断层堆积系一层煤渣一层匣钵及碎瓷片依次迭堆，出土器物以瓷器残片和窑具最多，完整瓷器60余件，其中碗8件，盏4件，碟2件，盘6件，杯5件，盏托5件，罐3件，钵1件，盒1件，水匱3件，洗1件，瓶8件，香炉3件，壶2件，鸟槽1件，小瓷塑8件（见附录）。瓷器以黑釉器为大宗，其次是青灰色釉器、米黄釉带黑器、素胎器等。

除瓷器外，还有式样众多的窑具，其中有盛坯用的匣钵和承托坯件用的各种垫托。凡大小不等的漏斗匣，均是装烧浅型碗、盏的；碗型匣是装烧小件的杯、碟所用。垫托中，盘型托是紧贴窑底支烧窑圈碗、盏的（至今垫托上还有一碗壁粘连于上）。三叉型垫、垫柱、环垫、垫饼均是大件套小件装烧器件的支垫。这些窑具用耐火土制成（见附录）。另外，清理了一座窑炉残迹，现将有关问题叙述如下：

一、质地与釉色及造型

采集的标本多质地坚硬，火候较高，瓷土淘洗欠细，有石英颗粒。胎骨结构紧密，气孔不明显，断面有灰黑色、黄白色、灰白色、红褐色等。而以黄白色、灰白色为主，白色极罕见，几次调查仅采集两件。胎体一般厚重，其釉层厚薄不等，特别在内底厚达3毫米，外壁釉不到底，多流聚成堆。凡施釉之器多饰一层白色化妆土。有的器皿由于施釉不规整，往往有釉色盖不完化妆土，漏出一白边，凡施化妆土者则釉色黑亮明润，未施化妆土的色泽必差。精致的紫黑色胎足茶盏、碗、杯，在露胎部分，增上了一层黑瓷色衣，其工细者有加饰黑色瓷衣的工序，可能是为仿“建窑”而作，或是为使露胎的色差与黑色一致，以增加色泽的协调。

广元窑为克服原材料之弱点，提高产品质量，均加饰了化妆土，既可克服瓷器表面的粗糙掩盖胎料不纯而泛出的杂色；又能提高釉色光洁度，这是与“建窑”黑釉瓷的最大区别。

广元瓷窑铺黑釉瓷的胎釉，经化验分析成分含量如下。①

胎的化学成分：

氧化硅71.21，氧化钛1.55，氧化铝18.17，氧化铁5.60，氧化钙0.37，氧化镁0.52，氧化钾1.55，氧化钠0.26，氧化铬0.02，总合99.25。化学式： $0.35\text{RXOYA}1_2\text{O}_3.669\text{SiO}_2$ 。

釉的化学成分：

氧化硅65.77，氧化钛0.96，氧化铝14.38，氧化铁4.89，氧化钙6.77，氧化镁2.29，氧化钾2.57，氧化钠0.81，氧化亚铁1.88，氧化锰0.14，氧化铬0.02，氧化铜0.02，氧化碳0.02，总合100.52，三氧化二铁（总）6.98，氧化亚铁26.90%。

从以上比例，铁的含量比其他釉色瓷特高，这是黑釉瓷的主要特征。根据物性测定，② 烧成温度 $1290 \pm 20^\circ\text{C}$ ，吸水率7.8，气孔7%左右，胎釉间有一白色层（即化妆土），及较多小气孔。

广元窑的釉色以黑色、褐黑色为主，但也有少数青灰色、黄色、米黄色、绿色等。关于黑色的变化，是以釉层的厚薄而定，厚者即呈黑色而明亮，薄者光度较差，并呈褐色，或黑棕色。现将其釉色分述于下：

1. 黑色分四色

(1) 正黑色，光亮如漆可照人，釉厚0.2—1，内底釉厚达6毫米，外壁底部釉流聚成堆。

(2) 紺黑色，其光亮仅次于正黑色。有的碗、盘内壁布有密集的酱黄色点子。

(3) 棕黑色釉，釉面微闪深黄色光亮，呈现褐色兔毫晶脉纹。

(4) 黑色玳瑁釉，底黑而光亮，以黄色斑块散落于黑釉中，

以上黑色，口沿部位釉层较薄，均呈褐色，是采用正烧，高温时釉药下流所致。

2. 褐色釉有二色

(1) 浅褐色，施釉较薄，通体釉层较匀，光度较差，此种产品多粗糙，或未上化妆土。

(2) 褐色鹧鸪斑釉，底着浅褐色，呈现似油滴斑纹，如鹧鸪鸟羽毛的斑状纹，与玳瑁釉有些相似又不完全相同，这种为精细品。

(3) 米黄色釉，光度极强，此色极少单用，釉下多绘饰黑花。

(4) 青灰色釉，光度极差，多施于粗糙的溜圆碗、盘上。

(5) 黄色釉，鲜明而光亮，有化妆土，施香炉和瓶上。

(6) 绿色釉，有草绿及绿中闪银灰色，以草绿色为优，可能由于这种釉色珍贵或不易掌握火候关系，仅见用于香炉及瓶上。

器物的种类，两次调查收集300余件标本，主要器物有碗、盘、碟、盏、盏托、瓶等，其次是钵、盒、洗、香炉、壶、水缸、

鸟槽、动物瓷塑及小玩具等。除瓷塑小件外，均系轮制，从造型设计上看，是比较考究而多有固定比例法则的，如大型的碗通高与底径多为1：1左右；盏的口径与底径多为3：1左右；瓶的口径除梅瓶而外，口径与底径多为1：1左右。整个造型给人一种庄重之感。手捏瓷塑小动物及小玩具，意态生动，其造型与工艺特点都是宋代常见器物。

二、花 纹 装 饰

过去多以为广元窑的花纹，仅有窑变，不见其他纹饰。现在出土有压印纹、刻划纹、素胎绘花、釉下彩纹饰四种。

1. 压印纹，印模压印，仅见白地素胎兽面含环瓶。胎上饰一层白色化妆土，压印几何云雷纹于颈腹之间至足部。

2. 划纹，仅有一罐，划篔状条纹，饰褐色乳钉纹。此罐器形别致，内上满釉，外壁素烧。从工艺过程看，是先上化妆土后刻划，故末尾有化妆土小积，且线凹处色深。这种造型和纹饰和日本山梨县热见村出土褐釉插座小壶有相同之处；^⑤ 与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的乳钉罐极似；在国内亦与江西赣州窑的褐釉乳钉茶罐相似。^④

3. 素胎绘花，于素胎上饰白色化妆土，用酱色釉绘折枝花于瓶上。

4. 釉下彩纹饰：（1）在釉下绘六根线条等分碗、盘，而后罩上青灰釉。（2）在棕、黄等色釉下，用化妆土绘上牡丹、游鸭、水藻、草叶纹等，线条凸起，稍不注意，当以为是压印纹。此类技法，其他地方少见。

三、 装烧工艺及窑炉结构

广元窑，施釉方法多用蘸釉，少用刷釉。其装烧方法有三

种：一为装匣正烧，一匣一器，匣底，石英砂粒作介质，器之内底皆满釉，好壁施釉至腹下，当为广元窑的上品；二为叠烧，其方法是不用匣钵，只用支托着窑底，把涩圈碗直接重叠于支托上，这种装烧法，碗内底的涩圈，必须刚好落在未上釉的圈足下，避免粘连；三为大小套烧，用垫饼、支柱、三叉型支垫于钵、罐、瓶内套烧。

窑炉情况：在断层东南面约15米的地方，发现一窑炉残存。此窑炉破坏甚重，难于识别其确切的结构。暴露于地表的只有烟孔墙与窑墙相接的东西一隅。经过清理，窑炉残存二室，窑顶无存，前室东西长5.80米，南北宽3.80米，南壁残高0.82米，烟孔墙残高0.02—0.20米，并有3至13厘米厚的窑汗粘连于上，烟孔两个，孔距0.32米，与南北窑壁相距各0.86米，前隔墙残长0.60米，仅有3块砖，室内由于后世曾辟为粪坑，窑室填充全被挖掉，故无遗物，前室后面为火膛，宽0.60米，北面有窑门，膛内红烧土厚0.18米。后室由于房舍叠压未清理到头，只露有东西长0.64米，南北宽3.82米，北壁残高0.60米，宽0.44米，用二列砖砌成。其隔墙比前室烟孔墙升高0.30米，只残存二层砖，长0.40米。窑炉用砖厚薄不等，完残皆有，但总起来可分两种：一为长0.20、宽0.20、厚0.10米，另一为长0.22、宽0.20、厚0.06米的粘土砖建成。室内窑底用黄沙铺底，残留有漏斗形匣钵碎片；青灰釉碗、紺黑色敛口茶盏、黑色釉盏等残片，均为一般常见之宋代器物，且与堆积层的产品相符。

总的来说，此窑破坏甚重，不过从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浙江阶级窑和福建明代的德化阶级窑看，均具有如下特点：窑室之间有隔墙辟为火膛，墙下设排烟孔，窑室之间有高差，窑底呈平面。这几点，广元窑也均具备。因此视之为阶级窑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关于宋代的阶级窑，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尚是首次。它证实了阶级窑的出现确实是在宋代；从而为我国古代窑炉史又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四、与建窑及其它有关民窑的关系

广元窑与建窑的风格相同点较多，特别是造型和釉色极为相近。两窑均有大中小型敞口碗、大小敛口茶盏。^⑤ 在釉色方面均以黑色釉为主，有漆黑色、紺黑色、兔毫晶脉纹、鹧鸪斑纹等，且在盏的口沿内外釉层较薄处显出褐色边，腹下釉层逐渐增厚聚集于底部及圈足周围。此外还有些其它颜色，如灰色、米黄色、绿色等。经物性测验，胎、釉厚重，建窑含铁量7%，广元窑5%。建窑烧成温度 $1310 \pm 20^{\circ}\text{C}$ ，广元窑烧成温度 $1290 \pm 20^{\circ}\text{C}$ 。建窑吸水率0.7度，广元窑7.8度。因此它们是既相近又相异。建窑温度高质地坚硬紧密，吸水率小，虽含铁量大，而在瓷化程度上高于广元窑。广元窑的技术可能受到建窑一些影响，^⑥ 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如在采用一匣一器装烧中不用泥饼作介质而用砂粒，以及为减少制匣的工序，增加窑炉容量，提高生产率，采用无垫托的叠烧。特别是多用化妆土，这是广元窑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与建窑最大的区别。广元窑的压印纹和刻划纹及明亮釉下彩花纹饰也是建窑没有的。建窑有贡瓷的任务，生产的广泛性受到约束，广元窑是民窑，不受官方约束，只要民用所需，其产品粗细皆备，这是建窑所不及的。

广元窑在过去无论从文献和各国出土物看，均无记载可征，但近些年来从国外的考古中，有似于广元窑黑釉瓷者已有三处可供考虑：第一是日本山梨县热见村出土的“褐釉插座小壶”；第二是朝鲜新安海底沉船发现的“乳钉罐”与广元的黑釉刻划乳钉纹杯相似，^⑦ 第三是日本富田太良遗址出土的“天目釉碗”^⑧ 与广元窑黑釉茶盏极似，村上勇先生认为出产地难以辨别。笔者从他介绍的造型和釉色及“露胎部位涂有化妆土”这一特点推测可能是广元窑的产品。进而推测广元窑也似有外销瓷出海的可能。

广元窑与江西吉州窑亦有相似地方，如吉州窑的素天目瓷瓶、炉等^②，无论从造型和釉色看是难于区别的。其次是吉州窑的白地绘褐色芍药瓶与广元窑白衣底绘褐色芍药瓶无甚大的差别，关于手制瓷塑动物小件，两窑均擅长。

广元窑与浙江武义的宋代黑釉茶盏极似，武义黑釉窑亦有黑色、紺黑色、褐色、兔毫晶脉纹釉等，并以黑色为主，且釉不到底。造型所不同的，武义茶盏略浅一些，而胎、釉皆薄，釉色不及广元窑莹润光亮，不见黑瓷衣，在兔毫纹上武义不是棕黑色底中微闪褐色晶脉纹，而是闪蓝色晶脉纹。在装匣焙烧中武义不用砂粒而用泥饼作介质。从品种、质量、造型、釉色看，广元窑胜于武义黑釉瓷窑。

广元窑与河南禹县扒村的产品也有相似之处，如扒村的黑釉凸弦纹罐和广元窑极似，^③利用白色化妆土，做到了粗料细作，但是禹县扒村的特点。而广元窑并不逊于扒村。

广元窑的米黄色釉绘黑色草叶纹梅瓶，在造型和纹饰上与河南汤阴鹤壁集窑梅瓶相比，很难分辨是两个不同的窑口所出。^④

从以上广元窑与南北各窑的相互关系，可证实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事实，广元窑还善于吸取其他各地特点，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

五、烧造历史

关于广元窑的烧造历史，据1930年重修《广元县志》十二卷记：“广元瓷业似早，考县北磁陶堡（即瓷窑铺）当在明时，其陶之器不悉何时没于水，每当水落，常于河干获得小缶，质同母家山陶，因陶没而业歇。”说明在明代或明以前已有烧造。《四川广元黑窑初探》记：“此地是唐宋以来的古窑址，它包含物几乎类似陶瓷器，似可说明他们之间的发展过程，其中上层的宋代黑釉器最为普遍”。^⑤这种看法有一定根据。从两次调

查所得，敛口黑釉茶盏、六出花瓣口盘、六棱线纹大小碗，多为宋代造型特征。兔毫纹盏在四川长江中下游的宋墓中广为出土。^⑬广元窑的茶托，不但有宋器，还有与五代越窑托相似者，与官窑、定窑托略似者。它的烧造时代，其上限可能早到五代晚期，下限晚至南宋末或元初是比较确切些。

广元窑得到发展，我们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广元境内及瓷窑铺周围盛产瓷土、长石、石英、方解石、石灰石、粘土、原煤，^⑭为制瓷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第二自唐宋以来，国家一再颁布禁令制止用铜造器以外，最重要的是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分裂局面，南北政治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交流，制瓷手工业相应地得到发展；第三是宋代制茶业有显著的发展，四川栽培茶的区域，遍及于雅（雅安）、蜀（成都）、邛（邛崃）、嘉（乐山）、彭（彭县）、汉（汉中）、利（广元）等地区去出售，外销长江中下游一带。^⑮由于茶产量多，饮茶之风更盛行，茶盏更为需要；第四在饮茶方法上又有改变，“宋代饮的是碾茶，把一种发酵的茶饼碾成细末，这种茶白是以黑色茶盏适宜”。^⑯如当时的许多诗家名人学士无不为之歌吟，北宋初蔡襄的诗歌里曾赞美“兔毫紫瓿新，蟹眼清泉煮”；苏东坡在《送南屏谦诗》即有“道人晓出南屏山，来施点茶三昧手，勿惊午盏兔毛斑，打出春瓮鹅儿酒”；僧德洪诗“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杨万里诗：“鹰爪新茶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⑰均称颂兔毫纹与鹧鸪斑黑釉茶盏，是深受饮茶家所喜爱的。连当时的统治者宋徽宗在《大观论茶》中亦赞美“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⑱因此，突出窑变的广元窑的发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它发挥了自身的客观条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适应了统治者的提倡和社会的需要而发展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广元窑从造型、釉色看，都是宋或略早于宋代的作品，元明时期的作风则极为罕见，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南宋末与蒙古统治者发生冲突，蒙军于1236

年分兵三路侵略南宋政权，西南一路，进取阳平关连陷成都、利州（广元）等地，在掠夺财富以后，自动从四川撤退。以后，又曾多次进攻四川，一直到1278年全部陷入蒙军统治手中。四十多年的战争，不能不使广元窑遭到破坏，因而停止烧造。

执笔者：陈丽琼

附录 广元瓷窑出土的瓷器及窑具

一、碗 8件

1. 广口外撇，口下急收，内壁有六条凸线纹，坦底圈足，釉色黑而光亮，内有一涩圈。通高6.3、口径21、足径7.5厘米。
2. 广口微外撇，外沿有凸弦纹一周，坦底圈足，内壁绘黑色草叶纹，米黄色釉。通高5.5、口边18.7、足径6.4厘米。
3. 广口外撇，厚唇，内壁作六条凸线纹，坦底足壁外张，内有涩圈，青灰釉。通高6.8、口径18.2、足径6.6厘米。
4. 广口，下腹微鼓，内壁出六条凸线纹，足壁略垂直，黑褐色釉。通高7、口径18、足径6.5厘米。
5. 广口微外撇，口下急收成斜壁，圈足，黑色釉。通高7、口径18.2、6.5足径厘米。
6. 敞口，斜壁，坦地圈足，足宽而外张，黑色釉。通高5.4、口径13.5、足径5.6厘米。
7. 口微撇，斜直壁，外腹下略方直，青灰釉，有涩圈。通高5.2、口径12、足径5.7厘米。
8. 敛口，鼓腹，下腹丰满，足径垂直，黑釉。通高5.2、口径12、足径4厘米。

二、盏 4件。

1. 敛口，圆唇，弧线壁，假圈足或玉壁底，黑褐釉。通高6、口径11.2、足径3.5厘米。
2. 敛口，口沿有凸弦纹，足壁外张，假圈足，内底有兔毫

纹，黑色釉。通高7、口径11.3、足径4厘米。

3. 掩口，口沿有凸弦纹，下腹丰满，假圈足，黑色釉。通高5.5、口径9、足径3.5厘米。

4. 敛口，方唇，腹下足瘦小，内壁有褐色兔毫晶脉纹。通高7、口径10.5、足径3.8厘米。

三、碟 2件。

1. 侈口、折腰，平底，黑釉。通高2、口径11、足径4.5厘米。

2. 扳沿，弧线壁，平底，土绀黑釉。通高1.5、口径8.9、足径3.3厘米。

四、盘 6件。

1. 扳沿，口作六出花瓣形，下腹急收，盘心较薄，平底，施黑色满釉。通高3、口径17、足径6厘米。

2. 扳沿，腹部呈斜直壁，圈足，内壁绘铁黑色草叶纹，米黄色釉。通高3.5、口径16、足径7.5厘米。

3. 侈口，腹部略有曲度，圈足较深，米黄釉或青灰釉，内壁绘铁黑色草叶纹。通高3.5、口径16、足径6.7厘米。

4. 侈口，宽沿，沿下微鼓，圈足，褐色釉。通高3.5、口径14、足径5.5厘米。

5. 扳沿，鼓腹，腹下渐厚，内有人字形的凹状纹。通高2；口径11.1、足径5.5厘米。

6. 侈口，腹微鼓，有涩圈，黑色釉，玳瑁纹。通高7.7、口径30、足径8.7厘米。

五、杯 5件。

1. 侈口，口下内收，上腹丰满，下腹细瘦呈小底，内壁底，绀黑釉。通高6.1、口径11.3、足径4.8厘米。

2. 敞口，口下急收，浅圈足，底小，褐色釉。通高5.4、口径11、足径3.1厘米。

3. 喇叭口，口下急收，浅圈足，足壁窄小，黑色釉，玳瑁纹。通高5、口径12、足径3.6厘米。

4. 直口，直腹坦底，平足微向上凹，口沿无釉，紺黑色釉。通高4、口径8.5、足径2.5厘米。

5. 敞口、弧线壁，浅圈足，黑褐色釉。通高4，口径3.5、足径2.5厘米。

六、盞托 5件。

1. 托口微外撇，口下略收呈坦底，托盘浅平，足壁内收，足底微向上凹，其形似带托茶碗，多为青灰釉。通高5、口径8、足径4厘米。

2. 敞口，口下弧线内收，托盘略宽而浅平，足向上坡度较大，微圈足，且有各色釉与纹饰。通高3.9、口径6.2、足径2.5厘米。

3. 直口，托身浅短、盘略呈弧形壁底为空心、圈足，只饰白色化妆土。通高2.5、口径5、足径3.6厘米。

4. 与3式略同。仅托身伸长托盘作六折折花瓣形。通高3.4、口径5、足径4厘米。

5. 敛口，托身下落，托盘上升与托口平齐，盘底下凹，饰白色化妆土。通高3.3、底径5.8、口径7.2厘米。

七、罐 3件。

1. 撇口带盖，颈肩有双立耳，深腹，圈足，此种形式大小不等，尚有各色釉，纹饰上有绘花及直弦纹等。通高19.3、足径8.5厘米。

2. 直口，无颈，鼓腹，平底双联罐，褐色釉。通高4.8、口径7.9、底径6.3厘米。

3. 卷沿，鼓腹，圜底，颈上有褐色乳钉纹，内壁满釉，外壁无釉，刻划篦状条纹。通高7.5、口径8，底径5厘米。

八、钵 1件。

敛口，厚唇，外壁口沿有二弦纹，深腹，坦底，浅圈足，底特厚。通高13、口径20、足径9.5厘米。

九、盒 1件。

子口，浅盖，小凹底，多米黄釉，绘黑褐色花朵纹，且有浓

淡之别。通高3、口径4.5、足径3.8厘米。

十、水匱口 3件。

1. 直口，单系，平底，多为素胎。通高7、口径6、底径4厘米。

2. 敞口，厚唇，唇沿有把，斜直壁，褐色釉。通高3.8、口径7、足径4.2厘米。

3. 直口，短嘴，深腹，假圈足，米黄釉。高4.5、口径4.6厘米。

十一、洗 1件。

敛口，无颈，上腹丰满，下腹瘦小，平底。通高3.4、口径6.5、底径3.8厘米。

十二、瓶 8件。

1. 喇叭口，长颈，鼓腹，腹部多饰褐色釉或白色化妆土，绘牡丹芍药等纹饰及素胎。通高17.8、口径4.7、足径5厘米。

2. 撇口，厚唇，与1式略同。通高20.2、口径6、足径6厘米。

3. 撇口，厚唇、颈腹难分，圈足，多上紺黑色釉或素胎。通高14.5、径5、足径4厘米。

4. 撇口，长颈，鼓腹，平底，黑色釉。通高11、口径3、底径3.2厘米。

5. 撇口，短颈，丰肩，深腹，平底，米黄釉绘草叶纹。通高5、口径2.5、底径2.8厘米。

6. 直口，贯耳，筒腹，平底，黑釉。通高18.2、口径4.7、底径4.5厘米。

7. 敛口，口下微鼓，肩上有凸弦纹，颈上有贯耳，足壁外张呈喇叭形，黑釉。通高18.5、口径3.8、足径5.8厘米。

8. 口残，长颈，肩有兽面衔环，下腹丰满，足壁外张呈喇叭圈足，黑釉。残高21.5、足径8厘米。

十三、香炉 3件。

1. 扳沿，口上两方耳，粗颈，鼓腹圆底，底下有三兽足，有黑绿或无釉饰白色化妆土。通高11.8、口径10厘米。

2. 直口，直腹，腹壁有二组弦纹，平底三足，各类釉色皆有。通高8.3、口径8.5厘米。

3. 扳沿，短颈，丰肩，肩下急收呈坦底，圈足及三兽足等。通高12、口径14厘米。

十四、壶 2件。

1. 喇叭口，宽扁把手，管状流，鼓腹，假圈足，米黄釉，饰黑彩草叶纹。通高7.5、口径3.5、足径3.5厘米。

2. 短流，盖身相连，盖与口沿有一圆孔，流略低于盖面，圈足。通高5.8厘米。

十五、鸟槽 1件。

敛口，浅腹圆鼓，腹上有状把手，平底，多上黑釉。通高2.2、口径4、底径3厘米。

十六、小瓷塑

种类较多，有小猴骑马、牛、羊、狗等，上黑、褐色釉等。通高6厘米左右。

十七、匣钵 2种。

1. 漏斗匣钵，用耐火土烧成，大小不等，匣壁有孔。其中一件高8.5、口径16、底径5.6厘米。

2. 碗形匣钵，匣壁无孔，质同，上大小不等。其中一件高6.3、口径12、底径6厘米。

十八、支垫 5种。

1. 盅形垫。小口，足略大，似倒扣茶盅。

2. 三叉垫。叉距9厘米。

3. 垫饼。径4厘米。

4. 垫柱。高4厘米。

5. 环垫。径6.5厘米。

注 释:

- ①②⑦国家建材总局建筑材料学研究所:《我国古代黑釉瓷初步研究》,1978年6月中国古陶瓷学术报告论文。
- ③黄颐寿:《清江出土的乳钉茶杯浅说》,1981年中国古外销陶瓷学术会论文。
- ④南朝鲜国立中央博物馆:《新安海底文物》,《中国古窑址瓷片展览》1981年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出版。
- ⑤宋伯胤:《建窑调查记》,《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3期。
- ⑥厦门大学人文学博物馆:《福建建阳吉水建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4期。
- ⑧村上勇:《富田三太良遗迹出土器陶瓷》,《贸易陶瓷研究》No.1 1981年p23—28。
- ⑨蒋玄怡:《吉州窑》图41,44。
- ⑩叶喆民:《河南省禹县古窑调查记略》,《文物》1964年8期。
- ⑪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鹤壁集古代瓷窑址发掘简报》,1964年《文物》8期。
- ⑫王家祐:《四川广元黑釉窑初探》,《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3期。
- ⑬1974、1975年笔者两次于长江下游马鞍山河段进行河道考古调查,常见宋墓中有兔毫纹盏出土。
- ⑭《广元县志》,十二卷,1930年重修。
- ⑮四川大学:《四川政治经济史稿》。
- ⑯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文物》1963年1期。
- ⑰《蔡忠惠文集》,卷二,《试茶:北苑十咏之六》,万历双谿斋刊本。《苏文忠公诗集》卷31,11页。《石门文字禅》卷8,11页,四部丛刊本,《诚斋集》卷20,7页。
- ⑱《大观论茶》,清顺治三年,浙江委宛山堂本《说郭》弱九十三。
(原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4期)

记广元宋墓腰坑出土文物

魏 达 议

1968年，四川广元县上西乡上西大队在皇泽寺石刻造像北面修水渠时，在一座石椁双棺墓的腰坑底部发现一对黑釉盖罐。这对黑釉盖罐在造型、釉色、胎骨上完全相同，是同一窑口烧造的。

黑釉盖罐 两件。形制完全相同。罐通高1.3、盖径12.2、边宽1.7厘米。盖的边缘宽出罐口0.5厘米，中央凸起，顶有连接的双反卷环形纽。罐为圆口，短颈，腹下收为浅圈足。口径10.5、腹径1.7、圈足径7.7高1.4厘米。

盖罐为灰黄色细砂缸胎，质细密坚硬，吸水性较弱。罐底外部的露胎部位挂有一层紫黑色的“乌泥”，由于上釉不到底，故呈现出整齐的“紫黑色胎”。陶罐是在1100°的高温中烧成。胎体厚约0.4厘米。

盖罐施黑釉前均用米黄色化妆土均匀地抹了一层。施釉均匀整齐，采用蘸釉法。因而有的部位呈现褐色的点线纹。口部边缘及近底部1.2厘米处和盖里面均不施黑釉。罐盖顶部只抹一圈米黄色的化妆土。使整个器物的色彩不显单调。由于焙烧时流釉，罐的口部边缘和盖纽边缘出现了米黄色化妆土和黑釉相混合的釉下褐色。在罐外底部有一周整齐且较厚的凝聚堆釉。

这个墓虽有纪年的买地券，但字迹模糊不能认出确切年代。我们只能从两件铜镜的造型与湖南宋墓出土的铜镜比较；而出土的钱币除莽泉和唐钱外，种类较多的是北宋钱币，最晚而又大量出土的是金海陵王完颜亮的正隆元宝。金正隆年间（1156—1161年）相当于南宋高宗绍兴末年。因此，这座石椁双棺墓的年代不会早于南宋绍兴年间，从而也就证实了同墓出土的其他器物的具体年代，两个黑釉盖罐应是南宋初期的珍贵遗物。

据《广元县志》第三编一〇二页陶瓷业说：“广元陶业似早，考县北磁陶堡当在明时，其成陶之器不悉何时没于水，每当水落常于河干掘获小缶，质同今之母家山陶，因陶没而业歇。”又：“大石（堡）之母家山，陶瓷并出，瓷属粗料，陶则细质，瓷业现犹经营，陶则停矣。”又据《四川广元黑釉窑初探》一文中说：“四川出土的古瓷器中，经常见有一种黑釉的器物，而兔毫盏与酱滴斑黑釉盏等最常见。这类器物一般都认为是宋代瓷。”“瓷窑铺又名瓷瑶铺或瓷陶堡，在广元县北门外约十二里……陶片堆积中以黑釉的占绝大多数……其中以上层的宋代黑釉器为最普遍。”（王家祐：《四川广元黑釉窑初探》、《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3期），该文作者在窑址收集整理出的“黑釉系标本”，有正黑色发光釉，酱边黑釉，兔毫纹黑釉，酱斑花黑釉，紫色霞光黑釉，黄色霞光花黑釉等，当是广元地区窑的主要系。

广元宋墓腰坑所出土的黑釉盖罐，从胎骨、釉色、制作和时代上无不与广元黑釉窑的产品相同，它就是当时当地的产品。在窑址的堆积层中去年我们还发现一个与黑釉盖罐的罐盖造型相同的器盖，胎黄红色，盖表涂有薄薄的一层米黄色化妆土，还未上黑釉。这就充分证明广元确实烧造过这类黑釉盖罐。

在调查此墓的同时，我们又调查了广元窑，并采集了一些标本，对广元窑的釉色品种有更多的了解，现提供一部分给学者们以资研究。窑址的宋代堆积层中椭圆碗，正黑釉盏、玳瑁盏、黑釉闪星点纹盏、黑釉兔毫盏、黑釉鹧鸪斑盏，褐地白花瓶、米黄地褐花瓶、黄地褐花瓶；黄地黑花盆，黄地黑花茶盏托，褐釉无口瓜棱壶、黄地黑花壶、黄地褐花壶等。

广元黑釉窑的特征与建窑产品相同。因此，我们认为广元黑釉是继承建窑的黑釉或兔毫斑而来，其产品完全可与建窑产品相媲美。

（摘自《文物资料丛刊》1983年7期）

四川崇宁县铁砧山的古窑址

支沅洪

一九五五年五月，我调查汉严君平墓时，听当地老乡说：“离这不远有个‘古窑包子’，很早就没烧了，现在还可以看到很多的烂陶片”。在群众的指引下，我到那里看了一次，认为是一座古代窑址。因为窑址位于铁砧山，暂名它为铁砧山窑。

铁砧山在崇宁县的西北部，实际是一横土埂子，所以又叫横山子，山南端有严君平墓，由此向北约三里，有一座较大的土堆，这就是老乡所说的“古窑包子”。土堆的上端及四周，满布着不成器形的各类陶片，及各种不同的匣钵、支钉等物。这些陶片全是泥胎，一般火候都颇高，釉色以黄绿为主，多数为轮制，厚约半公分。在窑址上拾得的陶片中，有一个四耳残陶罐，釉色，胎骨、器形，完全与成都跳蹬河第5号墓出土的五代四耳罐相同。有一种类似陶璧之物，质粗，直径约30厘米，厚约2.5厘米，地面堆积颇多。这种东西，是放在墓中殉葬用的，还是一种工具？尚须进一步研究；但过去在华阳县包家桥清理的小形宋墓中曾出土过类似之物，它上面并写有死者出生和死亡的年月日期。除此以外，这次拾得的标本，约可分为下列六种：

第一种：中为紫色泥胎，内涂灰色或黄色釉。器形以四耳罐为多，碗、盘外为半釉，满底，轮制。

第二种：中为紫色泥胎，外涂黄釉，酱色斑。

第三种：中为灰色泥胎，外涂灰褐色或黄褐色釉。

第四种：中为淡灰色泥胎，外涂灰色釉，开细冰纹。

第五种：中为半瓷胎，内外为淡黄褐釉，开细冰纹。

第六种：中为瓷胎，外为白釉。

关于窑史的记载，在崇宁县志卷二第一页说：“铁砧山又名横山子。今农人之耕田者犹时获古碗古盘。”同卷第十一页又说：“县北土性凝坚，制砖瓦可耐久。”卷三第二十一页说：“桂花场(县北)有窑二座，一名嘉庆窑，从嘉庆间开办；一名新窑，光绪间置。以黄泥为料，白石炉底捣烂；傅面烧数日遂成坚硬之品。大小器皿各有制造。有小窑数座，造香炉、香筒、痰盒、春凳、洗脸盆诸器具；惟造黄绿二色亦佳，不及大窑耐久。环邻数县亦颇畅销。”由这三段记载，可以看出这个古窑址很早以前就在大量烧造四川民间所用的生活器皿。过去谈中国陶瓷艺术的一般只限于几座精美的名窑，但要从物质资料上来真正了解和研究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和艺术创造，这类“无名气”的民窑是颇值得我们今天重视的，希望能引起同志们的注意与研究。

(原载《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3期)

四川省新津县邓双乡发现古代窑址二处

罗永祚

1956年10月四川省文管会派员到新津县普查登记地下文物，在邓双乡石厂湾附近新（新津）蒲（蒲江）公路上，发现唐代窑址一处，其分布面：上至玉皇观山麓，下至滨临南河河岸约百余平方米，新蒲公路横贯窑址，碎陶片随处皆有，因修路挖土，露出的碎陶片约尺余厚。据省文管会同志，就拾得的许多瓦足及碎陶片鉴定，其磁色和质量，与邛窑器略同。

在邓双乡玉皇观山麓猴子桥进山处发现旧窑址一处，其分布面积与前者大约相同，其特点是：遗弃的陶具较多，但均已残碎。就拾得的碎陶片鉴定与前者比较，亦略同，但时间可能较前者为早一些。此处的碎陶片分布情况和数量，较前者更为显著。

（原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期）

成都金堂县金锁桥古窑址

陈 丽 琼

金锁桥窑址，在金堂县玉虹公社同兴大队金锁桥，距玉虹陶厂二里许。这一带地方盛产陶土、磁石，特别是青釉料，现在玉虹陶厂仍以产青釉陶著名川中。

此窑址是玉虹陶厂职工发现的，去年12月编写组曾前去调查，窑址遗存早年已被破坏，现残存约有150米，宽50米左右。文化层厚约2米，包含残存的砖砌窑灶，已不能复原。另有窑具及青釉碎片。其时代可能早到隋唐至南北朝。现整理于下：

制造方法及质地与釉色

采用轮制拉坯成型，胎体有明显的轮旋刀削纹，质地坚硬，扣之有清越的音响。但也有其精细粗劣之分，优者质地紧密细腻，无孔眼；劣者疏松而有气泡，釉与胎结合不紧，变形者多；粗者器形表现为平底或小平足，细者多大平足。釉色以青白釉为主，青釉、青中泛黄次之。青白釉多施于碗，青釉多施于壶、罐，青中泛黄多用于复式耳系罐，釉均不到底，一般均在施釉前上一层白色装饰土，然后上釉，未上白色装饰土的地方，即便有釉，呈色较深，光泽不如上有装饰土的产品。

器 物 造 型

早期碗、碟皆平底无足，或平足、小平足，晚期作品皆有

足，或撇口，其形式排列如下：

1. 碟： 敛口，厚圆唇，腹下即徐徐内收，平底无足，釉不到底。高3.3、口径10、底径4.3厘米。

2. 盘有2式：

1式： 敛口、直唇，腹下急收成坦底。高3、口径14、底径12厘米。

2式： 敛口、圆唇，口沿略下即徐徐内收。高3.2、口径16、底径7.2厘米。

3. 碗有六式：

1式： 敛口、直唇，腹下急收呈坦底，平足，足底微向上凹。高6.3、口径17.2、底径6.4。

2式： 撇口，口下内收，沿略厚，坦底，平足，足底微向上凹。高6、口径16、足底5.6厘米。

3式： 撇口、唇为喇叭状，口沿较薄，上腹直壁，下腹急收呈坦底，平足，足底微向上凹。高4.5、口径10.3、足径4.3厘米。

4式： 撇口，唇厚，上腹直壁，下腹徐徐微收，平足，外底有一周弦纹，足壁外张。高4.3、口径6.2、足径3.4厘米。

5式： 敛口，直唇，弧壁，小平足。高6.2、口径17、足径3.8厘米。

6式： 口沿残，足为圈足，足沿方平。

窑具： 与金马六马槽古窑相似，有环垫、垫圈、锯齿形支钉，其大小是根据制器的大小而定，但其窑具多属红色，质量比新津、邛崃固驿较差。

此窑破坏甚重，堆积层残存不多，从断壁上看不出时代的先后，所遗留之大型器皆不能复原，如桥形系罐、盘口壶等，均只有上腹至口沿部分。但根据已复原的平足碗、平底盘看，其时代可上溯到南朝早期，其下如以圈足碗看可延至唐末。

（原载《四川陶瓷史资料》第1辑1979年）

灌县玉堂公社古瓷窑址试掘

四川省博物馆 灌县文管所

1977年春，四川省博物馆在灌县工作的两位同志，获悉该县玉堂公社县五七干校附近有瓷片和窑具的消息后，立即前往调查，初步证实是一处内容比较丰富的古瓷窑址。同年十月，省博物馆又派员对此遗址进行复查。通过两次调查得知，古窑遗址分布在县西南约五公里的玉堂公社的歧山、凤鸣、五七三个大队之间，东北与羊马河相邻，西南、西北被青城山、卧牛山、赵公山环抱，地处卧牛山下。窑址的面积约2.5平方公里，上下分布十八个窑包，当地社员称为“上九堆、下九堆”。在窑包范围内，遍地都是废弃的瓷片和窑具。有些地方堆积层厚达5—10米，确属我省一处重要的瓷窑遗址。

为了配合农田基本建设，更好地保护文物，四川省博物馆和灌县文物保管所联合组成发掘组，对此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在当地党委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当地社员群众的大力协助下，发掘工作于11月5日开始，12月25日结束，历时50天。

这次试掘是试探性的，仅在罗家窑包和何家窑包各开了一个5×5米的探方，罗家窑包清理了一座残窑，现将试掘情况依次介绍如下：

一、窑炉结构

窑炉在罗家窑包西侧，前为菜地，后有松林，左右与社员住房

相邻。窑炉的上部全部损毁，仅存废弃时的窑炉底部。全是烧结的炉沙堆积层，我们根据已露窑炉的残墙，采用顺势攀瓜的办法，分层揭去废窑底部炉沙至初建窑时的窑炉底面窥其残貌。

窑炉建筑在废弃的瓷片、窑具斜坡堆积层上，为长条形斜坡式龙窑。全长42.92米，内宽1.76~2.62米，残高1.64~2.08米。由火膛、前后窑室、隔墙和烟道等部分组成。方向正西，倾斜坡度 $14^{\circ}\sim 18^{\circ}$ 。炉底铺0.15~0.24米的河沙，颗粒较粗，内夹石英。南、北二墙均用双层土坯砖平铺直砌至1.2米起卷，似弧形卷拱顶。东墙(后墙)和隔墙都用单层土坯砖直砌，东墙较低，有明显的烟熏痕迹。窑炉的内壁都抹了一层厚0.12~0.16米的耐火粘土，由于久经高温，已变成红褐色的烧结层。窑床的前部为斜坡，后有十级阶梯。窑炉前部有两个排列的灶形火膛，全用砖和砾石建成，由于我们这次是从被废弃的窑炉底部清理出初建窑时的窑炉，经历年的培修、炉底加厚、炉墙增高、墙顶皆多变异，虽然也清理出了窑墙和残留的极少部分卷拱，但都是变异后的情况，失去原貌，找不到窑门和投柴孔，无法了解窑炉的全貌，更无法详细介绍窑炉的形制、结构和装烧窑的工艺过程。只将发掘的原始资料介绍出来，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

二、窑炉内出土遗物

窑炉内出土遗物都在窑底炉沙中清出，有窑具、瓷器和铜币三类：(表1)

(1) 窑具——全用夹砂陶制成，共采集24件。

支钉——圆形五齿，齿尖粘有釉药。

垫圈——圆形无齿，一件上下都粘有泥条，一件下部粘附粗砂粒。

垫环——壁形，两面都粘有釉药。

垫饼——形体不规则，采用手捏制而成。

墊筒——圓筒形，腰部有三圓孔，个别无孔。

(2) 瓷器——采集能看出器形的瓷片共68件。

碗分六式：

1式 敞口，弧壁，小圈足。内壁印有折枝牡丹花纹。砖坯红胎、绿釉。高8.4、口径25.4、底径6厘米。

2式 敞口，斜壁，小圈足。褐胎、酱釉。高4.4、口径10.6、底径4.12厘米。

3式 侈口，斜壁，小圈足。灰胎，白釉，其中一件内壁印有六道直线纹。高3.8~4.3、口径11.9~12.9、底径3.8~4.4厘米。

4式 浅形，口微侈，折腰，圈足。砖红胎，内外皆施一层黄色化妆土，无釉。高4.2、口径13、底径4.8厘米。

5式 敞口，宽斜折沿，直腹，凹底，圈足。褐胎，青黄色釉。高6.9、口径11、底径5.8厘米。

6式 浅形，直口，平唇，弧壁，玉璧底。褐胎内施米黄色化妆土，外施酱釉，芒口。高3.9、口径11.5、底径4.4厘米。

盘——侈口，弧腹，圈足。内壁印六道直线纹。灰胎，白釉。高4.3、口径15.4、底径5.3厘米。

碟分四式：

1式 侈口，斜壁，饼足。灰胎，白釉。高3.7、口径10.5、底径4.3厘米。

2式 敞口折沿，弧壁，饼足。褐胎，绿釉。高2.8、口径13.8、底径4.8厘米。

3式 浅形，敞口折沿，坦腹，饼足。褐胎白釉。高2，口径11.3、底径4.3厘米。

4式 菊瓣口，饼足。褐胎，绿釉。高2.7、口径10.8、底径4.5厘米。

盞分二式：

1式 敞口，折腹，卧足。砖红胎，灰白釉。高2.2、口径

14.5、底径3.7厘米。

2式 敞口，直颈，斜腹，圈足式饼足。褐胎、青釉或绿釉。高2.4~3.2、口径9.6~10、底径4~4.3厘米。

杯分二式：

1式 侈口，直腹，圈足。褐胎，内壁和口沿施青黄色釉，外部为青釉。高5.1、口径8.4、底径5厘米。

2式 敞口，斜直腹，平底。砖红胎，素烧无釉。高2.8、口径3.1、底径2.2厘米。

坛分二式：

1式（残）直口，平唇，短直颈，平斜肩，肩部有管状耳。灰胎、白釉。残高2.7厘米。

2式 侈口，腹微鼓，平底，肩部有双横耳。褐胎，米黄色釉。高5.5、口径1.5、底径3.8厘米。

壶（均残）分二式：

1式 浅盘形口，长颈，鼓腹。红胎，内外均施米黄色化妆土，无釉。残高7.1、盘口径7厘米。

2式 喇叭形口，长颈，鼓腹，颈部有柄痕。灰胎，白釉。残高7.2、口径7.7厘米。

水盂——（残）直口，直颈，圆腹。腹部釉下有绿彩直线纹。褐胎、白釉。残高2.6厘米。

盒——（残）子母口，直腹。红胎，内外均施白色化妆土，无釉。残高2.6厘米。

豆——敞口，宽折沿，直腹，短把，饼足。褐胎、青釉。高7.8、口径12.2、底径6.8厘米。

器盖——（残）伞盖形，乳状。褐胎，绿釉。

（3）铜钱——在炉沙中清出有“开元通宝”和“皇宗通宝”二种。

三、罗家窑包一号探方出土遗物

罗家窑包一号探方在窑包北侧，与窑炉相距约六米，探方从表土层至生土层约六米。全是废弃的瓷片和窑具，层次不明显。从出土遗物观察，上下层之间有变化，其变化特征是：上层窑具以垫圈为主，出土瓷器的底多沙粒痕。以灰胎和灰褐色胎为主，多数是白釉和灰白色釉，小底直腹碗为此层代表。下层窑具以支钉为主，灰胎很少。釉色以青色为主，绿色次之，白色几乎绝迹。印花和釉下彩器是为此层特色，执壶也在此层中大量出土。采集遗物有窑具、瓷器和铜钱三类。

(1) 窑具——质地与窑炉所出者相同，共采集 104 件。

支钉——为窑具中最多者，可分二式：

1 式 五齿足，有圆形、筒形和杯形三类，大小不同者十多种。

2 式 圆形六齿，大小七种。

垫圈——其中一种与窑炉所出者同，一种有凹槽。

垫环——形制与窑炉所出略同，有大小两种。

垫饼——与窑炉所出相同，有大小四种。

支柱——立椎形，平底，有明显的轮制痕迹，有的底部粘结一层较薄的沙粒，有的上部粘结着垫条或垫圈，有的粘附着支钉、垫饼或条等。

底垫——碗形，底有圆孔。其中一件于垫板上，底粘支钉、上承托瓷碗，支钉的齿尖粘在瓷碗的内底上。

垫筒（有称墩子者）——分腰部有孔和无孔的两种。

垫条——有直条和弧形条两种。

垫板——三角形，中有孔。其中一件三角部位有垫饼，中部有和垫柱接触痕迹。

印模——蘑菇形，上阴刻一“何”字。

(2) 瓷器——采集成形瓷器 302 件。(表二)

碗分十式:

1 式 与窑炉所出 1 式相同。

2 式 与窑炉所出 2 式相同,有印花、六道直线纹和素面三种。

3 式 与窑炉所出 3 式形状相同,有印花、六道直线纹和素面三种。

4 式 侈口,弧壁,圈足。有印花、六道直线纹和素面三种。有褐胎、绿釉和灰褐胎、白釉两种。高 4.7~9.3、口径 13.3~26.2、底径 4.8~10 厘米。

5 式 敞口,斜壁,小饼足,足部有三周凸弦纹。黑褐色胎,青釉。高 3.7、口径 11、底径 3.5 厘米。

6 式 敞口,椭圆腹,圈足。灰胎,白釉。高 4.9、口径 15.2、底径 5.1 厘米。

7 式 形同 6 式,浅腹。灰胎,白釉。高 4.9、口径 17.2、底径 5 厘米。

8 式 敞口,折沿,斜壁,折腰,浅圈足。褐胎,青釉。高 4.9、口径 13.5、底径 5.1 厘米。

9 式 敞口,折沿,弧壁,圈足。褐胎,青釉。有大小两种。高 4.7~6.2、口径 13.3~27.5、底径 4.8~10 厘米。

10 式 浅形,敞口,坦腹,圈足。灰胎,白釉,口部有一周为酱黄色釉边。高 3.2、口径 13.7、底径 3.1 厘米。

盘分二式:

1 式 与窑炉所出相同。

2 式 侈口,折腰,圈足。灰褐胎,灰白釉或青釉。高 4.2、口径 15.8~17.6、底径 5.2~6.6 厘米。

碟分二式:

1 式 侈口,斜壁,饼足。灰胎,白釉或褐胎青釉,白釉居多,个别的为酱色釉。高 3.7~4、口径 11~11.2、底径 4.6

~4.8厘米。

2式 形同1式，壁薄，底凹。灰胎，白釉。高3.4、口径11.6、底径3.4厘米。

盂分二式：

1式 浅形，敞口，平底，坦腹。灰胎，白釉。高1.4、口径8.7、底径3厘米。

2式 敞口，折腰，平底，褐胎青釉或褐胎灰白色釉二种。高2.2~2.9、口径8~9.8、底径3.2~3.8厘米。

钵 敞口，侈唇，直肩，斜腹，圈足。褐胎，青釉。高9.2、口径24.8、底径10.2厘米。

壶分六式：

1式 敞口，长颈，鼓腹，平底。腹前有管状流，后有带形柄，褐胎，酱色釉。高17.4、口径4.3、底径7.4厘米。

2式 侈口，长颈，鼓腹，平底。腹前有管状流，后有柄。灰褐胎，青绿色釉。高21.4、口径6.2、底径7.2厘米。

3式 敞口，平折沿，长颈，鼓腹，平底。腹前有管状流，后有带形柄，两侧有耳。褐胎，绿釉。高20.4、口径7、底径7.4厘米。

4式 形与2式相似，颈较粗大，腹较圆鼓。褐胎，青釉。高16.4、口径8.2、底径6.6厘米。

5式 直口，短颈，方圆腹，平底，肩上有流，对称有柄。灰褐胎，青釉。高6.1、口径2、底径4厘米。

6式 直口，卷唇，椭圆腹，平底。腹前有流，后有柄。灰褐胎，青釉。高9.6、口径4.1、底径6厘米。

瓶——喇叭口，长颈，圆腹，平底，灰胎，青釉。高9、口径4.8、底径3.9厘米。

水盂——小口，圆腹，饼足。褐胎，绿釉。高6.9、口径2.6、底径4厘米。

炉——敞口，斜直沿，凹底，饼足。腹下有三个乳钉状足，

砖红胎，灰白釉。高4.5、口径11.5、底径4.9厘米。

灯分二式：

1式 敞口，折沿，直腹，凹底，直柱，喇叭形圈足。柱间一周有莲瓣装饰。灰胎、青釉。高9.1、口径8.4、底径6.4厘米。

2式 敞口，斜折沿，直腹，短柱，喇叭形圈足。灰褐胎，青釉。高7.6、口径8.9、底径6.8厘米。

盒分二式：

1式 形与窑炉所出者相同。

2式 子母口，扁圆腹，圈足，褐胎，灰白釉。高3.6、口径10.5、底径6.7厘米。

器盖——四种。

器颈——三种。

器柄和器耳等。

另外还采集有各种砖红胎，绿釉印花残片，划花碗残片和釉下黄、酱、褐彩残片等。

(3) 铜钱——在探方内仅出“开元通宝”铜钱一种。

四、何家窑包一号探坑出土遗物

何家窑包在罗家窑包西北，相距约四十多米，中有菜地相隔。探方开在何家窑包东南侧窑地废品垃圾堆的腰部，从表层至生土层，深3.65~4.12米，全是废弃的瓷片和窑具，看不出明显的层次变化，出土遗物上下层也没有显著区别，故未分层。出土遗物有瓷片、窑具和铜钱三类。

(1) 窑具——质地与罗家窑包所出相同。

支钉——高大厚重，有五~七齿的十余种。

垫板——有六角形和圆形两种。

垫环——玉璧形，上有八个凹槽。其余的窑具与罗家窑包所出相似。只是形体较厚重，粗糙，没有发现垫圈，出土器

物只有支钉痕，没有垫沙粒的现象。

(2) 瓷器——共采集成形器物528件。(表三)

碗分七式：

1式 敛口，圆腹，璧底。褐胎，酱釉。高7、口径12.6、底径5.2厘米。

2式 敞口，斜壁，折腰，璧底。褐胎，青釉。高6.6、口径15、底径8.2厘米。

3式 侈口，斜壁，璧底，莲花形。灰褐胎，青釉。高7.5、口径17.8、底径8.8厘米。

4式 形同1式，饼足。褐胎，青釉，口沿一周加施酱釉。高5.1、口径18、底径6.8厘米。

5式 敞口，弧壁，饼足。黄褐胎，青釉，口沿一周加施酱釉，有厚壁和薄壁两种。高4.7~5、口径13~14.2、底径6.4~6.6厘米。

6式 口微侈，饼足。褐胎，青釉。有深腹和浅腹两种。高4.6~7、口径15.6~18、底径6.9~8.3厘米。

7式 平折沿，饼足。有黄褐胎，绿釉，砖红胎，米黄釉，个别为青釉。有深腹和浅腹二种。高4.9~8、口径14~20、底径5~8.4厘米。

盘分四式：

1式 敞口，平唇，斜壁，饼足。褐胎，青釉。高3.2、口径17、底径7.5厘米。

2式 敞口，斜折沿，坦腹，饼足。褐胎，青釉。高3.8、口径15、底径7.1厘米。

3式 侈口，弧壁，饼足。有褐胎、青釉和红胎，内外施米黄色化妆土，素烧无釉二种。高3.4~4、口径16.3~16.4、底径6.5~6.7厘米。

4式 侈口，曲腹，饼足。褐胎式红胎青釉。有五出、六出花瓣式口和素烧无纹饰者三种。高4.3~5、口径17.2~23.8、

底径7.9~9.8厘米。

盆分四式：

1式 敞口，平底，腹上部有凸弦纹一周，褐胎，青釉。高11、口径32、底径23.2厘米。

2式 敛口，平底，一件腹上部有凸弦纹一周。红胎，青釉。高8.2~11、口径27.6~28.8、底径17.2~20厘米。

3式 敛口，平底，平折沿，腹上部有凸弦纹一周。红胎，青釉。高12.4、口径29.6、底径17.4厘米。

4式 侈口，饼足。褐胎，青釉。高15、口径36.6、底径14.2厘米。

钵分五式：

1式 敛口，鼓腹，饼足。褐胎，青釉。高6.4、口径12.1、底径6.7厘米。

2式 敛口，侈唇，饼足。褐胎，青釉，口沿和腹部有酱色釉斑。高8.7、口径14.3、底径7.6厘米。

3式 敞口，饼足。黄褐胎，青釉。有酱色斑点。高7.1、口径13.5、底径7.3厘米。

4式 敞口，曲腹，饼足。钵内布满锯齿纹。褐胎，青釉。高4.7、口径14.6、底径7.3厘米。

5式 直口，圆唇，直腹，颈、腹部各有一道凹弦纹。腹部饰双耳。褐胎，青釉。残高9.2、口径13.6厘米。

瓮——敞口，圆唇，坦腹，饼足。有褐胎、红胎，青釉、米黄釉，酱釉和素烧多种。其中有十余件有酱色或褐色釉斑。高3.3、口径11.2、底径4.6厘米。

罐分十一式：

1式 敛口，卷唇，鼓腹，饼足。褐胎，青釉。高8.6、口径9、底径5.6厘米。

2式 敞口，饼足，双耳。黄褐胎，青釉。高8.6、口径8.3、底径5.6厘米。

3式 敛口，圆唇，饼足，双耳。褐胎，青釉。高6.1、口径9.3、底径4.8厘米。

4式 敞口，鼓腹，饼足，肩颈部饰对称双耳。褐胎，青釉。高11.7~12.8、口径6.9~7.4、底径6.3~6.6厘米。

5式 敞口，饼足，肩饰四耳。褐胎，青釉。高12.1~15.5、口径7.2~7.6、底径7.1~8.4厘米。

6式 敞口，椭圆腹，饼足，肩饰四耳。褐胎，青釉。高8.1、口径7.8、底径5.6厘米。

7式 直口，矮颈，鼓腹，饼足，肩饰四耳。褐胎，青釉。高12.5、口径8.2、底径7.1厘米。

8式 敞口，斜直颈，肩有耳，下部残。褐胎，青釉。腹部有酱色釉斑。残高5.6、口径1.3厘米。

9式 敞口，直颈，肩饰四横耳，褐胎，青釉。残高9.9、口径1.0厘米。

10式 小口，鼓腹，肩饰四横耳，褐胎，青釉。残高9.3、口径10.6厘米。

11式 桥耳。

壶分十式：

1式 喇叭口，鼓腹，饼足，腹前有短直流，后有柄。褐胎，青釉。口径9、高8.3、底径3.4厘米。

2式 鼓腹，饼足，腹部有流。褐胎，酱釉。残高9、底径4.2厘米。

3式 敞口，折沿，椭圆形腹，饼足，腹部有短直流，颈肩部有对称双耳。褐胎，青釉。高10.3、口径8、底径6.1厘米。

4式 敞口，斜折沿，直腹，饼足。腹部有短直流，颈、肩部有对称双耳。褐胎，青釉。高14.2、口径7.4、底径6.6厘米。

5式 小口，圆腹，肩部有短直流。红胎，外施米黄色化妆土，无釉。残高7.1厘米。

6式 长颈，撇足，腹前有流，后有柄，两侧有耳。褐胎，

青釉。残高18.6、底径8.8厘米。

7式 侈口，长颈，鼓腹，饼足。颈部有三道凸弦纹。腹前有流，两侧有横耳。褐胎，青釉。高23、口径8.4、底径8.8厘米。

8式 敞口，斜折沿，鼓腹，饼足。腹前有短直流，两侧有耳，颈部有两圈凸弦纹。褐胎，青釉。高19.6、口径8.8、底径9.4厘米。

9式 敞口，短颈，鼓腹，肩部有流，两侧有耳，下部残，褐胎，青釉。残高9.3、口径12.3厘米。

10式 小颈，鼓腹，饼足。腹前有流，后有柄。褐胎，酱釉。残高8.7、底径4.2厘米。

盒分二式：

1式 子母口（缺盖）折腹，饼足。褐胎，青釉。高7、口径17、底径8.4厘米。

2式 子母口（缺盖）圆腹，璧底。红胎，酱釉。高3.3、口径5.2、底径4厘米。

匣分三式：

1式 敞口，斜直腹，饼足。口沿处有流，腹部有把，把中空。褐胎，青釉。高9.6、口径13.6、底径7.6厘米。

2式 敛口，折沿，鼓腹，饼足，口沿处有流，腹部有把。褐胎，酱釉。高8.6、口径11.9、底径6.6厘米。

3式 莲瓣形，敞口，唇沿外折，饼足。口沿处有流，口与腹间安柱形柄。褐胎，青釉，有酱色釉斑。高8.4、口径11.2、底径6.4厘米。

炉——侈口，平底，下附三足。褐胎，酱釉。高6.1、口径8.7厘米。

圆球——上划圆圈纹，红胎，素烧无釉。直径3.4厘米。

纺轮——素烧无釉，高2.9、直径3.6厘米。

管——素烧无釉，中有孔，长3.6厘米。

器盖

另外还出土一件有釉下彩的残瓷片。

(3) 铜钱——探方内只出土“开元通宝”钱，与罗家窑包一探方同。

五、结 语

(1) 窑址的时代：

关于灌县窑的时代，无文献记载，无从稽考。仅就两次调查和这次试掘所获资料，根据器形和钱币等实物资料，作出初步推论。

窑炉和两个探方所出遗物，从器形发展和烧造工艺的演变规律看，三者之间可能有直接承袭关系。据此，我们将其分为三期。一期包括窑炉和罗家窑包一号探方上层，出土器物以圈足为主，而且制作也很规整，玉璧底和平底足很少见。器物与器物之间以沙粒和垫圈支撑叠烧为主，很少采用支钉垫烧，故器物内底多沙粒痕而极少支钉痕。此期以各式小圈足碗为其代表，具有典型的宋代风格。出土钱币最晚的有宋仁宗时的“皇宋通宝”，因此，我们把这期的时代定为北宋中、晚期，可能不致大误。二期包括罗家窑包下层，玉璧底和饼足器占一定比例，小圈足碗的量显著减少，大量出现各种印花、划花和釉下彩器，燕盏在这期内也出得很多。器与器间以支钉垫烧为主，器内底多支钉痕，少沙粒痕。此期以各种印花、划花和釉下彩器为其特色。出土钱币只有唐代的“开元通宝”，故而，我们将这期定为唐晚期至北宋。三期包括何家窑包，出土器物都是玉璧底和平底，均用支钉烧成，各式短直流壶，莲花形碗、盘、匜等为此期典型器物，具有唐代风格。钱币只出唐代的“开元通宝”一种，故将此期定为唐代。

(2) 灌县窑的面积大，堆积层厚，内容丰富，就时间、范围、内容都是我省内突出的代表。此次试掘只是小规模试探性的发掘，仅接触到十八个窑包中的极少部分，获得资料非常有

限，典型性和代表性都很不够，无法概括灌县窑全部内容，上述分期，局限很大，可能有错，待今后正式发掘后再作补订。

(3) 灌县窑的试掘，解决了我省过去出土的一些瓷器的窑口问题，填补了我省唐代文物的空白，同时也为我省陶瓷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表一： 出土器物统计表 (总计68件)

器 物 名 称	数 量	百分比%	器 物 名 称	数 量	百分比%
碗	13	19.1	豆	1	1.4
盘	5	7.4	盒	1	1.4
碟	15	22.1	水 盂	3	4.4
盏	8	11.8	盂	8	11.8
壶	7	10.4	器 盖	1	1.4
罐	6	8.8			

表二： 出土器物统计表 (总计302件)

器 物 名 称	数 量	百分比	器 物 名 称	数 量	百分比
碗	162	53.6	水盂	1	0.3
盘	16	5.3	瓶	2	0.7
碟	12	4	炉	5	1.7
盏	5	1.7	灯	9	3
钵	3	1	器盖	9	3
壶	52	17.2	器柄	10	3
盒	4	1.3	器颈	12	4

表三：

出土器物统计表

(总计582件)

器 物 名 称	数 量	百分比 (%)	器 物 名 称	数 量	百分比 (%)
碗	231	39.7	盒	2	0.3
盘	87	14.9	匝	21	3.6
盂	130	22.3	炉	1	0.17
盆	9	1.5	圆球	2	0.3
钵	15	2.6	纺轮	1	0.17
罐	54	9.3	管饰	5	0.9
壶	22	3.8	器盖	2	0.3

执笔者：陈显双

(原载《四川陶瓷史资料》第1辑, 1970年)

灌县、郫县南朝至唐古窑群调查

陈丽琼

在灌县金马公社与郫县黎明公社接壤的地方是四川省干部学校所在地（今为省旅游学校），在其西南面有一叫瓦窑的地方，在它的四周连及郫县新胜公社大坟包，南北长约5公里，散见有22个左右的古窑包群。此窑群是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于1964年发现的。1976年陶瓷编写组又进行了复查，并对灌县金马、六马槽、罗家窑、周家窑、大坟包古窑进行了复查和探测。这些窑包均属青釉窑系，其时代早晚不同，现分述于次。

灌县金马六马槽窑址

金马六马槽窑址，北距上瓦窑约300米，属金马公社金马大队三生产队。此窑是由两个窑包合并而成，是窑群中最大的一个古窑址，周长220米，高22米。窑包附近的西面，农舍周围挖地一至二米深，仍有窑场堆积层，可能当时窑场作坊即设在此周围。

为探测窑场的时代特征，从窑包北面已被农业生产挖露的断层，在距原生土2米70公分的斜坡断面进行挖掘，由北向南伸进1米80公分即出现很明显的一个断面，上层厚0.20米，下层2米，再下即原生土。上层全是树根、釉陶和窑具共存，其釉陶碎片胎质有灰白、红色胎，器形均为敛口坦底圆圈足碗，及平底桥形系罐、盘口桥形条壶，多足砚等。其釉外壁不到底，此层时代，若以圆圈足碗，及多足砚看，可能多为唐代遗物，但又不

一般隋唐时的复式系罐、壶等。另在上下两层之间，有较多的青白地带褐、黑、绿等彩色珠点线圈纹饰器皿。下层堆积，全是小平实心足碗、高足杯、及大量的盘口壶、桥形系罐，和多数的足底略大的敛口碗、小盘口圆形四耳系罐。其次在接近原生土层有平底无足敛口碗、碟、高足豆、盘，及属汉代作风的几何纹花砖一块，根据以上器型的演变，初步认为此窑址的时代，可早到南朝，晚至唐代。

这次探测共选集标本 3 2 0 余件，现从制造方法、质地与造型、釉色与纹饰、与其他窑的关系、烧造的时代等叙述如下：

制 造 方 法

是利用辘轳拉坯成型，待坯干后先上一层白衣，即化妆土，然后上釉，上釉方法是采用浸釉与蘸釉两种，有的是单用，有的是合用，视其器物的大小而定。一般小件碗、杯多用浸釉，大件的壶、罐多用蘸釉，大碗则两种并用。

焙烧方法：

在堆积层内不见煤渣，可能用木柴火煅烧。入窑烧制不用匣钵，用支垫、支钉。有仰烧与覆烧两种。覆烧是将器的口沿向下着于环垫、底足向上，然后在底足上托以一圆形锯齿支钉、钉上再托第二个器件，依次重叠数个至十个不等入窑煅烧。仰烧即以柱形支垫着窑，碗足托于支垫的圈坯内，碗口向上，然后又在碗底放上一个支钉，钉上再放碗，又依次重叠，入窑烧制。因此凡碗、杯、盘内底均有五个支烧痕。另外，还有大件套小件入窑烧制法。

质 地 与 造 型

胎质有灰白、红色两种缸胎，但以灰白为主，下层器物胎体常有孔眼、黑渣，有的釉面极不平整而有汽泡，器体变形或粘结较多，胎体厚重，胎浆淘洗较差，但在上下两层之间，特别是上层器物，器形多正规，釉色光亮而平整，不见泡，胎体结构紧密，可见上层的器物，已经是比较能掌握好瓷土与瓷石的关系。

系，釉料与胎体结合的关系，火焰升降的关系了。

窑具的种类，有圆柱形、环垫形、泥条坯垫形、锯齿形四大类。

圆柱形有三式：

1式 形如筒，上小下大，束腰中空有底，高2.7、口径10.2、底径1.2、壁厚1.8厘米。

2式 手鼓形，敛口宽唇收腰，口沿有三角形的小缺，可起通风进温的作用。器壁特厚，当是支烧大件壶、罐所用。

3式 扁鼓形，直口宽沿，上下垂直无底壁厚。高11.8、上口口径1.5、内径9、底外径1.7、内径5.5厘米。

环形垫有三式：

1式 璧形环垫，垫面外周边呈弧形，内边正方。外径17、内径10、厚1厘米。

2式 形如圈状，周边方正，体短束腰，内壁有1×1的一条凹槽。高3、外径1.4厘米。

3式 手捏制，将泥条两头相接成圈，径9、厚1厘米。

锯齿形支垫，大小不等，皆作圆状形，有收腰、桶腰，齿足垂直、内收外张均有，一般齿足为五板，大者六板，但数量极少。器径4.5至10.5、高2至5厘米。

这些窑具，从残存的支具与器皿粘结的物证看，支烧的器皿是有一定分工的，如筒状柱形器，由于它体高足小，占窑面少，可插入直径大的璧形环垫中的缝隙，可充分利用窑室空间，增加煅烧器件。筒形支垫与玉璧环垫，多为支烧大型的罐、壶等器，锯齿形支钉又多为碗、盘、杯等，唯平面锯齿支钉，则又专为支烧高足杯所用。

器皿造型的种类有碗、盘、杯、罐、壶、钵、炉、砚八大类。

碗有六式：

1式 敛口，浅腹，无足平底碗，釉色多剥落。高3、口径9.1、底径4.2厘米。

2式 敛口，直唇，坦底，浅腹，平底。高4.2、口径14.5、底径5.3厘米。

3式 敛口，直唇，深腹，实心平足，胎厚。高6.7、口径15.7、底径5厘米。

4式 敛口，直唇深腹，小平足，高7.3，口径15.3、足径4厘米。

5式 敞口，唇边略薄而外敞，平足足壁外张，足底微向上凹。高5.2、口径13.1、足径4.5厘米。

6式 敛口，圆唇，略向外撇、坦底，圈足，外内足壁向外张，底径等于口径的二分之一。高6、口径17.7、底径8.2。其中有件底部刻划有“宜富大吉”四字。

盘有五式：

1式 敛口，浅腹，平底，内底有弦纹。高3.8、口径12、底径5厘米。

2式 侈口，宽沿，喇叭形圈足，又称豆高足盘。高5.7、口径18、底径10.5厘米。

3式 直口，足浅短，其他与2式相同。高7、口径14.5、底径3.8厘米。

4式 与3式略同，只喇叭足放矮。

5式 盘口与腹壁，均与以上各盘相似，唯将喇叭足由高度变短呈圈足，此式盘是其他窑中所少见的。高3.5、口径11.5、底径18.5厘米。

杯有四式：

1式 敛口，深腹，实心小平足，足壁垂直。高3.5、底径2.7，口径8.2厘米。

2式 敛口，腹壁鼓圆，小平足，足壁外张内收，底微向上凹。

3式 敞口，深腹，喇叭形圈足。高6.4、口径11.4、足径3.7厘米。

4式 撇口，深腹，喇叭形高圈足。高8.8、口径8.6、底径7.3厘米。

5式 口微敞，下腹壁急收，喇叭形圈足，上满釉，形制秀雅美观。高8.2、口径7.2、底径4.7厘米。

罐有三式：

1式 敛口、宽唇、肩上有四桥形系、鼓腹、平底，均残不能复原。

2式 侈口、颈下有横耳、腹壁微鼓，均残，不能复原。

3式 盘口、小颈而矮、颈肩之间有圆形耳四个，鼓腹、平底，或小平足。高10~14、口径4.7~6.6、底径4~5.2厘米。

罐与邛崃十方堂“永元”年号罐相同

壶有二式：

1式 盘口，高颈，颈上有三道凸弦纹，肩上有四桥形系，平底（多残破，不能复原）。

2式 盘口、矮颈、其他同上。

钵有二式：

1式 敛口，圆唇，鼓腹平底，釉色青白而光亮，上腹饰有釉下彩的联珠纹，胎骨比其他各器皆细腻，造型端正大方。

2式 盘口、方唇、浅腹、平底。

香炉 口作宽沿、五足作兽蹄状。

砚有二式：

1式 圆形，砚心微凹，周有凹水槽，足为五足钉。

2式 圆形，与1式同，唯足为多足。

水丞 小敛口，腹为鼓形，仅一件不能复原。

釉 色 与 纹 饰

此窑址，范围广，面积大，堆积层厚，延续时间长，对它的许多问题的分析，只能以层次先后来划分比较，特别是釉色与纹饰的变化及其特征，更应如此。

从出土器物的釉色看，下层遗物是青釉、青灰釉、茶色釉，或青中泛黄等色，纹饰上只少量的刻划弦纹于碗的内底，或罐、壶

的颈上，无带彩纹饰。在上下层之间与上层中，釉色增有似白色的青白釉色，黑褐色、赭色、绿色等釉。纹饰上出现了新颖的釉下彩。此种釉下彩的方法，是在白色的化妆土上盖釉，然后在釉上绘以彩色的纹饰，再入窑一次烧成，另一种，则在釉下着上绿色即是。

上下层上釉均不到底，而近似白色之青白釉，只用于钵上，或炉、砚、似桥形系的罐上，唯不见于用于碗上，可见当时这种釉还是比较稀少而珍贵的。

釉下彩的纹饰，是以近似白釉作地，绘上黑褐、赭、黑、绿色的线圈纹、联珠纹、草叶纹。图案的变换，有在口沿绘一至三圈线圈联珠纹，然后再以珠圈纹、线圈纹、相隔，及双圈相套、或交叉变换，构成不同形式的图案。色彩虽然就只那么两三色，但由于配制得当，仍然十分雅洁。加以青白釉的柔和，更显得图案的静穆气氛。

至于纹饰的绘制方法，根据出土136片纹饰中，一般着色较厚，甚而鼓凸出来，看不出什么迹象，以为是直接用手工一次绘成，但从其中有些纹饰由于着色厚薄不等，在薄的部分中便显出有刻划纹的痕迹，从这痕迹的暴露，可看出在绘鱼饰前，其工艺过程还有一次先刻划成纹的工序，然后再着色釉绘制成功。

与其他窑的关系

出土的窑具及青釉器，不管是环形支垫，或锯齿形支钉、敛口直唇小平足碗、或平足碗、敛口圆唇小平足杯、桥形系盘口壶、罐五足砚的造型与质地釉色都与邛崃固驿、十方堂，新津白云寺、玉皇观、金堂金锁桥，成都青羊宫相同，特别是带彩的联珠线圈纹，又与青羊宫窑好似姊妹窑一般。再有就是这里的小盘口短颈圆耳四系罐，与邛崃十方堂出的黑釉“永元”年号的釉色、造型、质地无一不相同，这是它与以上所属各窑的共性。至于他的特性，主要是晚期的圈足碗，又别具一格，和其他诸窑晚期的圈足形式不同而独特，其足壁不是方形或玉璧底假圈足，而是底

径大于口径的二分之一，足壁里外均向中方圆，成特殊圆形足壁，并看不出刀削痕，此足壁工艺上要比其他方足壁费工，生产量上加快上受到影响，可能后来暂时被淘汰而为大平足或方圈足之类了。另与圈足碗同出的多足砚，是唐初期砚，则可能此圆圈足碗、亦当属唐初作品。

这里的窑具尤以圆状或圆底锯齿形支钉，与长江下游浙江肖山县上董窑晋代越窑多足窑具相似，只在使用上略有区别。上董窑是两支具互托一器皿，此是一支具托一器皿，关于胎骨和釉色均多属灰胎、青釉，釉只涂在器壁的上半部，下部近底处胎骨外露。纹饰上有简单朴素的弦纹，底上有窑具印痕，器底足平底微向内凹。

其次是高足盘、短喇叭足盘、小平足杯、高足杯、环垫圈状窑具，锯齿形支烧具亦与河南安阳隋代窑址遗物类似，可见四川早在晋至隋代，我国南北瓷业的发展已是互相呼应、相互交流，具有共同的技术与工艺特点了。

烧 造 历 史

此窑的烧造时代，在方志上或有关史料上均不见记载，仅1966年文物2期曾报导过，四川大学历史系林向同志曾推断：“应为唐代遗物，或可早到南朝晚期”现在看来这个推断是比较正确。不过从当时收集的材料看，作出这样的推论，在实物证据上还比较单薄。经过这次探掘，在最上层的多足圆砚，圆圈足底碗，实属初唐的遗物，关于下层的平底碗，盘口桥形系甗、小盘口短颈四系罐都属南朝至东晋的作风，如小盘口短颈四系罐和邛崃十方堂有“永元”年号文样的罐造型釉色胎质极同。查“永元”年号，历史上仅有三个，第一是东汉和帝刘肇（公元89—105年）时；第二是东晋十六国前凉张茂（公元320—323年）时；第三个是南朝齐东昏侯肖宝卷（公元499—500年）时，若是第一个东汉时“永元”，从出土器物看，汉代作品只少数的无足平底碗、盘与几何纹花砖一片，数量极少，不足为据。

若是第二个“永元”则更无依据，因前凉张氏政权根本未及四川。只在甘肃北部地区。

因此只能是第三个“永元”，主要依据是与南齐“永元”年号相同的罐，伴随出土的小平底杯、碗（平底）、盘口壶、桥形系罐，都属南朝时作风，如敛口平足碗、小平足杯、盘口四系壶在四川德阳黄许镇、昭化宝轮院晋至六朝墓，江苏句容陈家村南朝墓、南京富贵山东晋墓、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均有出土，故推断为南齐“永元”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至于袖下彩联珠纹残片四件，与他同时大量出土的高足杯，与安阳隋代青釉窑相似、很可能为隋代作品。

据以上关系，此窑虽有早到两晋时代的作品，但不是普遍的，同时早期作风延沿至晚期是无疑的，因此还是以与“永元”年号罐相同的器物作比较、暂定为南朝至初唐是此窑的烧造时代比较可能些，至于是否可早到两晋时代，还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另外，因窑的堆积层厚面积大、目前我们所得资料，只是堆积层边沿的一隅，长5——11米，宽2米，深2.20米的面积，还未能窥其全貌，其看法不免局限性较大，推论上很可能有谬误。

探掘的收获

一、窑址堆积层很清楚，未经破坏和扰乱，是目前四川已发现的早期青釉窑中，保存最好而庞大的一个。如能进行发掘，必将对四川南北朝至唐代青瓷发展，提出科学而确切的实物证据，是研究四川青瓷发展的珍贵材料。

二、过去对邛崃十方堂采集的黑釉书写的“永元”罐，无法认识，现在通过此窑的器物相比较印证，完全证实它为南朝时的“永元”，因此对邛崃十方堂窑址烧造的时代，更加深了认识，特别是对那个别有用心的美国人大卫·格莱汉姆推论邛崃十方堂窑烧造时代是唐末宋初，是一个有力的反驳。

三、以前多传说瓷胎上施白色化妆土，始于唐代的那窑白瓷，但在此窑内的器物，从最底层到最上层的青釉碗，或其他器

物，均是先施白色化妆土，然后再上釉色，从这里不难看出，白色化妆土的出现，若以南朝开始计算，至少把我国瓷器上化妆土的时代提早了两个世纪。

灌县金马公社罗家、周家窑址

罗家古窑和周家古窑，均在灌县金马公社，距六马槽约2华里，位于六马槽的东面。周家窑与罗家窑可东西相望，相隔约200米，两窑面积各有300平方米左右。

一、罗家古窑

罗家古窑是一座孤堆，在它的西南面有一电塔矗立，堆积层厚2米左右，可分上下层，上层厚1.3米，下层0.20米。出土的窑具、器皿与六马槽相同。器皿中有碗、杯、盘、砚、壶、罐等，其釉色以青釉为主，工艺过程也与六马槽相同。上层器物的碗全是敛口圆圈足，或少数撇口平足碗。砚有五足、六足圆形砚，壶、罐的耳系均为桥形系，不见复式系，其中出有一件罐的残片的纹饰与邛崃唐代的青釉黄绿彩相同。另在窑具上有一个信手刻划的“痛”字，不知是何意。下层遗物的敛口直唇小平足碗、杯，其时代可能为隋唐代遗物，因此它的烧造时代当在隋唐时期。

二、周家古窑

周家古窑在罗家古窑之西面，窑场上已建有抽水机房，及周家住房。另还有坟堆，并长满了青杠树，堆积层厚约2米左右。这里除窑具上与罗家相同而外，器皿变化特大，多为敞口大平底，宽口沿大平底碗，还有玉璧底碗。复式系反唇罐特多，桥形系极少，敛口小平足碗根本未见。釉色有青、绿、黄等色，釉面平整无气泡，胎质淘洗较好，有灰胎、红胎两种。火候在1000度左右，扣之有清脆之声。这种器物在四川唐和五代的墓葬多有出土。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窑堆拾到一件与六马槽上层的圆圈足碗相同的小碗，因此，是否周家早期也出圆圈足碗，而大平足碗又代替了

它？如果是这样，罗家窑与周家窑的时代是可衔接的，并且周家窑晚于罗家窑，故周家窑的烧造时代最早也只能是初唐时期。

郟县铁占山大坟包古窑

大坟包古窑与灌县金马六马槽相距约七里，位于六马槽的西边，即现在郟县永胜公社五大队三小队。

据《崇宁县志》记载：“铁占山又名横山子，今农人耕田者犹时获古碗古盘”。铁占山在清代属崇宁县，现划归郟县。以上记载，说明窑场已废甚久。这个窑场面积较大，与它相邻的即有四个显著的窑包，现在已有些窑场被开垦为农田，从农田的断壁上还可见若干残瓷片与废匣钵共存。调查时选择了大坟包、二坟包两个窑挖了两个断面，均到1.70米左右即见原生土，出土器物有圆形环垫、三角形环垫，锯齿形支钉、圆垫柄等窑具，釉陶中有撇口平足碗、敞口平足碗、平足水匜、平底钵、复式耳罐、短咀壶、及少数桥形系壶残耳，其时代可能为唐代古窑。

制作及烧制方法

采用轮制拉坯，在上釉以前，必施白色化妆土，然后施釉。烧制方法用三角形环垫，或圆形环垫着窑，在垫上覆扣一碗，然
已在碗口上用圆形泥饼土封扣紧，这样窑内温度均匀，因此

妆上部位，釉色带白，光亮莹润，未饰化妆土部位，即是青色，光度减半，可见装饰土的作用，是能提高釉色的亮度，还能增加玻璃质感的程度。

造型种类

造型的种类，以圆形器为主，其次有镶嵌器，圆琢器。主要是生产日常用具，且以碗为最多，其他如盘、碟、罐、壶、水匜则次之。

碗有9种形式：

1式 敞口、弧壁、平底足，足壁外张。通高4.4、口径13、底径5.8。

2式 敞口，口沿下徐徐内收，平底足。通高6.5、口径16.8、底径7.2。

3式 敞口，斜直壁，下腹壁与底呈80度的凹形底，平底足。通高4.4、口径13、底径4.9。

4式 撇口，口以下略收，平底足外张，通高6.8、口径15.8、底径6.8厘米。

5式 撇口、弧壁至内底急下呈80度的角度，故为凹形底，底足外张而内收。高4.2、口径12.8、底径4.3厘米。

6式 撇口、弧壁、底足外张，平底足。通高4.8、口径15、底径6.8。

7式 撇口，弧壁、平底足，底足外张而内收。通高6.6、口径19、底径8.8厘米。

8、撇口，口沿较厚而宽，平底足。通高4.2、口径16.8、底径6.8厘米。

9式 撇口，口沿呈宽边，弧壁，平底足，足壁外张。通高4.1、口径14.8、底径6.2厘米。

碟有2式：

1式 敞口、厚唇，口沿下内收、平底足。高1、口径11.5、底径3.7厘米。

2式 口微撇，口沿外垂，平底足，足壁外张。通高3、口径9.5、底径5厘米。

盘有2式：

1式 敞口、浅腹斜直壁、平底足。通高4、口径19、底径7厘米。

2式 敞口、浅腹直壁、底坦平、平底足。通高3.5、口径16、底径6.5厘米。

以上各式碗、碟、盘的底径只是极少1:1，一般多底径大于高，其特点是比较安稳，不似小平足，容易倾倒，适应于民间需要。

钵有2式：

1式 敛口、圆唇、丰肩、肩腹之间有二凸弦纹，腹下急收，平底足。通高7.5、底径8.1、口径16厘米。

2式 敛口、圆唇、肩腹之间凸弦纹一周，其下急收，平底足，其特点在上腹绘有茶色草叶纹三组，笔调简朴，豪放不羁，充分表现了民间绘画的特点。

罐有2式（皆不完整）：

1式 敞口、短颈、鼓腹、复残耳、平底。

2式 直口、双复式，平底足。

壶有三种（皆不完整）：

1式 盘口，四桥形系。

2式 只见短流

3式 流略长，带把、平底。

水盂——广口而撇，直壁、腹上有三周凸弦纹，于弦纹之间有一圆形喇叭口把，下腹足处急收，平底足，呈玉璧状。其特点，在口沿上施有一公分宽的茶色釉作装饰。通高9、口径15、底径7厘米。

烧造的历史与其他窑的关系

此窑是四川唐代民间窑之一，其范围虽广，但堆积层不很厚，可能烧造时间不会很长。从所收集的标本看，其特征多为平底足，短流，及少数玉璧底，不见初唐时的敛口圆形深圈足碗，或更早的小平底足，因此它的时代不会早至初唐，从器开片的特点与釉色的种类，花纹的装饰，略与邛崃唐代作品相似，如青釉的圆形短流、青釉上绘以茶色的草叶纹，厚唇敞口碟，都是邛窑的作风。因此，我们认为此窑的烧造时间当在金马罗家窑之后，与周家窑略同或稍晚，说确切一点，可能在中唐至晚唐时候。

其次，虽然这里有很多地方与邛窑作品相同，但其质地的精细、造型的秀雅，釉色的多样又差于邛窑，只能与乐山唐代青釉器，金马周家青釉器、金堂金锁桥青釉口相比。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窑的窑具几乎绝大部分与各窑相似，但这里有一种圆形三角形垫具，又是其他诸窑所没有的。

（原载《四川陶瓷史资料》第1辑1979年）

乐山县关庙古窑址

陈丽琼

乐山关庙古窑，位于岷江中下游的左岸，乐山市关庙公社二大队四生产队，盘陀寺的一条水渠的两旁。

窑场堆积情况，现仅存60厘米厚，釉陶碎片散见在水渠周围约半华里，据当地干部云：“在廿年前，堆积层厚约3米左右，后因1957年兴修水渠时被挖去了”。

包含有罐、碗、杯、盘、砚及各类窑具碎片。

制作方法，是采用轮制拉坯成型，坯晾干后即先上一层白衣，然后再上釉，是用浸釉与浇釉法两种，前一种多施用于碗、盘、杯，后一种多用于大型的罐、坛等。

烧制方法，调查时未见有煤渣，可能是以柴火烧制。

装窑方法，是用圆柱形支垫着窑，垫上托置器皿，其器皿之间以锯齿形支钉相隔，放上数个或十个不等器皿入窑烧制，至于大型器则用二级梯形环垫，或圆形环垫支烧。

造型种类较为简单，以生活用具为主，有青釉平口短颈桥形系罐，黄釉反唇短颈瓦沟系罐、圈耳四系罐、太平底敞口碗、玉璧底黄釉碗、侈口折腰碗，大平底盘，圆形砚等。

胎质、均灰色缸胎，火候较高，结构紧密，气孔较少，扣之有清脆声。

釉色以青、黄二色为主，亦有极少青中泛紫，在上釉之前，先饰有一层白色化妆土，在未上到白衣之处的釉色，即漏胎骨呈铁青色。釉不到底，脱落现象较重。

窑具：有圆柱形支垫，二级梯形环垫，锯齿形支钉，大小环垫等。

以上器形与釉色、窑具，均和邛崃十方堂、新津玉皇观、郫县新胜公社大坟包遗物有相似之处。此窑不见于记载，它的烧造时代当属唐或至隋。

此窑的发现，可说明四川在隋唐时代，不仅川东、川西有古窑烧造，在川南亦有古窑烧造。

（原载《四川古陶瓷史资料》第1辑1979年）

四川西昌高枳唐代瓦窑发掘简报

四川省博物馆

西昌地区博物馆 西昌县文化馆

1975年5月，四川省金沙江、安宁河流域联合考古调查队在西昌县高枳公社陈所大队第七生产队发现一座瓦窑遗址。同年九月，我们对此窑址进行了发掘清理。窑址位于西昌城东三公里邛海以北，北面为一小溪，当地人称瓦窑沙沟，过去西昌至凉山的大道从沟中经过。南面为西昌至昭觉的公路。瓦窑建在沟边的一小土丘上，窑门面北，现残存窑室两座，东西排列，相距6米。这次发掘重点清理了西面一座，编号一号窑。现将一号窑简介于后。

建 筑 结 构

一号瓦窑是利用沟边小土丘断面向南凿一平洞，再加修饰而成。窑的结构分窑门、火膛、窑室、烟室和烟道等部分。

窑门 略呈椭圆形，宽1.05、高1.77米。用单砖封门，大部倒塌。

窑室 窑室凿在生土层中，平面呈一马蹄形，顶部呈圆拱状。内壁修整后又抹上一层0.06米厚的泥皮，已烧成青灰色。泥皮外有0.3米厚的红烧土。窑室的前部为火膛，后部为窑床。全长4.6、顶高2.1米。

火膛 在窑室前部向下挖一口大底小的浅坑即为火膛，长2米，宽窄依窑室两壁而定。火膛最深处0.18米。发掘时火膛

内尚存厚约0.6米的木炭渣灰。

窑床 在窑室后部留一土台为窑床，长2.6米，宽窄依窑室两壁而定。土台高0.14至0.2米。

烟室和烟道 窑的最后部为烟室。在烟室和窑床之间有一用单砖砌成的隔墙，封至顶部。隔墙表面抹一层泥皮以防砖缝漏烟。隔墙下有距离大体相等的排烟孔五个。孔距一般在0.45至0.5米左右。孔高0.4、宽0.15至0.4米。隔墙后是一槽沟，即为烟室。烟室高2.02、宽0.15至0.2米。烟室顶端凿透地表以造烟囱。烟囱已毁。

出土遗物

板瓦 数量最多，大部残破，分大小两种。大者长33、上宽22、下宽30、厚1.5厘米；小者长29.5、上宽22、下宽20厘米。均为泥质，呈青灰色，火候很高，背部素面，内面有布纹。

筒瓦 均为泥质，火候不均，筒径9、长34、厚1.5厘米。子口颈内收，子口长4厘米。背部素面磨光，内面有布纹。有青灰色和褐色两种。

瓦当 均为莲纹，分三式：

1式 中心为一圆莲房，周围绕以莲花八瓣，花瓣略呈菱形；外圈饰十七颗乳钉。边廓较宽，直径12厘米。

2式 与上式基本相同，只是边廓较窄，外圈饰二十五颗乳钉。直径11厘米。

3式 中心莲房较小，莲花瓣呈三角形，外饰连珠纹，直边廓。直径11厘米。

钱币 在窑门处出土唐“开元通宝”铜钱一枚。钱币字迹清晰，边廓整齐。有明显的火烧痕迹，颜色发灰。当是工匠烧窑时掉进去的。

黑陶罐 一件。发掘过程中在火膛内发现。素面，敛口，圆肩，斜直腹，盘底。口径9.5、底径13.5、高14.5厘米。

高枳窑址出土遗物绝大部分为板瓦，也有一定数量的筒瓦和瓦当。因此，我们认为此处窑址主要是烧制板瓦的，也烧制少量的筒瓦和瓦当。

窑的建造方法与洛阳隋唐宫城内瓦窑的情况基本相同。莲花纹瓦当均为典型的唐代风格。另外，在一号窑门处还出土了唐“开元通宝”，因此，我们初步推断这是一处唐代窑址。

高枳窑址所出的器物单纯，时代明确，是四川省首次发现的唐代烧瓦窑。在四川西昌地区发现这些唐代遗物，不仅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而且为研究当时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

（原载《文物》1977年6期）

重庆近郊的建窑遗址

〔美〕 葛维汉著 秦学圣译

1938年在重庆时，友人告知长江对岸黄桷埡附近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瓷片，并说那里新修了一条公路，建议我去看一下。四月十三日我从储奇门过江在海棠溪上岸，登上了去黄桷埡的山岗，不久便发现了一个宋代窑址。它就是那些瓷片的主要来源。使我感到惊异的是这些瓷片显然属于典型的建窑瓷或所谓的“天目瓷”。除此而外，我在窑址未发现明代瓷或其他瓷类。不用多长时间，我就在这窑址采集到许多瓷片。另外还有一个黑色残瓷瓶；几个完整的红釉碗，其内面底部有一圈未上釉；和几个涂有深色釉的盏，一个残盏带有熟知的兔毫纹。这些器物光润美观，有红色的，也有黑色的，少数带有杂色斑驳。

建窑乃单色瓷，由红到黑，色调不一，通常都有很好的光泽；有些带有红色或黑色细条纹，称为“兔毫”；有些带有杂色斑驳，称为“鹧鸪斑”；外面底部通常不上釉。福建产者胎色深而黑，其未上釉部分经窑烧后变为红色。建窑瓷由于其产于福建的建安和建阳而得名。日本人称这类窑器为“天目瓷”中国的河南和其他地区也生产这类瓷器，但其胎坯常为白色或淡黄色。一种红褐色带有“油滴”（或无釉的小斑）的建窑瓷非常宝贵难得。

最常见的，至少是最为人所知的器物，乃一种小底圆盏。福建和河南产的这种盏底部凹而显出圈缘，内面底部釉很厚而凹如池，外面近底部釉层形成厚的边缘或滴流。这种瓷盏在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享有盛誉

除盞之外还有黑色瓶以及黑或红色的壶、瓶和碗等。碗常为红色，内面底部有一无釉的圆圈。

我以前在成都东门外十三里处的琉璃厂宋代窑址发现过典型的盞、瓶、壶等。由于考古学家尚未承认四川出产“天目瓷”，尽管在窑址发现这类瓷器，我也未敢肯定它们是四川产品。事实上，在琉璃厂发现了许多这类瓷器，很难说它们是外地生产而偶然被带进这个窑址的。黄桷埡窑址的发现充分证明四川地区广泛生产建窑瓷器。我们甚至在邛州窑址采集到带有“油滴”的“天目瓷”。在四川各地的宋代和明代墓里多有随葬的瓷罐，内盛对死者的供品。上面一般都有“啃食”日或月的龙饰，有些还饰有几竖行上翻或下翻的小丘；由红到黑各种色调的都有；底部有不上釉的部分。这显然也属于“天目瓷”。

四川还制造“天目瓷”的后代产品，例如广泛使用的表面有光泽的褐色水罐就非常近似“天目瓷”，应与“天目瓷”有传统的关系。在中国瓷店里可以看到十分象“天目瓷”的碗，内面底部甚至也有一不上釉的圆圈。

(译自 David Crackett Graham: Chien Yao Kiln Site Near Chungking, Szechwa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X, 1938)

巴县姜家窑址

陈丽琼

巴县姜家窑，在姜家公社上场口生产队。此窑址仅有窑灶，不见堆积层，窑灶顶上为一明墓。从残存的部分看，结构简单，窑室修建是采用就地取材的自然石块砌成。其形为扁圆桶形，从火膛至后壁，深2米、宽2.4米、高2.1米。后壁顶有二圆形出烟孔，窑室有二级台阶，匣钵与烧制器堆叠于上。窑前还有未烧过的煤渣。这种个体小窑在川东地区俗称“鸡窝窑”。

窑内有匣钵、黑釉瓷碗、碟、杯、白釉碟等残片，有的碗还放在反扑的匣钵内。烧制方法是一件器皿一个匣钵，匣钵与器皿之间没有避粘的介质，但器皿的外壁口沿下至底及内底有一圈不上釉，可以避免粘连。胎质灰白色，或白中闪黄，制作粗糙，均无纹饰。釉色主要是黑釉，其次是白釉闪黄，釉层中有小气泡，略有闪光。现将标本整理如下：

器 皿

杯：直口内敛，口以下弧线内收，小平足，底部微凹，腹下无釉。高5、口径11.6、足径3.5厘米。

盏：敞口，外折，口沿极厚，大于器壁各部，小平底。高2.5、口径9.5底径2.8厘米。

浅形碗：敞口，口以下弧线内收，圈足略撇。高4、口径16、足径6.5、另一高4.8、口径15、足径5厘米。

深形碗：敞口，口以下弧线内收，足部较丰满，圈足。高6.1、口径16、底径6.8厘米。

碟：白釉，口内敛，口以下弧线内收，圈足，足沿有刀削线。高2.8、口径10、底径4.6厘米。

窑具

锥形匣钵：直口，口以下渐广、腰下急收成锥形小平底，外壁刀弦纹凸起，内壁平顺。高9.5、口径15、壁厚1.2、底径4厘米。

碗形匣钵：敞口，口以下内收，弦纹凸起，底有圆孔通风。高6.8、口径12、壁厚1.6底外径6.5、内径2.4厘米。

根据以上造型，与胎质、上釉等工艺，和川东地区墓葬出土物比较，此窑器皿应属宋代制作。

此窑烧造的器物虽种类不多而粗糙，但还是有其时间代表性，从造型、胎质、釉色看，与四川广元瓷窑铺宋代黑瓷颇相似，在川东地区宋墓中亦有普遍出土，以往我们都认为此类器物，是广元瓷窑铺或建窑出产，现在看来在宋代川东地区亦可自制。

此窑是四川古代烧窑中最小的代表者，从其规模之小，烧造的粗糙简单，它应是民间一家一户所烧，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手工业是由家庭副业草创，陶瓷手工业亦是如此。这一物证，是研究古代个体经济发展的极好资料之一。

（原载《四川古陶瓷史资料》第1辑1979年）

四川武胜匡家坝汉代砖窑试掘记

陈丽琼

1979年3至5月重庆市博物馆、南充地区文化局共同对长江支流嘉陵江流域南充河段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砖窑,现报导如下:

通过调查,在嘉陵江中游的蓬安、南充、武胜境内,都发现有不同时代的砖瓦窑,其中具有时代特征的,要算汉代砖窑。这些砖窑多建造在嘉陵江的一级台地上,或是支流与干流交汇的冲积扇形三角台地上。从已暴露的汉代窑看,多被破坏。南充县兴隆、李渡等地窑群多被破坏,其中比较完好的只有蓬溪县曹家坝窑。该窑位于万和公社三大队四生产队临江的台地上。窑一半暴露于外,顶距地表约1米,上窄下宽,形似炮弹。通高4.20、顶宽1.60、烧结层厚0.55米。底部宽2.90米,烧结层厚0.30米。两侧烧结的窑壁厚0.22米。顶下正中有一烟孔,呈弧顶长方形,长0.60、宽0.23、壁外红烧土厚0.35米。窑内仅有汉砖,别无它物,故推测为汉代砖窑。

武胜旧县匡家坝汉代砖窑位于嘉陵江右岸小溪交汇处,西距武胜县15公里,东与中兴公社隔江相望,现属旧县公社一大队一生产队。匡家坝汉代窑是一窑群,有五处之多。我们只选择处于一生产队的汉代窑群进行了试掘。

此窑群残存二座,编为一、二号窑。一号窑在试掘以前已裸露于外,仅留东北壁及窑床的一部分,其它皆破坏无存。窑床上堆积的全是子母砖块和倒塌后的窑壁混杂物,在窑顶西南面有烧

爆裂了的半截花砖悬于断壁上。

窑炉破坏甚重，残存的窑床呈平面台式，比火膛升高0.30米，前高后低。底部与窑壁有灰色烧结土，而窑壁烧结土与底部不同，整齐均匀，约0.10米厚。

火膛与窑床壁面残高0.70—0.90米，残长2.30米。窑床上留有三排四行烧砖时排坯的黑色印痕。每排四行，长0.44、宽0.19、排距0.05米。从窑床断面看，接近火膛部位的烧结土厚而坚硬，距火膛远者逐渐减之。清理过程中，未发现煤渣，只有少量木炭核，因此，断定其用木柴作燃料。

二号窑与一号窑并列，相距0.50米，距地表仅0.40米，方向是235°。窑中堆积有倒塌的窑壁和烧爆裂的花砖。其完整者，长44、宽17、厚11厘米。

窑的结构，分窑门、火膛、窑床、烟道和窑顶五个部分。窑顶已破坏无存。全窑东西长4.22、南北宽1.92、残高0.34—0.90米。窑周壁均用10厘米厚的细泥抹平。窑床与火膛亦属厚薄不等的细泥粘稠，经焙烧已成坚硬的砖灰色。

窑门 宽0.40—0.48、残高0.30—0.52、红烧土厚0.04—0.01米。门道两壁内，弧形显著。

火膛 平面呈梯形，前小后大，前宽0.66、后宽1.92米。南壁残缺，北壁完整，残高0.50—0.93米。微内收成弧形，底有0.02—0.10米厚的砖灰色烧结土，红烧土厚0.20米。

窑床 略呈长方台形，并高于火膛0.32米，倾斜状，前边比后边高0.10米。东西长1.90、南北宽1.92—2.00、窑壁高0.86—0.90米。床面有0.08米厚的红泥砂烧结土，表面有灰、黑分明的排砖印痕。灰色印痕共九条，中间七条面宽0.17米，窑壁两侧面宽0.12—0.14米。黑色印痕宽0.06—0.07米、长1.78米左右，由窑床前端至后壁底，在八条黑色印痕前端，接近火膛部位，黑色印痕突然中断，但细看有横宽0.08、纵长0.17米左右的黑色印痕。长0.44、宽

0.17米的灰色痕迹，这应是排坯的印痕，只是排坯的方法改为横式。从这些印痕可看出当时的排坯法，横竖皆有，并可作出这样的推测：第一层中间七行，每行排长0.44、宽0.17、厚0.11米的砖坯平放四块，其两侧为增加容量，即把坯轮起放，正好为0.11米，亦为四块砖，而在接近窑床边沿横放四块，刚好留下灰色印痕，这样就可得出 $4 \times 8 + 8 = 40$ 块砖坯。若此窑顶弧面内收在1.10米高时还不显著，正好为中间七行平放与横放砖高度0.11米的10倍；为两侧轮放砖高度0.19米的6倍还余0.08米，就能得出这样的算式： $(4 \times 10) + (28 \times 10) + (8 \times 6) = 368$ 块砖，若此窑顶部完整，即可算出较准确的窑容量来。同时若此窑高度与蓬安曹家坝汉代窑炉高至4.2米，那此窑容量就当在千块以上了。因此，这灰黑印痕为我们了解汉窑排砖坯法，和推测窑炉容量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另外，窑床上0.08米厚的泥砂烧结土遗存，绘图照像后，揭去此层，在烧结得很坚硬的窑床上发现留有与泥砂表面位置相等的灰色、黑色印痕。这种现象不知是否为每次装坯入窑时为避免砖坯与窑床粘结而洒上的泥砂所累积，还是在烧窑过程中认为窑床太低，为加高火膛深度、增加燃料容量、提高烧成温度而作。研究是什么原因，尚待研究。

烟道 共三个，竖穴立于窑床后壁，作长方条形。烟道作法：在窑周壁抹上0.10米厚的泥壁后，才进行挖造。烟道均凹进窑壁0.22—0.40米不等，宽0.10—0.14米不等，红烧土0.07—0.25米。烟道后部无泥壁，原生土夯平。在烟道底部由下而上0.30米处各自扩宽0.04—0.06米，形成榫子。这榫子当为由下而上砌坯封闭烟孔之用。而榫子以下0.30米处即为烟的进口处，这样火力容易被烟道吸引，增加抽力作用，火焰由底部而上，使燃料得以充分燃烧。

经过调查和试掘，初步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窑的结构平面呈倒漏斗形，后壁垂直，窑室、火膛、窑

门周壁向内有弧形，顶无存，不能看出全貌。但根据蓬安汉代窑壁顶部结构及此窑的后壁和平面图相比较，它与甘肃酒泉（《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8期37页）、西安北郊（《考古》1964年4期108页）汉代砖窑的形制颇为类似。从这点可以看出，早在汉代，四川地区就与西北、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上有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的史实。

二、窑床在正中，且前高后底，呈斜坡状，烟道并排设三个，这种结构是比较合理的。窑床前高后低，火焰进入窑室后抽力就大，恰能适应烧砖所需要的温度。烟道并排三个，则可将火膛中燃烧的火焰分三路引入窑室，使窑室内温度均匀，砖坯受热也均匀，这样成品的完好率就高，即能节约燃料，又能降低成本。

三、根据一号窑炉只出子母砖和二号窑炉出长方形花砖类判断，可能这两个窑在烧造砖型上是有分工的。特别从子母砖看，很可能是专为建筑汉代墓葬用砖而烧造。

四、从出土的花砖纹饰看，具有战国晚期巴、楚铜器纹饰的风格，然双线菱形纹、圆点纹似又有东汉花砖纹饰的新意。但从整个纹饰风格看，又无东汉“永和四年造”砖、“万岁”砖上纹饰的那种简朴粗犷风格。一号窑所出子母砖，在重庆冬笋坝西汉后期墓中有过发现（《考古》1959年8期443页）。子母砖的时代问题，冯汉骥先生认为“多为西汉末年，东汉前期”（《文物》1961年11期38页）。再说这两个窑的结构与甘肃酒泉、西安北郊西汉晚期砖瓦窑有共似之处，因此我们认为此窑的烧造时代当在西汉晚期或东汉初期。

（原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宋代石炉栅馒头窑

陈丽琼

重庆市博物馆为了更全面的了解和研究四川古代陶瓷工艺发展的特点，丰富馆藏藏品的内容，在历年多次调查的基础上，于今年2月22日至4月8日，对重庆长江南岸涂山黑釉瓷进行了重点调查和试掘。

涂山古窑址，位于长江南岸文峰公社。分布于东起联合大队白合生产队的王庄、涂山湖水库到黄桷埡正街周围，西至四川省中药研究所，东西长达五华里。它的窑区，因历代修建房舍、建路，和长年被雨水冲刷，窑址多处遭到破坏和复盖，现在露头的地方计有八处。这次试掘点有王庄、小湾、航灯厂附近、涂山湖四个地方，而以涂山湖为重点，共计270余平方米，发现了两座馒头窑，采集了较完整的标本1千余件，现将出土器物及窑炉情况简介于下。

两座窑炉位于涂山水库湖畔，距白合生产队抽水房西20米左右，秋夏水涨即被淹没。故窑址保存较好。

窑炉地表面，被煤渣匣钵瓷片所复盖，一揭土即发现窑室倒塌的乱石和红烧土块，经过清理，发现窑炉是以砂岩条石砌成马蹄形式的馒头窑。其四周土层内有众多的黑釉瓷片及黑釉窑变碗、盘、碟、杯、钵、盏、灯、罐、瓶、壶、水丞、瓷塑小件等。这些器物，有粗细之别，粗器以碗、钵、罐为主。细器以盏、杯、壶为多，但也有特别精细的碗、盘，不仅胎质较薄，釉色莹润，造型也很端庄适用。其釉色以黑褐色为主，同时尚有较多的窑变

幅射花办纹盏、兔毫纹、玳瑁纹盘、碗等。尤以窑变色彩极为丰富，能在一器上同时看到褐、绿、黑、蓝等四色渗融在一起，而又互有区别的釉。

窑炉有两座，紧密相连，仅相距约一米多，东西向者为一号炉，南北向为二号炉。在清理窑炉时，于二号炉的烟窗内发现有窖藏的金银首饰，其中有金耳环、金簪、金花饰、碎银、银手镯、银碗等的工艺美术品，这些金银器的纹饰与造型都具有宋代作风，尤以那莖花的金缠枝、折枝牡丹、莲、菊、葵、梅等纹饰，不仅设计优美，确与宋代工艺图案的作风相类，为二号窑炉的烧造年代的下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旁证。另外，在两炉火膛内均填满了煤渣，可见当时涂山窑是用煤炭作燃料烧制瓷器的。

窑室建造系用砂岩条石经过加工叠砌而成。内壁壁面整齐合缝，外壁凹凸不平。上部已经残缺，仅余下部。有窑门、火膛、窑床、烟孔、烟窗五个部位。现将两窑分别叙述如下：

一号炉方向 平面呈马蹄形。有新旧两窑炉重叠的痕迹，为说明重叠关系，设新炉为 y_1 ，旧炉为 y_1' ， y_1 用实线表示， y_1' 用虚线表示。 y_1 是在 y_1' 的窑炉基础上扩建的，其窑炉结构和长度不变，仅宽度在旧炉上扩大20—40厘米。 y_1' 南北长420厘米，东西宽216厘米，残高50—130厘米，周壁窑汗厚3—6厘米。

y_1' （旧炉）

窑门，平面呈喇叭形，门口宽46厘米，残高100厘米，门外长50厘米，与岩基自然岩石相连，形成八字形门道，道外有黑煤渣层，厚10厘米。

火膛，呈半月形，东西宽166厘米，南北长120厘米，残高90—130厘米，膛内填满了煤炭渣和匣钵、瓷片等物。

窑床，平面略呈梯形，高出火膛90厘米，床面，前高后低相差10厘米，东西宽210厘米，南北深140厘米，残高50厘米。

烟孔，设于窑床后壁，共计四个，东西各二孔，皆紧靠左右窑壁。孔高22—28厘米，宽14—16厘米，烟孔隔墙26厘米。

烟窗，二个，与烟孔墙紧连，分设于窑室后壁东西两侧，窗距78厘米，长66—70厘米，宽46—48厘米，窑汗厚1—2厘米。

y 1（新炉）

整个结构与y 1'相同，只火膛、窑床、烟孔、烟窗等部位均各自向左右两侧扩大20—40厘米，火膛由90增至130厘米高，在火膛周壁留有五根石立柱，推测应为置放石炉栅的支柱。窑床残高42厘米，床面前高后低相差10厘米，其平面铺有10厘米厚的黄砂一层，残匣钵粘结于上。后壁西侧残留三烟孔，东侧残缺。烟孔残高20厘米，宽20厘米，深40厘米，窑汗0.5厘米厚。烟窗二个，大小不等，宽100—104厘米，长46—48厘米。

二号炉（y 2），方向

其形式与建造方法、材料等都与y 1相同窑汗厚2厘米。

窑门，平面呈八字形。口宽48厘米，残高130厘米，门道宽80—108厘米，门道长146厘米，用砂岩砌建，并与岩基自然岩石相连。

火膛，平面呈半月形，东西88厘米，南北宽234厘米，膛中设有砂岩炉栅，残留有6根（正中4根，两角各1根），炉栅设于中部，下至膛底46厘米，上至窑床64厘米。根据残留遗迹看，栅距12—16厘米，栅厚12厘米，略呈圆柱形，正栅共计8根，加上左右二角各1根，合计10根。其排列形式略呈扇形。同时，根据残存炉栅断节看，整个炉栅，多系建窑时早已预计好的长度，直砌建于火膛的中部，仅正中两根炉栅，则为窑膛建好后，紧贴火膛后壁直立两柱，与左右炉栅适度，即再将石栅放置于上。这样处理，可能有两个因素，第一因正对窑门，膛壁与窑门距离较大，石栅长度不便取材，即用搭柱形式；第二可能是为便于除渣上炭，正门二根炉栅采用临时支搭，比较方便灵活，有便于劳动操作，可能后者因素较多。

窑床，平面呈长方形，略大于火膛，窑壁残高44—62厘米，东西长146厘米，南北宽216厘米，床面前高后底，倾斜10度，铺

有5—10厘米的黄沙层。后壁残高10—40厘米，左侧残，右侧有竖烟孔两个，孔大22×22厘米，其排列方式，与一号炉y1'相同，如果左侧不残，也可能有烟孔二个。共计一排当为4个烟孔。其烟孔与后烟窗相通。

烟窗，左右两侧各1个，平面呈扇形，两窗之间有隔墙，隔墙中空，其外壁仍连为一体，东西宽68—70厘米，南北长64—82厘米，于右侧烟窗内窖藏有宋代金银首饰器皿（已见前述）。

综上所述，从出土的瓷器与残留的窑炉，虽属残坏不全，但仍可互相补充，说明如下几个问题。

一、据一号窑炉的新旧两炉关系，可看出虽同是馒头窑，和用同样材料建造，烟孔由一排四个增至六个；窑室面积由208厘米，增至280厘米宽，充分反映了炉室是在不断改进革新中，生产量也在扩大范围；更重要的说明了窑炉面积扩大，烟孔的数量亦要相应增加，如果忽略了这问题，窑炉抽力就不够，火焰的出口失调，燃料不能达到充分燃烧，即会影响窑温的升高。

二、从出土器物分析，烧成范围很广，成品率较高，生烧器极少。为了解烧成温度，我们曾选择了几件生烧产品，一分为二，一分留下作比较；一分进行复烧，窑温达1320℃左右，出窑后，其胎的坚质与釉色的光亮与未入窑的一分相比，即大大超过，且与出土众多的成品碎片相同，而器形并无变异，可见涂山窑在当时的烧成温度已达1320℃左右。

三、30年代美国葛维汉在涂山窑，曾作过些地面采集，并提出与建窑极似的论点，^①但那仅限于地面采集，其论据尚欠完善。经过我们这次试掘，出土的大批实物资料，说明与建窑有相似之处，而也有不同的特征。建窑是龙窑和阶级窑，胎体多灰黑色，而涂山窑是馒头窑，胎色多灰白色和白色。应是宋代四川地区的杰作。

四、涂山窑的窑炉设计及构造、与陕西铜川北宋的馒头窑，^②旬邑安仁金元窑炉有相似处，而且都用煤为燃料，表明这时西

南、西北两地烧瓷工艺是互相交流和影响的。

五、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馒头窑中，在北方的金元时代，有以耐火砖作的炉栅，^③但在北宋时代及其以前，就未有任何发现。这次发现的窑炉栅，不仅早于金元时代，而且还是用砂岩石料建炉作栅，这是一种新发现，为我国古代窑炉建造的发展史上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注 释：

① David Crackett Graham; Chien Yao Kiln Site Near Chungking Szechwan, 1938, 193—194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10卷

② 陕西省考古所：《陕西铜川耀州窑》

③ 咸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旬邑安仁古瓷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3期

(原载《河北陶瓷》1982年4期)

重庆宋代天目瓷

陈丽琼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的东南部，在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北沿嘉陵江上溯可达陕西境内，南沿长江上溯可到云南，顺长江东下可通湖北、安徽、江西、江苏直到海口。早在秦汉时期，重庆即设郡建城，自古以来就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重镇，交通的枢纽。

历来重庆地方史研究者都偏重于历史文献、文物古迹的整理研究，对于重庆古代陶瓷手工业的生产发展概况就很少涉及，故本文拟就重庆南岸黄桷埡涂山窑天目瓷的情况，及其工艺特点，兴盛与衰败，进行初步探讨。

一、天目的产地

“天目”这一名称，最早是指建窑系的茶盏。大约在日本镰仓时代（公元12世纪到14世纪），来我国留学的僧侣把由浙江天目山带回日本的建窑瓷盏称为“天目瓷”。但现在天目这个词的意义已不限于建窑瓷盏。凡是上黑釉的瓷器通称天目瓷。它的色泽有漆黑、绀黑、黑褐、棕褐、柿色等。有的还在这些色泽上闪烁各种窑变，如常称的兔毫纹、鹧鸪斑、玳瑁纹、油滴纹、曜变等。除此以外，还有以黑、褐釉作地，附加刻划纹、剔花纹、压印纹等，也属于天目瓷之类。

天目瓷这一名称虽为日本命名，但现已为国际所通用；在英

语里读作“Temmokh”。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已故）云：青瓷与天目如同绘画中的水墨画，仅在东方得到发展，诞生于中国，后来逐渐传播到邻国，是东方独特的陶瓷制品。①

1983年美国入葛维汉在重庆黄桷埡涂山窑采集了一些天目瓷，除素天目外，尚有兔毫纹、玳瑁纹等天目，其形式有碗、盏、瓶、壶等，葛氏称之为“重庆的建窑遗址”。②

解放后，我们对重庆辖区的天目产地进行了多次调查，有北碚天目、合川天目、江北天目、巴县天目、重庆天目。同时，对巴县、重庆两地天目作了一些试掘工作，从而对其烧造历史、装烧工艺、产品种类等获得了一批实物标本和科学资料，现就这些试掘所得作如下初步探讨。

（1）巴县天目瓷

巴县天目瓷窑，在巴县姜家公社场口生产队，1971年发现，1976年春进行了清理。

此窑址仅发现窑炉及少数瓷片，未见废渣堆积残存。从遗存的窑炉看，结构简单，为就地取材的自然石块略加修整砌成。似为小馒头窑，但又区别于馒头窑，从火膛到后壁，深2米，宽2.4米，残高2.1米。后壁顶有二圆形烟孔，未见烟囱。窑室内有匣钵与烧制器皿堆叠于上，窑室前还有未烧过的煤炭。这种个体小窑俗称“鸡窝窑”。出土有漏斗形匣钵、碗形支垫，瓷器以黑色、褐色为主，器形仅见杯、盏、碗、盘、碟、灯等器件，胎色多灰白、黄白，轮制拉坯，制作粗糙，但不上化妆土，黑褐色盏中有兔毫纹。器形特征，多敛口小平足盏，或玉壁底盏，碗多为敞口斜直壁、弧壁，圈足外釉不到底，内底有涩圈，是宋代常见的器形，在本市宋墓中亦多有出土，当为宋代窑址。以窑炉之小，烧造器形之简单，质地之粗，它应为民间一家一户所烧。据目前所知，它是四川古代窑炉中最小者，这充分反映了宋代重庆地方烧造黑釉瓷是普遍的家庭手工业生产，也从侧面证实了中国封建社会手工业是农民家庭的副业，手工业与农业紧密结合，

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经济的特点，陶瓷手工业亦不例外。这一物证，为研究古代的个体经济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2）重庆天目瓷

重庆涂山天目瓷窑址的某些部份，1982年2至4月配合基本建设对它进行了清理和试掘，试掘面积270余平方米，获得较成形的陶瓷标本近一千余件。

涂山窑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窑场，分布在南岸文峰公社联合大队白合生产队王庄、涂山湖水库到黄桷埡正街周围，直伸公社所在地附近，东西长达五华里。这是南山与涂山之间的低洼地带，越过南岸老君坡即临近长江江岸，产品运销十分方便。由于几百年来人口居住密集，地形地貌改变较大，窑场多被房屋叠压，仅暴露遗存八处。其中以小湾生产队窑场最大，面积约二千多平方米；涂山湖水库窑炉最完整，经过清理，是两座石结构的宋代半倒焰式的馒头窑。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此窑炉至今还残存有石炉棚，这是目前陶瓷考古的新发现。

涂山窑场器物的特征多属宋代风格。根据窑场遗存分布密集的状况，可以想见当时窑业的繁荣景象。

二、重庆天目的造型

重庆涂山天目瓷窑是一个民间窑场，产品以造型简朴端庄的民间日常生活用瓷为主，也兼烧精细端巧的高档瓷。

据目前所知，器物种类在食器方面有碗、盘、杯、盏、钵、碟、壶，陈设器方面有瓶、盆、炉、水丞、灯、鸟槽，玩具方面有小型的瓷塑人物、动物等。这些器物形制规正，形式繁多，在一类器形上即有多种多样的造型。以食器碗而言，即有敞口、侈口、花瓣口，斜直壁、弧壁、深型、浅型，玉壁底、圈足底等，大小型号有十八式之多。粗犷的碗内多有一涩圈不上釉，外釉亦不到底，胎体厚重；精细的皆上满釉，胎薄釉润，少数还有玳瑁

纹。又以盏为例，也有敛口、敞口、侈口，弧壁或斜弧壁，小平足、小玉璧底等，高低不等，大小不一，有九种形式。盏是重庆天目的精致品，内上满釉，外釉不到底。形式端庄巧秀古朴，与“建窑”极似。再如盘、碟之器，亦有敞口、花瓣口，浅弧壁、折腰、坦底，平足、圈足，计十余式。粗放者内底有一涩圈，工细者皆上满釉，多玳瑁纹，造型、釉色均极佳美。就以陈设器而论，如瓶，有侈口胆式瓶、玉壶春瓶、侈口小颈双耳瓶等。如壶，有长流把手壶、瓜形把手壶、侈口小颈双耳葫芦壶等，均造型别致；葫芦形壶河南天目中亦有。③ 此外还有一种少见的环底壶，喇叭口，颈直而短，颈肩上设二复系式双耳，肩上有八颗圆形乳钉纹，内满釉，外釉不到底，其形与江西赣州窑、四川广元窑的环底壶略似。④ 在盒方面，盒盖多素面，有的在其上饰以别具一格的凸形纽，实用而简朴。至于瓷塑小玩具，目前发现的种类还不多，仅以出土的小人物、小马为例，乍一看去，颇似信手捏成，但却各具神情，栩栩如生，于简练中寓精巧，应是经过锤炼的佳作，时隔数百年，看来还耐人寻味。

三、重庆天目的纹饰

重庆天目的纹样装饰，大约有三种，一是釉中装饰，二是釉下绘画装饰，三是胎坯刻划、压印纹装饰。釉中装饰最盛，釉下绘画少而简单，胎坯装饰为四川天目瓷之巨擘。

（1） 釉中装饰纹样

重庆天目瓷胎体质地较一般天目瓷纯净，色泽较白，淘洗较好，且不用化妆土而色泽的光亮度、莹润感极强。釉色以黑、褐二色为主，其次还有漆黑、黑褐、酱色、绀黑、柿色、银灰褐色等，银灰褐色最亮，有些还反射出五色缤纷的虹彩。但众多的纹饰，是在黑、褐釉作地的釉中，呈现兔毫纹、玳瑁纹、油滴纹、鹧鸪斑纹、鳝鱼纹、辐射状的菊花纹、金星纹、曜变纹极少，特别

是曜变仅发现五片。

釉色和纹样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上二次釉；先在胎体表面涂上含铁量较重的底釉，而后根据匠师对纹饰的设想，再挥上又一种含铁量较低的釉料，经过火焰变化，及釉料中对釉色起主导作用的铁化合物配方不同，就能产生出不同的纹饰。

关于釉的化学组成，据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张福康教授分析，酱色釉的构成为： SiO_2 64.12， Al_2O_3 13.99， TiO_2 0.99， P_2O_5 0.21， FeO 0.51， Na_2O 0.37， K_2O 3.22， Fe_2O_3 5.88， MnO 0.11， MgO 2.70， CaO 7.93。这些数据表明酱色釉的本质属于 $\text{CaO}-\text{MgO}-\text{K}_2\text{O}$ 釉，主要着色元素为 FeO ，又釉中含有一定的 P_2O_5 ，说明曾加入过草木灰。

上述釉中纹饰，在我国南北各地宋代天目瓷中都有不同程度上的类似，这说明了重庆天目曾吸取别家所长，才烧制出了具有共同特点的作品。但重庆天目也有自己的特征，如辐射状的菊花纹，是重庆天目瓷最常见、最典型而又最有风韵的。其纹饰变换无穷，色彩尤为丰富；在黑色底釉上辐射出大小各异的花瓣，大的似柳叶，小的似灯蕊丝，似火花，总体似菊花纹，有的在花瓣中闪烁着银色的光辉，和褐、绿、黑、蓝四色渗融在一起，又互有区别，看起来十分柔和细嫩，给人们一种美的享受。这种纹饰仅在精细的小平足茶盏上施用。这种釉中饰纹虽然在耀州窑、青州窑、建窑等地亦偶有发现，但不如这里的绚丽多姿，产量丰富。这些纹样是利用釉中铁化合物在高温饱和溶液中结晶来代替艺术加工制成的，这说明重庆涂山窑的匠师们已能熟练掌握复杂的火焰变化，才能焙烧出这些璀璨的窑变纹饰。

重庆天目另一值得重点介绍的是曜变纹，曜变是天目中最珍贵的纹饰。我在调查清理中共发现五片，有一片是侈口双复式系乳钉纹底壶片，其他四片均是敞口圈足碗残片。

曜变，据日本奥田直荣所著《天目》云：“曜变是建窑中的最上品，世上独有。黑地上施有浓淡的琉璃斑点，又有黄、白等

各种颜色浓淡交融，光彩如锦，数以万计”；“曜变建盏，名传天下，不可多得也”。⑤ 又据日本小山富士夫所著《天目》云：

“曜变天目的釉层厚，颜色深黑，其内底有大大小小的结晶，在结晶的周围闪耀着葱绿、葱紫的放射状光辉”。⑥ 我国陶瓷工艺专家叶宏明认为：曜变天目是天目的一个品种，它是在陶瓷制品如茶碗内施上厚厚一层的漆黑釉，釉里浮现着大大小小的斑点，斑点的周围闪烁着晕色似的光辉……随着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呈现出红、绿、黄、蓝等不同的美丽的颜色。⑦

重庆天目除具有以上大同小异的特点外，还有在银褐色底釉上浮现出大大小小的斑块结晶的，斑块上有一层薄膜，薄膜四周闪耀着晕色似的蓝色光辉，这种光辉随着观察角度不同呈出红、天蓝、绿、紫的艳丽色彩。

最近，在我国上海召开的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中，日本山崎一雄先生发表了有关曜变研究论文，其基本观点亦同于以上各家解释。重庆曜变天目的特点与其相合，⑧ 因此，曜变天目就不是所谓的“建窑所独有”了。

曜变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我国陶瓷工艺专家叶宏明、日本高分子科学家安藤坚两先生认为：曜变天目的色彩变动，是由于光波透过釉面的薄膜而产生的。这层薄膜是在烧成过程中，黑釉受温度、气氛和烧成操作方法的影晌自然产生的东西，而不是茶碗出窑后再用人工附加的；同时还指出曜变天目是在非常局限的烧成条件下产生的，在几十万件中才能产生一件。故被日本人视为“神技”。⑨ 由此可见，重庆涂山窑的匠师们，也是有着多么卓越的才华和创造力啊！

（2）釉下绘画装饰

这种装饰较简单，一般在碗上用料浆于内壁画出五根或六根等分短线，然后上釉。其次是在碗的口沿用白色料浆涂于釉上，成为半厘米左右的边。后一种碗，河南天目称之为“白覆轮”碗。

（3）胎坯装饰

是指在胎坯上刻、划、印和堆贴纹饰。重庆天目刻划纹不多，仅有少数碗之外壁刻莲瓣纹，或口沿作五出或六出花瓣口。堆贴纹亦不很多，喜在罐、壶、盖上设纽和附加乳钉纹或云纹耳系等。胎坯装饰的主要纹饰是印花纹。印花纹多在碗的内壁，及内底的中心部位，压印莲花纹、菊花纹、牡丹纹等，多数为缠枝牡丹配莲花瓣纹，少数为缠枝牡丹配菊花纹。其花纹多凸突，在花的轮廓线处，釉色淡薄呈棕色或黄褐色，稍不注意，还会以为是画料线纹。纹样的布局，一般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关于黑瓷胎坯上装饰印花纹，据目前考古资料看，仅北方山西介休洪山镇和福建泉州宋代天目中有，因此当视为“少有的纹饰”。

四、重庆天目烧造工艺

陶瓷既是生活实用器，又是科技艺术产品。它的造型规矩程度和釉面光洁度是与窑炉的科学性紧密相关的。所以有人又把陶瓷称为“火的艺术”。火使坯体变为璀璨美丽的器物，也能毁掉无数工力所完成的精美作品。古代窑场能否发展，能持续多长时间，是与原料、窑炉以及能否减少生产中的废品有关的。产生废品的原因很多；如瓷土的选用和淘洗，窑炉的改进，匣钵与垫具的配置，上釉的方法和釉的流淌，都是直接引起烧制过程中产生废品的重要因素，这些方面也是历代陶瓷工人改进陶瓷生产技术的主要方面。

（1）窑炉结构

根据调查与试掘资料，重庆天目瓷的窑炉为馒头窑。经过清理发掘的有两座馒头窑，窑室是选用砂岩石料，经过简单加工叠砌而成的，内壁合缝整齐，外壁粗糙不平。上部已残缺，仅留存下部，有窑门，火膛，石炉栅，窑床（窑室），烟孔，烟窗六个部份。前后长4米多，左右宽2米多。火膛内填满了煤渣，当是用煤炭作燃料。火膛内设的石炉栅和石炉栅支柱，就全国发现的占

代窑炉而言，这还是首次，填补了历史上窑炉记载的空白。两窑有叠压关系，可看出窑炉改进的发展过程。叠压的两个窑炉的结构同是半倒焰式的馒头窑。上层新窑是在下层老窑的基础上加宽20—40厘米；老窑烟孔为一侧各2个，新窑每侧增为3个。这反映了生产量在逐渐扩大，也说明了窑炉容积扩大，烟孔的数量亦要相应增加。如忽略这一环节，窑炉抽力就不够，燃料不能达到充分燃烧，即会影响窑温的上升。

从出土物分析，烧成范围很宽，成品率较高，生烧器较少。我们选择了两三件生烧器一分为二，一半留下作比较，一半送去复烧（在现代瓷窑炉中烧造，窑温达1320℃^①）。出窑后，两相比较，未烧者胎黄，无光；复烧者胎白，釉面光亮，色彩艳丽，与出土较多的其他残片比较，器形无变异。可见重庆天目在当时烧成温度已达1320℃，与今日瓷窑烧瓷温度相当。另外，从残件看，器型较规正，变形器极少，飞釉和开片的情况亦很难见到，表明当时不但窑炉结构合理实用，制瓷的匠师已能掌握胎釉的膨胀系数，擅长观测火候，对于窑温的升降的控制做到了恰如其分的程度。

（2）工艺情况

重庆天目的瓷土较一般天目略细白，淘洗较净，精致品经过二次淘洗沉淀，成品细腻而质坚，可与今日之瓷胎媲美。其他非天目器皿质地略差，有的还带黄白，或有少数气孔。成型方法，是轮制拉坯，仅耳系为模制，瓷塑小品人物及动物玩具则为手捏和雕塑。上釉方法，一般为浸釉，少数为刷釉；内底皆满釉，但外部不到底。一般粗糙的碗、盘多内底有涩圈，涩圈是为了快省装烧。茶盏外部露胎处，有的还另上一层铁黑色瓷衣，稍不注意，当还认为是“建窑”盏之铁骨胎足。

试掘与采集的窑具均是用耐火土制成。有大小不等的锅底形匣钵、直筒形匣钵及盅形支托、圈形垫饼、环形垫具。在匣内有的还装砂粒或垫饼，在碗底上亦粘有砂粒和垫饼等，从这些窑具

与器皿的粘连情况分析，其装烧方法有仰烧、覆烧、对口烧三种。仰烧法有二，一为一匣一器，匣钵形式为锅形匣钵，器皿与匣钵的介质，有垫饼、环垫、砂粒三种；二为一匣数器或多至十余器装烧，用身高的筒形匣钵，匣底用砂粒、垫饼或环垫均可，将碗口向上，碗底置于垫上，而后将第二碗的圈足落于第一碗的涩圈上叠烧，有的还洒用砂粒作介质。其次是覆烧法，覆烧法也是叠烧，但不用匣钵，只用盅形支托置于窑面，把碗口向下，内底涩圈落于前一碗的圈足上，器件之间不用介质。为防止搭釉粘连，凡此类装烧器件皆不在涩圈和圈足施釉。这种装烧法，可大大减少匣钵的原料，减少工序，增加窑容量。再次是对口烧，对口烧也可说是对底烧。我们见到的对口烧遗留，是小件双耳罐，口底皆不上釉，口对口、底对底地重叠装烧残件中，有口与口因搭釉连在一起的残件。重庆天目装烧法有精装、筒装两种，而以筒装为主。

陶瓷的生产和它的经济意义是互为因果的。宋代的重庆天目瓷装烧法是为了多方面的需要：精品瓷是为统治阶级所专用，简易装烧的日用瓷器是为了大量供应民间所需。在经济上适应了当时的人民购买力，对发展窑场、发展生产起了有利的作用，从而使这个窑场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

五、其他天目

重庆天目与四川各地民窑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它们的兴衰也是紧密相连的。四川境内专烧天目瓷或以天目瓷为主的窑场，在广元、南充（已被覆盖）、合川、江北、北碚、巴县、重庆等地均有发现。而兼烧其他各类瓷器的窑场就散布得更广泛，如川西的蜀窑、华阳琉璃厂、川东的武胜等，从其工艺过程，无论制作的技术，装烧的方法，造型的风格，窑变的纹饰，釉色的种类，都基本相同，但亦有区别。其中最为优良者，当推重庆天

目。兹略述梗概于下：

(1) 四川天目共同特点

无论是川北广元天目，或川西华阳琉璃厂天目，或川东武胜天目、巴县天目，都是民窑。它们以生产日常用器为主，工艺以圆形器为主，雕琢器仅有少数。造型上最具特点的是，都有敛口小平足盏，大小涩圈碗、盘、敛口钵、直口钵，双耳盖罐，碟形灯，瓷塑小玩具。釉色以黑、褐为主；在窑变纹饰上，兔毫纹是其基本的，玳瑁纹、鹧鸪斑纹只是产量多少不同而已。装烧法可说各地并无两样。

(2) 四川各地天目的差异

重庆天目胎质较广元、华阳琉璃厂窑细而白，不上化妆土。据张福康教授对一土黄色胎的化学组成的分析，是： SiO_2 75.04， Al_2O_3 18.22， TiO_2 1.21， P_2O_5 0.04， Na_2O 0.18 K_2O 2.87， Fe_2O_3 1.77， MnO < 0.01， MgO 0.68， CaO 0.10；烧成温度达130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此 Fe_2O_3 的含量仅1.77，与广元天目胎 Fe_2O_3 5.60悬殊较大。广元窑、琉璃厂因胎质粗糙，含铁量重，绝大多数施用化妆土美化瓷器。窑炉结构上，重庆是馒头窑，广元是阶级窑，尽管阶级窑优于馒头窑，但是由于广元窑原料粗糙，其多数成品不及重庆，特别是窑变纹饰更为逊色，至于曜变，在广元窑还未见到。但另一方面的纹饰，如素胎上绘褐色牡丹、折枝花、压印云雷纹等，在重庆天目中又没有发现，重庆天目的压印花纹在广元天目中也不多见。

总的说来，它们都具有相同的时代风格，由于窑炉不同，胎质不同，产品的精美情况也各不相同。重庆与广元两窑相隔千余里，但相差无几，主要是它们有嘉陵江为通道，互相往来方便，自然给陶瓷手工业经验交流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六、重庆天目生产兴衰简史

重庆天目瓷在史籍里不曾记载，在窑内也未发现有纪年的实

物资料，因而对它的兴衰史，只能根据出土物的造型、纹饰、工艺特征，进行对比分析，以推测其烧造历史。

以王庄、涂山湖、航灯厂附近窑址内出土器形论，绝大多数是两宋作风。仅小湾生产队窑址内出土器形偏早一点，因在表土层之下、文化层之中发现有北宋的青白瓷刻花碟和小平足杯。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层之下，出有一种复式系的双耳黑釉壶（有人称“盞”），其形为侈口、短颈、丰肩，环底内壁满釉，外壁半釉，于颈肩上有附加堆乳钉纹八枚；从总的形式而言，与江西赣州窑之搯座柳斗壶和广元窑之乳钉壶略同，但从双耳为复式系的特点，就四川古墓葬出土物而言，在唐到五代，最迟到北宋初即有此耳饰，到南宋或元初则未见到了。因此我们推测它的时代可早到北宋初期。其次，涂山湖馒头窑内窖藏的金银器有朝阳花瓣形银碗及喇叭状高圈足瓜瓣碗，盃花缠枝牡丹、莲、菊纹碗，与四川绵阳宋墓出土的盃花银碗极似；金花皮上錾刻的折枝牡丹、莲、梅等，属于宋代工艺的典型。再者，涂山湖窑炉之上层烟孔为一侧三孔，与陕西旬邑金元时代的窑炉有相似之处；^① 但我们以整个窑址中未见有任何元代器物之特征和新品种，故认为它至迟当在南宋。还有一点值得参考的，是三十年代美国人葛维汉在黄桷埡的王庄作过调查，确认那是“重庆的建窑遗址”，其时代定为宋代。巴县天目与重庆天目多相同。综上所述，可以认为重庆天目瓷的烧造历史是北宋到南宋末，共经历了百年左右。至于它为什么经历了这么长的历史？又为什么突然衰败下去呢？现提出如下看法：

（1）发生、发展的自然因素

重庆地方盛产瓷土和耐火材料，不仅为古代烧瓷所用，就今南岸地区烧制粗瓷，亦就地取材。煤是烧瓷的重要燃料之一。就近而言，在黄桷埡的王庄附近至今仍能挖出原煤，可供民间烧用；稍远一点，有久负盛名的重庆中梁山煤矿、北碚的天府煤矿、南桐矿区等。关于瓷土的矿藏量，据重庆陶瓷工业公司杨秀逸工程

师调查，南桐区的矿藏量可供长久大量生产之用。

（2）发生、发展的社会条件

第一，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开始，我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到北宋初，全国实现大统一，南北经济得到进一步交流，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大发展。其手工业的猛进，无论是生产规模的大小，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技术水平的先进，以及手工业工人队伍的壮大，都较前代大有进步。商品经济亦日渐蓬勃发展，扬州、成都分别成为空前繁荣的城市。故有东南和四川是北宋末期汉族南迁者“乐土”的说法。成都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生产最发达，巴蜀、江淮、江浙等省不仅是粮食的重要产地，亦是手工业发达之区，重庆是四川联系长江中下游的交通枢纽和重要口岸，能广泛地集散出入于川中的名窑产品，从而促使了重庆天目瓷的兴起和发展。

第二，唐宋时，我国陶瓷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黑釉瓷到了宋代是它的极盛时期，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与宋人饮茶的风尚有密切的关系。

我国饮茶之始，见《晏子春秋》：“婴子相齐……食晚粟之饭……，茗菜而已。”可见周朝已经饮茶。《尔雅·释木》：“槩，苦茶。”晋人郭璞注：“树小似梔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莽，蜀人名之苦茶。”西汉文学家王褒《僮约》中曾说“烹茶尽具，已而盖藏”。又说“武都买茶”，可见我国饮茶风尚的形成始于蜀地；到西汉时期不仅茶为饮料，且已成为商品了。唐肃宗、代宗之际，陆羽著《茶经》说：“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已记载了茶和瓷盏之关系。到了宋代，士大夫阶层讲求“斗茶”、“品茶”。其时饮茶方法又很独特，是“把一种发酵的膏茶碾成细沫，然后用初沸的水点注，茶汤表面浮起一层白沫。这种茶自是以黑釉盏饮茶为适宜。黑白分明才好斗茶，才好品茶”。斗茶在宋初已极盛行；到北宋末，宋徽宗赵佶也常与臣僚“斗茶”。北宋初蔡襄

诗赞颂“兔毫紫瓿新，蟹眼清泉煮”。^⑫ 其后苏东坡《送南屏谦师》，有“道人晓出南屏山，来施点茶三昧手。匆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⑬ 黄山谷词有“冰瓷莹玉，金缕鹧鸪斑”。^⑭ 宋徽宗在他所著《大观论茶》中也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⑮ 这里的“兔毫紫瓿”、“兔毛斑盏”、“金缕鹧鸪斑”、“玉毫条达”，指的都是兔毫纹或鹧鸪纹的天目茶盏。黑釉瓷为当时社会所需，使它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第三，北宋政权南迁后，封建政府的财政支出浩繁，经费筹措困难，而“市舶之利最厚”。这时我国外销物品，以金银、丝绸、陶瓷、漆器为大宗。江南沿海瓷业多有外销任务，势必导致国内民用不足，又唐宋以来，一再颁令禁止用铜作器，这也大大刺激了陶瓷手工业的发展。重庆天目瓷虽不能确知有无外销任务，但它颇能满足国内民用生活之所需。

（2）衰败的主要原因

重庆天目瓷力求工艺简便，经济实用，因此得到了发展。但它固守陈规，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新兴的产品白瓷、青花瓷深受人们喜爱，简便粗糙的黑釉瓷就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市场，使它走向消亡的途径。元明以后，饮茶之风大有改变，喜用白瓷器。明高濂《遵生八笺》：“茶盏惟宣窑坛盏为最，质厚白莹，样式古雅。”明许次纾然明《茶疏·瓿注》亦谓：“茶瓿古取建窑兔毛花者……其在今日，纯白为佳。”黑釉盏在与白瓷茶具竞争中受到了淘汰。

另一社会原因是，南宋晚期，北方蒙古族崛起，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四川是南宋政权最后的支撑者，抗元的根据地，战争的持续时间共达四十年左右。蒙古军所到之处，“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野奥区，今为膏血之野。”四川经过蒙古军的长期屠杀和劫掠，人口锐减；南宋淳熙二年（1177年），四川共有二百六十四万户，人口七百五十余万，但到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就只余十万余户了。这种残酷的战乱摧残，重庆天

泪瓷生产怎能经受得起呢？极盛一时的重庆天目必然衰败下去。

注 释：

- ①⑥ 王景圣译、日本小山富士夫著《天目》，景德镇陶瓷馆文物资料组编印的《陶瓷资料》1978年5期。
- ② David Crackett Graham; Chien Yao Kiln Site Near Chungking, Szechwan载《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10卷1938，第193—194期。
- ③ 赵青云著《河南天目瓷的起源与发展》，《古陶瓷研究》1982年第一辑。
- ④ 冯先铭著《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六期。
- ⑤ 丁炯译，日本奥田直荣著《天目》，德川美术馆、根津美术馆编集。1982年中国古陶瓷学会学术讨论会论文。
- ⑦ 叶宏明著《曜变、油滴和兔毫》，《河北陶瓷》1982年1期。
- ⑧ 日本山崎一雄于1982年11月参加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发言与所著《特种天目茶碗，曜变和油滴的科学研究》，见《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文摘》，1982年11月。
- ⑨ 同⑦；又叶宏明著《曜变天目黑釉瓷》，《硅酸盐通报》1982年3期。
- ⑩ 重庆天目生烧器系承重庆瓷厂卢汝湘工程师试烧。
- ⑪ 咸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旬邑安仁古瓷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
- ⑫ 《蔡忠惠文集》卷二《试茶：北碗十咏之六》，万历双瓮斋刊本。
- ⑬ 《苏文忠公诗集》卷31，11卷。
- ⑭ 《宋六十名家词·山谷词》《满庭芳·咏茶》。
- ⑮ 《大观论茶》，清顺治三年浙江委宛山堂本，《说郛》引九十三。

（原载《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2期）

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

“《吕氏春秋》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亦见尸子。”

——朱琰述《陶说》卷二，页一，严一萍选译《百部丛书集成》中《龙藏秘书》艺文印书馆印行本

“宋叶寘《垣斋笔衡》云：陶器自舜时便有。三代迄于秦汉，所谓甃器是也。此必叶公仅依《周礼·考工记》有虞氏上陶。《礼记·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韩非子》虞舜作食器。《史记·五帝本纪》舜陶河滨，作什器于寿邱诸书等句而云然耳。予尝阅《汲冢周书》有云神农作瓦器。《路史》有云燧人为釜。《物原》有云神农作瓮，轩辕作碗碟。《紺珠》有云瓶罐同，神农制。《吕氏春秋》有云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说文》昆吾作陶。《春秋正义》少皞有五工，正埴埴之工曰陶埴之文，则陶甃上古已有，不自舜始也。意《考工》《礼记》《韩非》《史记》皆称有虞氏者，盖以上古太朴陶器只如今黄土地上之质，至舜而制度略备，精粗有别，故有泰尊食器之作尔，其称上陶者上与尚通，谓舜至质贵陶器也。当训好尚，不作上下之上解。”

唐氏肆考

——兰浦滨南氏原著郑廷桂问谷补辑《景德镇陶录》卷九页七，《美术丛书》本。

“凡陶埴(读若甫郑康成读若放)之事，髻鬻薛暴，不入市。”

“郑司农曰，髻读为刮，薛读为药，黄药之药，暴读为刺(或音谷)髻顿伤也。薛，破

聚也。暴、扶起不整致也。”

——《冬官考工记下》，《四部丛刊》本《周礼》卷十二、页七。

“碗 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

——唐陆羽《茶经》，《说郛》卷八十三，页十，据明钞本涵芬楼藏板。

“自暖杯 内库有青酒杯，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以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次如沸汤，名自暖杯。”

——冯贲著《云仙杂记》卷七，引自《开元天宝遗事》，丛书集成本。

“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槨，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槨为纵目冢也。”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四部丛刊》本卷三，页二。

“临邛夹门镇山险处，得瓦棺，长七尺，厚几二寸，与今木棺略同，但盖底相反，骨犹不坏，棺外列置瓦器，皆极淳古，时靖康丙午岁也，李知几及见之。”

——宋陆放翁《老学庵笔记》卷五，页四十二至四十三，《丛书集成》本。

“西山八国，琼古已来，为中国西南之患也。自蜀武侯擒纵之后，方通诚款。唐鲜于仲通将领博海等军六万众，殁于鬼王按《学海》本作王之谋，遂至姚蛮生心，数侵黎嵩，量由非才也。近又李福尚书镇西川，牛丛为貳车，日南蛮直犯梓潼，役陶匠二十万烧砖，欲塞剑门。蜀有五丈天王者，宝历中所置也。”

后蜀何光远撰《鉴诫录·判木夹》《丛书集成》本卷二。编者按：论文云：“唐末，蜀主竟能役陶匠二十万烧砖塞剑阁”，烧砖欲塞剑门，乃李福尚书，非蜀主也。盖作者引用有误。

“凡白土曰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太原平定，开封禹州；南则泉郡德化土由永定窑在德化，徽郡婺源祁门，他处白土，陶范不粘。或以扫壁为慢”。

——《天工开物·陶埏》第七卷，白瓷附青瓷条，明崇祯十年刊本。

“太史奏曰：窑门出天子，有诏去城七里内诸窑尽废之。”

——唐赵元一撰《奉天录》

编者按：《丛书集成》版《奉天录》卷一“户部侍郎赵贇上封事，请税三辅两几居宇间架，及取两市富商大贾，于西湖，慈恩二寺置院检纳，贪吏深文，怨及社稷。太史奏曰窑门出天子，有诏去城七里内诸窑尽废之”这段文前，无“蜀主都门附近，窑门甚多”句。

“照书烛必令粗而短，勿过一尺。粗则耐，短则近。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盏最省油。蜀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半。灯檠法，高七寸，盘阔六寸，受盏圈径二寸半，择与圈称者。”

——《陆放翁全集·斋居纪事》，汲古阁本。

“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灯盏诗。今汉嘉有之，盖夹灯盏

也。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盞为火所灼而燥，故速干，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邵公济牧汉嘉时，数以遗中朝士大夫。按文安尝为玉津令，则汉嘉出此物，几三百年矣。”

——宋陆放翁《老学庵笔记》，丛书集成本编者按：《蜀中广记》卷六十八亦载其事，惟无邵公二句。

“大邑瓷碗《杜工部集》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按《说文》碗小孟也。字或作碗。汉淮南王传注食器杯碗之属。杨升庵述宋林少颖语谓案古碗字，张平子青玉案，即青玉碗。南京人谓传碗为案酒可证。《枢要录》言载家冷物用硫黄碗，热物用冷水瓷碗。瓷碗自唐时盛行内邱属邢州，如《国史补》所云，邢碗亦重于天下，大邑属邳州，色白而坚且轻，扣之有韵味，工部诗瓷碗之上品矣。茶经并不列之……。”

——朱琰《陶说》卷五，页三，严一萍撰辑《百部丛书集成》中《龙威秘书》艺文印书馆印行本编者按：乾隆十四年宋载纂修本《大邑县志》卷四《艺文》载：“咏大邑瓷器 唐杜甫“大邑出瓷轻且坚，叩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干雪，分送茅斋也可怜”。有誤。

“陈文惠丞相家，收一蜀王衍时皇太子陶砚，连盖，盖上有凤坐一台，余雕杂花草，涅之以金泥红漆，有字曰凤凰台。此制方直，上狭，笋在砚上，中甚平也。”

“杭州龙华寺，收梁傅大夫瓷砚一枚，甚大，瓷褐色，心如鍬，环水如辟雍之制。下作浪花摆环近足处，而磨墨处无瓷釉，然殊着墨。”

——米芾《砚史》，《丛书集成》本。

“吴越秘色窑 钱氏有国时，越州烧进。高斋漫录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

按王蜀报朱梁信物有金棱碗，致语云：金棱合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则秘色是当时瓷器之名，不然吴越专以此烧进，而王蜀亦取以报梁耶。”

——米珎笠亭述《陶说》卷五，严一萍撰辑《百部丛书集成》中《龙威秘书》，艺文印书馆印行本。

“宋叶寘《坦斋笔衡》云：陶器自舜时便有，三代迄于秦汉，所谓甃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宋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瓷，遂有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宵盛沆瀣，共稽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氏已有，非始于钱氏。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制，釉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牟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陶宗仪《辍耕录·窑器》卷第二十九，页四四六至四四七《丛书集成》本。

“……为至正德初，侍于今上，尤重其能，屡命于琉璃厂董督陶冶，建诸瓴壁。自是工不告劳，事多就绪，上下咸得其欢心……。”

——明嘉靖二十一年太监《丁祥墓志铭》，碑藏四川省博物馆。

“蜀窑 唐时四川邛州之大邑所烧体薄而坚致，色白声清，为当时珍重。杜少陵集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首句美其质，次句美其声，三句美其色。蜀窑之佳，已可想见。案《辍耕录》引《笔衡》载有续窑，疑续即蜀误，唐氏又以大邑瓷隶越窑下，说又误矣。”

——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七《美术丛书》本。

“定州让巧薄，邛邑斗轻坚。”

——《渊颖集》卷二，元吴莱《大食瓶》诗句，
《丛书集成》本。

“清泰二年九月……王贡唐锦绮五百连，金花食器二千两，金陵秘色瓷器二百事。”

——仁和吴任臣志伊氏撰《十国春秋·文穆王世家》卷第七十九，页六

编者按：“文穆王名（钱）元瓘，字明宝，初名传瓘，及即位更今名。”

掇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功剡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漘。中白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

——《全唐诗》卷七百十，页八一七四，徐夔《贡余秘色茶盏》诗，中华书局本。

“皇后既立，后宠少衰，而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

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门限也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缸，函兰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

——《汉书·孝成赵皇后传》卷九十七下外戚传第六十七下，校点本。

“冰壶精鉴，遥清玉垒之郊；霜镜悬明，下映金城之域。”

王勃《王子安集》《益州夫子庙碑》，四部丛刊集部卷十三。

“由是金城逆顺，山河假成器之因；玉烛浮沉，风火兆流形之藁。”

——王勃《王子安集》，《彭州九陇县龙怀寺碑》四部丛刊集部卷十三。

编者按民国三年版《全蜀艺文志》“金城逆顺”作“金机逆顺”，“玉烛沉浮”作“玉烛浮沉”有误。“金城山在彭州”。“金城即阳平化也。”

——《元一统志》卷五。

“磁峰场、旧名冯衙，镇在西乡鹿坪里，距县西北六十里，东南至隆丰场四十里，乾隆十六年设。”

——张龙甲撰《彭县志》光绪四年重修本，卷二。

“广元陶业似早，考县北磁陶堡当在明时，其成陶之器不悉何时没于水，每当水落，常于河干掘获小缶，质同今之母家山陶，因陶没而业歇。”清之著名陶器，以羊模坝之瓮罐火碗为佳，瓮可一石，罐耐火炼，火碗味佳，世守其业，未之或停。大石（堡）之母家山，陶磁并出，磁属粗料，陶则细质，磁业现犹经营，陶则停矣。五郎之磁业亦粗质，水磨有细磁料，无识而营之者。沙陶业，县之北门外炉罐为主，质劣而不耐久，未若甘雀品质之佳。”

——《重修广元县志稿·陶瓷业》第三编，页一〇二，1930年版。

“长石，分布县属南北二山，其晶形劈开面互成直角者为正长石，不成直角者为斜长石，表面有真珠光泽，但易受风雨剥蚀，分解为陶土、磁土、粘土。”

“陶土，县北东山堡羊模坝，取制陶器最良，大石堡之母家山及磁窑堡均佳。”

“磁土，县东流坪与大石，取制土碗，水磨虽有，无制器者。”

——《重修广元县志稿·物产》第三编，页九十六
编者按：乾隆二十二年张賡谟纂修《广元县志》本，无以上记载。

“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直立，易以取乳；宽则运筯旋彻，不碍击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小大。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

宋徽宗《大观论茶·盏》《说郛》卷五十二，页十三至十五，据明钞本涵芬楼藏版。

“兔毫紫瓿新，蟹眼清泉煮，雪冻作成花，云闲一作开未垂缕，愿尔池中波，去作人间雨。”

——《蔡忠惠文集》卷二《北苑十咏之六》，清逊敏斋刻本。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施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乱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

——《蔡注分类东坡先生诗》，《送南屏谦诗》

《四部丛刊》本卷十三，页十一至十八。

“政和官焙来何处，雪后晴窗欣共煮，银瓶瑟瑟过风雨，渐觉羊肠挽声度，盞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

——释德洪觉范《无学点茶乞诗》《石门文字禅》卷八页十一《四部丛刊》本。

“鹰爪新茶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细参六一泉中味，故有涪翁句子香。日铸建溪当退舍，落霞秋水梦还乡。何时归上滕王阁，自看风炉自煮尝。”

——《诚斋集》卷二十，页七，庐陵杨万里秀廷《以六一泉煮双井茶》诗。

“烹茶器具，已而盖藏。”“武都买茶”。

——王褒《僮约》，《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四十二，页三五九

编者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亦有王褒文集。僮指“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髻奴便了，决价万五千”。

“茶盞惟宜窑坛盞为最，质厚白莹，样式古雅。”

——明高谦《遵生八笺》卷十一，页十二。

“茶瓯、古取建窑兔毛花者，亦斗碾茶用之宜耳。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定窑最贵，不易得矣。”

——明许次纾然明《茶疏·瓯注》《丛书集成》本，页七。

“北苑龙团，江南鹰爪，万里名动京关。碾轻罗细，琼蕊暖

生烟，一种风流气味，如甘露，不染尘凡，纤纤捧，冰瓷莹玉，金缕鹧鸪斑。相如方病酒，银瓶蟹眼，波怒涛翻，为扶起尊前，醉玉颓山。饮罢风生两腋，醒魂到明月轮边，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窗前。”

——《宋六十名家词·山谷词》《满庭芳……》，
中华书局聚珍本。

巴蜀在中国文化上之重大贡献

傅振伦

上略……

陶 瓷

四川古代陶器，除新石器时代遗物外，似以汉墓之明器为最古。其色灰少而红多，殆火候之关系也。其形制多奇拙。隋唐明器，出土亦多。余于蓉市见唐代陶制三级浮图，高一尺有奇，旁刻造铭文曰：“大唐显庆元年四月朔八日，弟子□□良为□母许氏患病，敬造三级宝塔一座。”铭文伪作，然物则真也，闻出自土中。其所谓唐三彩（三彩者，即黄、绿、青三色也）陶俑者亦有发见。尝于成都见有三彩罗汉像，川北所出，高尺余，袈裟色浓绿，而边缘棕色，惜制作欠精耳。二十九年（1939年）四月十九日，成都东门外发见此类土俑十有一件，其一为人首蛇身妇人，岂象女娲者欤！《鉴诫录》曰：“唐末，蜀主竟能役陶匠二十万，造砖塞剑门。”其陶工之多，更可推知！

四川瓷器，传世者以唐之大邑窑器为最有名。《杜少陵集·于韦少府班觅松树子》，《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曰：“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盖咏其洁白、坚薄、声清、和韵也，但传世精品不多。民国二十四年邛崃城外十里之郊，发现青绿器多件。二十五年六月，某军人大肆搜掘，获器甚多。其物因流传市上，远及沪滨，世人呼为邛窑瓷器。龚煦春先生并撰《邛窑器考》，物故后，稿

亦不知流落何所矣！按邛窑之器，釉色多青、绿、而黑、白间有之。胎骨白而器重，多碗、碟、瓶、尊。又有所谓省油灯盏者，发现不少，考其制作，见于陆游《斋居纪事》，其文曰：“照书灯必令粗而短，勿过一尺。粗则耐，短则近。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盏最省油。蜀有夹瓷盏，注水唇窍中，可省油之半。灯檠高七寸，盘阔六寸，受盏圈径二寸半。择与圈称者。”放翁所著《老学庵笔记》又曰：“宋文安集中有省油灯盏诗，今汉嘉有之，盖夹灯盏也。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邵公济牧汉嘉时，数以遗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尝为玉津令，则汉嘉出此物，几三百年矣。”按宋文安公，即宋白，字太素，大名人。蜀平，曾为玉津令。（时西元九六五年）生于晋天禧元年（936年），卒于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正月，年七十七。有司谥白为文宪，内出密奏，言白素无检操，遂改文安，有集百卷，其事详《宋史·文苑传》。太素去放翁三百年也。邛窑省油灯，今多有之。余藏一器，乃宋琉璃厂窑所制，胎骨釉色，均欠精。现在抗战，大后方油料，甚感缺乏，而应仿制，以节物力也！

成都古玩铺中，又有所谓蜀窑器者，后世或称续窑。蜀窑多佳器。《景德镇陶录》称其器“壁薄而坚致，色白声清，为当时所珍重”。余于徐森玉先生处，见蜀窑秘色印花牡丹瓷碟，又于马洗繁先生处，见蜀窑月白半脱胎划花花卉瓷盏。一口径不及二寸，一不过三寸，皆薄净可爱，诚上品也。唐氏《肆考》前蜀王坚报朱梁信物有金陵碗，致语“金陵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盖唐末蜀瓷，已臻上乘，殆非虚也。

五代后蜀孟氏有国时（925至965年）成都东郊有琉璃厂窑，今传世之器，粗陋可憎。胎骨似黑泥，甚粗劣，釉不能伏全器，露胎，而釉色一同邛窑，亦有黑、白、青、绿等品，世人与邛器相混，不能分辨。实一粗一精，至为显然也。

《奉天录》曰：“蜀主都门附近，窑门甚多，太史奏曰；

‘窑门出天子’。又诏：去城七里内诸窑，尽废之。”陶瓷之盛可以想见。而大邑、邛州、蜀、续、琉璃厂等窑，至宋仍行烧造也。巴蜀在吾国陶瓷史上之地位，其重要如此。四川境内，今时有龙泉、钩窑器出土，闻彭县海窝子普照寺等地，今仍能仿古为之。夹江、洪雅一带，又有汝窑器之出土，此等器用为川省自制，抑或来自外省，则不知矣。宋叶寘《垣斋笔衡》曰：“本朝磁器，……江南则处州龙泉窑。……中兴后……如乌泥器者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续窑即蜀窑，殆私窑之著名也。

古器亡矣，今多不可见。民国以来，川省造瓷者不少。有川北板厂，有资中之兴华瓷业公司，有威远之新华瓷厂，隆昌之大成公司，有烧酒坊（即安富场）之混金陶场，有大足之昌州制瓷公司，有泸县之川瓷公司，有重庆之川东瓷业公司，有巴县之蜀瓷公司。抗战之后，间或停辍，然新成立者亦不少。如巴县沙坪坝之陶瓷示范工厂，小歌乐山之瓷厂，江津之瓷厂，在工业上均有所贡献。

（录自《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第三卷第七册1944年）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

编 后 记

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邛崃县召开，现编辑《四川古陶瓷研究集》，提供给“两研会”会员及古陶瓷爱好者作参考资料之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所收入本书的文章，按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分综合、专题论述两部分。

凡解放前后发表的四川古陶瓷文章，俱注明其发表刊物、时间。至其它书籍点滴资料，以及墓葬发掘报告及简报中有关的陶瓷资料，均未收入。

凡采用解放前未经正式发掘的古陶瓷窑址资料所写的论文，皆已收入本集，以供参考。至于文中所附的图、照片，均未收入。

凡本书所引用之原始资料，都经一一查对，其有错误遗漏者，悉按原书校正，并将书名、卷页、作者、时间、版本注出，按文章排列次序，编成《四川古陶瓷有关文献资料辑录》，附于集，后以便读者查阅，间加编者按。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凡具有学术探讨性的文章，完全保持作者的观点。

在收集、校对、复印工作中，得到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四川古陶瓷研究集》编辑组

1983年12月1日